

我的叔叔费孝通

费皖◎著

My Uncle Fei Xiaotong

费孝通 (1910~2005)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





我的叔叔费孝通
My Uncle Fei Xiaotong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205-06882-0



9 787205 068820 >

定价：28.00元

我的叔叔费孝通
My Uncle Fei Xiaotong

费皖◎著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费皖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叔叔费孝通/费皖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205-06882-0

I. ①我… II. ①费… III. ①费孝通 (1910~2005)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9475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18

插 页: 1

字 数: 230千字

出版时间: 2010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 喃 张 洪

装帧设计: 郝 强 路 征

责任校对: 高 辉

书 号: ISBN 978-7-205-06882-0

定 价: 28.00元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去世。

费孝通首先是我的叔叔，~~舅舅~~是人们叫惯了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兄弟姐妹当中，我父亲是老大，他是老五，所以我也叫他五叔。对于五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了解得并不多，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使我能经常陪伴在他身边，一来二去，或许也可说是耳濡目染，逐渐懂得和明白了一些他对人和做事情的道理，对他便更亲近和尊敬。

五叔虽已离我而去，但是在我心里，他俯身在堆满书籍、报章的书桌前写作的样子；他的一口吴侬乡音依然那么清晰，萦绕在耳，真真切切——像是在讲述着什么，交代着什么事情……

写在前面

一次偶然的机，我陪叔叔一起出差。那是1983年的事。这年3月，叔叔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7月的时候，黑龙江省卫生厅通过我的一位同学发出邀请，要孝通叔叔到哈尔滨去讲学。我的这位老同学面子真大。或许因为有老同学这层关系，叔叔想到了我，并要我和他走一趟，在旅途中也好照顾一下。陪他出差，我说这事简单，买两张火车票走就是了。不想叔叔摇摇头说：不行、不行，现在不自由了，不像过去，现在一行一动都要报告的……

那时叔叔正在为重建社会学和搞他的学术调查忙碌着，同时因为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所以盟内的工作也很多。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以后，中国民主同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各项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这次叔叔去哈尔滨，除了到卫生厅讲学，和黑龙江省政府有关部门相互沟通之外，还有拜访当地民盟同志的任务。所以在出差前，我按照他的吩咐先到民盟中央机关办一些必办的事情，这一来和民盟中央办公厅的金若年同志接上了头。金若年是民盟的老人儿，解放前就在民盟工作，跟我父母都熟悉。几次接触之后，他索性建议我到民盟机关来工作。我那时有几种选择，尚在犹豫当中，考虑再三，最终接受了这个建议。陪叔叔从哈尔滨回来后，我下决心调到民盟，

成了民盟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盟的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创造了许多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形式，民盟中央开展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为了开展这项工作，民盟中央于1988年成立了区域发展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民盟中央领导同志在做区域经济研究时提供服务，以及处理一些相关事务。我便最终落脚在这个委员会。

从1982年起，叔叔在作学术研究时，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转移到社区调查方面，紧密地和区域战略规划研究结合了起来，同时，一直在考虑为“民盟怎样利用好自身的智力优势，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富有成效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找一条路子。当他担任了民盟主席以后，就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民盟的工作结合起来，发动全国各地有条件的民盟组织，和他一样协助政府搞调研，为当地经济发展提建议。作为盟中央区域发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就跟着他一起忙活。

后来，为了准备出版《费孝通文集》，领导又指派我负责整理叔叔的文章。这个工作逼得我不得不把收集到的、几十年来他所写的文章，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尽管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并没有费脑筋去思考，甚至有的还读不



在《费孝通文集》首发式上。

很懂，但是却让我了解了他从14岁开始到80多岁的这段时间里都“想”了些什么。

1999年10月，叔叔90岁生日前夕，500多万字的《费孝通文集》（14卷本）终于问世，这是我们几个参与编辑这套文集的同志送给他的生日礼物。2001年和2004年，又分别整理出版了《费孝通文集》第15卷和第16卷。

从1983年算起，20多年来，我有机会经常陪伴在叔叔身边，看他做事，听他讲话，读他的文章，不仅增长了知识，也更加深对他的了解，感情一天天亲近。



◀ 《费孝通文集》出版后，责任编辑给叔叔送来样书。

目录

写在前面 | 01

如磐岁月 | 01

- 一、十一岁时才知道有个叔叔叫费孝通 02
- 二、“三凤齐飞” 07
- 三、思想改造 12
- 四、经历反右 19
- 五、我们费家还没有当工人的，你是第一个，不简单 43
- 六、说“家世” 53
- 七、叔叔听我讲故事 67
- 八、“要不要去苏州的票？” 74
- 九、孝通婶妈 78
- 十、给潘公公“看病”，替浦熙修买“砒霜” 88
- 十一、干校生活 98

老树新枝 | 121

- 十二 “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 122
- 十三、“查三代容易做，但一个人的本领没法从三代上查出来” 131
- 十四、“为今后参与发展东北亚国际竞争准备实力” 135
- 十五、“上书紫光阁” 141
- 十六、叔叔的“本领” 146
- 十七、“石碑埋又立” 156
- 十八、到六巷 164
- 十九、“哪儿穷就去哪儿” 172
- 二十、广宗扶贫 178
- 二十一、希望一生中能够亲自去拜访中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 187
- 二十二、关于“百分之百”的对话 204
- 二十三、家乡的凤尾菇和卡拉汉访苏北 209
- 二十四、真秘书，假秘书 214
- 二十五、遭遇“非典” 222
- 二十六、最后冲刺 263
- 二十七、谢幕 273
-

如磐岁月

十一岁时才知道有个叔叔叫费孝通

“三凤齐飞”

思想改造

经历反右

我们费家还没有当工人的，你是第一个，不简单
说“家世”

叔叔听我讲故事

“要不要去苏州的票？”

孝通婶妈

给潘公公“看病”，替浦熙修买“砒霜”

干校生活

一、十一岁时才知道有个叔叔叫费孝通

为什么到 11 岁时才知道有个叔叔叫费孝通呢？这是因为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叫棉兰的地方，在国外我们家没有亲戚。再加上我出生那年，正赶上“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国内爆发了抗日战争，局面很乱。等我长大一点，4 岁那年，父亲因为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荷印殖民政府（那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驱逐出境，全家被迫搬到了新加坡。但是还没等我们安顿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鬼子长驱南下，很快就打到新加坡附近。妈妈只好带着我们姐弟四人离开新加坡，开始了逃难生活。记得在去爪哇巴城（雅加达）的路上，我们乘坐的轮船，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旅客都躲到餐厅的桌子下面，在爆炸声中，轮船激烈地震颤着。时间不长，空袭过去了，大人们纷纷议论，有人说这几架飞机大概不是专门来炸我们的，要不然不会扔这么几颗炸弹就飞走了。但是就这几颗炸弹，也把船头甲板炸了个大窟窿，还炸死了两名水手。我还依稀记得，这两个水手是用白布裹好后，从船舷上被推到海里的。妈妈说这是“海葬”，在大海上死的人都这样。我们到巴城不久，日本人也打到爪哇。妈妈又拉扯着我们逃到石叻班让，与先期流亡到那里的父亲会合。

石叻班让是苏门答腊东海岸边上的一个小岛，离新加坡不很远。日本人因为兵力不够用，没有在岛上驻军，不过他们隔一段时间会到岛上“巡视”一下，或者来抓人，我就曾看见日本兵把和我们一起逃难的王叔阳和郭后觉两人抓走（后来郭先生死在集中营里），据说是因为他们都戴眼镜，看样子像知识分子。父亲也戴眼镜，那天恰巧不在，没有被抓。后来只要听说日本人来，他就赶紧躲到山巴里去。日本人上岛“巡视”的时候，会有人组织一些群众到路边“欢迎”，小孩子是一定要去的。欢迎的时候人们要不停地喊“邦塞”，邦塞在日本话里是万岁的意思，这两个字的发音恰好和当地华侨说的福建话“拉屎”的发音很像，所以每次我大声喊“邦塞”的时候，心里是在骂这些小日本“吃屎去吧”。



▲
1948年6月回国前夕，我们班同学和老师为我送行时拍的照片。前排左一坐着的小孩就是我。

石叻班让虽小，却有一所小学，妈妈把我送去那里上学。课程里有一门日语课，从“阿义务诶哦”学起，我很不情愿学这东西，所以每到上日语课时，就故意不听、不念。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就六七岁，却会有这样强烈的“反日”情绪，大概是受父母和整个身边环境影响的吧。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但是国内，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起了内战。印尼这里也不平静。日本刚一投降，印尼就宣布独立，准备接管政权。同时，作为盟军的荷兰军队，也想趁此机会卷土重来，恢复战前荷兰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印尼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加上荷兰殖民势力的侵入，造成了战后一段时期，印尼局势非常混乱。就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沦陷时流亡到苏门答腊的胡愈之^①、王任叔^②等人先后抵达棉兰。我父亲也回到棉兰担任华侨总会秘书主任。

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印尼的华侨中间，明显地分成支持共产党的“民主派”和追随国民党的“反动派”。棉兰华侨中的进步人士，在胡愈之、王任叔的领导下，由我父亲和邵宗汉等人出面，成立了苏岛华侨民主同盟（后经民盟总部批准为中国民主同盟苏岛支部）。通过民盟，团结广大侨胞，与追随国民党的“反动派”进行斗争。

为了打击民主派，国民党驻棉兰领事勾结当地政府，于1947年8月，将王任叔逮捕（胡愈之已先期去了香港），关押在棉兰海口集中营，企图引渡到国内。后经各方营救，荷印当局把他驱逐出境，这样王任叔去了香港。一年后，荷印政府故伎重演，把父亲和邵宗汉驱逐出境，同时通知说，英国政府不准你们在英属殖民地登陆。也就是说，父亲和邵先生离开棉兰后，不能去新加坡和香港，这样一来如果回国，只能在国民党盘踞的汕头上岸了，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事情紧迫，父亲和邵先生商定，马上跟香港民盟总部联系，同时打电报把情况告诉在北平的费孝通。

1948年8月，当我们拿着去汕头的船票，登上驶向中国大陆的“万福士”号邮轮时，还没有得到来自大陆的任何

①胡愈之(1896—1986年)，作家、翻译家、新闻出版工作者及国际问题专家。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加入民盟。1940年奉命赴新加坡，在侨胞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后，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1946年在南洋建立民盟组织。翌年，召开了民盟马来亚支部第一届全马代表大会，任支部主任委员。他还是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民盟中央主席史良逝世，他任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历任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

②王任叔(1901—1972年)，笔名巴人，文艺理论家、作家、诗人和翻译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发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主持过社会科学大学。1941年奉周恩来指示去美国办《华侨日报》，后因护照难办而改去新加坡。与胡愈之并肩战斗，一同流亡印尼。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第一任大使出使印尼。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等职。1960年“反右倾”时，被定为资产阶级“人性论”代表人物，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期间屡遭批斗，几次因脑血栓昏厥。1970年被遣返原籍奉化农村。由于得不到医治，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由精神分裂症发展到癫狂的程度。1972年含冤而歿。1979年终得平反。



▲
我们全家和刘岩（王任叔夫人，前排右一）、邵宗汉（前排右二）在“万福士号”甲板上合影。

消息。轮船经过新加坡时，因为要在港口过夜，新加坡警方如临大敌，把父亲和邵先生押上岸，在牢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快开船时才把他们送回来。就在“万福士”驶离新加坡不久，船长突然通知父亲：你们可以在香港登岸了。后来，当提起这段往事时，父亲说：上了万福士号，心一直悬着，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船长说了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才放下心来。也不必多问，心里明白就是了。^①

船到香港，民盟总部的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到码头来接我们。后来听说万福士号抵达汕头时，国民党特务早在码头“恭候”，却扑了空，胡乱抓了几个人了事。

我们一家在香港暂住下来。父亲被安排到达德学院教书。但是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六口之家的生活是困难的，于是妈妈把我和哥哥送到上海霍叔叔家，把大姐、二姐送到北平的青叔叔和孝通叔叔那里。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父亲费振东在家里是老大，下面有十个弟弟妹妹。老二是姑姑费达生，老三费青，老四费霍，老五费孝通。在孝通叔叔十几岁的时候，

^①“我的大哥费振东原在印尼做华侨中的爱国民主工作，民盟负责人之一。受荷兰殖民政府拘捕，并接受国民党领事要求，押送台湾，同时拘捕的有邵宗汉（现在在外交部）。我得信，就托当时在北平的一个美国人巴格（Borg）去电香港大学校长的女秘书，设法在彼等经过香港时截救。港大校长出面保彼等在港登陆。”——摘自“文革”时费孝通的《综合材料》手稿。

我的祖母病故，祖父续弦后，又育有费开、费定、费球、费中、费璇、费奇六个子女。妈妈在提到这些叔叔姑姑的时候，特别提到孝通叔叔文章写得好，年轻人都喜欢看写的东西，如果报纸上登了他的文章，这天的报纸就卖得快。所以我很早就知道孝通叔叔会写文章。

那是 1948 年的事。当时我 11 岁。

二、“三凤齐飞”

父亲在香港滞留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解放；第二年（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蒋介石宣布下野；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大局已定，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建立新政权了。3月，父亲和其他人一起，在共产党的安排下，乘船离开香港，经塘沽回到了刚解放的北平，参加筹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

这时候我和哥哥在上海霍叔叔家已经住了大约一年。上海一解放，妈妈就赶来接我们，乘坐解放后从上海开出的第一列火车回到北平，一家人团圆了。我和哥哥一到北平，父亲就带我们去沙滩中老胡同看望青叔叔，又去清华园胜因院孝通叔叔家。和这两位叔叔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两位叔叔摆满一擦擦书籍的房间，似乎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忘不了的是他们说话的时候，不时会用一个小小的喷雾器往嘴里喷点药，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有哮喘病的缘故，话说多了会感到憋气。大概是家族遗传，我也有这个毛病，知道喘起来是很难受的，看到这样小巧的喷雾器还真羡慕。可恶的哮喘病一直拖累着两位叔叔。尤其是青叔叔因为这个病，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十分痛苦。孝通叔叔则在上世纪50年代末，接受一种从苏联传入的“组织疗



法”——在肚皮下植入一只小鸡胚胎。但是小鸡胚胎植入以后，病没有治好，从此肚子上的脂肪反倒越积越多了。

父亲到北平后，和三弟、五弟相聚，兄弟久别重逢，格外高兴。一次，三人去拜望来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亚子先生是我祖父的好朋友，他的母亲费漱芳是费家一位远房姑奶奶，所以和费家还沾点亲戚，论起来亚子先生应该是父亲他们的姑舅。见面后亚子先生很高兴，即席赋诗相赠。

▲
三兄弟合影（左起费孝通、
费振东、费青）。

诗云：

松陵门第旧高华，三凤齐飞汝最高。
季子北平同讲学，长君南海早乘槎。
交情远溯追名父，亲谊还应念舅家。
漫笑文人封建习，一诗题赠喜天涯。

我们是9月到北平，没过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十一那天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倒不是因为它的伟大意义让我忘不了，而是因为这一天，我是从很近的地方，看到了开国大典上解放军威武雄壮的阅兵式，那个威武雄壮的场面让我永生难忘。

那时候，父亲还没有分配工作，我们全家暂时住在王府井南口的大饭店里，就是现在的北京饭店，过去的饭店可没有现在的高，我们住的房间正好对着长安街。记得十一那天上午，外面静悄悄的，从窗口望出去，长安街上整齐地站满解放军战士，还有骑兵，让我奇怪的是，那些军马真听话，它们站在那里，乖乖的不叫唤、不乱跑，也不乱拉屎。妈妈指着街上的解放军告诉我：今天是大日子，毛主席要在天安门阅兵。下午，天安门那边放起礼炮，检阅开始了，我赶紧搬把凳子到窗户前，站上去往外看，不久开来一辆吉普车，妈妈说，车上站着的是朱总司令。接着阅兵开始，一队队解放军战士，伴着激昂的军乐，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天安门方向前进，后面还有炮队、坦克车，好威武啊！晚上爸爸妈妈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去了，我和哥哥跑到街上，挤在又唱又跳的人群里瞧热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在人们眼里，新中国充满勃勃生机，就像初茁的花苞，感到特别美妙可爱。在共产党的召唤下，群贤毕至，人人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建设一个新政权努力工作。

父亲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为新中国的诞生感到欢欣鼓舞，都想为振兴

国家尽力。父亲作为“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后来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任该委员会文教宣传司司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后，被选为人民代表，同时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1952年出任北京归国华侨补习学校校长。

费青在北京大学任法律系主任和北京政法学院教务长，主持两校的教学工作，同时还担任新中国最高法院委员、法制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为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而忙碌。

费孝通更是公务缠身，除了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主持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之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他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访问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返京后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院长乌兰夫）；1954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三兄弟各自忙自己的工作，就很少有时间相聚了。



1949年父亲（后排右一）作为国外华侨民主人士，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三、思想改造

1949年秋天，我进了华北育才小学，读四年级。这是一所从解放区迁来的干部子弟学校，校址在先农坛，很大，学生都住校，星期六才能回家，星期日傍晚返校，点名，上晚自习。1952年毕业，考进了师大附中二部（即师大第二附中）。这也是一所寄宿制干部子弟学校。后来改名为一零一中学。校址在圆明园。从小学到高中，我在学校住了将近十年。

初到一零一中学的时候，孝通叔叔还住在清华园。圆明园离清华园不远，假日的时候我常去他家玩。每次去，总能看见不少年轻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这种“热闹”的场面据说是“传统”的。听

▼
叔叔一家和我母亲（左一）、
两个姐姐在清华园胜因院住
宅院子里（1948年）。



二姐说，解放前每到星期日，总会有很多学生到家里来，吵吵闹闹地讨论问题，有时到中午也不走，五婶就热情地招呼他们一起吃饭。二姐跟其中的一些人混得挺熟，他们中间有的人会突然“失踪”不知去向，过几天就会传出这个人去了解放区的消息。二姐还从他们手里借过《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类苏联小说。解放军围城的时候，清华园已经解放，大姐从城里青叔叔家跑到清华园（围城时，白天并不关城门，大姐和北京大学一个学生骑自行车出西直门，通过一段“无人区”到清华），跟大学生们在一起。解放军进城的前一天，她们没跟五婶说一声，就同一群大学生进城，一夜未归，准备参加第二天的解放军入城式。这下可急坏了五婶——“兵荒马乱的，不声不响就走，万一出了事，让我怎么向你们的妈妈交代！”当两个姐姐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时，被五婶劈头盖脸地狠狠训斥了一顿。

二姐说的是解放前的事，而我来到这里，并不理会那些学生谈论什么，而是先到厨房，我知道五婶一定会在那里忙碌着。五婶和我妈妈是读师范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又在南洋一起教书，所以对我特别关爱，每次见到我，都会给我好东西吃。她烧得一手好菜，做的红烧肉最香。但是没过多久，叔叔一家就搬到民族学院去了。

叔叔在上世纪 40 年代，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年轻学者。有一个叫阿古什的人，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的学生。阿古什在他的博士论文《费孝通传》里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用一架专机运走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内的著名知识分子。他（费孝通）不喜欢国民党，他不会跟着他们去台湾的，但他完全可以像 1946 年考虑的那样，

去英国或美国；他懂英文，有博士头衔，在英美人类学家中有点名气，在这两个国家他有许多学术界的朋友，在美国大学中谋一个适当的职务是不成问题的”^①。

阿古什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1936年，孝通叔叔从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人类学系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当时学术界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从而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时至今日，《江村经济》仍然是西方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生必读参考书。叔叔回国后，深入云南农村实地调查，写了《禄村农田》调查报告，后来又发表了《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等诸多论文，这些文章都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1946年叔叔重访英伦的时候，他的老师弗思曾极力劝说他留在母校任教，协助拓展对亚洲的研究范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也亲自出马，请他留下来。但是，叔叔认为自己在国内有许多事情可做，他的志愿是研究中国，而在国外研究中国社会是很困难的，于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临走的时候弗思又写了推荐信给香港大学校长，想把他留在香港，也没成功。解放前夕，费正清还想拉他去美国，叔叔说：“1948年11月前后，他给我来了个电报，哈佛大学决定请我为客座教授，速即去美。我这时已决定在北平等待解放，没有接受，也没有复信。”^②与此同时，美国大使馆也不遗余力地想动员他离开北平，他们派官员到清华园找潘光旦和费孝通，询问他们在北平即将解放时，做何打算？当听说他们都没有离开北平的意思时，这个美国人就用手在脖子上划了一下，表示在共产党政权下，他们将会没命。叔叔郑重地回答说：“不会

① [美] 大卫·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第164页，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摘自“文革”时费孝通的《综合材料》手稿。

这样的。”在美国大使馆撤退侨民的10月间，一个美国朋友认为“他在共产党的政权下不会有好结果”，劝他离开，叔叔毅然表示“不论结果怎样，我是决心不离开中国的，我将成为新政权的‘忠实的反对派’”。^①

1948年12月，解放军进驻清华园，但是北平城里还没解放，守城的傅作义还在与解放军谈判和平解放的条件。新年刚过，叔叔突然接到在燕京上学时的老师张东荪通知，要他和雷洁琼、严景耀（雷洁琼丈夫）一起去石家庄（据说张东



解放初期的孝通叔叔

荪还带了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叔叔没有去台湾，不去英国，也不去美国，却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去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在那里张东荪把他介绍给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认识了李维汉、陆定一、周扬、齐燕铭等中共领导人。阿古什说：“毛同他谈话后，对他颇为赞许。”^②

叔叔是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书生，忧国忧民，一心想为祖国昌盛贡献力量。他认为打仗的时候自己不能上战场杀敌，只能用自己的知识，为胜利之后建设一个怎样的中国，出些主意。然而在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独裁统治下，这个愿望根本实现不

^①摘自“文革”时费孝通的《综合材料》手稿。

^②【美】大卫·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第167页，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

了。叔叔不是共产主义者，对共产党的了解也不很多。他说，他读过《资本论》，但“不想说我真正懂得很清楚”。

然而在社会实践中，大量的事实让他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一批肯干事的年轻人”，“他们爱国又能吃苦……把他们看做振兴中国的力量”，并且相信自己“和共产党人可以一起工作”。当这样一批肯干事的人打下江山以后，他愿意留下来，希望和他们合作，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政权下，“为中国的工农业发展作出贡献”。

西柏坡之行对叔叔来说是一次增加对共产党了解的机会。在去石家庄的路上，他亲眼目睹老乡们支援前线的粮队，“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这支队伍“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远远望去是一行红星”。他还注意到，这些运粮队伍里“没有枪兵押着”。这个壮丽的景象打动了，让他感受到了一股力量、让他折服。他说，这是“内在自发的一致性。这成千成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什么东西把他们交织配合的呢？是从每一个人心头发出来的一致目标，革命”。

解放了，叔叔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眼前的一切使他精神振奋，对前途充满信心。他在给外国友人的一封信里表示：

我认为我留在北平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从解放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根本性的、很宝贵的经验。它至少给我一个机会，使我反省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和批判我以前的工作。我又当了学生，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接受“再教育”……我也相信如果西方让我们自己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会在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解放这个字不是空洞口号，它有具体含义。

我去访问过老解放区，回来以后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请相信我，在我看到具体事实以前，我不会相信任何人的话……我在新中国未看到任何排外情绪……新政权在建设中心诚意学习先进技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薪金也提高了，这表明科学和知识受到重视。我们大学里没

有人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课照样上下去，而且学生在课堂上比以前更守纪律。我的教学方法受到鼓励，即在我讲课过程中带领学生作实地观察。我还被聘请到北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以便发展城市研究工作。

看得出，叔叔是打心眼里欢迎和接受到来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了，这不仅仅意味政权的更迭，对叔叔来说，还要过“思想改造”这一关。自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在人民内部开展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以后，在全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叔叔承认，像他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还是保守住过去个人主义的作风，在新事业里是插不上手的……就会到处碰壁。不改造，就只能退下去”。他诚心诚意地想改造自己，不要掉队。他说：“1949年在我是一个‘学习年’。在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听到了多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事。不但如是，就是平素常见常闻的，在这一年中也显示出了以往没有显示过的意义。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他在《我这一年》、《大学的改造》这两本小册子和《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人民首都，人民当了主人》、《思想战线的一角》等文章里，表达了自己解放以来在思想改造中所受到的教育和体会。

后来“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开展起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运动相结合，思想改造的“调门”越唱越高，逐渐变了味。清华大学有关领导，把这个运动拔高到“反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高度上。有过亲身体验的王蒙先生说：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一种风气，越是骂自己，越是忏悔自己的丑恶反动，就越证明学习有了收获”。孝通叔叔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在1952年出版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里，收录了他的一篇题为《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的检讨。在文章里他骂自己从出国留学时起到解放前夕，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俘虏，“从丧失民族立场一直发展到危害民族”，而且还引导青年，组织研究机关，扩大这种危害民族的工作，“实

际上已经进入资产阶级阵营”。如果在这条帝国主义安排下来腐化收买中国知识分子的路上爬，必然会成为为帝国主义服务、背叛祖国的罪人。

说自己的进步面貌只是一件外衣，“外衣里面是丑恶的、肮脏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改良主义……本质上是反革命，反对斗争，反对土地改革，维持封建势力，反对工业化，给帝国主义造殖民地……”他还说，在这次运动中，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检查，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罪行，只是“悲伤、哀鸣、求饶”。从运动开始起就情绪不安，连觉也睡不稳。叔叔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后，表示感谢这次运动把他震醒，不但让他认识了过去犯下的“这样多、这样大的错误”，而且还认识到“现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这样多的脏东西”。因此“必须下决心，否定过去，批判改良主义，斩断与英美帝国主义的思想联系，克服个人打算，加强政治学习，更重要的是依靠组织，在同志们经常的督促下，老实地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把自己痛骂了一顿以后，叔叔算是过了关。但是，如果说当年“最后没能过思想关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那么朝鲜战争的爆发，后期‘三反’、‘五反’运动的介入，使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多数算是过了关的知识分子，身上的怀疑也远未能卸去”。^①

叔叔虽然过了关，但是“身上的怀疑也远未能卸去”。

^① 胡平：《禅机 1957 苦难的祭坛》，第 35 页，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 年版。

四、经历反右

1953年初，共产党宣布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此时，“似乎党已经察觉，在某些颐指气使的党员干部的手下，知识分子有些无所适从，疲惫不堪了。得让前者收敛一点，并让后者坐下来喘口气，以便能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蓝图上”。^①事实上，过了关的叔叔的确得到了“坐下来喘口气”的机会，甚至还经历了一段心情相对舒畅、工作相当顺手的时期。他担任了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委副主任等比较重要的职务。

但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不到5年，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斗争收场的时候，我父亲和孝通叔叔都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正是这个时候，我中学毕业了。按当时情况说，家里出了右派分子这样一件严重的大事，要及时向组织交代清楚，这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规矩”，然而我却不懂，没有那样去做。为什么我会不懂这规矩呢？如果要找客观原因的话，大概是

^①胡平：《禅机 1957 苦难的祭坛》，第 36 页，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 年版。



因为长期住校，生活在一个几乎“孤岛”似的小圈子里，社会上掀起的政治风浪没有刮进来，加上平时很少回家，与父母缺少沟通，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还浑然不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愚钝和无知，没弄懂此时此刻向组织“交代”和“揭发”“阶级敌人”罪恶的必要性和其中的奥妙。因为没有及时向组织交代家里的问题，于是毕业时得到了一个“与右派家庭划不清界限”的鉴定。

日前读了葛剑雄先生的《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说他在1968年到1978年间曾搞过的学生政审工作，就是在学生中学毕业前，去“每位学生家长所在单位，通过查阅本人档案，摘录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奖惩记录、有何审查结论或特别须要说明的问题，然后交单位核对无误签署意见，盖上公章”，然后把这些材料放入学生档案，“转入他（她）下阶段的工作、学习单位或户口所在的派出所”。这些政审材料是不与本人见面的。葛先生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考察。

1950年7月叔叔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以此为契机，他又开始了对少数民族的研究。这几张图片是他在贵州访问时的几个镜头。

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前每个成年人或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都“经历或熟悉的过程”，并且“经我们之手产生的‘政审材料’，更多的是使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册。”想来我也不会是个例外。遗憾的是我那时全然不懂这些规矩，甚至不知天高地厚还想去当兵，跟着一帮同学走后门去部队检查身体，结果自然是落了空。以后，又报考青年艺术剧院美工，这次考试通过了第一试，第二榜落选了，朋友说“你没过政审关”，这话弄得我一头雾水——我政治上有什么问题呀？

如此一来，升学没了希望，想去的地方去不成，只得回家等待。暑期一结束，便接到了分配到北京市金属结构厂的通知（那时中学毕业生国家也管分配工作），成了一名锻工，也就是铁匠。这是个重体力活，粮食定量每月49斤。

老实说，学校的那个鉴定从某个角度上讲是对的。按照当时通常人们对“组织上说对，就是对，说错，就是错”的思维定式，我的确相信把父亲他们打成右派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我眼里父亲是个温和、善良的人，干什么事情都那么认真、负责，在南洋的时候是个坚定的“民主派”。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你被驱逐出境的时候，有没有办法不回国？他说：那时候朋友很多，应当可以有办法的，至少可以留个“根”在那里，把你和哥哥“送”给什么朋友，这在广东人和福建人里是很普通的事。顶多改个姓，那有什么关系，你们还是费家的人嘛。但是当时国内形势那么好，我们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就要垮台了，当然要回国！根本不会有其他念头。

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义无反顾回国参加革命的父亲，一下子会变成反共反人民的坏人？至于孝通叔叔就更是弄不清楚了。想不通，心里就认定他们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也就恨不起来，自然“划不清界限”了。

参加工作后，我从学校搬回家，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和父亲好像达成了某种默契，大家都不提右派的事，不去触碰那道令人痛苦的“伤疤”。所以长期以来我不仅不知道他当右派的具体罪状，也没有问过他在南洋都干过些什么事。

一转眼到了1979年，这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党组给母亲送来了一张《关

于费振东同志被划为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遗憾的是，这一纸“改正决定”父亲没有看到，因为他没能闯过“文化大革命”这道鬼门关。

父亲1975年元旦刚过就住进医院，那时孝通叔叔已经从五七干校回来，当他听说大哥住院后非常着急，特地进城到医院看望。这天我正在医院陪父亲，送叔叔走的时候，他在走廊里问我：“检查出是什么毛病？”我说：“医生说是直肠癌，要动手术。”叔叔一愣，又疑惑地问：“这个字怎么写？”我回答了，叔叔脸色沉重地说出个英文词：“cancer，这个病不好。”我知道叔叔学过医，他懂得。第二天叔叔又到医院找主刀大夫，谈了很久。

手术很成功，父亲醒来以后精神也好。第二天叔叔就来看望，两人说了会儿话，约好隔天再来。没想到第三天，我值完夜班刚从医院回到家，隔壁看公用电话的大爷就跑来说，医院来电话要我赶快去，有急事！当我赶到医院时，接我班的姐姐说：爹爹去世了。你刚走，爹爹突然喘不上气，我急忙去叫护士，找不到，好容易碰到一个，她来看了看病人，要我和她一起去找氧气瓶，整个楼里乱糟糟，也不知道氧气瓶在哪里。当我们从另一层楼找来氧气瓶赶回病房时，爹爹已经不行了……父亲终于没有坚持下来。

父亲的后事是由民盟中央军宣队办理，遗体告别那天，孝通叔叔早早从民族学院赶来，和我们全家一起把父亲送到八宝山。

我打开侨办送来的这张“改正决定”，见上面写着：“据查证，费振东同志在整风前后的有关言论行动，有的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的是对工作的意见，这是允许的、正常的。他的许多看法是符合事实的，即使有的看法片面，或有错误，也是属于认识问题，不是右派言行……”

我手里攥着这张迟到的、已经没什么用场的“改正决定”，心想，这轻飘飘的一张纸，难道就能弥补父亲和他的家人失去的20年宝贵时光？还有因此而受到的种种屈辱……当然这张纸，“有”聊胜于“无”，来年清明家祭时，把它捎（烧）给父亲，倘若他天上有知，大概可以得到些许安慰吧。

这一纸“决定”虽然派不上什么用场，却引起了我想搞清楚父亲究竟是

个怎样的人，他都做了些什么事的念头，于是我把他遗留下来的“交代”、记事本、文稿以及能够找到的片纸只字统统搜罗来，仔细地阅读。还请母亲回忆她和父亲在南洋时发生过的事情……渐渐地，父亲的形象在我脑海里越来越丰满起来。

父亲生于1902年1月20日，9岁才上小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苏州市立二中三年级读书的父亲和同学们一道上街游行。1922年入上海交通大学读铁路管理科，1926年毕业，这一年他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前一年发生了五卅运动，父亲作为学生会主席，站在队伍头一排，带领同学参加游行，他的行动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按交通大学的章程规定，该校毕业生统一由交通部分配到铁路部门工作。但是由于他的“不良”表现，学校当局通知他和另外六名同学（其中有解放后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陆定一）不予分配工作。于是他自谋职业，到上海一所政法学院教英文。这年年底，通过交大同学介绍，他越洋远赴南洋，来到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其时，当地一家《苏门答腊民报》需要编辑人员，他应聘当了该报主笔。

1927年5月5日，父亲在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文章，报馆监理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不满，声称费振东是共产党，不能当《民报》主笔。父亲只得离开报馆，先后在几所华人学校当老师，最后来到巴城（雅加达）的八华学校当语文教员。在巴城他和母亲相识并建立了家庭。自从来到印尼以后，便失去了和共产党的联系，脱党了。

巴城是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首府，华侨多，华人办的学校规模也大。八华学校是巴城华侨的最高学府，从初小到高中都有，分英文、华文两部，英文历来是主课，因此英文部在学校里占上风，学生养成了一种重洋轻华的风气，学习中文时马马虎虎。

1927年前后，一些曾经在国内大学学习过的华侨，在巴城华人界逐渐取得优势。这种形势促使八华学校聘请了一些像我父亲这样毕业于国内大学的人到中文部当教师。这些人中英文都有较好的水平，爱国思想比较浓厚，比较重

视中国文化。开校务会时，他们都出席，于是中文部教员渐渐占得优势。经过一段时间后，八华学校的学风有所转变，教职员和学生都比较关心祖国的情况，也比较重视中文的学习了。

1933年，有朋友邀请父亲回棉兰担任中华商会工作。这时父亲已在南洋生活、工作了六七年，对印尼华侨社会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他认为印尼华侨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是建立在众多侨胞从事的商业经营之上。华侨商人在经营活动中，经常要与荷印政府和欧美洋商打交道，政府和洋商常常会抓住侨商不熟悉当地法律法规的空子而占得便宜，侨商明知吃了亏还无话可说。父亲认为，为了对付当局政府和洋商，保护侨商的合法权益，应该加强商界团体的力量，要有多一些懂得英文和文化水平高一些的人到商界团体里工作才好。他希望自己能够直接参与到里边去，为侨胞做一些工作。他进一步想到，如果能通过商界团结更多的华侨，不断增强他们的爱国思想，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今后开展许多工作就有办法。到商会工作正是实现这个想法的机会，于是欣然应邀回到棉兰。

父亲担任了商会的秘书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商会的日常事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同洋商作斗争。父亲上任伊始，就发生了一桩“承运仰光大米事件”。原来棉兰米商从暹罗购买的大米，都是由“欧美商人总会”雇佣外国轮船运输，洋商垄断了所有的大米运输渠道。为打破他们的垄断，中华商会与暹罗的华侨轮船公司挂上钩，由他们为棉兰的米商运米。这样运了两次，外国轮船公司急了，使用各种手段企图逼迫中华商会停止与暹罗华侨轮船公司的合作。父亲他们根据当地法律法规，据理力争，经过多次交锋，洋商终告失败，只得与中华商会谈判。最后双方作出让步，商定洋人轮船公司依旧运米，运费照旧，但要从运费中扣还5%给华商。在洋人轮船公司履行了“回扣金”协定后，暹罗华侨轮船公司才停止了运米。

回扣金协定签订后，洋商不死心，又勾结一些做洋货生意的华人，串通国民党驻棉兰领事梁某，以中华商会破坏中荷邦交为由，声言要解散商会，取

消回扣金协定，于是在棉兰华商中掀起了一场“驱梁运动”。决定由父亲起草一份诉状，派人回国向南京中央政府外交部控告梁某。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南京政府不得不撤换了梁某。这次与国民党驻棉兰领事的斗争获得了胜利。

中华商会将取得的回扣金，一半还给华侨进口商，另一半作为公积金，由商会支配使用，从而奠定了商会的经济基础。商会将这笔钱中的大部分用来开办华侨学校、老人院、幼稚园，还有一部分捐献给了祖国。随着工作的开展，商会业务也逐渐增多，如翻译文件，传达政府颁布的有关商业法令、法规；代办各类执照、进出口手续；协调、仲裁华洋商之间的破产、倒账案件和其他纠纷。

中华商会与洋商和侨商中的不法分子作斗争，维护了侨商的合法利益，中华商会的威望大大提高，得到了广大华侨的支持，侨商几乎都参加了商会。

父亲除了处理商会事务外，继续对印尼及华侨（主要是华侨商人）的经济状况进行研究。从现存的、残缺不全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他这一时期曾经写了《荷领东印度商业指南》、《荷印政府施行限制商品进口之现状》、《荷印华侨之分布及其在租税上之负担》、《荷印皇家航空公司》、《荷印学校教育略述》、《苏东各埠华侨商业名录》等十余篇文章。当我翻看这些泛黄、已经发脆的稿纸时，怎么也想不出，这些故纸堆是怎么挨过40余年的光景，又逃过红卫兵查抄而存留下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各地华侨群情激愤，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支援祖国。棉兰成立了“棉兰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冠以“筹赈难民”，是为了弱化政治色彩，避免当地政府的干扰）的机构来负责该项工作。筹赈会由中华商会领导，父亲兼任该会的秘书长。

抗日救亡工作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发动侨胞捐资。大批青年学生组成募捐队走上街头，广大侨胞积极认捐，募捐队每天把募到的钱款交到筹赈会，清点入账，第二天在报上公布账目，然后将这些款项汇到国内宋庆龄主持的红十字会，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寄到了延安。与此同时，棉兰华侨中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一些年轻人上街砸日货商店

的招牌，甚至有人割了日货进口商人的耳朵。筹赈会及时对这些热血青年进行劝导，将筹赈工作引向正确的轨道上。

由于战乱，父亲与国内家人少有书信来往。1935年青叔叔考取了公费留学，到德国柏林学习。第二年，孝通叔叔也留学伦敦。英德隔海相望，相距不远，暑假时孝通叔叔就到柏林看望三哥，也许因为同样身处异乡，他们经常想起大哥，不知道远在南洋的大哥过得怎样？于是相约找个机会去看望他。

青叔叔在德期间，喘病经常发作，虽经柏林大学医学院的精心治疗，仍无法根治。1938年春，青叔叔毕业东返，决定先到印尼休养一段时间，想在热带把病养好，同时也可以看望多年不见的大哥。几个月后，孝通叔叔也完成学业，回国途中顺道到了新加坡，兄弟三人在那里见了面，大家谈天说地，讨论起大哥在印尼的工作。当时两个弟弟想，如果大哥在印尼工作不顺手，局面打不开的话，就劝他回国另求发展。让两个弟弟没料到的是，这些年来大哥对印尼的历史、地理和当地华侨的社会经济、教育状况已经做了不少调查研究，不仅写了很多文章，还对开展华侨工作有了一套想法，更重要的是他在商会担任了重要职务，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兄弟俩觉得华侨工作十分重要，应该重视，大哥在印尼已经立住了脚跟，值得继续干下去。

三兄弟久别相逢，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分手的时候眨眼就到，先是孝通叔叔匆匆回国。此时，抗日烽烟弥漫，国内陆路交通已经瘫痪，他只好走海路从越南西贡上岸，然后再从海防搭上滇越铁路上的火车。那时的火车开得很慢，归心似箭的孝通叔叔干脆坐了铁路压道车赶路。接着青叔叔也循着这一路线回国，与弟弟在昆明会合。

这次兄弟见面更加强了父亲为侨胞服务的信念，工作更加起劲。然而时间一长，筹赈会的活动还是引起了荷兰殖民政府的注意和一些做日货生意的侨商不满。枪打出头鸟。1942年，荷印政府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听信国民党领事的谗言，决定将“出头露面”的商会秘书主任费振东驱逐出境。于是我们一家离开印尼来到新加坡。

不想，没等我们把新家安顿好，日本飞机就开始轰炸新加坡了，并且把英国的一艘主力舰击沉。日本人打来了，我们不得不离开新加坡，辗转流亡到靠近新加坡一个叫石叻班让的小岛上。在石叻班让，表面上看，父亲过着息交绝游、与世隔离的生活，实际上暗地里仍与“某些人”有往来。听大姐说，在石叻班让的时候，她负责烧饭，有一阵子她发现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偷偷留下一些饭菜，然后悄悄带走。父亲为什么要留饭？饭给谁吃了？一天，她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尾随父亲出去，只见父亲来到偏僻处一间破败的茅屋里，把饭菜给了藏在里面的一个小伙子。回去以后她问父亲那是什么人？父亲说那人叫陈平，是马共。并且再三叮嘱她，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大姐说：那时候父亲已经跟她讲过“资本主义”、“共产党”一类话题，也知道马共就是马来亚共产党，是抗日的，说出去不得了，所以一直守口如瓶。

日本投降了，大家松了一口气，趁着胜利的喜庆，妈妈带两个姐姐去新加坡玩。大姐拉着妈妈特意去马共总部找陈平，想要陈平把她留下来。可是陈平不在，加上妈妈的阻拦，最终大姐没能如愿，但是在马共总部看到的印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还是让她激动了好几天。

1948年我们离开印尼的时候，听说陈平已经是马共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正率领着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与重新占领马来亚的英国殖民者打仗。后来马来西亚取得民族独立，他们又与马来西亚政府对着干。到上世纪60年代，马共游击队撤到马泰边境泰国一侧。到20世纪80年代初，东南亚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东盟各国加强了打击不安定因素的力量，马共遭到重创。后来马共的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受泰国官方提出的条件（1.不必写“悔过书”或“脱党声明”；2.保证人身安全，不判罪、不受监视，就业自由；3.子女上学、就业、结婚不受歧视，出国不受限制），纷纷走出丛林。曾经是马共总书记的陈平也放下了武器，据说现在居住在泰国。

话扯远了，还回到石叻班让。我们一家逃到岛上之后，父亲在朋友的帮助下，搞过肥皂、香烟、草纸、饼干之类的小手工业，还在居民区开了家“小



棉兰华侨妇女联合会成立（1946年）。



王任叔正在给棉兰妇联成员讲话（1947年）。



▲
华侨总会所属幼稚园成立
(1946年)。

小杂货商店”，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战争结束了，下一步怎么办？这时候父亲接到了朋友来信，要他赶快回棉兰继续搞商会工作。当时，世界局势动荡不定，中国国内，内战一触即发；印尼局势也因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抵御荷兰殖民者入侵，变得十分复杂、混乱。

此时棉兰的民盟苏岛支部已经成立，父亲任第一届支部主委，公开活动。苏岛民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当地的国民党势力作斗争，团结广大侨胞，维护华侨和印尼人民的友谊，坚决支持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苏岛民盟盟员一度发展到五六十人，成为苏岛各地民主运动的核心力量。

民盟苏岛支部一直到1950年中印（尼）建交后，才奉上级指示，停止活动，宣告解散。

战后，苏岛各地的华侨商会也联合起来，组成了苏岛华侨总会联合会。事实上联合会成了苏岛华侨的最高领导机构，棉兰华侨总会是联合会的办事机构，父亲还是出任秘书长。

联合会担负着为全苏岛华侨办理商务、教育、福利以及对外交际等事务。

战后的棉兰华侨社会，明显地分成以国民党驻棉兰领事为首的“反动派”，和民盟领导的拥护共产党的“民主派”，两派泾渭分明，斗争得相当厉害。在民盟

盟员的推动下，苏岛各地纷纷成立起职工会、农会、青年会、妇女会等团体；棉兰华侨总会还组织了歌咏队、剧团、篮球队到各地演出、比赛，一时间民主派的势力发展得很快。

战争刚结束，社会秩序混乱，华侨总会还担负起处理突发事件的担子。比如1946年9月间，一伙携带武器的印尼人，窜到苏岛东海岸的一个小岛，峇眼亚比华侨聚居处，绑票勒索、抢劫财物。该地华侨有几万人，为了自卫，他们也武装起来，在对抗中不免殃及池鱼，引起了普通印尼人的不满，终于发展成华侨与印尼人之间大规模械斗。事发后，印尼政府派人与国民党驻棉兰领事馆商议解决办法，但遭领事回绝，他们不得不找棉兰华侨总会商量。总会决定派父亲和另一位能操福建话的同事，偕同政府方面的代表和各报记者共30多人前往调解。一行人抵达峇眼后，父亲他们即与当地同胞的代表协商。父亲依据总会所定“与印尼人民友好合作”的原则，晓以大义，



▲
1948年“五四”青年节游艺会上，棉兰华侨中学学生自治会义卖部学生留影。

终于说服当地侨民同意停止械斗，与印尼人进行谈判。最后召开了全岛群众大会。开会时，数千人的会场秩序井然，大家同意既往不咎，发扬中国大国风度和印尼人民友好相处，互相合作。一场持续了六七个月的骚乱终于平息。

就在父亲调停械斗期间，棉兰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华中事件”。1946年10月10日，棉兰华侨中学学生会出了一期讨论中华民国国庆的壁报，其中转载了陈伯达写的《蒋介石应当爱国》。这篇文章被一些三青团学生认为是攻击、诬蔑了他们的领袖，要求立即撤下该文，并要壁报组组长费曦（我的大姐）公开承认错误，说出提供文章的人，予以治罪。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这件事被那几个三青团学生捅到社会上。第二天，国民党的报纸发表了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肆宣扬，企图扩大事态。国民党领事也借题发挥，不顾违反国际惯例，于当天夜里，下令保安队（为维护治安，不少地方的华侨组织起保安队、自卫团，棉兰保安队被国民党领事控制）逮捕了华中校长、民盟苏岛支部文教委员朱志辉和费曦（第二天费曦被释放）。民主派奋起反击，在自己的报纸《民主日报》上，刊登文章讲明事实真相，揭露、谴责国民党领事和保安队的胡作非为。一时间，棉兰和附近各埠华侨群情激愤，纷纷谴责国民党领事和保安队的无理行径。最后，保安队在广大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无条件释放了朱志辉。这场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民主派的斗志，各地民主团体趁势开展工作，苏岛的爱国民主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47年7月，荷兰人占领了印尼首都日惹及一些大中城市，棉兰也被他们占领了。国民党驻棉兰领事趁机同荷兰殖民当局勾结，将父亲驱逐出境。1948年8月，我们全家回到了祖国。

没想到，一纸“改正决定”，竟给了我一个把父亲在南洋的这段经历，大致梳理清楚的契机，让我加深了解、认识了他，我们父子在情感上更加亲近了。我想，这也是对历史的尊重吧。

在查阅父亲材料的同时，我也开始留意有关孝通叔叔的一些文章和相关

材料。当年听说他写了几篇向党进攻的文章，其中最“恶毒”的要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重访江村》。我想就从这两篇文章入手，弄清楚当时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事情要从1957年4月27日说起。那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4日，也就是一周以后，毛泽东又颁发了由他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召开座谈会，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的前一天，即4月26日，叔叔去了开弦弓。

开弦弓就是《江村经济》里的“江村”，是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所属的一个小村子。重访江村是叔叔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现。事有凑巧，1956年澳大利亚一个代表团访华，其中有一个叫葛迪斯的人类学家，在一次招待会上对周恩来说，自己是费孝通的老朋友，希望能够去“江村”访问，周恩来答应了他的要求。5月12日至



◀ 1936年叔叔在开弦弓村养伤时和村中儿童合影。其时，他的脚伤尚未痊愈，行走仍需靠手杖帮忙。

16日，葛迪斯赴江村考察。回国后写了一本《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老朋友的江村之行，又勾起了孝通叔叔再回江村看看的念头，在得到有关领导同意之后，他带领中国社科院的几个年轻人去了开弦弓。

1935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叔叔到广西大瑶山做调查，不幸发生了严重事故，叔叔重负伤，新婚妻子王同惠坠崖牺牲。叔叔获救后，被送到广州治疗。1936年暑期，他应姐姐费达生之邀，来到姐姐工作的开弦弓村，准备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后出国。没想到一住下来，村里农民开办的合作缫丝厂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生产经营活动把他吸引住了，于是便对这个小村庄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调查。假期期满，叔叔带着在开弦弓调查的材料，登上了远赴英伦的邮轮“白公爵”号。旅途中他趁着“记忆犹新，把开弦弓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稿，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

两年后，叔叔用“开弦弓调查的资料”写成论文《江村经济》，获得博士学位。可以说一个“无心插柳”的休假，成就了一个社会学、人类学家。

开弦弓村位于太湖东南岸，离上海约一百二三十公里，距苏州仅三四十公里。境内河道纵横，这个小小的村落就有三条河从村里穿过，其中主要的一条河就像一张弯弓，开弦弓因此得名。这个地区主要的农作物是稻米，还有一些小麦、油菜籽，河湖里盛产鱼虾。

开弦弓和太湖周围的村庄一样，靠着桑树，发展起蚕丝业，历史上有名的“辑里丝”就产于这一带。由于生丝质量优良，这里生产的丝，曾经占了出口额的绝大部分。开弦弓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蚕，养蚕缫丝成了村民最主要的副业生产。这里是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鱼米之乡。但是一直以来，生活在这个“天堂”里的农民，却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

通过在开弦弓的调查，叔叔发现“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他还发现，中国的农村是一个“牛郎织女”式的、农工相辅的社会，也就是男人下地干活，女人在家里搞副业生产。地里的生产仅

能勉强糊口，要想有点零花钱，就得靠家庭副业的收入。他认为要最终解决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例如“整个纺织工业本来是农民的职业”。因此主张把“有些加工工业，比如小型轻工业分散下去，不一定都要集中在城市里搞”——这就是他提倡的“工业下乡”。

《江村经济》问世后，时光过去了2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开弦弓村怎样了？在一个崭新的社会里，乡亲们生活好吗？叔叔迫不及待地想去看个究竟。

这次重访江村，他请姐姐一起去。当姐弟俩乘的船刚刚进村，就被岸边的许多老人认出来。那时汽车只能通到吴江县的几个镇，从镇到下面的村子是没有公路的，只能乘船前行。上了岸，大家围拢来握手打招呼，问长问短，无话不谈，乡亲们这样亲切，使叔叔“感动得眼睛发酸”。

接下来的20天里，叔叔带领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调查组的同志，白天和村干部讨论，找老乡聊天、摸情况；晚上在油灯下，查数据、打算盘、摇计算机……夜以继日紧张工作。调查的数据表明，开弦弓村的生产比21年前有了大幅度增长，1956年合作化后，水稻平均亩产达到559斤，比1936年增产200多斤；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以这个社的第二大队为例，1936年这个大队的总产值折米25.9万多斤，1956年达到了41.8万多斤，增产61%。

从数字上看，全村的粮食虽说不是很富余，但是应该是够吃的，那么为什么调查组还是听到不少人家说“感到粮食有点紧张”呢？是不是口粮留少了？于是调查组请了几位老乡来讨论，得到的结果是：“男全劳力一人一月50斤，女半劳力35斤，10岁以下儿童20斤，婴儿不算。一家开伙，老少可以搭配。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儿童，每月是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人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这样看来，即以当地公认标准来说，现在留下的粮食应当是够的，但是也应当说……并不宽裕；必须精打细算……把紧了吃……如果放松些，很容易在青黄不接时就闹饥荒了。”



调查组抵达开弦弓村后，夜以继日地工作，找老乡谈话，和干部座谈，晚上打算盘、摇计算机，核实调查得来的数据，一晚上竟要用掉一斤灯油。

原来因为这些年来推行农业合作化，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老天爷帮忙，开弦弓取得连年的丰收，人们产生了“来年一定会有更好收成的乐观情绪”，村民中间流传起“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这样的话，促使大家放开肚皮吃，这一“放开”就吃过了标准。再加上前一年，正值水稻扬花时节，突然刮了一场台风，这场台风吹走了预期的丰收。原来“粮食紧张”是因为“放开肚皮”和台风造成的。

那么大家普遍反映觉得“手头缺钱花”是怎么一回事呢？答案是“问题出在副业上”。解放以后农业社只搞农业，种粮食，不准搞副业，连养几只鸡鸭，也被当作“资产阶级尾巴”割掉了。所有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

集中到城镇里去做。比如在开弦弓“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还有烘茧也划归商业部门去做；村里养羊、养兔的农户也少了”。统计表明，1936年开弦弓农民副业收入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副业生产的萎缩，自然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开弦弓历来是一个副业生产发达的地方，除了家家户户养蚕外，还养羊、养兔和在农闲时搞贩运。抗战前，这个村的村民还在费达生帮助下，入股集资办起了一个合作丝厂，这个丝厂对村民收入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虽然过去了20多年，至今大家还念念不忘这个小工厂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如今副业生产都被砍掉了，收入自然就减少了。

叔叔认为，“副业和农业不应当是矛盾的，农副业之间安排得好又是可以互相支持的。在资源、劳力、资金的利用上，可以搭成一个有利的循环”。于是他在《重访江村》中，重新提出了早年关于发展乡村工业的主张，他说：



这幅照片是叔叔1936年在开弦弓村拍摄的，湖对岸冒青烟的地方正是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所在地。



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一类在农村里，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的小型轻工业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现的可能和必要？谈起这个问题，我也有一段心事。因为21年前我看到过这种小工厂对于提高农村经济的好处，印象很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提倡所谓“乡村工业”。也许由于我道理讲得不清楚，又过分强调了这种小型轻工业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时，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狠狠地被批判过一阵……但是所提出关于乡村工业的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觉得很适合于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最近听到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更打动了我的心。这次我重访江村，我这段衷曲又涌上心头。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来，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在这段话里叔叔提到了“勇气”两个字。是啊，重提这样一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刚刚“狠狠地被批判过一阵”，并且“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主张，很危险。但是这个主张“很适合于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所以他还是鼓起勇气提了出来。那么叔叔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依我看，首先是他把农民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为农民增加点收入、生活过得宽裕一些出力；其次，文章里说得很清楚，就是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给他鼓了劲。

叔叔虽然有了勇气，但是他仍然显得处处小心谨慎。文章一开始，他就强调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在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不是选择哪条路的问题了，而是怎样更顺利地在这条大家已经选择定了的道路上前进”。他还一再表示赞同现行的农村政策，肯定“开弦弓的农业社办得很有成绩，是合作化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带来了连年的农业增产”。

在说到为什么副业收入下降时，话变得委婉起来，他说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是哪一条也不能算到合作化的账上去，相反的农村合作化提供了发展副业的

有利条件，问题是在于领导农村工作的部门对于这种原来副业化比例特别高的地区，没有很好贯彻关于多种经营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里存在着许多值得注意的内部矛盾。今后如果能很好地执行这个方针，副业发展问题一定是能解决的”。他一再申明，为了把道理讲得更清楚一点，“不能不啰唆一些，更希望读者不要挑出一两句话来，说我又在吹冷风了”。看得出，叔叔在写这篇文章时，心里还是在“打鼓”，唯恐有人误解或歪曲他的意思。

他诚心诚意地要求领导注意发展副业这个问题，希望在农业社经营范围这个基本问题上，放开来争鸣一下，甚至“哀求”说：“如果领导部门觉得这种建议值得在实践里试验一下，在开弦弓恢复这个合作丝厂……我也愿意鼓励我的姊姊和一些专家们一起来提出具体方案的。”

叔叔说得很“啰唆”，意思却十分明白——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够的，还要发展副业。没想到这原本是很正常、很好的建议，在紧接着发生的反右运动中，还是被歪曲成了“恶意宣传农民收入减少”，“在副业生产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等罪行，成了叔叔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之一。

再看看《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前后，发生了什么？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短短的几年里，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改造、忠诚老实运动、拔白旗插红旗、肃反、“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胡适等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搞得狼狈不堪，无所适从；再加上这个时期党和政府在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发生了一些偏差，使得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原本就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唯物论等这些新东西比较陌生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误会，造成党和非党之间的一些隔阂，应该说发生这些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当然，这种隔阂是不利于国家建设的。其时，党和政府已经察觉到了这个弊端，并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讨论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国务院于1956年4

月发出了《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对科研机关、高等学校等处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等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要迅速地和适当地解决缺少助手、辅助人员的困难，积极解决所缺房屋等问题……并经常关心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共产党希望采取一些措施，填平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沟沟坎坎。

也是这一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研究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专家局，为的是能够搞清楚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以便对症下药。齐燕铭是该局局长，费孝通被任命为副局长，齐燕铭交代他要“通过民主党派了解知识分子情况和要求，及时反映”^①。

1954年，叔叔在民盟中央担任文教部副部长。民盟作为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多，他就通过民盟这个渠道，用社会学的方法，即所谓“串联”、“滚雪球”的办法来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1955年底，他利用人大代表到外地视察的机会，偕同潘光旦到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通过民盟地方组织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并要地方组织广泛征求知识分子意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要求。

1956年下半年，叔叔到云南进行少数民族历史、社会调查，专家局要他趁这次机会，了解一下西南方面知识分子情况。1957年春叔叔完成调查，并把半年多来，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到的知识分子状况向专家局作了报告，同时也向民盟中央作汇报。汇报以后，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对这个“调查结果”进行讨论，希望能够比较全面地估计当时知识分子问题。会上许多同志鼓励他“为知识分子说说话”，于是就有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在1957年3月24日的

^①摘自“文革”时费孝通的《综合材料》手稿。

《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文章说：

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来已起了变化。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问题表现在哪里？他指出：

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来，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究竟顾虑些什么呢？……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担心……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的问题，把知识分子的心态

描写得入木三分，文章引起了全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周恩来在一次旅行时，看到这篇文章，连声称赞说：“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但是，这样一篇反映真实情况，受到群众欢迎和党的高层领导肯定的文章，后来竟成了孝通叔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又一条主要罪状。

其实，在这篇文章写好以后，拿不拿去发表，同在《重访江村》里提不提发展乡村工业一样，也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行。这次叔叔的勇气又是从哪来的呢？他在《“早春”前后》里说得很清楚：

2月中，《《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初稿已经写成，但是文章提出的问题分量不轻，没有勇气送出去。反复修改了几次，又复写了几份，分送给民盟的朋友研究提意见。大约是2月底，我正想发稿时，来了一位朋友，和我说：“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形势是要收了。”潘光旦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一听我转述了那位朋友的话，就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一次谈话，不是收，而是放呀。”这一下我们弄糊涂了。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那天上午，我把“早春”送出去了。那天因为有外宾来参观，要我招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先生听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我，揭开了谜底。

下一天一早起来拿出底稿，把后半篇重写了一遍。从修正稿送去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当这篇收收放放的“早春”出世，早春却是已过了时了……我想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气，也反映了体质，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

文章中所说潘先生揭开的“谜底”，就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讲话里，他对“收”“放”问题明确表示要“放”。在这“放”声中，叔叔把文章送了出去。

潘先生哪里知道，就在他兴冲冲“揭开谜底”后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主意，下了反击右派的决心。

如果从5月4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算起，到5月15日他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前后仅隔11天！在这短短的11天里，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孝通叔叔终于落入“陷阱”，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老账新账一起算，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当了右派以后，父亲和叔叔受到降职降薪的处罚，撤销了所有职务，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改造。说到降薪，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1952年大学里搞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了。这个时候，教育部正在给大学教授们定级。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定了一级教授，按道理费孝通也应该一样，可是上面有人说搞社会学的不能给一级，所以将费孝通定成了二级教授。1958年受罚，降到四级。1980年费孝通在政治上得到平反，统战部有意趁这个机会把职称也一并改正过来。叔叔知道后说：算了吧，这个旧案就不要翻了。二级很好，外国人看了会说中国水平高啊，像我这样的只是个二级教授，不挺好吗？所以费孝通一直是个“二级教授”。

五、我们费家还没有当工人的，你是第一个，不简单

没考上大学，我并不感到沮丧，因为听老师说，苏联的中学毕业生，都要到工厂、集体农庄或部队里锻炼一番以后才能考大学。“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想中国也会像苏联老大哥那样，当我在工厂锻炼一两年以后，一定能再去上学，而且几年的工厂锻炼，肯定会受到很大教育，增长很多见识，像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吴运铎、高玉宝这些英雄模范，不都是在社会中锻炼出来的吗？再说，全国正在“大跃进”，到处热气腾腾，报上说了，用不了几年，我们就能“超英赶美”，“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了……能够在这个时候出上力，当上新中国“第一代有知识的工人”，我感到挺光荣。所以当我第一次穿上劳动布工作服，鞋上罩着“脚盖”（为防止炽热的氧化铁皮掉到鞋里）站在烘炉前，夹起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坯时，心里真有那么点自豪呢。当上铁匠以后，我很快就学会了看图纸、烧火、抡大锤这一套打铁的基本技能。不到一年，我就当上掌钳的“炉头”，带着两个徒工独立干活了。

但是事实告诉我，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心里想的和现实往往是两回事。就拿那个“锻炼个一两年就可以继续上学”的想法说吧，当进厂的第三年，我向车间领导申请去考学时，那位心直口快的党支部书记劝我：“死了这条心，不

会批准你去的，就安心在厂里锻炼吧。”这时才明白，当年在学校听到的美好事情，在我身上是不会实现了。

我听懂了书记话里的意思，不再想考学的事了，不过，年轻的还得学点什么呀，我想既然已经进了工厂，就学工吧。于是报名上了夜大的机械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对老师讲的那些微积分、几何学，就像冤家那样实在不喜欢。后来听说电视大学招生，我就去考，考上了，学中文。但是还没上满两年，电大校长吴晗就被揪了出来，成了“反革命”。“文革”爆发，电大停办了。

虽然我自己对当工人没怎么在意，但是却引起费家一些人的关注。首先就惊动了远在苏州的祖父，老爷爷特意来信，夸我“路走对了，当工人光荣”。我的祖父费璞安，生于1879年，在清王朝生活了二十多年，按理说，应该是满脑子封建意识、迂腐不堪的“遗老”一类人物。从我们家的历史上看，费家可以算是“诗书继世长”和推崇“唯有读书高”的人家，老爷爷不赞同孙子去当一个“铁匠”，应该说是正常的。但是，我祖父却能“与时俱进”，他对我当工人不仅没有丝毫责备之意，反而大大称赞我“当上了工人阶级”，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其次是达叔叔。达叔叔是我姑姑，但是我一直称她“叔叔”，据说这是家乡的习惯：一个女孩子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还没有出嫁，这时候她的晚辈就按男性的辈分来称呼她。我不知道



▲
我的爷爷费璞安，生于1879年，虽然在旧社会生活了60年，解放后却能与时俱进，思想一点都不“封建”。

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真的，不过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的达叔叔还没有成家。我知道她是一位研究蚕桑的专家，搞技术的，她鼓励我“好好学技术，将来为国家出力”，还特别提醒我要“学孝通那样写文章”，千万不要像她“有话写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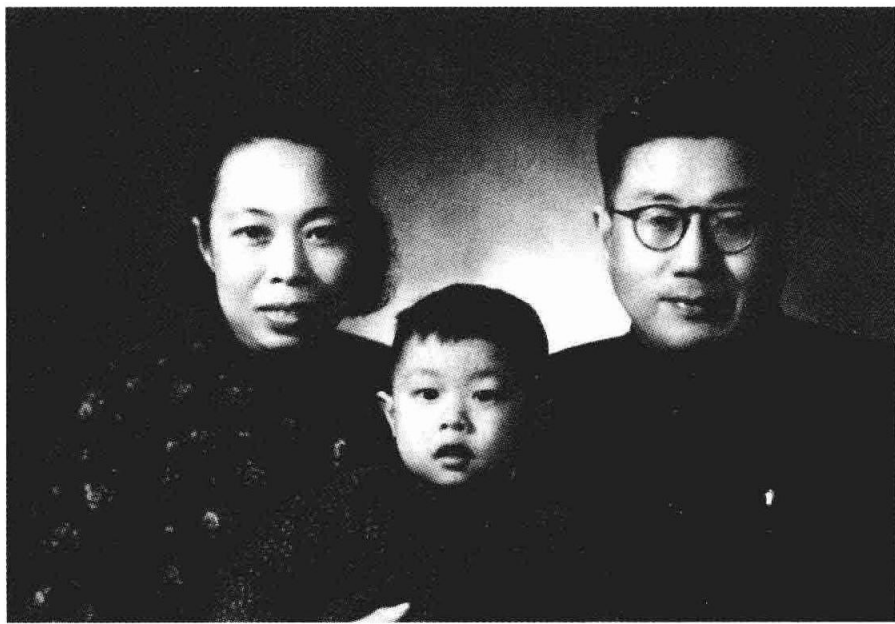
我当工人以后，很快就听到了爷爷和姑姑的鼓励，但是听到孝通叔叔的“评价”，却是二三年以后的事了。那阵子他常常来我家和父亲聊天，有一次他们谈到什么事，把我叫过去问工厂里的生产状况。末了，叔叔问我在工厂干得怎样？适应吗？我说，还可以，干活没问题，但是和我当学生时想象的“工厂”和“工人阶级”可大不一样。他笑笑说：“我们费家还没有当工人的，你是第一个，不简单。”话说得不多，我听了也没在意。

我听到了爷爷、达叔叔、孝通叔叔对我当工人的看法，可是听不到青叔叔会说什么了，因为他在我进工厂之前，去世了。

费青，1907年出生。天资聪颖，1924年（17岁）考入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准备将来当医生。在校期间受大哥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东吴大学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出面邀请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到学校演讲，影响很大。五卅运动爆发时，带领同学们冲破学校阻挠，上街游行宣传，连日奋战，还跑到苏州郊区一家纱厂，支持那里工人罢工。此外，他创办了平成工人义务夜校，教工人学文化。

1926年5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征，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一时间广州成了全国革命中心。这年暑期，青叔叔被选为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江苏省代表，秘密赴广州参加大会。会后受军阀孙传芳通缉，被迫离开苏州，在“以法治国”思想的影响下，弃医学法，进了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革命陷入低潮。青叔叔说：“我也因学校当局暗中诬告而被反动政府列入黑名单。起初我虽冒险找寻革命朋友联系，但在当时大环境的极端恐怖和学校里小环境的权诈缓和下，终于失掉了与革命的联系，逐渐深埋到书堆里，只想求到一点专门知识，以为将来终会有用



▲
青叔叔一家

处。”^①自此青叔叔一度消沉，远离政治，专心读书。

1929年青叔叔从法学院毕业，因为成绩优异，校方推荐他到国立成都大学任教，教授国际公法、罗马法和英美法等课程。到了成都大学以后，他教课很卖力，但是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私下里一打听，原来是学生嫌他没有出洋留过学，这下让他明白：要在大学教书，必得出洋留学。

1931年，青叔叔回到上海，在暨南大学教课，同时担任律师。当时上海律师界是日本帮的地盘，青叔叔根本挤不进去，工作并不顺利，但是他办了几件为共产党嫌疑犯辩护的案子，在律师界引起不小震动。当时国民党逮捕共产党人后，是不通过普通法院审判的，但在外国租界抓到共产党嫌疑犯以后，必须做做样子，先在租界里的特区高等法院分院过一下堂，再交给国民党政府。通常不会有律师敢于真正为这种案件的被告作辩护。一次，青叔叔经朋友介绍接了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小学校长和两名教员在外国租界被巡捕逮捕，以共产党嫌

①引自《费青自传》。



▲
孝通叔叔“重访江村”之后，同姐姐、姐夫郑辟疆一同到无锡大箕山疗养院看望住院的费青，图中左起依次为郑辟疆、费达生、费青、费孝通。

疑犯的罪名被起诉。国民党方面搞了一个自称已经自首的共产党人做假证人，说是曾和三被告多次在学校的一间房间里开过秘密会议。青叔叔为了揭穿该证人的谎言，当庭请求法官命令那个证人，把他自称去过多次的那所学校的位置和开会房间的格局画出来，然后再命令去那所学校拘捕证人的巡捕，也画一张那样的图。糊涂法官居然同意了青叔叔的请求。结果两人画的图样完全不同，假证人被揭穿，因此也就不能证明那三个人是共产党。法官被逼到极为尴尬的地步，但是仍然毫无道理地只开释了一名被告，另外两人仍交给了国民党。这场官司虽然没有取得全胜，但是能有一名被告被开释，已经是空前绝后了。事后，许多律师朋友劝他“以后不要再如此天真，不然会有危险”。

教书和律师工作都不顺利，让青叔叔出国深造的想法更加迫切了。当时出去留学的途径有三条：一条是考官费，这条路基本被那些达官贵人把持了；第二条是有钱人家自掏腰

包出去；家里没有条件的人，只有走第三条路，考公费。比如清华有以退回庚子赔款为名设立的留美、留英奖学金。学校每年会在报上登出公告，写明这一年有哪些学科招考公费留学生，要考哪几门功课，等等。一般一科只招收一个人，各校拔尖的学生都会报名，考上了就像中状元一样。此外还可以争取国外各学校设立的奖学金、助学金来达到留学目的。

青叔叔走的是考公费这条路。1933年他参加清华留英公费考试，没有成功，于是索性搬到清华园和弟弟住在一起。那时孝通叔叔正在清华研究院学习，兄弟两人住在一起，校方不管，也不要钱。第二年，青叔叔通过了留美公费考试，但是因为英美法系与中国法系相差较远，遂申请改去德国学习。

1935年青叔叔赴德国，经过三年学成回国，回国途中为治疗喘病在印尼休养了半年多，然后返回昆明，由孝通叔叔介绍到云南大学任教。不久，他的哮喘病再度发作，医生劝他赶快离开高海拔的昆明。恰巧此时，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请他回母校主持法科系工作，1940年青叔叔回到上海。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区，法学院校址被占领，学校被迫关闭。他与几个同事把留在上海的学生组织起来，开办补习班，坚持上课。

待补习班走上正轨后，青叔叔于1943年再次辗转返回内地，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法科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回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法律系任教。此时孝通叔叔也在该校社会学系教书，兄弟两人成了同事，经常见面倾谈。青叔叔第二次回到重庆时，这个原本偏远、不为人瞩目的省份已经是“抗日大后方”，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重返内地”把青叔叔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让他感到“好像进了一所政治补习学校，把我少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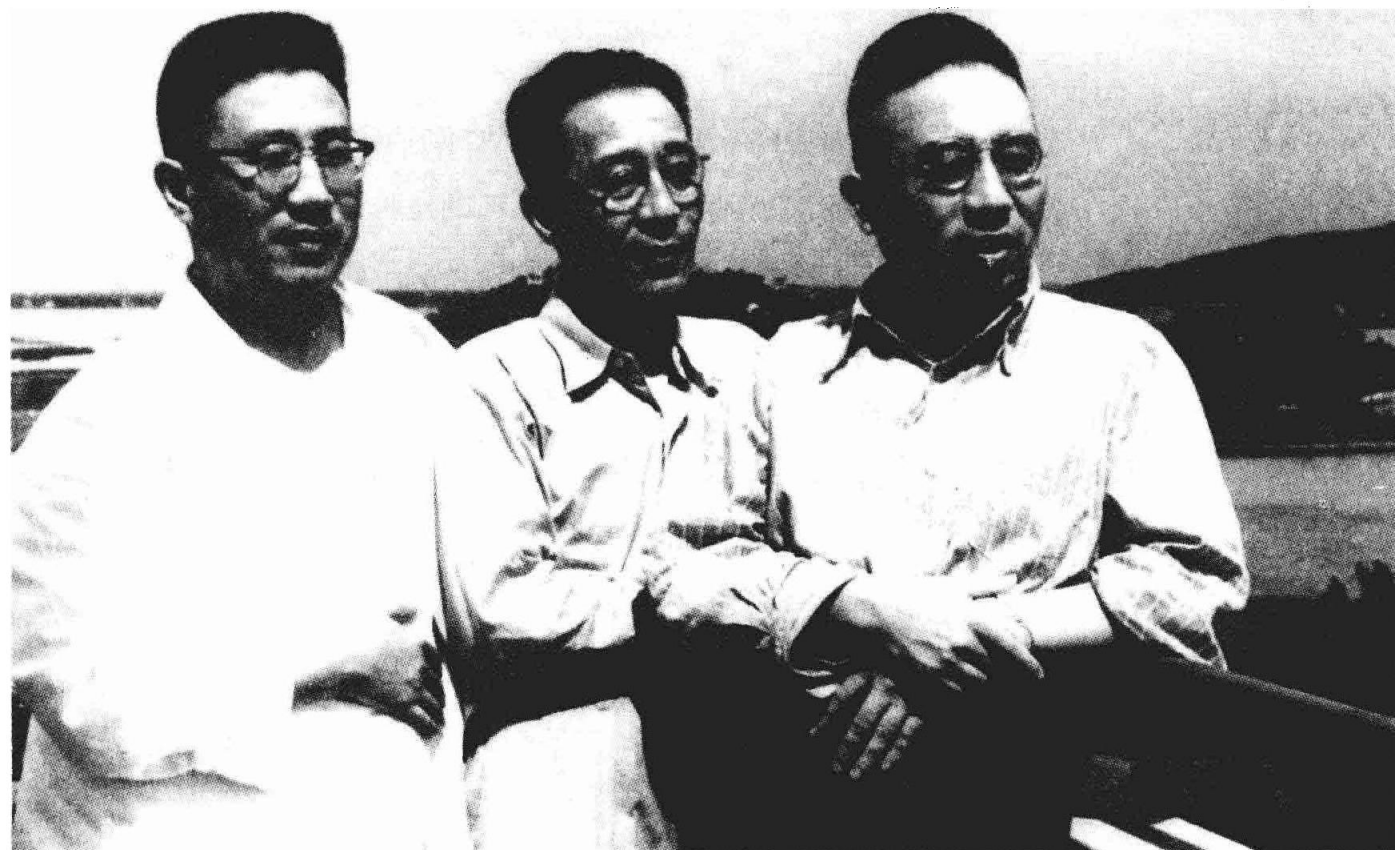
时期的政治热情重新唤醒了”。^①

初到复旦，青叔叔立刻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与进步学生之间的激烈斗争，虽然初来乍到还没摸清底细，但遇事仗义执言的青叔叔，在“两军”对垒面前，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进步学生一边。当时法科系里有一个当三青团书记的学生，经常制造事端，青叔叔就利用自己负责系务的身份，坚持要求校方开除这个人。这事一直闹到三青团特务头子戴泽那里，令校长屡遭申斥，青叔叔也受到不小压力，但他依然坚持，毫不让步，直到青叔叔离开复旦后，此事才不了了之。除了支持进步学生之外，他还发起组织“教授联谊会”，联络进步教授，遇有重大事件，即征集签名发表“宣言”……

抗战胜利后，青叔叔转到西南联大，由于弟弟的关系，他结识了吴晗等一批朋友，这些人政治上的积极态度，起了“助燃剂”的作用，使青叔叔被唤醒的政治热情燃烧得越来越炽烈！从此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加到反迫害、反饥饿的民主运动中，还口诛笔伐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在《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运用自己在法律界的影响，对受迫害的学生尽力援救，甚至帮助他们投奔解放区。“一二·一”惨案后，他和闻一多、潘光旦、楚图南、潘大逵、吴晗等 19 位教授，在孝通叔叔执笔的、反对美国给蒋介石提供军援的《致马歇尔将军书》上签了名。这个时候，虽然青叔叔和许多进步人士交往密切，也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但他认为没有加入“团体”的必要，这个看法一直到解放后才改变，后来加入民盟，已经是 1952 年的事了。

1946 年夏，青叔叔随学校复原北平。其时，国民党政府挟接收日伪政权之威，气焰十分嚣张，加紧了对民主运动的镇

^①引自《费青自传》。



压。作为律师，青叔叔依然在法庭上为受迫害的进步学生辩护，痛斥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这年年底，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沈崇家长请青叔叔作为首席律师出庭辩护，青叔叔“详考了法科、政治各方面的利弊，商定了应对的办法”^①，为案件开庭做了充分准备。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和法律界某些人从中作梗，致使此案未公开审理，两名罪犯被宣告无罪。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北平各高校联合举行示威游行，抗暴运动迅速扩展到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一个持续三个月之久的、声

▲
父亲和霍叔叔到大箕山看望青叔叔。

^①引自《费青自传》。

势浩大的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反美爱国运动！

1947年春，青叔叔在吴晗、闻家驷、雷洁琼等支持下筹办了《中建》周刊（解放后改名《新建设》），为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的进步教授提供了一个讲坛。

青叔叔一生精研法学，著述颇丰，可惜在“文革”中散失殆尽。后经友人搜集，仅得《从法律之外到法律之内》、《知识与智慧》、《论狂妄政治》、《悼念民主法律战士曼纽尔·布洛克》、《希特勒袒日仇我政策的由来》等寥寥七八篇。

青叔叔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听说他歌唱得很好，也擅长绘画，但是从小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无法根治。发病时喘不上气，十分痛苦，一生被病魔拖累。1955年冬天，他的哮喘病发作厉害，不得不去上海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病情有了好转，在一封给大哥的信中他说：“弟最近一月多来身体很有进步，药物治疗有把握，且已能开始做锻炼，后者尤为割肺以来所未有之好现象……这样锻炼再能继续三四个月，我相信能够使我恢复到以前在南洋住半年后的健康程度。”出院后，他继续留在无锡太湖疗养院休养。疗养期间，他要青婶捎去绘画颜料、纸笔，在太湖边上作画吟诗，安心养病。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童心傲骨两难驯，
已是天涯病废身；
寂寞湖楼归未得，
听风听雨又逢春。

青叔叔一身病骨，积年痛苦，表露无遗。

1957年初，一直在疗养院治疗和恢复的青叔叔，感觉自己健康大有好转，计划入夏后回北京。但是就在他准备起程的时候，突然接到老朋友吴晗的来信，说是近来京城“气候不好”，建议他推迟返京。此刻，久病住院，远离政治漩涡的青叔叔，对社会上掀起的反右狂澜知之甚少，看着吴晗的信，一时摸不着

头脑，满腹狐疑。不料几天后，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点名的“大右派”当中，“费孝通”三字赫然在目，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令他心惊，接着费振东的名字也上了报。这些消息犹如一颗颗重磅炸弹命中要害。疑惑、惊吓、担忧、愤懑一下子把他击倒，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当青叔叔的骨灰运回北京，在嘉兴寺祭奠的时候，我分明看到父亲和孝通叔叔眼里噙着的泪水。

青叔叔生前，我和他见面的次数不多，常听爸爸妈妈提到的，多半是他发病或去南方住院治疗的。当我刚刚迈入社会的时候，他去世了，后来也很少听到家里人说起他的事，所以青叔叔给我留下一个体弱多病、郁郁寡欢的印象。

后来在孝通叔叔身边听他说起几个哥哥的故事，言语间充满一往情深的思念，也在我心里树立起青叔叔“病废身”之外的形象——充满激情、一身正气，是一个勇敢的、秉承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传统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

六、说“家世”

长期以来我对费家的家世了解不多，也没有兴趣打听，后来听孝通叔叔讲述早年的故事，听多了，才慢慢悟出他讲这些陈芝麻烂谷子里边的一些“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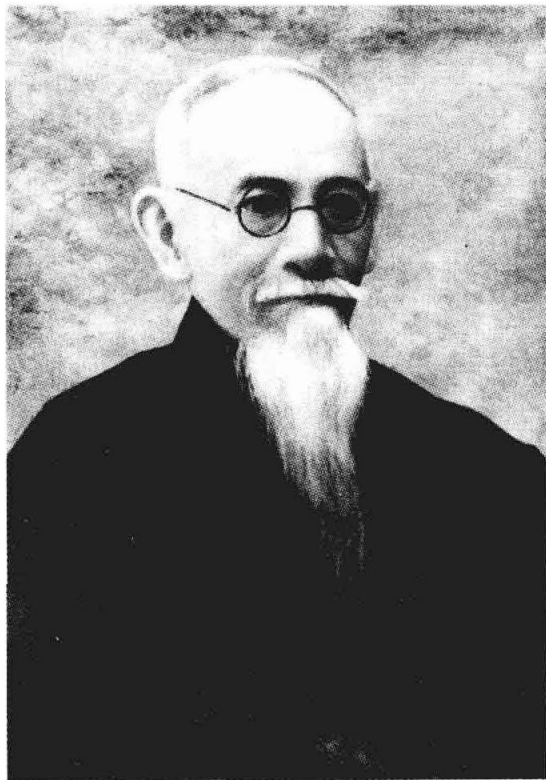
一次叔叔生病住院，医生不让他看书，更不能写字。这天我去陪他，他对我说：这几天不能看东西，脑筋却不受影响，经常想起过去的事，你们这一代人应该了解一点，我讲一些给你听。于是他从到山东“寻根”说起：

前几年我到山东临沂访问，顺便去邻近的费县寻根。据说现在散居全国各地的费姓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们这一支出去后，辗转到了江南，最后在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屯村落了脚。你的父亲就出生在屯村，后来才搬到同里镇。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同里搬到松陵镇了，松陵是吴江县行政中心，比同里要热闹得多。

小时候，过年要拜祖宗，厅里桌上摆着家谱，墙上挂了祖宗画像，小孩轮流上去磕头。现在那些画像和家谱，早已不知去向，但是家谱上有个叫费祎的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那时我正在看《三国演义》，知道费祎就是受诸葛亮赏识的那个蜀国大臣。史书记载，费祎是江夏鄆县人（今

河南信阳东北)。那时我就奇怪，我们的祖先怎么跑到四川去了？

费家在同里算得上是大户人家，有不少田，还开了一家当铺，记得小时候晚上出门，我手里拿的灯笼上写着“江夏费”三个字。这也许可以算作同里费家与四川那个费祜有关系的一个线索吧。我去费县寻根，是想搞清楚费家祖先迁徙的路线、过程，后来写了一篇《寻根絮语》。其实也是充实我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设想的内容。



▲ 孝通叔叔的外祖父杨敦颐，是乡里的一位士绅。

祖父去世后，大伯伯当了家，他开了一家（大）烟馆。历史上，清朝政府禁烟失败后，在民间可以公开吸食鸦片。大伯伯开了烟馆后，为了独霸市场，使尽手段，竟然逼得一个生意上的对手，跑到费家院子里吞鸦片自杀。他的这一手激起人们的愤怒，一群人拥进家里，砸烂了不少东西。看来大伯伯在当地够霸道的。这件事以后，费家开始败落了。

祖父有个好朋友叫杨敦颐，他把女儿杨纫兰嫁给我父亲。结婚的时候，母亲的嫁妆里有一份田产，这是因为费家的经济状况不好，外祖父想用这份田地来保证女儿婚后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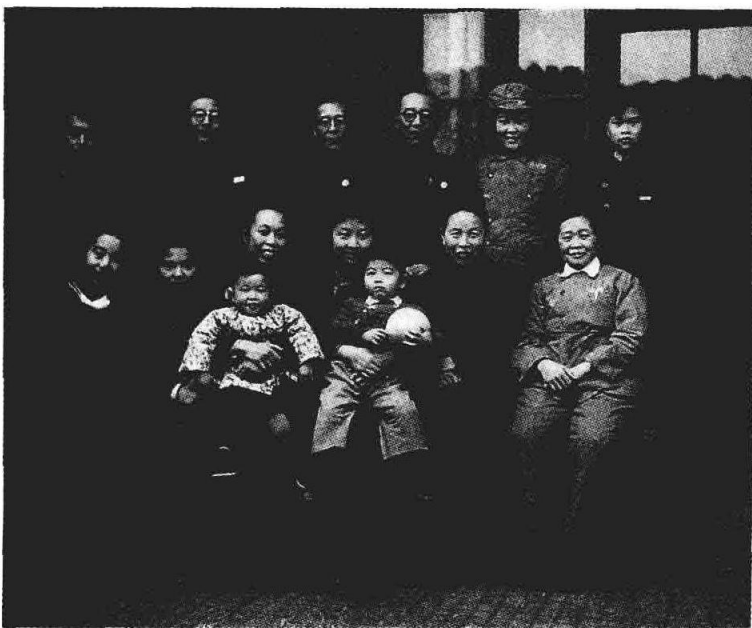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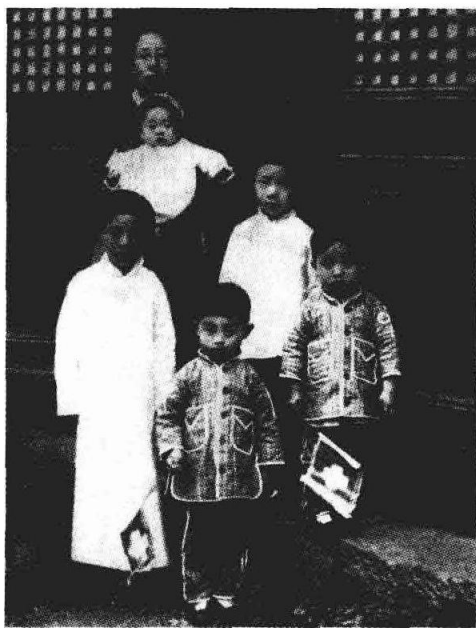
外祖父国学底子很好，对文字学有很深的造诣。他在

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特意加试的甲辰恩科上考中举人，被派到镇江做“学台”，这个官相当于现在教育厅长的职务。但是他不喜欢做官，不久就辞去官职，到商务印书馆当一名编辑，曾经是编纂《辞海》的编辑之一。杨家在同里是一家大户，拥有不少土地，开有米行，在苏州十全街还有一家布厂，是典型的地主家庭。我的几个舅舅都很有才气，各有所学，大舅舅杨千里写得一手好字，靠笔杆子做了官，当过两任吴江县令，后来官至孙中山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另一个舅舅考上清华，与胡适一道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天津办工厂，创下抵羊牌毛线这个名牌；六舅舅学西医，是一名医生；还有一个舅舅是搞美术的，在好莱坞参加过动画片《白雪公主》的绘制；小舅舅杨锡璆是建筑师，参与过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

◀
孝通叔叔8个月大的时候，被妈妈抱着，在同里老家的院子里和哥哥姐姐合影。

▶
父亲和青叔叔、孝通叔叔在北京舅舅家（1952年）。

外祖父家经济条件比我们家好，几个舅舅天分高，学习成绩都很好，我和哥哥们不服气，暗地里跟舅舅比赛，





不想落在他们后面。我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有舅舅出国留学了，我当然不能落后，下决心将来也要出国留学。

我妈妈杨纫兰毕业于当时最“新潮”的上海务本女学，后来在家乡办蒙养院（幼儿园），蒙养院里的孩子穿制服，在脚踏风琴伴奏下唱歌、跳舞。这一套是学了西方的做法，与中国传统对孩子的教育有天壤之别。在保留下来的几张老照片里，有一张是妈妈在蒙养院里领着孩子们做游戏，从照片里可以看到孩子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还有一张是妈妈抱着我，两个哥哥穿着蒙养院的制服，手里还拿着一面红十字会的小旗，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新鲜的事情。等我长大一点以后，也进了妈妈的蒙养院。从这几张照片里，可以看出在我身边正在发生着的许多变化。

我父亲曾经考中过科举制度时候的生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科举制废除后，吴江县派他去日本留学。有趣的是父亲他们这批留学生并不懂日语，于是日本方面派懂中国话的老师给他们上课，生活上就靠打手势、写汉字和别人交流。父亲学的是教育学，回国后担任过江



图中领着孩子们唱歌谣的老师就是杨纫兰。她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敢于开风气之先的杰出女性。20世纪初，她在家乡吴江县开办了江震第一蒙养院（幼儿园），在那时，这是很新鲜的事。

苏省的督学。督学的任务是要了解全省各地学校的情况，所以父亲经常出差。父亲每次从外地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翻看他带回来的材料，这些材料里多半会有地方志，我特别喜欢看这种记录各地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的书。父亲回来以后还要写调查报告，每次报告写好誊清后，他要青哥和霍哥一个念原稿，一个对抄文，仔细校对，最后他自己再看一遍，如果发现没有校出来的错字，两个哥哥就要挨批评。我那时还小，只能在旁边陪着，但是父亲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两个哥哥认真校对的神情，却留在了我的脑筋里。

父亲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提倡新学。他与清朝最后一个状元，主张兴办实业、积极开办新学堂的张謇是好朋友。父亲曾经到南通张謇开办的学校里教书，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那里，又因为张謇的儿辈排行“孝”字，所以我名字叫“孝通”，就是为了纪念那段历史。父亲在政治上反对帝制，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上海，和朋友一起组织红十字会，准备上前线。那时他是吴江县议会议长，苏州光复后，革命军开到吴江，他以议长身份召开民众大会，欢迎革命军到来，并当场销毁清政府官印，宣布吴江光复。

我是大清王朝倒台的前一年，1910年出生的。我们家里最长的一辈是祖母和她的妹妹，孩子们叫她三好婆，我是三好婆带大的，所以同她的感情很深。我从她絮絮叨叨讲的故事里，知道祖母家姓周，她的父亲在太平军打到苏州一带的时候被“长毛”掳了去，从此不知下落。在她心里父亲并没有死，只不过是走失了，因为我看见她和祖母在每年的某个日子里，会把一只鞋丢到街上，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仪式”，意思是让失踪的人能找到回家的路。我想，祖母家很可能是在太平天国这场风暴中被冲掉了，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除了祖母和三好婆之外，周家没有其他的亲戚了。历史上，家乡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大的战争，比如明朝平定倭寇的时候就在这一带打过仗。当时戚继光从南方调来了很多少数民族士兵，征战多年，到16世纪中期战事才平息。我想，打完仗以后，他们中间一

定会有人留下来不走了，并且在这里成家，留下后代。我是汉族，可是发现自己身上毛发很重，甚至长了胸毛，这不合汉族人的体态特征。所以我想，说不定费氏家族里有什么人和少数民族的后裔结了缘，说不定我身上还带着哪个少数民族的基因呢。当然这都是瞎猜。

我的祖母是个小脚老太太，脚小得站都站不稳，干家务也受影响，而三好婆是“解放脚”，就是曾经缠过脚，后来又放开了。我不知道她们姐妹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可能是因为妹妹缠脚后不久，就碰到了长毛造反，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是禁止妇女缠足的，妹妹被迫不得不把脚放开。没把脚缠小一直使三好婆感到懊恼。我小时候就知道，三好婆不愿意让人看到她的一双大脚，常常穿着长裙把脚遮住。祖母也有懊恼事，可能也是受太平军的冲击吧，作为童养媳，她很小就进了费家，所以和祖父成亲的时候没有坐上花轿。对于这件事祖母始终耿耿于怀，一生都摆脱不了“童养媳”、“小媳妇”的阴影。后来我在《中国士绅》里有一段对“小媳妇”的描写，就是体会到祖母那时的感觉写出来的。要知道“裹小脚”和“坐花轿”是那个时代身份的标志。祖母和三好婆都错过了这个表示身份的机会，她们懊恼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妈妈办的蒙养院里受到新式的幼儿教育，六岁进吴江小学读书，学校是在供奉雷神的雷震殿里，所以我们叫它雷震殿小学。学的课程有国文、算学、历史、地理、图画，跟过去私塾里念的不一样，是新的一套东西。这些课程里，我最喜欢的是沈天民校长讲的乡土志，里面讲的垂虹桥、鲈香亭都是我们经常去玩的地方，还有我们想知道的知识。

我十岁时，全家搬到了苏州。那时候我的身体瘦弱，经常生病，妈妈怕我转到新学校后会受到同学欺负，就把我送到她的朋友王季玉开办的振华女校（今苏州市第十中学）上学，她认为女同学一定不会像男同学那样喜欢欺负人。王季玉校长是美国留学生，学生物学的，回国后从母亲手里接过这所学校，当了校长，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一辈子。这个学校在苏州

很有名，教育质量很高，现在著名的物理学家何怡贞、何泽慧姐妹，是比我低一班的同学，女作家杨绛，则是我同班同学。

提到杨绛可以多说几句。我和她同学的时候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她嫁给了钱钟书。钱钟书在清华和我也同过学，那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写文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我同钱氏夫妇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前几天杨绛还来医院看过我。记得解放初期，乔冠华要我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那时候我的兴趣不在这里，就推荐钱钟书担当了这个工作。后来他又和乔冠华、叶君健、袁水拍一起搞了《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大概是因为有这一段翻译毛选和诗词的经历，钱钟书夫妇在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中，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钱钟书夫妇都是写文章高手，我更喜欢杨绛的散文。但是她的写法和我不一样，我的散文里有“社会学”，所以我一生虽然写了不少文章，得到一些人称赞，也有很多人喜欢看，但是始终没有进入文学的圈子里。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老师要我住到他的一个朋友家里。这个人的丈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阵亡的师长，父亲是英国人类学界的一个前辈。据说尼赫鲁的女儿，当过印度总理的甘地夫人留学时，曾经住在她家。这个人交际很广，午茶和晚餐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教授、记者、作家等名流在她家聚会。一次晚宴上，我认识了一个出版界的经纪人。这种经纪人专门为作家和出版社牵线搭桥，等出了书，收取一定的经纪费。这个人怂恿我写一本以中国人为主题的小说，我写了一个节略，他看过后，没有叫我再试，看来他认为我不是写小说的人。

我没有写小说，是个“文学圈外”的人物，然而在学术圈子里也有人说我写的东西，论文不像论文，游记不像游记，这样一来，我的文章既进不了文学圈子又不像学术论文，成了“四不像”。我想所以会成这个样子，可能是跟我一向不喜欢在别人定下的框框里，规规矩矩办事的脾气有关。所以我常常说自己是一匹不听话的“黑马”，是鬼节里漏网的“小鬼”。

有意思的是，后来居然有人出版我的散文集，要把我拉进文学圈子。他们已经出版了杨绛和钱钟书的集子，又想到要出我的。说起来有趣，我跟杨绛、钱钟书都同过学，而且跟杨绛很要好。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之后，有人把我们三篇文章放在一起出版，想想很妙，如果把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写出来，一定很好玩。

趁叔叔喝水的空当，我接过话茬：你说的“故事”，这就是打算写的“杂俎”吧，一定很好看。喝了口水叔叔接着说：

是的，这些“小东西”挺有意思，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有时间写。散文集编好后，出版社要我写篇序言，当编者来取序言稿子的时候，我跟他说，写编后记的时候，可以把杨季康（杨绛）是我的女朋友和我推荐钱钟书替我去搞毛选英文翻译这两件事写进去。这事钱先生一直不知道。我想，我们三个朋友之间过去的一段经历，经过了几十年，快到谢幕的时候又被一套散文集“捆”到了一起，也算是有缘分。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篇散文，但是像我们这样三个人合起来的散文，就更有意思，更好看了。

编后记写好后，我要作者拿给杨绛看。后来杨绛写了一封信给我，表示她不希望说出当年的事情。其实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我就是想把这段历史结一结“账”，说出来，都是事实，又是好事，有什么不好说的。当年我和她是好朋友，后来她跟钱钟书结了婚，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我也没在意，也没对钱先生有什么不满。我对他一直很尊敬，推荐他搞毛选的英文翻译就是证明。杨绛在这个事情上超脱不出来，还纠缠在里边，这对她的心情和健康不利。但她有她的想法，不能勉强，听她的就是了。

我看一个人要有这样的境界，就是超脱出来，能够通过别人的看法来增加对自己的了解。最后还是要自己看自己，看出在历史里边活动着的“我”，看出了点名堂，笑一笑，觉得很妙，如果再把妙在什么地方说出来，

那就更妙了。

1998年末，钱钟书病逝。我原来想在《费孝通散文》的编后记中写出当年我和他们两人的交往，表达出历史的妙处，可是没有“妙”出来。有妙处，却没有妙出来，看来我对别人的了解还不够。这也是我应该检讨的地方。这一生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很多，过去的没有走，现在的又来了。这件事没有如我所愿，想想为什么，也很有意思。

话扯远了，再拉回到振华学校。我在振华读到初一，就转学到教会办的东吴大学附属一中。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对我后来喜欢写作有很大影响。我的一位姑夫，为了祝贺我当了中学生，为我订了一份商务印书馆出的《少年》杂志。我很爱看，每一期都从头读到尾，一字不落。慢慢地就不满足于只当读者了，就写了一篇稿子寄出去。没想到那年的第一期《少年》里，居然登了我寄去的那篇《秀才先生的恶作剧》。看到自己写的字变成铅字印在白纸上，当时激动的心情让我一生忘不了！从此更加用心学文学，还得到过学校奖励的“国文猛进奖”，同时也更喜欢写东西了，不断地写了文章寄出去。如今过了几十年，我还记得那本《少年》的封面上印着的、表示鼠年的那几只老鼠。查一下，应该是1924年，那年我14岁。

高中毕业后，我考进东吴大学医预科，准备将来当医生给人看病。可是中间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

我出生的时候，大清灭亡，改朝换代，建立了民国，但是国家并没有富强起来，反而出现军阀割据、连年战争的局面，老百姓穷困，国家衰弱；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准备瓜分中国。那时候的进步学生都有一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劲头，不满意国家贫弱的现状，要为振兴中华民族做些事情。我受两个哥哥的影响，跟着他们参加各种进步青年的政治活动，还担任过苏州《民报》副刊编辑。在大学里，我是学生会秘书、校刊通讯秘书。

大学二年级那年，有一天，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去医务室看病，和医生发生争吵，被医生打了一拳。大家知道后十分气愤，学生会就代表学生们

向校方提出抗议，学校当局却百般袒护校医，双方各不相让，最后闹到学生们罢课的局面。事情过去后，校方要开除带头闹事的人，我是其中一个。但是因为我平时学习成绩好，品行也不错，老师们对我的印象很好，最后决定对我免于开除，但一定要离开学校。正好这时候我的思想也有了变化，不再满足于将来当医生给一个一个人看病，想学一套能给社会治“病”的本领。于是转学到了燕京，选择了社会学系。

从蒙养院开始，然后进小学，上中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最后出国留学——这一整套经历表明，我从小到大，没上过私塾，没念过《三字经》、《百家姓》，一开始就接受了“新学”的正规教育。但在父亲的督促下，我还是学了一点古文，学会背诵《滕王阁序》、《岳阳楼记》等一些有名的文章。后来父亲又在放假期间送我到金松岑那里学习，金老师要我“圈”《史记》和《庄子》学起。圈书是过去学习的一种方法，就是给文章标点。

金松岑很有名气，他的古文底子深厚。当时同里镇有所谓“杨柳松柏”四大家。“杨”是我的外祖父杨敦颐；“柳”是著名“南社”大诗人柳亚子；“松”就是金松岑（金天翮），他是人们熟悉的小说《孽海花》前六回



▲ 胸前别着燕京大学校徽的孝通叔叔。

▼ 50年代，孝通叔叔和父亲下围棋（右二为达叔叔）。

的作者（后由好友曾朴续写完成）；“柏”是陈伯儒（伯、柏同音），即陈去病，“南社”创始人之一，当过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参议院的秘书长。我虽然得到这样一位好老师的教导，但是毕竟没有系统地学，后来又没下功夫补习，所以国学底子很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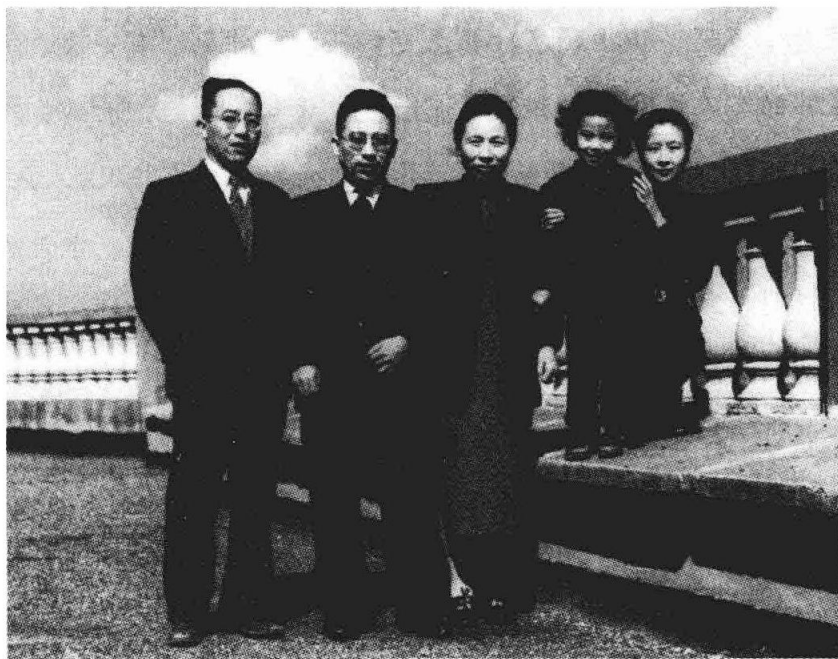
我们不是有钱人家，但是靠父亲的工资能吃饱饭，五个子女也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要供给五个孩子上学，费用是相当大的。妈妈利用上师范、护士学校、蚕校等专科学校花钱少的条件，定下这样一个办法：老大上大学，老二上专科，老三再上大学……大学和专科间隔交叉，这样保证了我们五个人都得到很好的教育。当然，这跟家里一向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大概是妈妈有意锻炼我，要我记了一段时间全家的支出账目。一天，妈妈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要我把各项支出画在坐标纸上，结果是花在教育上的费用最多。妈妈说，花钱的时候，她要把几个孩子上学的费用留够，然后才用作别的花销。这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几十年以后在一次政协会上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国家在花钱的时候，也应该先留出足够的教育经费，其他的钱，多就多用，少就节约点。我认为，国家和家庭理财的道理是相通的。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但很顽皮，甚至会搞一些恶作剧。有一次，一位姓张、长得很胖的客人在客厅里和父亲谈话。我故意跑到他们面前，冲着客人大喊一声：“豸猪张只一”，然后跑开。开始父亲以为我在捣乱，人来疯，但是反复几次以后，就听出我是把“一只张猪豸”倒过来说的，于是严肃地制止了我的胡闹。客人走了以后，父亲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屁股还挨了板子。可以说，这次受罚是最厉害的一次。

我们兄弟中间，大哥俨然是个“头头”，他的手很巧，“花头（样）”最多，每到假期，就领着我们学做手工，干这干那，我最小就跟在他们后边学。我的簿记（会计）知识就是那个时候跟大哥学的。大哥上中学的时候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的头儿，加入了共产党。“五

卅”运动时学生上街游行，他是领队，走在队伍的第一排。毕业时，他和另外四五个带头闹事的同学（其中有陆定一，大哥在交大入党的事，就是他告诉我的）没有按规定由政府统一分配工作。大哥离开学校后，几经周折，去了印尼，在一家报馆作主笔，教过书。这一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哥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依我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也影响了他回国后的工作。不过，说实话，大哥心太软、不够横，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大哥在南洋20多年，一直从事民主运动，和朋友一道组建了苏岛民主同盟。直到被荷印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国内。

在大哥的影响下，青哥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两个哥哥的政治态度和做人的道理，对我影响很深，实际上影响了我一生的政治立场。可以说直到现在，我所做的事情都没有背离他们的想法。



孝通叔叔一家与霍叔叔夫妇合影。

达姐是老二，所以按妈妈的安排，上了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来到日本留学，成为蚕丝专家，为中国的蚕丝业勤勤恳恳地奉献了一生。她在家乡为农民服务的事迹教育了我，引导我走上了正确的学术道路。

霍哥是老四，和达姐一样上了专科学校，学土木工程，毕业后跟舅舅（杨锡璆）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参加过抗战前长江沿线防御工事的设计和修筑滇缅公路。战后，他在上海市工务局当工程师，一生从事技术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中风去世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经历风风雨雨，走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

我给你讲费家的家世，是因为从这里边可以看出一些道理来。比如拿我来说，从小到大，一直是处在新与旧两种文化碰撞的第一线。我们这个家，大约在100多年里，从屯村搬到同里，又到松陵镇，再从镇上搬到苏州市，进了城。我们虽然不是农民，但是它由农村逐步搬进城的过程，是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演进相合的。如果扩大开来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步骤，简单地说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这股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听叔叔这么一说，我似乎明白了，他跟我聊“家世”，实际上是给我上了一堂“社会学基础课”。

从叔叔讲的“家世”里，我听出来，我的祖父虽然是个清朝“遗老”，思想却不守旧，可以说是一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老人。解放以后，他对共产党、新中国充满期待，常常写作一些讴歌新事物的诗词。1963年他在《新春自祝》里写道：

虚龄八五度春朝，
愿望无穷气倍豪。
思想敞开神自得，
年年健进乐逍遥。

1966年春节，88岁高龄，已经半盲的老人家还热情地高歌：

春光带来革命花开，
世界人民打擂台，
不怕美帝不成灰；
高唱革命歌，
人民乐事多，
粮食积广场，
鱼肉满街敷；
此日市场人头挤，
革命春节刚到来，
工农弟兄和姊妹，
老老少少乐开颜；
大唱革命歌，
人民乐事多。

但是，老爷爷“大唱革命歌”的歌声还回响在耳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伙“革命小将”冲进他的房间，逼着这个“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交代罪行！老人家气愤难当，突发脑溢血，从此瘫卧在床，苦挨三年，于1969年离开了人世。当时除了被轰回苏州的五婶之外，在北京的亲属都不能去为他送行。



1965年春节，在苏州市政协联欢会上，爷爷和达叔叔在政协院子里拍摄了这幅照片。爷爷在照片背面写道：时，大雪三天琼林玉苑美景满目，缀成银光万丈的新世界。

七、叔叔听我讲故事

据统计，反右期间全国民盟盟员中被打成右派的，占到盟员总数的10.5%^①，民盟在这场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窝”。反右后民盟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总结报告里说“民盟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盟员的多数还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因此每个盟员“必须以政治挂帅为前提”，“拔白旗，插红旗，改造立场，改造思想”，才能“跟上形势，过好社会主义关”。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意见》精神，对右派们“进行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交代政策，指明前途；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批判其错误态度，推动和帮助他们接受改造”，民盟中央抓紧了对在京中央委员的学习，每周有几天，要他们到机关来学习。

反右以后，父亲和叔叔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但是在民盟中央委员会里还保留了一个“委员”的位子。两人摘掉了右派帽子，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毕业后，就回民盟中央参加

^①民盟内据1958年1月的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3378人，占盟员总数的10.5%，其中中央委员（含候补中央委员），59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3，中央常委11人，占中央常委总数35%；各省市主委、副主委30人，占30%，县分部主委76人，占32%。——《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第132页，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学习，所以每个礼拜两人能够在学习时见面。

反右斗争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很多知识分子心存疑惧，对形势、政策、工作等方面的看法、想法，采取了“不讲、不写、不想”的态度。从民盟方面来看，党盟关系、盟组织与盟员的关系、盟员与盟员的关系都变得紧张起来。到1960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形势困难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老百姓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都发生了困难，不仅粮、油、肉、蛋凭票供应，连花生、瓜子都绝了迹，只能在春节、国庆这样的节日里分配到一点。这时怎样才能团结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克服困难，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共产党要求各民主党派帮助来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

这时候民盟中央组织的学习从形式上讲，改变了反右时“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那种搞法，改用“三不”、“三自”，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自己提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和风细雨”的方式。这种学习气氛比较宽松，被称作“神仙会”。父亲和叔叔除了定期参加民盟中央组织的神仙会之外，有时候还和一些“摘帽右派”，跟随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到外地农村和工厂参观学习。

所谓“摘帽右派”，实际上就是表面上去掉了右派标签的右派，他们“还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被剥夺许多权利，被当作一类特殊的人对待”。比如叔叔虽然摘掉了“帽子”，而且还保留着民族学院教授的头衔，但是却不能上课堂讲课，更不能写什么文章，当然，就是写了，也不会有人拿去发表。所以后来我们整理、编辑《费孝通文集》的时候，发现从反右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的20年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到文集里。我们只好写一个《编者的话》来说明：

本卷收录的文章写于1957年而止于1980年。在这段时间里，作者所写的文章如此之少而且时间跨度之长，其原因可谓人所皆知。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作者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而未能幸免。

在此后的20年里，除了奉命翻译一些学术资料外，能收到文集中的文字，只有作为《干校家书》的寥寥几封短札……

其实，收到《费孝通文集》里的除了《干校家书》之外，还有一篇《留英记》。那时父亲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当编辑。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是一本内部发行的期刊，专门登载旨在留存和抢救一些具有史料价值事件知情人所写的文章。父亲认为费孝通在英国学习的经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求学的过程，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史料价值，就请弟弟写出来。

这篇文章是上世纪60年代初写的，虽然事隔久远，但我还能记得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时的情景。那天，我因为头天上中班，上午起来得比较晚，父亲正伏在桌上改稿子，见我起来，就从一摞稿子中抽出一份对我说：这是五叔的文章，挺有意思，你看看。父亲经常会拿一些他认为我应该读的东西给我看，有时还会评说几句。接过来一看，是《留英记》，不很长，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老实说，那时候很少看到孝通叔叔的文章，这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挺深，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里面有一段写他寄宿在英国贵族家里的经历。从里边我看出了他的“资产阶级老师”，一定要他住进贵族家，是要让叔叔从这个“家”的日常生活里，沾染上英国统治阶级的气味。这不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资产阶级用“潜移默化”、“腐蚀利诱”拉人下水的手段吗。这个“资产阶级”够歹毒的。

还有那个“席明纳”真不错：在一间满桌、满地、满墙是书籍、杂志、文稿的房间里，随意地摆着些沙发、椅子、板凳，参加的人找个地方坐下，你有心得体会想说，就可以发一通议论；如果像叔叔这样的毛头小伙，没什么可说，也可以躲在墙角里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听，受点熏陶。这样的学习会可比我现在参加的会，舒畅多了。

看完文章交还父亲，本想他会说点什么，但是没有。后来这篇文章刊登在《文史资料》上。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发表在内部刊物上，不过万把字的史料性短文，在“文革”当中也被打成“为社会学翻案、继续招魂，为反动的功

能学派续家谱，宣扬英国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鼓吹学术自由，为旧中宣部的高教六十条鸣锣开道”的大毒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再把话题拉回到“神仙会”上来。“神仙会”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不再那么剑拔弩张，的确改变了当时紧张、沉闷的局面。这股“和风”似乎也吹进了我们家，因为这一时期，父亲和叔叔在学习结束后会一起回家，哥俩儿轻松地在一起坐一坐，聊一聊，或者下几盘围棋。父亲还可能用那把小小的圆肚铝壶，煮一壶咖啡（父亲在南洋20多年，养成喝咖啡的习惯。回国后，偶尔会收到南方亲友寄来的咖啡）请弟弟喝一小杯。有时候，兄弟俩还会去离家不远的一家小酒馆，每人要上半升啤酒，坐下来和酒友们侃一通。

那几年，去这家小酒馆喝啤酒，几乎成了父亲每天必做的“功课”。父亲在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很少，民盟中央每周也只有三两个半天的学习。自从父亲完成了那本《英使访华录》的翻译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可忙活的了。闲来无事，就成了那家小酒馆的常客——要上半升啤酒，一盘小菜，坐下来，抽支烟，聊聊天，打发时间。酒友们也不知他姓甚名谁，都亲切地喊他“老半升”。父亲曾在一首打油诗里这样写道：

一杯啤酒一支烟，
一个工程在面前。
碎木竹片有精良，
安乐靠椅自己修。

父亲用啤酒、香烟和修理那把破藤椅在消磨时光。

那时，我在工厂“三班倒”，如果叔叔来的时候，碰巧我在家，又到了吃饭时间，我就煮面条或是别的什么招待叔叔，他总是吃得津津有味，还夸我饭菜做得好。后来，一起参加学习的叶笃义、罗涵先等人也来了，他们聊的多是

“神仙会”上的事；有时罗涵先会拿出报纸，根据报上出现或消失的某个人的名字来分析时局，大家戏称他研究的是“名单学”。

我很少听他们谈话。记得有一次父亲和叔叔不知道谈到什么问题时，把我叫过去，要我讲讲工厂里的情况，我就讲了一些在我身边发生的故事。那年头，全国从上到下正处在疯狂的“大跃进”之中，报上说了，我们要在15年之内“超英赶美”，似乎“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农村里建立了“人民公社”，大家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地里不时放出亩产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粮食的“高产卫星”。工人阶级当然不能落后。我们厂是铁工厂，要为“钢铁元帅”升帐，突破年产1070万吨钢出力。厂党委号召全厂工人“大炼钢铁”，我和大家一样，没白天没黑夜地用一种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称之为“炒钢”的炼钢法来炼钢——在地上挖一个坑，底部接通“风葫芦”（鼓风机），坑里放了焦炭（焦炭到铸工车间去拿），然后把盛了铁末子（车工切削下来的铁屑）的坩埚放到上面烧，同时用一根铁棍不停地搅拌，铁末子在高温中熔化，倒出来凝结后，就是一块炼成的“钢”。一天，我们锻工班一位师傅，忽然想要试试这种“炒”出来的钢，经不经得住锻打，于是用钳子夹了一块刚凝成块的“钢”放到空气锤上，没想到当锤头打在上面时，只听“嘭”的一声，火花四溅，这块“钢”竟像豆腐渣那样散开了。不过这一天，我们锻工班还是敲锣打鼓，用小车推着，把“炒”出来的钢送到党委那里去报喜。

除了炼“钢”，还刮起了一阵“超声波”风。为了这个超声波，厂党委很下了一番功夫，党委书记亲自向全厂工人报告他外出参观学习时所见到的奇迹。这位书记讲，“超声波”具有神奇的功效，他在徐水亲眼见到一头长了“癞”的病牛，被“超声波”治好了。这头牛病得不轻，趴在地上不能动，当用“超声波”“超”它时，它就能动弹了；再“超”，它站起来了；三“超”，能吃草了；最后一“超”，神了，牛竟跑起来，病全好了。超声波不仅能给牛治病，如果用它来“超”地里的麦子，麦子眼看着噌噌往上长；食堂用“超声波”煮饭，不仅熟得快，而且饭会变多；用来洗碗，能轻松除去污渍……总之“超声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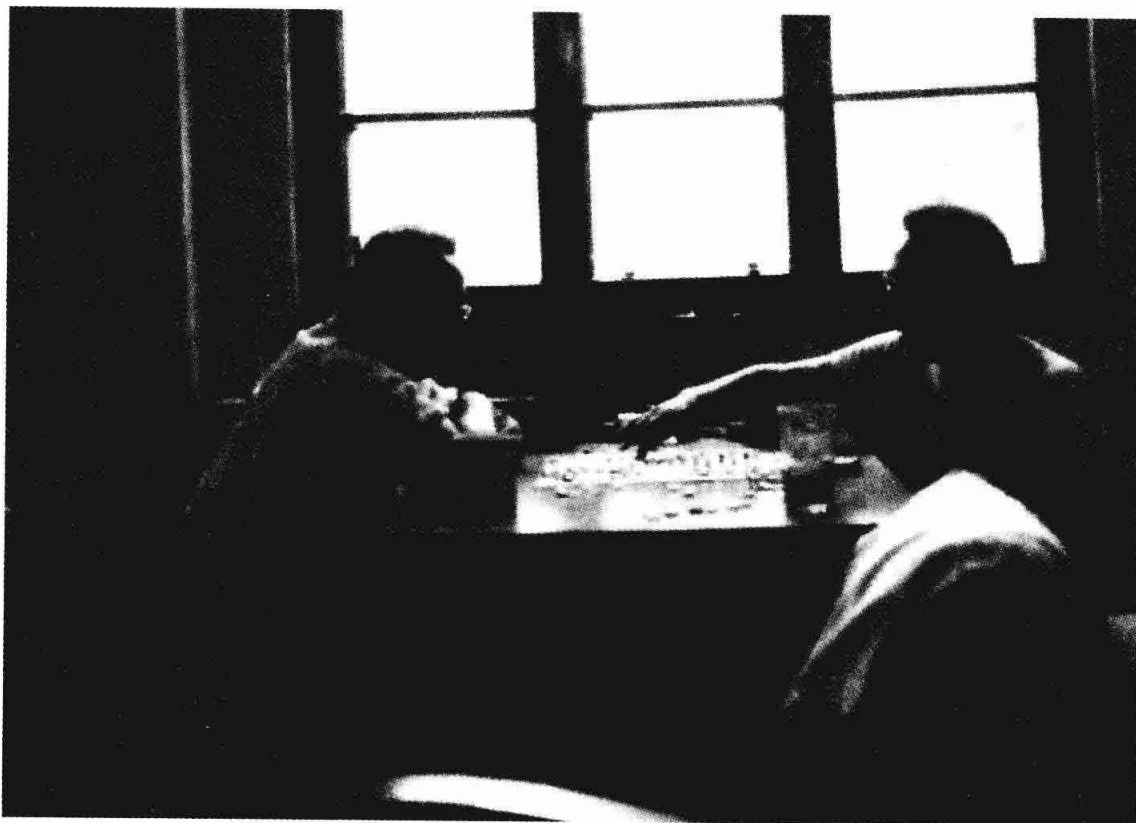
神通广大。他号召全厂立即掀起一个制作和使用“超声波”的高潮。

党委书记的动员报告的确鼓起了工人們的劲头。会后，我们从车间书记那里领来“超声波”的图纸，仔细一看，没想到神通广大的“超声波”竟如此简单：一根长约100mm，相当于普通家里水管粗细的无缝钢管，一头砸扁，再把砸扁的地方锯出一个“U”形缺口，然后嵌入一片薄钢片，固定住，一个“超声波发生器”就诞生了。把这个玩意儿通上高压气，一吹，据说就能发出“超声波”。制作这样一个东西不难，但是要保证“使用”这些“超声波”，却让我们犯愁。听说机工车间有人把它对准车刀吹，不但切削效率没有提高，反而把切下来炽热的铁屑吹得乱飞，容易伤人。我们想不出喷射着高压空气的“超声波”怎么应用在打铁上的办法，结果制作的“超声波”被扔在了一边。由于全厂人人制作超声波，没两天，料场里所有适合做“超声波”的管材全部用光了。接着上边又推出一种“蜗牛式”的“超声波”发生器，这种“超声波”由于制作起来比较复杂，再加上大家看不到它的神奇威力，都没了兴趣。这股荒唐的“超声波”热很快就退了烧。

我发现，当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叔叔总是很注意地听，但是从不表示什么意见，顶多问一句：你们一天能炼多少钢？“超声波”管用吗？你做了几个这样的话。记得有一次我讲完后，他和父亲用英语交谈了几句。我听不懂，也没理会。但是我能从神情上看出，他们对我讲的这些荒诞故事充满了忧虑，又不能流露出来，甚至在我面前都不便议论什么。他们是担心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会不知轻重说出去，惹来麻烦吧。现在想想，那个年头人们十分起劲干的那些事，是多么愚蠢和荒唐啊。

父亲他们兄弟俩聊天下棋的“好日子”，一直延续到“文革”爆发前夕。经常来我家一起聊天的叶笃义先生，在“文革”后写的《虽九死其犹未悔》里回忆说：“他（费孝通）每星期天到他的阿哥费振东家里闲坐，我也届时前往。后来我的问题愈迫愈紧，我对振东说为了使他们兄弟免受牵连，我不能去看他们了。”

叶笃义不来了，罗涵先也不来了，最后，叔叔也不来了。



兄弟对弈

八、“要不要去苏州的票？”

自从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造反有理”以后，红卫兵开始杀向社会、走上街头，到处贴大字报、撒传单、发表演讲，对“阶级敌人”实行揪斗、游街，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一种紧张、不安，甚至恐怖的气氛当中。我家在交道口，离民族学院不算很远，我却不敢去，怕去了以后会引来麻烦。我没敢去民院，叔叔却来我们家了。那是1966年8月28日一早，叔叔和婶婶突然敲开了我家屋门。那天我上中班，正好在家。叔叔神色有些紧张地对我说：“民族学院的红卫兵勒令牛鬼蛇神的家属今天一定要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你赶快想办法弄张去苏州的火车票，把婶妈送走。”回过头又对我父亲说：“我看还是把孟吟送走的好，学校里很乱，我的处境也不好。前天中午回到家，孟吟不在，怕是出了什么事，情急之下，我就在家属院里一边敲着脸盆一边喊，‘牛鬼蛇神费孝通的老婆不见了’，转了一圈，最后在居委会找到她。孟吟走后，我一个人还好应付。”

我不敢怠慢，马上骑车去北京火车站。到了那里一看，心凉了半截，只见站前广场上人头攒动，售票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找到卖苏州票的窗口，只见买票的人“前胸贴后背”地一个紧挨着一个排成长队。我费劲地向

队尾挤去，心里直嘀咕：人这么多这么乱，上午能买到票吗？买不到怎么办？厂里的“革命”正抓得紧，我又是“黑五类”出身，不去“促生产”还得了！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突然觉得肩头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回头看，一位中年人凑到我跟前低声问道：要不要去苏州的票？这句轻声的问话，让我心头一震。怕是听错了吧，愣了一下，他又问了一遍，听清楚了，我赶忙答应。于是他把我拉到一处角落，拿出一张当天晚上去苏州的卧铺票，他说在人挤的地方退票，怕人群拥过来乱抢。我千谢万谢，真是老天保佑，居然没费太大力气就搞到票了，而且还是卧铺。后来听说，由于旅客太多，第二天各趟列车的卧铺，全部取消改成硬座了。

中午，我准时去上班，一出门，见对面一所中学里涌出一队臂戴红箍、腰扎皮带、身穿黄军装的红卫兵小将，大呼小叫着向旁边的胡同冲去；一路上，只见大街两边墙上写满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令人触目惊心。路过东单时，胡同里突然冒出一队红卫兵，高呼口号，个个手里拎着皮带，一个瘦小的老太婆佝偻着腰，踉踉跄跄走在前面，挂在胸前写着“地主婆”的大牌子几乎耷拉到地上。四周的行人被嘈杂的口号声、喝骂声吸引，纷纷聚拢过去。我紧蹬了几下，自行车向东拐个弯，飞快地向工厂驰去。

红卫兵组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我们厂也有人拉起了这样的“队伍”，而且不断听到他们出去抄家和大打出手的消息。

我按时赶到车间，像往常一样开始干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惴惴不安，一会儿想五婶是不是顺利上了车？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担心起那个“地主婆”能不能挺过这一劫；后来又隐隐感到家里什么地方不对劲……好不容易挨到下班，我赶紧蹬车往家赶。

夜里 11 点多钟，昏暗的路灯下没几个行人，街上冷冷清清。然而当离家不远的时候，我猛然看见家门口围着一帮人，心里不由咯噔一下——真的出事了。到了门口，我认出这些人是厂里的红卫兵，他们拦着不许我进去，宣布说正在你家进行“革命的抄家行动”。一个女“红卫兵”（厂技校的一个学生，以

用皮带打人狠而名闻全厂)拎着根宽皮带看着我。我努力侧耳倾听院里传出来的响声,试图判断里边发生了什么……大概是因为我到家的时候,抄家已接近尾声,所以没多久,红卫兵们纷纷登上卡车扬长而去。我冲进屋里,看到父亲和母亲坐在椅子上,虽然显得十分疲惫,却没有挨打的迹象,我放下了悬着的心。这时才注意到,屋里像被翻了个个儿,那张破办公桌的抽屉全被拉出来,里边的东西散落一地。插在书架上的契诃夫小说(是我一本一本从旧书摊上淘换来的)不见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也被抄走了。我住的小东屋,被翻得乱七八糟,床上被褥掀到一边,露出床板;原本放在窗台上的花盆被摔碎,泥土撒了一地;纸糊的顶棚被捅了一个大窟窿。妻子说,红卫兵问她有没有金银财宝、变天账什么的,以为藏在上边,就捅开了。我家从来没有什财宝,更没有变天账,他们这次抄家,肯定“战果”可怜,只能带走塞满一些衣物和书籍的两只破皮箱(皮箱虽破,却是从南洋带回来的,颇有纪念意义)。

造反派走后,全家人一夜无眠,围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妻子说,她看到“西纠”贴出的通告,说凡是被抄家的“黑五类”,必须立即滚出北京,我们是不是会被赶走?如果走,我们去哪?大家商量不出个头绪,只得决定上班后各自向单位作汇报,听候造反派处理。第二天我按时去上班,刚到厂门口,就看到地上写着“揪出大右派的孝子贤孙费皖”几个大黑字,名字上打了两个大大的红叉子。我想今天要吃苦头了。果然一进车间,便上来两个戴红箍的造反派,不容分说,把我胳膊一拧,掐着脖子,押上了批斗会的现场。我弯腰低头接受批判,在一片讨伐声中,我渐渐听明白了,这只是我们车间的一个小型批斗会。听了半天,揭发的“罪行”都是些“上纲”、“上线”的鸡毛蒜皮,里边只有一条挺要命的,有人揭发我向一些人散布说,毛主席在费孝通被打成右派以后,召见过他,并且对他说了“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这样的话,这是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大右派费孝通坐在一条板凳上。是可忍,孰不可忍”!这话如果被“演义”一番,再一“上纲”、“上线”,就是“反革命言论”了!我心想,自己八成在劫难逃。

这天批斗会后，我被关进一间空屋里，连着三天不许回家，白天除了到各班组接受批斗之外，余下的时间就是写交代。坐班房的时候，看守要我和一帮“走资派”一起排队去食堂买“黑饭”，我说：我不是走资派，不能跟他们一起排队，要自己走，不然我就不去买饭。第二天中午我真的没有吃饭。看守警告我不要绝食顽抗！不过晚饭的时候，他就让我单独去食堂了。第四天我被释放，但是回车间以后不准干活，要我坐在一个角落里接着写交代。这么多天来，挖空心思，该写的写了，该骂的骂了，没有新鲜东西可写了，枯坐在那里，无人理睬，我学会用抽烟来消磨时间。又过了几天，终于被打发回班组，不知道为什么，批斗没有再继续，更没有升级。再后来不了了之，没人提这事了。

虽然造反派不再理睬我，但是我的心依然悬着，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整我，听说别的车间被抄家的人有轰回老家去的，他们怎么处理我？另外还有个问题令我纳闷，抄家的时候，为什么那几个出名的打手会手下留情？过了好久才有人偷偷告诉我：那晚造反派一连抄了好几家，你们是最后一家。去之前他们到派出所了解情况，派出所的同志说“抄家可以，但不许打人”。没想到他们竟照办了。听了这话，我心里暗暗感激那位好心的民警。

九、孝通婶妈

值得庆幸的是，造反派抄家的时候，孝通婶妈已经登上了去苏州的火车，如果那时候他们还没走，真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样。

婶妈这一走，老两口天各一方，各自又经历了一番磨难。三年后婶妈才返回北京自己的家。

婶妈抵达苏州的时候，正赶上我的祖父因为被抄家批斗而突发脑溢血，所以从回老家的第一天起，她就挑起照顾老爷爷的重担，直到老人家去世，整整三年。婶妈不仅历尽服侍瘫痪病人的种种辛苦，还承受着心灵上的煎熬，因此精神和身体都受到很大伤害，留下了严



▲ 婶妈在南洋时留影（1944年）。

重的后遗症。

婶妈姓孟名吟，和我妈妈在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时是同班同学。那时候她已经结婚，同学们常常拿这事同她开玩笑，毕业后同我妈妈一起去南洋教书。抗战时期因丈夫病重回国，不久丈夫去世，经我父母介绍去了昆明，与孝通叔叔相识，1939年两人结为伉俪。婶妈干活麻利，不管什么时候，家里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是个持家好手；她又是个热情、好客、善良的人。听二姐说，她那年从香港来到清华园的时候，天气已经渐渐凉了，可是从“四季如夏”的南洋乍到北方，一件过冬的衣裳都没有，天说冷就冷，这可急坏了婶妈。她马上着手为二姐准备过冬衣物，忙活了好一阵子才准备齐全。二姐还说，她本来不爱喝牛奶，可是在婶妈的“监督”下，每天早晨都要被“逼”喝下一杯牛奶以后才去上学。时间长了，居然养成习惯。婶妈就像照顾女儿一样，让二姐在清华园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婶妈和叔叔结婚的时候，抗战已经打了两年。虽说昆明是“大后方”，离前线还远，但是日本鬼子的飞机不时会来轰炸，“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功课”，最多的时候天天都有。有一次警报解除后，他们从城外回到家里，发现“四个钟头前还是整整齐齐的一个院子，现在却成了一座破庙。没有了颜色，全屋都压在有一寸多厚的灰尘下。院子里堆满了飞来的断梁折椽，还有很多的破烂的书报”，原来院子里落下了炸弹，屋子被炸塌了。为了躲避轰炸，他们搬到呈贡乡下，租了一间“下面一半是房东的厨房，一半是他们的猪圈”的厢房住下，在“楼下的炊烟和猪圈里所免不了的气味”的“熏陶”下住了五个年头。就是在这厢房里，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女儿的到来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欢乐，同时也增加了负担。

战时的生活是艰苦的，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即使是在云南大学当教授的叔叔一家，日子也不好过。我曾经在云南省档案馆，看到过一份民国三十三年（1944）云大教师工资的原始记录，当时刘文典的工资是国币600元，费孝通550元，楚图南500元，白寿彝500元，方国瑜500元，华罗庚480元……

钱穆在 1945 年的工资是 600 元。以上几位教授都是在各自学术领域里取得过杰出成就的学者，他们拿到的这五六百元工资，顶不顶用呢？有人计算过，如果 1937 年的物价指数为 100 的话，到 1943 年下半年，生活费指数上涨已突破 4 万，换句话说，此时的 300 元，仅相当于战前的 8 元多。抗战以来，昆明的物价飞涨了 300 倍，而西南联大教职员工的薪水只增加 5 倍。像闻一多这样的著名教授，每月的薪水也只能维持十天半月的家用开销。

微薄的工资难于维持生计，教授们落到“吃不饱饭”的窘境。为了吃饭，闻一多不得不利用教课间隙在茶馆里“挂牌治印”，挣些“润资”贴补家用。叔叔一家处境和大家一样，为了缓解养家压力，他在教书之余，拼命给报刊写文章，为了给女儿挣些买奶粉的钱。他甚至跑到云大校门外的小茶馆里，整天“泡在茶馆里”，在那样乱哄哄的环境里，为在一旁等着“取货”的报社记者写稿。

婶妈就在这样艰苦的局势里，操持着这个小家庭。

好容易盼到了胜利，抗战结束，人们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可是蒋介石为了独吞胜利果实，继续他的独裁统治，导致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又打起了内战。

虽说叔叔一直专注于学术研究，希望用自己的知识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出力。但是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即使在抗击外辱的时候，仍然不顾民族存亡，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千方百计地要消灭共产党；胜利后又不愿谈判，一心打内战；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鱼肉百姓；军队和警察残酷镇压群众……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引起了叔叔强烈的不满，促使他写出了大量针砭时事、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文章，甚至对国民党头子蒋介石也充满鄙夷！

叔叔疾恶如仇，富于正义感，这样的感情、心态必然导致他投身到反内战、反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的斗争之中。他参加民主同盟，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抨击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文章，支持学生运动，从而得到了“民主教授”的美誉。1945 年 11 月 25 日晚，西南联大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有数千人参加的“时事晚会”，叔叔和钱端升、伍启元、潘大逵等教授到会演讲。这个集会引起了当局的恐慌，派军警包围了联大，开会的时候，校外不时响起枪声，混入会场

的特务伺机割断电线，企图制造混乱。但是人们并没有被吓倒，教授们陆续登台演讲，轮到叔叔上台演讲时突然枪声四起，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但是他镇静地继续演讲，他知道这时候自己的任何胆怯和慌乱，就有可能引起会场的骚乱，其后果就会招来一场屠杀！他在台上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在热烈的掌声中叔叔结束了讲话。这次集会虽然在特务的破坏下提前结束了，但是其影响巨大，更加激发了群众反内战的斗志。

演讲会刚刚过去五天，反动当局又出动军警和武装特务袭击了联大和云大等校的爱国师生，他们用木棍打，用刺刀扎，甚至扔出手榴弹，造成了四死、伤数十人的“一二·一”惨案。这时的昆明已完全笼罩在“黑色恐怖”之中。

翌年，国民党特务更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他们强令进步刊物停刊，跟踪盯梢进步人士，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7月11日，民盟成员、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在青云街学院坡被枪杀。李公朴是民盟总部派到昆明来组织反内战运动的，由他发起约了闻一多、潘光旦、楚图南、潘大逵、冯素陶和费孝通七人具名，邀请新闻记者在商务酒店开了一个招待会，会上由李公朴和闻一多发言，表明民盟反对内战的态度，当时就有特务捣乱。新闻招待会后，特务终于下了毒手。

7月15日，开过“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的闻一多先生，刚从府甬道西仓坡《民主周刊》社开完记者会回家，就和他的儿子一起也被暗杀了！

李、闻的先后被害，使叔叔无法按捺胸中的激愤，他在一篇悼念闻一多的短文中说：

不久之前，我曾同他在同一会场上，听他公开地向社会人士声言：“我们是要用和平的手段争取和平。”“他可以死，我也可以死，人人都可以死！”我在他遗体前沉默了。“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等事。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其实，叔叔的处境也十分凶险。他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已经被特务跟踪，李公朴遇刺后，天天有形迹可疑的人在云大和联大教员宿舍周围游荡，叔叔家背后城墙上的短墙已被拆去，特务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冲进来抓人。闻一多被害那天晚上，他避到云大校长熊庆来家，这时他想起美国领事罗舍说过，“如果有需要帮助可以通知



我”，于是就叫一个学生去和罗舍联系。罗舍亲自开了吉普车来接叔叔，并声明这是他个人的行动，“准备冒丢官之险来保护你”^①。当他们刚从校长家离开，国民党特务便闯进熊校长家搜查，带走了叔叔留在那里的那个包。显然特务们已经要对他下手了。当时除了叔叔以外，还有一些经常出头露面的民主教授，如潘光旦、潘大逵、张奚若、尚钺、冯素陶、赵沅等人也被接进领事馆，他们都是民盟盟员。美国领事馆保护民主教授这件事，还引起了一场“外交争端”——叔叔他们躲进领事馆后，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要求领事馆交出这几个人，领事馆不干，事情闹到了南京。为此，国民党中央政府外交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进行了交涉。最后由美方派人与云南省政府以及民盟负责人共同会谈，达成协议，在保证这些民主教授安全的前提下，将他们送离昆明。

▲ 1947年2月叔叔离英返国，途经新加坡时留影。

^①摘自“文革”时费孝通的《综合材料》手稿。

叔叔去了南京，然后回到家乡。为了规避政治迫害的风险以及改变当时的环境，在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建议和安排下，接受了英国一个文化团体的邀请，于1946年11月告别家人去了英国。

孝通婶妈带着女儿留在浒墅关。虽说“那时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问题不扩大到家属”，但是婶妈独自一人应对这样一个艰难、险恶、动荡不安的局面，成天提心吊胆，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叔叔在英国只待了三个月，1947年2月便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继续教书。这期间除了教课，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书桌上”，想把这些年来在学术上思考的问题梳理清楚，整理成文。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的暴风骤雨，还是刮进了清华园，搅得校园里恶浪滚滚。

国内战争打响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统区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加紧对民主力量的镇压，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7月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随即就以“危及国家颠覆政府”的罪名，

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同时，在南京、天津、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开始大规模逮捕进步学生。北平的特种刑事法庭也发出了“传讯、拘留、提审”各大学里民运积极分子的命令。

清华大学成了警察、

▼
老两口



特务主要“光顾”的地方。当年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副主席的裴毓荪回忆说：“1947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通知，说我处境险恶，必须立即撤离清华校园暂避。当我准备离校时，发现军警已经守住了各个路口，便衣特务在校内到处乱窜。急迫中我朝胜因院走去，希望教授住宅区里的戒备能松懈一些。没想到，那里也一样有军警在巡逻，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定了定神，抬头察看四周，发现自己正站在费孝通家门前，想要上前求助，又觉得眼下局势紧张，这样做可能会给费先生带来麻烦，犹豫再三，还是敲响了费家大门。费先生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快到里面去，我们正在为你担心呢。先上阁楼去躲一躲，我们再想办法。’费师母则为此担惊受怕，时时留意门外情况，生怕有人闯进来，通宵不能入眠。费先生当晚又跑到燕京大学，希望找到一辆能够自由出入清华的汽车把我送走，但是没能如愿。”^①裴毓荪还说，她在费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发现费家门前出现了几个可疑的“便衣”，于是费先生就把她转移到了冯友兰家。第三天，吴泽霖教授又把她接走，这天半夜，地下党派彭珮云等同学来接她，他们翻越清华园的围墙，终于逃离虎口。

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叔叔再一次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但是叔叔的作为，让婶妈更加担惊受怕。

这种提心吊胆、寝食难安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解放了！婶妈以为从此就能过上安稳日子，再不会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房前屋后转悠，全家平平安安，女儿正常上学，正值不惑之年的丈夫，学术上能更上一层楼，为建设新中国尽力。然而事与愿违，后来的日子一点都不“太平”，在一个接一个的“运

^①《薪火相传》，第156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动”中，叔叔一次又一次地“交代”、“检查”，使得婶妈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生怕出什么事，直到叔叔戴上“帽子”，不做什么事了，她才觉得踏实一点——不做事就不会再惹是非。然而，“踏实”日子没过多久，“是非”又找上门来，而且还捎带上她自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叔叔的“旧账”再次被清算，婶妈也受株连，挨辱骂，被轰回老家，身心备受煎熬。

婶妈从老家回京的时候，叔叔已去了干校，一去三年。当叔叔从干校回来，老两口重聚时，婶妈的身体已经垮了，咳嗽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只要闻到一点刺激性的味道，就会咳个不停。那时候叔叔经常在家里翻译一些外文资料，有一次他又习惯地点燃一支烟吸起来，正在厨房里干活的婶妈被烟味呛得咳起来。激烈的咳嗽声让叔叔察觉到自己吸烟给婶妈带来的危害，于是赶紧掐灭香烟跑到厨房里，看着老伴痛苦的样子，感到十分内疚，此时他突然做出一个决定，对老伴说：“从现在起我不再吸烟了。”

叔叔可是个“老烟民”，虽然我没有问过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但是我知道，在1934年他写的《杂草七则》里就有“更想起了对床抽烟的余味，一定袅袅难绝了”，还有“手里烧着烟，有一点醉意”这样的话，所以可以断定他不会迟过24岁就有了这个嗜好。我还记得，叔叔在干校的时候，大概是因为香烟经常“断顿”，又不容易得到“补给”，所以隔三差五，会托我父亲代买一些香烟寄给他，没有好烟，一毛五一包又苦又呛的“绿叶”（牌）也行。可见叔叔抽烟够凶的。有一次他度假时来我家，我见他掏出“绿叶”来抽，就拿出我的“大福字”烟给他，他摇摇手，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这个挺好，你也要学会抽这种苦烟！”我听了点点头，心想叔叔干吗要我“学会抽这种苦烟”？

尽管叔叔的烟瘾很大，但是自从下了“不再吸烟”的决心以后，就再没有吸过一口香烟。1980年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一位老朋友知道他烟瘾大，特地送来了骆驼牌香烟，虽然戒烟已经好几年，但是，看到这些名牌香烟他还是“馋”得想吸一支，不过，还是克制住了。他说，说来真奇怪，从那次“骆驼



牌的诱惑”之后，不论见到什么好烟，就再也不“动心”了。

婶妈和叔叔结婚几十年来，饱受战乱和社会动荡之苦，长期处在恐惧、紧张、焦虑、无奈之中，种下了病根。1979年叔叔在给友人张文芬的信中说：“老伴今年比去年略略好些，她的病可以说是过去那段历史的后遗症。一受刺激就容易兴奋，自己不能控制，最剧烈时要抽筋。”

历史终于翻过沉重的一页，全国人民过上安稳的生活，叔叔重获新生，再不会让婶妈“提心吊胆”了。长期在吉林公主岭工作的女儿一家，也回到北京，一家团圆，儿孙绕膝，各方面的条件好起来，婶妈应该可以安下心来休息一下，治一治病了。但是，这种长期煎熬种下的病根，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治愈。更糟糕的是，由于不小心摔了跤，股骨骨折，不能走动，令她只能坐着或躺在床上。有一次我去叔叔家，见叔叔正在给婶妈念报，那时婶妈已经表现出“脑质软化”的

▲
婶妈和孝通叔叔一起去新疆考察（1982年）。



▲叔叔携女儿为婶妈送行，婶妈的骨灰撒在了浩淼的太湖里。

症状，长时间不言不语坐在那里发呆，叔叔希望通过不断和她讲话、读报给她听来延缓病情的发展。到1989年婶妈的病情越发严重，竟卧床不起，意识渐失。

婶妈成了“植物人”，但是叔叔始终没有放弃对她的治疗和关爱。据我所知，每次出差前，叔叔除了叮嘱女儿按时给母亲服药，多翻身、勤按摩防止褥疮之外，还要来到床前和婶妈握手道别；出差回来，也一定要到病榻前看望老伴儿，摩挲着她的手，问一声：感觉还好吧……

1994年末，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年的婶妈走了。我听叔叔说：孟吟一辈子为我担惊受怕，没有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最后精神上承受不住，病倒了。“文革”以后，各方面的条件好了，她却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又经常在外边跑，聚少离多，对她的关照太少了……内疚、自责、悲痛之情溢于言表。婶妈去世后，他作短歌抒怀，歌曰：

老妻久病，终得永息。
老夫忆旧，幽明难接。
往事如烟，忧患重积。
颠簸万里，悲喜交集。
少怀初衷，今犹如昔。
残风经秋，星火不熄。

婶妈和叔叔相濡以沫，同甘苦共患难，走过了整整五十五个年头。

十、给潘公公“看病”，替浦熙修买“砒霜”

我家被抄的第二天，叔叔家也给抄了。红卫兵掠走东西以后，封闭了所有的房间，只留一间小房间和厨房给他用。小房间里没有床，叔叔只得铺条褥子睡在水泥地上。抄家以后，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批斗，他曾经在一个月里，被批斗十多次，每次批斗持续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批斗会上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批判，这时他不得不深深地弯着腰站立在那里，有时支持不住了，直直腰或挪动一下身子，就会招来踢打。长时间保持那么一种姿势，实际上是在受刑。批斗会上他要跟着大家一道高呼打倒费孝通的口号，回答红卫兵的逼问。有一次一个红卫兵喝问他：为什么在英国拿到博士以后，不留在条件优越的国外，而要急匆匆回国，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老实交代！叔叔“交代”说：当时国内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作为中国人一定要回来为抗战出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想都不用想，就回来了。这样的交代招来了更强烈的“打倒费孝通”、“费孝通必须老实交代”的口号声——这些红卫兵根本不懂得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除了挨批斗，有时还要头戴纸糊高帽，胸前挂上“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牌子在校园里游街，“给来京的红卫兵观看”。这样的境况持续了整整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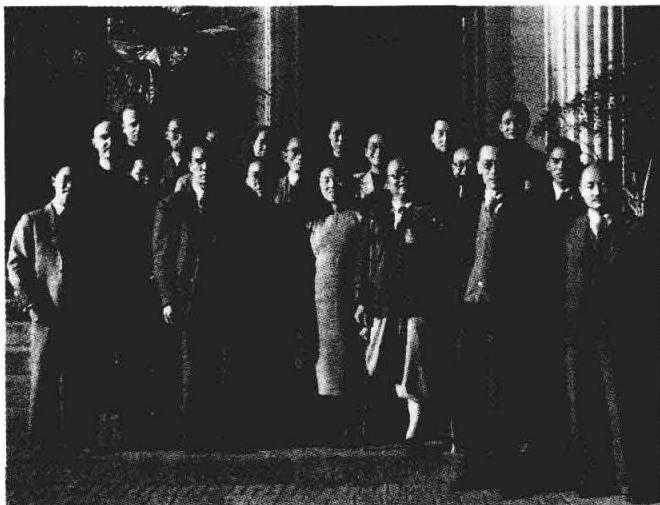
除了挨斗游街，他还住过“牛棚”。全校的“牛鬼蛇神”集中起来，睡在简陋的房间里，一个挨一个。早上出操，然后集体学习，随时准备被拉出去挨批。住在牛棚里的人，劳动改造是不可少的，红卫兵命令他打扫全校厕所。和叔叔一起打扫厕所的王尧说：“那时候天气寒冷，每天，费孝通老师推着小推车，车上是打扫厕所的工具。除了打扫厕所他还要兼管替家属院的厕所生煤球炉子（为防止水管被冻坏），一天下来只见他搞得满脸煤黑，东一块西一块，成了大花脸”，他“还做了工具把厕所里长期留下了的污垢刮得干干净净，真是发挥了‘博士’水平”。叔叔说因为干这个活，让他“对校园中的全部厕所都相当熟悉”。

那时叔叔住在民族学院家属院西四排的平房里，屋里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煤炉取暖。这年深秋，我带了烟筒、铁丝等用具，去帮他装炉子。以往去他家，都是从民族学院的正门进去，穿过校园到家属区。现在不敢从有人值守的正门进去，就从学校围墙外的玉米地里绕过校园，到家属区去，免得引起人注意惹麻烦。后来造反派忙于夺权打内战，对“牛鬼蛇神”不再感兴趣，局势不那么紧张了，我就隔一段时间，去民院帮他干点活，整理整理房间，到魏公村买买粮食什么的。

一次在整理完房间后，叔叔说：“你知道为什么造反派给我留的房间，比潘公公的多一间吗？这还要‘感谢’你们厂的红卫兵呢，多亏他们来外调，我趁这机会，把毛主席召见我，请我吃饭，还有在游泳池旁边和我说的话，统统讲给他们听了，这话平时是不好讲的。当时民院的造反派也在场，可能这些话起了点作用。”听说我们工厂的人来外调过，我赶紧问：“你跟他们说了什么？”“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跟我说，戴个右派帽子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过多少帽子啊，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我现在不是很好吗。他要我交几个工农朋友。我还告诉他们，反右以前，毛主席两次请我和冯友兰到他家吃饭。吃饭的时候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学苏联，一学就不要革命了。”听了叔叔这番话，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当初我在车间的角落里写了那么多天的交代，原来他们跑到这里来了，一定是没有搞出什么名

堂,只好放过我。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叔叔说的潘公公,就是住在隔壁的潘光旦先生,他是叔叔的老师,也是右派。“文革”一开始,潘公公就告诫叔叔说:“大运动来了,要避风躲雨啊!”为了能够躲过这场大风暴,叔叔给自己定下应对的16字诀:“逆来顺受,避风躲雨,少惹是非,力求自保”^①。



记得第一次见到潘公公时,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只有一条腿。后来听说这是他在清华念书时,因为上体育课练习跳高跌坏了右腿,当时医疗条件差,感染了,不得不截肢。他学习成绩优异,受到老师梁启超的器重。由于成绩突出,校方决定选派他出国深造。可有人不同意,说外国人会笑话中国派不出两条腿的人,连一条腿的也送来了。幸好学校领导有远见,依然派他出国,结果培养出一位大学问家。叔叔称他是“活辞典”,平时碰到什么疑难问题,跑去请教,一定能得到满意的解答。

上世纪50年代初潘先生以残缺之躯,伏在马背上进入湘鄂山区,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克服了正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搞清楚土家族的情况,为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作出了贡献。叔叔说,潘先生做事情非常专心,他善于根据自己的条件做到常人不易做到的事,他能够长时间地坐在书桌前,注意力高度集中地读书或写作。

早在1933年叔叔在清华研究院念书时,潘先生是那里的老师。叔叔虽然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在课外读过他的书,完

▲
解放前夕,中国社会学界已初步形成一支研究队伍,并取得一定成果。图为参加社会学年会的代表在一起(前排右三为潘光旦先生)。

^①摘自“文革”时费孝通的《初步检查》手稿。

全接受他的政治和学术观点。抗战时期叔叔在云南大学教书，潘先生在西南联大任职，后来由潘先生介绍，叔叔转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两人交往更加密切。他的政治态度对叔叔影响很大，叔叔说：“我在昆明时期，在政治观点上和他基本一致，行动上也经常在一起，政治活动主要跟着他走。”潘先生是民盟中央委员，昆明民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由他介绍，叔叔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李、闻事件中，他和叔叔一起躲到美国领事馆，事后一起在苏州隐避。叔叔出访英国回来后，又和他同在清华大学社会系工作……上学的时候，潘先生是老师，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是同事，命运就这样把两人连在一起。

解放后，经过院系调整，两人一起到了民族学院，成了邻居。闲暇时常结伴在家属院里散步，从容不迫，边走边谈，就是在反右的时候，这个习惯也没改变。在家属区散步免不了会碰到一些小朋友，当孩子们认出眼前这两人就是大字报上说的“坏人”时，有的孩子会追在后面喊一些像“右派分子黑良心，反苏反共反人民”这样的顺口溜，甚至有小朋友向他们扔石子。遇到这样的情形，潘公公和叔叔仍然平静地继续谈着话，向前走，从不回头呵斥这些孩子。

潘公公是右派，当然逃不过抄家的命运。听说抄家时，“红卫兵抄到他的存折上只有数百元，不相信，认为他隐瞒财产。他叫他们到民族学院藏书的地方去看，那里有几间屋子装满了他的藏书。他的钱全买了书了”。^①造反派抄家以后，只留了一间厨房给他用，所以叔叔说他比潘公公多一间房。

红卫兵留下的厨房里，没床没被，其他房间都贴了封条，不能进去。叔叔就从自己那里搬来褥子和被子，替老师在水

^①摘自叶笃义著：《虽九死其犹未悔》，第172页，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

泥地上搭了一张“床”，算是有个睡觉的地方。潘公公只有一条腿，除了撑着双拐挨批斗之外，还要去拔草。一条腿的残疾人，怎么蹲得下去，又不许坐小板凳，在红卫兵的监视下，他只好坐在地上干活。老年人在潮湿的地上坐久了，很容易得病。潘公公终于挺不住了。

老人家病倒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要一个行动不方便的残病老人去医院看病，实在是太困难了。况且这个时候北京正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医院里看病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会遇到麻烦，像潘公公这样出名的大右派去看病会碰到什么，可想而知。但是病又不能不看，无奈之下，叔叔想能不能先请一位医生来家里做个初步检查，他要我想想办法。说来也巧，那个在黑龙江当大夫的董云志同学，这时正好在北京友谊医院进修。我去找他，说明情况，他毫不犹豫地跟我来到民院。但是董大夫连个听诊器都没有，只能问问病情，按按肚子，摸到小腹部有硬块，怀疑是泌尿系统感染或者是肿瘤，但无法作进一步检查，只能到新街口药店买一些消炎药送去。

潘公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还是被送进积水潭医院做了前列腺的手术。手术刚刚做完，主刀医生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能再给人看病。医院里一片混乱，护士都“抓革命”去了，病人得不到正常的看护和治疗，插在潘公公身上的导管掉了也没人理睬，十分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知出院会有危险，潘公公还是提前出了院。出院后他一直感觉不好，挨了大约十天，终于坚持不住了。那天晚上他说身上感到很疼，跟叔叔要止痛片，但是没有，叔叔只得紧紧搂住他，希望能减轻老师一点痛苦……潘公公就这样躺在叔叔的怀里走了。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一生治学，格局很大，特别是对优生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娼妓制度、人才分布等，都有极深入的研究”^①的一代国学大师，潘光旦先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潘先生去世后，叔叔下放五七干校，临走时他拿了一大包东西来我家，说这是潘先生生前喜爱的“宝贝”，自己去了干校，前途未卜，放在民族学院怕不保险，还是存放在这里好。打开来一看是一对四五十公分高的葫芦。稀奇的是这两个葫芦，就像两个脑门长在一起的连体婴儿，这样的“联体葫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对葫芦一直在我家摆着，直到“文革”结束。遗憾的是1975年唐山大地震时，葫芦震落地上，有一只从细腰处摔断了，我只好用乳胶把它粘上。“文革”过后，母亲命我把它交还叔叔，这对葫芦最后又回到了潘家。

叔叔在干校时“常想到潘公”，他说：“自1952年他调来民院工作，我们是邻居，因此朝夕相处，出入同车。政治和学术观点基本一致，但我较为活跃。1957年都犯右派错误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同时摘去帽子，处理安排基本相同。工作、学习以及政协、民盟活动又都在一起。他是我这段期间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人。在我一生的政治生活中，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潘公的特点是在圆而坚，好学不倦，有自知之明，功夫用在自己身上”，我“一生中和他接触较多，而且较深，算是难得的‘缘分’。如果在过去，一定得写一篇东西，现在只能自己回味回味”了。

叔叔一定没有料到，就在他说这话后没几年，“四人帮”被铲除了，一场“保全文化和摧残文化的大搏斗”终见分晓。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潘先生和他的长婿胡寿文共同翻译

^①谢泳：《杂书过眼录》，第207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的达尔文名著《人类的由来》。在看到这部书的清样之后，叔叔写了“一篇东西”——《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回味”了和潘先生40年来亦师亦友的情谊：

这本书的翻译，是潘光旦先生一生学术工作中最后完成的一项业绩，充分体现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我师从先生近40年，比邻而居者近20年。同遭贬批后，更日夕相处、出入相随、质疑问难、说古论今者近10年。这10年中，先生以负辱之身，不怨不尤，孜孜矻矻，勤学不懈，在弃世之前，基本上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

……

同代的学者中，在国学的造诣上，超过潘先生的固然不少，但同时兼通西学者则屈指难计。他弱冠入清华受业……在校期间，因体育事故，断一腿，成残废，而依然保送出国留学，是因为他学业成绩优异，学校和老师不忍割爱。据说他英语之熟练，发音之准确，隔室不能辨其为华人。返国后，他曾在上海执教，又兼任著名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刊》的编辑。他所写的社论，传诵一时。文采风流，中西并茂用在他的身上实非过誉。

……

翻译难于创作。创作是以我为主，有什么写什么。而翻译则既要从人，又要化人为己，文从己出，是有拘束的创作。信达雅的信，就是要按原文的一字一句地和盘译出，译者要紧跟密随著者的思路和文采，不允许有半点造作和走样，凡是有含混遗漏的，就成败笔；凡是达意而不能传情的，就是次品。翻译的困难就在此，好比山山要越，关关要破，无可躲避。翻译的滋味也就在此，每过一山，每破一关，自得之境，其乐无穷。潘先生每有得意之译，往往衔着烟斗，用他高度近视的眼睛瞪视着我，微笑不语。我知道他在邀我拍案叹服，又故意坦然无动于衷，以逗他自白。师生间常以此相娱。此情此景，犹在目前。

叔叔重新出来工作之后，为了弘扬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做人的道理，亲自参与和主持纪念潘先生的各项活动。在纪念先生 90 诞辰举办的“公共关系讲习班”上，他根据老师一生研究的主题——人和人的关系，作了《从私交到公关》的讲话。从 1992 年到 1995 年，叔叔连续四年参加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潘光旦纪念讲座”，发表了《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略谈中国社会学》、《开风气 育人才》等多篇学术论文。1999 年，潘先生诞辰 100 周年，他在《推己及人》里，概括了先生做人的特点：

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在社会上，人同别人之间的关系里边，有一个“己”字。怎么对待自己，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是个“吾”，是“己”。在英文里讲，是“self”，不是“me”，也不是“I”。弄清楚这个“self”是怎么样，该怎么样，是个最基本的问题……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他们对于怎么做人才对得起自己很清楚，对于推己及人立身处世也很清楚……他们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怎么才算对得起呢？不是去争一个好的名誉，不是去追求一个好看的面子……考虑一个事情，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他知道怎么对人，知道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受些启发，多用点脑筋，多懂得一点“己”字，也许可以多懂得一点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有一种超越自己的力量……他的

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想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叔叔不光在学界弘扬潘先生的学术思想，他还希望每个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学习潘先生的高尚品德。有一次我随叔叔到烟台出差，他听说当地有家永康公司，公司总经理一位好朋友的孩子连续两年高考成绩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是因为残疾，没有大学录取他，孩子一时想不通寻了短见。一个熟悉的、要强的孩子突然死了，促使这位老板办了一所永康残疾人大学。虽然这所大学不够“规范”，但已经吸收了200多个残疾孩子在里边学习。叔叔认为永康公司发扬了中国劳动人民扶残助弱的优良传统、精神可嘉，于是就抽空去看望他们。在与孩子们见面时，叔叔以潘先生为榜样激励这些孩子们，要他们做一个身残志坚的青年人。后来听说，那次讲话在孩子们中间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不少孩子表示，过去只想在学校学点技术，将来到社会上有个谋生之路就行了，听了费爷爷的讲话以后，觉得只是谋生还不够，应该发掘自身的优势，要做得更好、更优秀。

自从当上右派以后，叔叔结交了一位好朋友，她就是浦熙修。叔叔称她是一位“知心难友”，那是因为反右时，浦熙修被说成“章罗联盟”里的女干将，而费孝通则是“联盟”里摇羽毛扇的军师。后来“军师”和“干将”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成了同学，“有了相互交心的机会，大家多了一层相识，建立了心态上深一层的联系”。可以说他们是在逆境中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

浦熙修也是民盟中央委员，经常和叔叔一起参加“神仙会”，政协组织参观学习时，又常常被编在一组里，因此两人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叔叔称呼她浦二姐，说她“表里有矛盾，从当年文采来看，似有丘壑，而迫近时却又平淡少城府。从一生起伏来看，似多坎坷，而感情上却又坦荡少波折，似深而浅；似浓而淡；似曲而直；似男而女，妙在有此矛盾”。

“文革”期间，浦熙修不幸罹患癌症。不知道她从哪里觅得一偏方，说是将七根葱白与适量巴豆、砒霜混合捣碎，握于手掌心，可治癌。药方里的葱和巴豆都好买，砒霜却是剧毒药，通常在药店里是买不到的。叔叔知道后，要我设法搞一点。我想哈尔滨的老董是大夫，兴许会有办法，就写信请他帮忙。董大夫果然神通广大，不久就收到他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一小包砒霜。我拿了赶紧交给叔叔。

叔叔非常关切浦熙修的病情，要大哥代他去探望。1970年叔叔从干校回京，特意去看望躺在床上的浦二姐，听说她很想吃婶妈煮的红烧肉，第二天就骑自行车亲自把老伴煮的肉送去，还约浦二姐病好以后，教她骑自行车，一同到沙洋长堤上比赛。

俗话说“偏方治大病”，遗憾的是，这个偏方没能治好浦熙修的大病。她还是因为癌症复发而离开人世。去世时，叔叔还在干校。

1999年，浦熙修的孩子东林姐弟把母亲1957年以前历年所发表过的文章，整理编辑成书，要叔叔写一篇怀念的文章。叔叔对东林姐弟说：“至今我还常常想到她，而且感到和她往来相处的那段经历”，于是写了《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文章最后写道：

我在怀念浦二姊时总有一种想法，我们这一代人很快就会结束了。但是在这神州大地，甚至整个地球上，人类还应当活下去。为了人类继续发展，我总是有一种非分的想法，愿意像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扭曲灵魂的历史不再重演了。我们这一代受过劫难的人，是否有责任把我们所受的灾难总结出一些教训，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化怀念为防灾的力量，使得子子孙孙的灵魂再不遭扭曲呢？这也许是对亿万难友怀念的积极的行动。巴金老先生提出过建立“文革”纪念馆也许早已看到这个意思了。我自认脆弱而且加上年纪老了，让我留着这个意思来结束这次对浦二姊的怀念吧。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曾有过这一段可悲痛的历史。

十一、干校生活

1968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河农场开办“五七干校”,组织干部下放劳动的报道。毛泽东看了以后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下达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分期下放劳动”的指示。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单位,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中央民族学院的“五七干校”(沙洋干校)在湖北省潜江县广华寺。

1969年10月,林彪发出加强备战的“第一号令”,北京机关、学校的大部分人员都疏散到干校去了。民族学院第一批下放的人员名单中就有费孝通。

民盟中央也一样,在吉林舒兰和湖北沙洋建立了自己的干校,部分中央委员和机关干部先后都去了。大概是年龄大的关系吧,我父亲没有去,留在了北京。但是他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因为“文革”一开始,民盟中央就被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查封”,停止了一切活动,“神仙会”自然不能再開,平日的朋友大多成了“牛鬼蛇神”,害怕彼此连累,断了来往。如今叔叔也走了,父亲周围几乎没了可以交谈的对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日子,这让他感到十分孤独。父亲在《五一夜随笔》中流露出了这样的寂寞:

斗室悄悄人安息，
钟声的的空阶寂。
焰火熄灭星月老，
远道车声难得停。

父亲感觉到沉寂，远在湖北的叔叔也感到“往来多是些无法多谈的人。整天如此，早晚如此，未免寂寞耳”。但是心里有话还是要说，于是写信就成了兄弟俩相互倾诉的一条渠道。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稿和文件时，发现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打开来，里边是叔叔的来信，有22封，显然是父亲刻意保存下来的。我记得家书应该不止这22封，而且除了信，还应该有好多幅叔叔画的风景写生，可惜已经找不到了。

“劳动问题容易解决……最困难的是思想” 叔叔在干校劳动了两年半，照他的说法，“在那里我成为一个相当好的劳动者，我学会了怎样盖房、种棉花、烧饭”，他认为干部到干校锻炼，“劳动问题容易解决……最困难的是思想”。他说，在干校生活没什么目的，“劳动中可以不展望，不回顾，可以随时强自取乐。当你累的时候休息一会儿，抽一支香烟，那时会觉得很舒服，但是没有希望。我们与外界隔绝，一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叔叔说的是实话，下乡劳动，身体上受些累，生活上受点苦，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反而会因为下乡能到生产队插队，有机会同农民面对面交谈而让他感到高兴。有一次我哥哥费江去潜江探望他，他告诉费江：“插队落户给了我一次难得的与农民交朋友的机会，简直有‘放虎归山’的感觉。”

民族学院的沙洋干校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全农场只有几排劳改犯人住的房舍和几间烤烟房、农机具库房，总共不足百间。第一批下放人员，拉家带口700多男女老少到达以后，吃饭、喝水、居住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挖井、

盖房解决基本生活条件，是他们最先要干的活。叔叔在第一封信里说：“我们自己挖的井，已经供水，自己喝上了。自己修建的房子部分也已经有人入住……房子在修建，计划不小，要准备住千多人……现在已有 700 多人，不久要达到 900 人，房子还只有 100 间，平均每间 9 人。”他还说：“一年或二年之间，住的问题基本上是消灭不了拥挤状态。所以只有从思想上解决，那就是向贫下中农看齐，不怕挤、不怕苦。大部分人住集体宿舍，习惯于火车里的生活。”他还认为在干校“自己身体健康似无问题”，“劳动关、生活关都过得好的”。并用轻松的笔调描写“洗石灰”时的情景：洗石灰“就是把石灰溶在水里，流到一个池里，半干后用来和沙成为砌砖时所用的泥……劳动不算重，就是身上不免溅着白灰，一点一片地绣上了花”。

与洗石灰不同，盖房就是个很重的体力活，比如搬砖运瓦，这是小工干的累活。据当年一起在干校劳动的刘晓回忆说：盖房的时候，年老的、女同志当小工，大家排成长队将工地附近的砖，一块一块地传到砌墙师傅手中。对费孝通、林耀华这样的老先生们来说决不轻松，即使年轻一点的教师，一天干下来，也累得腰痛手疼，不愿动弹。年已六旬的费孝通和大家一起排队递砖，在这样重的劳动中，他还不忘关心照顾排在这长队里的吴文藻老师，他“主动站在吴



▲ 叔叔（左）在干校伙房专心切菜。

先生的前边，每递一块砖，就多走两步，凑到老师身边，将砖递到吴先生手里，用此办法减少老师的劳累。他还时常到谢老太（在干校大家都这么称呼冰心先生）那里问寒问暖，送去吃的，生怕师母有个闪失”。

干校学员除了挖井盖房，还要学农。大队人马在田里劳动，百多人一小群一小群地散布在广阔平整的江汉平原上，大家忙着开沟平地，远处麦浪浮动，拖拉机日夜在地里转动，新犁的一片细土，等待种下玉米和棉花。等到幼苗出土，又要给玉米定苗、松土、除草；还要种棉花，把营养钵里的苗种到地里后，接下去要打药、打枝、打叶，没完没了直到收获。大田里的劳作给叔叔“很新的印象，感到胸襟宽畅”。

江汉平原的夏天，温度高达35度到40度，在大田里干活，汗水淋漓，周身如汗洗。对于出大汗，叔叔自有一套说法，认为“一年中需要有一个时期出出大汗，是体内洗涤，可以除病”。出透了汗水，口干舌燥，痛饮送到地头田间的茶水，让他对“短衫汗透迎浆水”这样的诗句“更觉情切了”。在大田里劳动，风吹日晒，他“露在衣衫外的皮肤已黑黝黝的如非洲人士”。

叔叔把在大田里种棉花、玉米说得似乎很轻松，事实上并非如此。4月是栽棉花的时节。有一年，军宣队给叔叔所在班下达了种100亩棉花的任务。这个班除叔叔外还有吴文藻、冰心、林耀华等人，都是些“老弱残兵”，他们用尽了力气，好不容易把棉苗移植到田里，然后眼看苗儿茁壮成长，接下来就得间苗、定苗、除草、松土……干这些活都得低头俯身，腰腿上最吃力，为了减轻腰上的痛苦，这些老教授们索性坐到地上，蹭着往前干。老年人在地上坐的时间长了，又站不起来，干完活得别人拉一把才能站起来。进入盛夏，正是灭蚜虫的紧要时候，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就像一口大蒸锅，气温达到摄氏40度，在这样的大热天里，全班不管老弱，人人都背上几十斤重的喷雾器，整天在棉田里打药……叔叔坦然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劳动。

除了在大田里干活，他还到伙房帮过厨，当过“分发连里的报纸杂志”的“邮递员”。当然这个邮递员是不管分发信件的，因为信件“其中还有‘政治’，有

机密，有区别对待，另有可靠人员负责”。

初到伙房干活的时候，师傅们怕他“年纪大、架子大，学不好，调不动”，对他敬而远之。后来因为“除了背运米袋，180斤是动都动不了”之外，伙房里其他工作，比如切菜、洗猪下水、用机器轧面条；把大盆的饭菜运到食堂，一勺一勺分给大家，样样都干得来，日子长了，师傅们不仅改变了开始的看法，而且给予了“很卖力气”的评语，叔叔认为“这个评语还是恰当的”。参加劳动使他的身体变得健壮，甚至以往经常发作的哮喘也好了许多。看来“劳动关”的确比较好过。

但是要思想过关却不容易了，主要表现在“吃”上。在干校住久了，过日子的名堂也多了，不知道是谁，发明了用泥和了猪毛做土炉子，生上炭火，冬天能取暖，又能煮东西。这种土炉子在干校推广开来，有人就用它煮黄豆来吃，先是白煮加盐，逐步提高，加酱油、糖、味精，后来又进一步，加了肉罐头里的肉，成了上等珍品。叔叔还搞到了一些浓缩咖啡、奶粉……结果引来了麻烦，受到批判。他感叹地说：“生活问题上，私字表现的机会多，条件在改善中更会暴露……最困难的是思想，这就很难说了，嘴上都会说得很好听，做什么都有漂亮的说法，骨子里要真的能够‘斗私，批修’却不简单。”他还以幽默的笔触描写自己在看青时，当“老妇儿童来棉田拾棉秆”时遇到的尴尬：

置身于国家、集体、个人三种利益的矛盾之中，很不容易处理，或左或右都会出问题……要坚持原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谈何容易……看到农民没有柴烧，老妇儿童纷纷来棉田拾棉秆，你说让不让他们拾？让，不保卫国家利益；不让，不体贴贫下中农的困难；又让又不让，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结果还是明哲保身，赶紧回到群众监督之下劳动劳动的好。见好就收，留点被批评的余地。

虽然干校是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但是阶级斗争是不能停的，甚至有时

要减少劳动，把主要时间用来搞运动。比如有一段时间，中心是抓“五一六”，后来又增加了“二反一打，二反者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一打是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干校上下人人都要“大检举、大揭发，所以大字报、小字报、凑材料、讨论、批判”，再“加上学习、批判极左思潮（先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写写体会、讲用”，从早到晚都安排得结结实实的。叔叔说，“跟着安排好的日程过日子，时间过得特别快，倒也省心”。“省心”的日子让他感到“此间乐，不思蜀”。

叔叔为什么会省心呢？是因为当初“五一六”兴风作浪之时，他正在牛棚里，对这些人的活动一无所知，现在他“只能对已经揪出来的人，打打落水狗，说些大道理，也写写评论，如敦促知情人赶快揭发等广播稿”。所以什么抓“五一六”分子、“批清”等这些高潮，与他都挨不上边，不用他费心思去应付。日子过得虽然省心，但是从全局看，又不能不让叔叔忧虑：“这里的日子实在好过。如果大多数的文化人士俱有此想法，那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怎样扭得过来，我还看不清楚。”

我一直认为，叔叔虽然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甚至想到自杀，却大难不死，不能不说是沾了右派的“光”。试想，如果十年前他没被打倒，到“文革”时一定是个不小的“官”，就会成为这次运动里的斗争重点，就像他自己说的，运动初期被揪的很可能是费孝通而不是吴晗了。

当然，这段时间里叔叔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损失了宝贵的20年。1987年美国人类学家巴博德教授问他，这时期“对你是特别痛苦的。有没有任何东西弥补它？在智力方面是否发生过你认为有些价值的事情？”叔叔回答说：“智力上完全停滞……我相信这个运动完全是一个悲剧。唯一可能的正面结果是大多数中国人从此有决心防止那种事件和时代的重演……对我没有多少正面的东西，主要是损害。”如果非要找出点“有些价值”的东西，那就是让他“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促使他“要用那种态度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给未来几代人去阅读和了解……我要求我留给后世一些积极的影响”。

吴文藻老师 吴文藻是叔叔1930年在燕京大学念书时的老师。当年叔叔转学到燕京改学社会科学时，究竟要学哪一门并没有定下来，进校后才知道有个社会学系。那时候燕京大学允许新入学的学生先听课再定专业。于是他去听了心理学系主任陆志韦先生的课，也听了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先生的课，最后



选择了社会学系。吴文藻老师正在系里担任教授，因此从入学伊始，叔叔就成了吴文藻的门生。

▲ 孝通叔叔、婶妈与潘光旦（左三）、吴文藻（左四）两位老师在一起。

吴老师一开始就给叔叔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首先他知道吴老师是自己从小就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所以从心里就认定他一定是个“不凡”的人才。后来又听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和该校“最近十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新近才应聘到燕京任职，是个很有学问的老师。随着接触的增加，叔叔对吴老师的了解逐渐深入，对老师更加钦佩了。

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教会出钱办的学校，教课的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教授，不少老师用英语给学生上课，甚至上国文课都用英语来讲，有的老师还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觉得很时髦。但是吴文藻老师不这样，他用中文给学生讲课，也不起英文名字。叔叔记得，他听吴老师讲的第一堂课，就是他用中文讲一本英文写的西方社会思想史。用中文讲英文教本，实际上就是现场“口头翻译”，在当时的燕京，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社会学是一门由外国引进的学科，用吴老师的话说，当

时中国大学里社会学是“始而由外国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国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但“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面对这种状况，他提出要建立一个“扎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叔叔认为这个口号“有中国味”，符合自己为了“认识中国社会”选择社会学的目的，他是“很赞成的”。

“社会学中国化”这个口号，成了吴文藻一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看来，用中国普通话讲课，在编写汉语教材和讲课的时候，融入一些中国的传统社会观念等做法，只是实现自己理想必须做的初步工作。他知道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这样一件宏伟的事业，绝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能够做到的，所以他有一个长期、通盘的计划——到学校教课，物色培养学生；办刊物，宣传自己的主张；有针对性聘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

培养学生是吴老师计划里重要的一部分。他利用各种机会，把学生分送到英美各个大学去深造，谁到哪个大学，跟谁去学，他心里都有个谱。叔叔是被吴文藻看中的学生之一，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吴文藻为了通过清华公派留学生的机会送叔叔去英国学习，先是说服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在叔叔毕业那年招收人类学研究生；然后又带领叔叔去拜见该系的史禄国教授，亲自推荐这个学生。史禄国是一个俄国人，一个“真正的欧洲学者”，清华大学唯一的人类学教授，得到史氏的首肯之后，经过考试，吴老师成功地将叔叔送到史氏门下。

吴老师安排叔叔跟史禄国学习人类学，是为了下一步到英国师从人类学功能学派泰斗马林诺斯基做准备。为此，吴老师又利用去参加哈佛大学成立300周年纪念会（1936年）的机会，和马林诺斯基见了面，向他介绍了费孝通的情况，促成马老师收下这个中国弟子。

叔叔没有辜负老师的一番苦心，从马老师手里获得了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叔叔来到吴老师身边，在他创建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且负责吴老师几经周折，从中英庚款里搞到的经费而建立起来的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工作。工作站为叔叔提供了一个继续进行农村实地调

查的舞台。在叔叔的带领下，工作站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个工作站就是后来被人称作“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的“魁阁”。

抗战胜利后，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外交组公使衔组长和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去了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他辞去国民党政政府的一切职务，于1951年回国。1953年，叔叔请吴老师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1957年他和叔叔都被打成右派，一起进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改造，“文革”时同遭批斗，同下干校，这才发生了刘晓说的费老“不忘关心照顾排在这长队里的吴文藻老师”的感人情节。

反右后，吴老师和叔叔不再去课堂讲课，只能在民族学院研究部搞一些有关国外民族动向情报的翻译、编辑工作。“文革”后期，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一度搞得很紧张，吴文藻、冰心、叔叔他们受命把从外国出版物中搜集到的，有关中印边界地区政治、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摘录、翻译出来，供有关方面参考。除此他们还翻译了《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1985年吴文藻老师去世了。去世前他向家人说，他的藏书都要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但是愿意留下一些给自己的学生费孝通作纪念，至于留下哪些书，可由孝通自己挑选。叔叔遵从老师的遗愿，从老师的书架上挑选了派克和伯吉斯合编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和派克著的《论城市》两本书。

20世纪90年代，叔叔提出要进行“补课”和“反思”，其实叔叔是要把这两个“题目”作为切入点，对自己一生的学术生涯作一番总结。他在“重温派克社会学”时，就把吴老师遗赠给他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和《论城市》作为他的“入门门径”，写作了洋洋七万言的《补课札记》。叔叔在札记里说，当时他选这两本书，是因为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他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没想到吴老师留下的作为纪念的两本书竟是“为我留下当前‘补课’的入门，把以上这些事情联串到一起来，说是巧合似乎还不能尽意，如果说这里还有点天意，又未免太神了些”。

是啊，几十年来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不管时局如何变幻，命运始终

把叔叔和吴文藻师生拴在一起，密切合作，为“社会学中国化”付出心血，难道这不是天意吗？

1995年，吴文藻逝世十周年，也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在纪念会上叔叔发表了《开风气 育人才》的演讲，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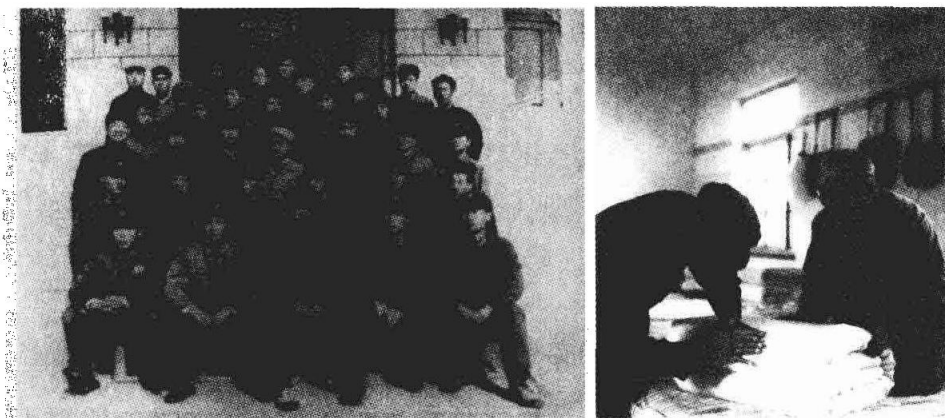
水有源，树有根，学术风气也有带头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怀有在中国人文科学的领域里开创一种风气的宗旨，在过去十年里，所里已经有不少年轻学者为实现这个风气而做出了一定成绩。把这个风气带进中国来的，而且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吴文藻老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带头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所力行的那些学术方针中，有不少就是吴老师留下的教导。因之在吴老师逝世的十周年回顾一下他始终坚持的学术主张，对这个研究所今后的继续发展，应当是有用的，对同人们今后在学术领域里继续开拓和创造也是有益的。

叔叔一生作为，就像是从小吴文藻老师手里接过接力棒后，竭尽全力在“没有止境的接力赛跑的跑道”上向前奔跑，如今他老了，该“把这根接力棒递给下一代的学者了”。

但愿有人能够接过这根接力棒，在这条没有止境的跑道上继续飞奔。

插队 干校学员除了在校劳动之外，还要定期到附近的生产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谓插队，就是下到村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正好为叔叔提供了一个“趁筋骨还健，能劳动时，多去体验体验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生活”的机会，这是他的“老本行”，自从反右以后，这样的机会是求也求不来的，难怪他有“放虎归山”的感觉。

叔叔插队的地方是红桥大队红桥生产队第三生产小组，住在张万洲家。张家所在的村子十分贫穷，还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农民住的多是四周露天的草



房。虽然村子周围到处是水塘，村里却没有井，人和牲畜共用一个水塘，生活之艰苦可见一斑。

刚到生产队的时候，村里的老乡以为叔叔是新来的劳改犯，后来听说是北京来的干部，又以为是当大官的，有钱，别看“穿得破，可吃得好，光着膀子戴手表”，对他敬而远之。插队伊始，正赶上摘收棉花，辽阔的江汉平原上，一眼望不到边白花花的一片，令叔叔心旷神怡。叔叔下到棉田，就迫不及待地干起来，哪知道这看似绵软的棉花，却包在坚硬的棉壳里，旁边还有枝枝杈杈围着，要把它摘下来，难免不扎到手，一天下来，手忙脚乱也摘不了一二十斤。老乡看到这情景，赶忙过来一边劝他不要着急，一边教他采摘的要领。几天下来叔叔采摘棉花的技术大有提高，有一天竟然摘了40多斤。叔叔说，摘棉花看似简单，其实也是有学问的，不学习的话，我们是要吃苦头的。他还采了一朵棉花请人带到家里给外孙女，要她懂得“身上穿的衣服，归根到底是要一朵一朵地用手摘下来的”。

插队期间，叔叔不仅下地学摘棉花，还和饲养员一齐放水牛，晚上与左邻右舍的老乡谈古论今。他诚恳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认真劳动的精神，很快就得到了老乡们的认可，

除了上干校，叔叔还到部队“学军”。60多岁的老头操练立正、稍息、开步走，令人匪夷所思，怪不得他用揶揄的口吻说：“老人也能学军，打破了神话。”图为叔叔（第二排左五）在河北省定县某部学军时的留影。

向解放军战士学叠“豆腐块”式的被子。

他也在劳动和闲谈中摸清楚了这个队的生产状况。

一起插队的刘晓回忆说：在村里劳动的40多天里，经常可以看到费先生和张万洲坐在村外的草地上，一边抽烟，一边谈生产队的事，打听村里农民的收入，询问一个人最多能放几头牛？喂牛的饲料如何解决？了解清楚后，就向生产队建议队里应该多养些牛，特别是要多养母牛，因为母牛能产仔，本钱少；养的牛多了，肥料就多，肥多粮食可以增产，粮多牲口的饲料就好解决，社员收入也能增加。他是用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周围的事物，然而说的话老乡们都听得懂。张万洲听了费先生的主意以后，逢人便说：老费有学问，他说什么都能扯到怎样让我们的庄稼增产上，他说的都是我们平时想的事。

张万洲一家非常敬重叔叔，家里尽管穷，他还是想方设法改善伙食，让房客吃得好一点。有一天下工后，叔叔突然发起烧来，张万洲知道了十分着急，特地到供销社买了个暖水瓶给叔叔用，第二天一早又送来开水和稀粥。看到生病的叔叔住的偏房阴暗潮湿，他就叫来儿子，不容分说地把叔叔挪到向阳的、刚盖好准备给儿子住的新房里。叔叔插队的时间只有40天，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十天里，他还抽空给张万洲上高中的儿子辅导功课，和房东一家成了好朋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插队期满回干校以后，每逢节假日，叔叔“还要去生产队望望老师”。1970年春节，去张万洲家拜年，他在家书里这样描述：村里“儿童少妇都换了新装，檐前挂着鱼片。我家主人去年只养了两头小猪，看来过节没有宰猪……我带了一些糖果、肥皂、香烟送他们，他们偷偷地在我袋里塞了一大包冻米糕、大馒头……好容易辞却他们留我吃饭，这是纪律”。

这些话很直白，道出了他和张万洲一家的情谊，大概正是这股“情谊”，居然让叔叔在张口“阶级”闭口“斗争”的年头里，情不自禁地谈起了“人情”这个话题。他说：“西湖之所以令人留恋，山水固然是必要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历代积累的‘人情’。比西湖秀丽的山水多得很，为什么唯有西湖吸引人？在人不在湖！”接着又讲了眼前发生的一个故事：

讲“人情”，随处都有值得沉溺的。说昨天的事吧，我们洗澡要走半小时到一个工人居民点。我洗完了，一个人回来，已是黄昏时节。前面来了一队拉草的牛车，走近了其中有个人和我打招呼，我已不记得，有点面熟。到最后，却见到我插队时的房东，一把把我拉住，忙着在衣襟里掏东西，掏了好一会儿，摸出了一包香烟，是“三门峡”，把最后一支递给我，要说什么，我听不清他的话，但意思全领会了。我前两个星期，星期天去五场，同去的人喜欢喝啤酒，我就买了两瓶啤酒，在饭馆里喝了，两个空瓶怎么办呢？……我说背空瓶回去没意思，于是想到不如买两瓶煤油……这样就打了两瓶煤油。可是骑车要带两个瓶，吉令各龙可不是件简单事，又是煤油，泼出来把别的东西搞坏了。于是想不如走小路，到插队的那家，送他们……到了生产队，门关着，厨房的门锁上，但是留个缝，我把带去的煤油，还有送他孩子的两本《红旗》一起塞了进去……至于那包“三门峡”，也是我更前一次到他家去时带给他的……他揣在怀里，过了有一个月，还留着这一支。

牛车在前面走，好一段路了，他一定要问我哪天再去他家，而且又骂他邻居的孩子，上一次不知道去叫他……

我的这瓶煤油和他的那支烟，在“人情”上讲，大概可以说是有点“阶级之别”。可是有一点，就是他有此情而不一定自觉其美，我是无情，而恰恰能领会其味。你说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又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吗？

叔叔非常珍惜在红桥生产队插队的那段经历，他认为“农民是识货的，他们质朴无华，最懂得分量”。又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喜欢水，住在水边的农民，与人为善，我愿意和他们交往。”

1993年5月，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孝通叔叔赴湖北省武汉、孝感、潜江等地考察“庭院经济”的发展状况，叔叔认为这是中原地区农民的传统，是一条致富的好路子，值得总结推广。其实这个“庭院经济”，同他插队时建议生产队多养母牛，乃至60多年前提出的“农工相辅”，是一脉相承的。

借这次到潜江考察的机会，叔叔特意回红桥生产队看望老朋友。遗憾的是，当年的“老师”张万洲和他的老伴都已谢世，连他们的儿子也病死了，要不然张万洲一定会听到“老费”讲更多、更令他激动的事情。

想起小时候苏州的“退一步居” 叔叔生性开朗、豁达，生活上也是“大大咧咧”，吃饭穿衣从不讲究、挑剔，到了干校，打理自己的生活可以说是应付自如。干校学员住集体宿舍，人多拥挤，他在床边用“从劳改队搞来的一个破木几，铺上一块桌布，当作床头的小桌”，用来吃饭、写字，营造出一小片自己的空间。闲暇时候，和室友一起用泥制作土棋子，对弈消遣；用自制的泥炉子煮黄豆、荠菜来改善伙食。他还有过这样一段冒险经历：一天下午，“休息期间想去捡些野菜，到了蚕豆田里，一同去的人发现了一只野鸡，如获至宝。原来前几天下玉米种，种子拌了农药，飞鸟不知道，吃了玉米种，就毒死了。前几天已经有人拾到了好几只鸽子，但不敢吃……我们几个人就鼓足勇气吃了一顿，其肉既嫩又鲜，而且吃了毫无问题……我们又搞到一只，不是天赐美味吗”。他不无自嘲地说：“干校生活的片断，别的时代的老年人是享受不到的。”

到村里拜访“老师”，与农民朋友谈天说地，和室友下几盘围棋；洗涤积了多日的脏衣脏被，然后骑车到广华寺吃一碗大肉面，回来洗个热水澡……这是休息日的安排。他还托人带去理发的电推子、缝纫机针，说如果好用可以给大家理理发，做做针线活，“也可以为人民服务”。叔叔手是很巧的，缝缝补补都会干，甚至还会织毛衣、毛袜。

叔叔在干校过劳动关、生活关是毫无问题的，他“觉得这里的生活确实不坏，劳动上大体可以赶得上，一般已不觉得十分疲乏，当个小工，当个半劳动力，看来是还够条件。再锻炼一个时期，可以达到靠工分过半自给的程度。颇有长期打算，终老是乡的意味”。

依我看，叔叔这种“长期打算，终老是乡”，从此躲到小屋里“读读自己心爱的书”的想法，只是他在一个特殊时期、特定环境里产生出来的。其实动

脑筋思考，是叔叔的“本能”，面对如此剧烈变动着的大千世界，他怎么会无动于衷，仅仅安于“读书”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旧的被淘汰，在新社会面前，他承认自己是“旧中国的产物”，“原来的思想方法不再是正确的了”，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要不然“只能退下去”。在频繁的“运动”中，他努力“反省”，决心抛弃“旧的思想 and 行为方式”，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并且自认为已经找到了一条改造思想的路子，他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试图帮助同他一样的知识分子，闯过思想改造关。

然而严酷的现实却把这个良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面对这个巨大的反差，他一直在“想”，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但是不能写、不能说，又不能讨论，这使他很苦恼，甚至思想都“混乱”了，失去了信心。就在他还没有摆脱那种“不能忍受回顾，也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又不想回顾”的状态时，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向他袭来。是非颠倒，全国陷入一片混乱！虽然叔叔相信这样不正常的情况一定会变化，但不知道会怎样变，什么时候变，也拿不准自己在这个乱世里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还会有什么样的前途。他屡遭凌辱，吃尽苦头，感到没有了未来、没有了希望，又无能为力，绝望了。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不认为我应再活下去，我考虑过自杀。”

幸好叔叔“没有去做”，他没有死，坚持下来了。但是思想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对未来毫无信心。记得1970年春的一天，父亲要我帮他买一些速写本、素描纸、绘图铅笔和彩色笔，说是要寄给叔叔。我有点纳闷，叔叔还要学画画？后来看了他的信才明白，原来沙洋干校“能容千人的礼堂已盖了屋面，粉刷了四壁。还在运砖准备扩建宿舍和猪圈……这个干校的规模已经不小，已经不是临时的性质”，于是有了准备在这里长期干下去的想法。他想自己“抛离书本已久，下笔迟钝锈涩，语言无味……一转眼已过花甲，而停笔20年，文思枯谢”，恐怕今后已不能写作；又“默察自己，耳朵不灵，与声韵之道无缘，但于形象色彩还有一定想象力，不妨发展一下……或者可以进入画意，开拓一个新境界，也是长久之计的一部分”。预备下些纸笔，可以“在休息时，在假日，

在田野里写写生”，为生活增添一些内容。原来叔叔是因为文章写不了而想改习画画，乃不得已之举。

事实上，叔叔的确对形象和色彩很有想象力。早年在瑶山调查的时候，他带了水彩、铅笔、画图簿，一路上画一些房屋、景色，“还替一个小孩速写了一张”；后来在云南大理察访时，还临摹了好几幅剑川石宝山石钟寺里的石刻画。父亲给他寄去纸笔以后，就经常看到他随信寄来的一些写生画，挺有味道的。

除了改学画画，他还进一步谋划“退”路。他认为，大哥是他们同胞五人中“走得最稳”的一个，“稳字得之于善退”，这使他想起小时候在苏州“十全街旧居有‘退一步居’，幼年以其有狐仙之说，不敢独处此室，而今才理解其含义。今后尚有一二十年，或可得其教益”。他请大哥留意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有否空缺，“苟有援引，似有退一步居之可能”。他还把一天夜里，在半眠中所得的一首七绝录下寄给大哥：

一夜北风雨意收，陌头野芙蓉艳三秋。
草木无情花何艳，村鸡啼处月如钩。

他说：“村鸡啼处，可不要忘记月亮是该下落了，我们所代表的这个历史阶段该是结束了，所以必须回到十全街的小厅里去，即使有一些寂寞。”并一再说明，请大哥留意找一个可以待一二十年的“居”，“不是进，而是退。有这一二十年也许还可以从从容容地读读自己心爱的书”。退隐之意表露无遗。

叔叔想找个“退一步居”，也是从自身的处境出发，对当时形势作了估计以后产生的。大约是1971年10月里，叔叔觉得时局似乎“已接近把原来所谓统战问题提出来明确一下了”，因为对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成分，处理得妥当不妥当还是有深远影响的，是个根本问题。他说：

一种从历史中生长的东西，要消灭它，不采取果断的态度是不行的，但

是采取“果断”的手段却也是不行的。社会这个东西，有点像水，刀是割不断的，要疏导，要泻泄，急了没有用。过激就有反复，就有旋涡……历史遗留下来的成分的善于处理，是考验一个领袖的重要课题……处理的办法也不外乎“消化”两字，消化为主，排泄为次。消化也就是“综合利用”，要能利用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主体要强大，谁消谁的问题没有解决，也就谈不到利用。

叔叔把自己看做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成分”，希望能被“综合利用”，如果能在文史资料编辑组谋得一职，已是个不错的出路了。他认为：

说得大一些，这个战国时代，原本是苏秦张仪之流的大好舞台，但一个人应有自知之明，而且苏张的结局也是个历史教训，让别人去担当这个角色吧。五七年这一步是祸是福，实在难说了，现在已是70年代，20年的时光不能说没有一些增益，但离那种人物的条件已经遥远了。草木本无情，说它艳，说它妍，还不是别人的事，于己何关！艳、妍和丑、恶是一事也。

当然最后的结果比估计要好得多，叔叔等到了被“综合利用”的机会——那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二十二通家书 当初我不懂得为什么父亲那么看重叔叔的来信，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是父亲每次阅读叔叔来信时那种满足、专注的神情，仍历历在目。我记得，父亲每次看完信后，总要我也读一读，然后把信叠好放进抽屉里。但是我看了这些信以后，根本想不到里边还有什么“意思”，顶多觉得叔叔文章写得真好，挺好看也好玩，从头到尾一气写完，几乎一字不改。

一直到后来与叔叔接触多了，了解慢慢加深，才稍稍能悟出一点“家书”的意思。叔叔写文章不愿意受形式的拘束，他说，他在干校写的家书可以当散文看，是“自由体”，一般人不会那样写。要细细地看，才能看出文章背后的东西，

只有“懂得”他的人，才懂得里边的意思。听了这话，我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那么看重叔叔的来信，并且把它仔细地收藏起来，叔叔不是说过“知我者莫若兄也”这样一句话吗。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通讯条件还十分落后，地处偏僻的干校，更是信息闭塞，人们只能从《参考消息》、《人民日报》这类报刊和听到的传达报告里获取信息，难怪干校里“看报的人都很心急，一看到报就抢着要看”。叔叔就从这一点点有限的信息里，敏锐地捕捉时局变化的蛛丝马迹，不时会有一些精妙的发现和独到的见解。有了想法就想和别人交流、讨论，干校里的“同学”早就被无休止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逼得个个成了谨小慎微的惊弓之鸟，人与人相互提防，失去了信任。在这样的环境里，叔叔不能也不敢和别人讨论，只有通过写信和大哥交谈，大哥成了他倾诉的唯一对象。叔叔在干校两年多里写的信，只留下了22通，没想到，这区区一二万文字，如今竟成了解他在干校期间生活和思想状况的第一手材料。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材料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
叔叔的家书



叔叔的22通家书中，有14封谈到当时的政治局势。比如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急于打破多年闭关锁国的僵局，终于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打出了一记绝妙的“乒乓外交”，在世界上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当庄则栋在日本名古屋重重地扣出这粒乒乓球的时候，远在沙洋的费孝通好像听到了这乒乒乓乓的声音，而且断定它将会越响越强烈。他结合在传

达“旅游工作会议”和“出版工作会议”上听到的讲话，作出如下判断：

“乒乓外交”的背景也比较明确了，看来对“西方”的接触会很快增加起来，这是一个意义深长的斗争。由于这个新形势，国内的各方面都会起很大的影响，其中也就包括了像我这一类人的处理、对待和使用的问题。再配合了“出版”方面透露出来的要求，对知识分子、文化事业都得有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有句话很令人深思：“封是容易的，启封却困难了。”把过去的历史一概否定是省事的，要联系起来却是问题重重了。大批“极左思潮”就是为此作思想准备，而要在人们的感情上扭转过来就不是件易事。对文物，对书籍是如此，对人则更难了……形势发展得快，也有它的另一面，怕跟不上……我发愁的是年龄问题，老小是否接得上。

他又分析道：

“乒乓外交”使得天下大事逐步显形，在我是远交近攻，抑敌于苗。前指美苏，后指日本。对方是近围远吊，以共治共。前指苏印日的联合，而美退居后方，后指美欧合作搞东欧，用中国牵住苏修。此乃最近显形的大略。三国都感孤立，都感压力，都不得不突破现状……新三国演义中，我占人，苏占地，美占天。天者历史之余威。地者背靠地极，出可攻，退可守。人者意识形态的先进。三者各有所长，骄者败。最近十年中风云变幻当层出不穷，大有可观。

中美首脑会晤事引起此间不少议论……我想决策焦点是在让不让50万美军回国去，基辛格“胃病”的病根在此。出个台湾作代价。看来是让这批美国佬今年回家过年，又让台湾流落老小回大陆，双方取得了协议。其他如联合国问题、中美建交问题似乎都成了应有笔墨。

事隔三十多年，我们回过头看时局的发展和结果，不能不佩服叔叔眼光之锐利、推断之准确。其实对于政治分析、时事评论，他是行家里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有人说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分析家”和“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那是在抗战时期摆摊卖文的时候，他写的大量政治、时事评论，受到读者广泛欢迎，因而博得这样的美誉。他说：那时候因为和英国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组成的“援华协会”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个协会每个星期把英国主要报刊上的重要消息剪下来，用航空信寄给我，所以我的信息来得又快又多，这是别人很难拥有的“资源”。同时我喜欢研究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出来又能赚稿费，解决生活问题，所以这类东西写得更多了一些。他还认为，由于他受过英国学校的教育，有这么一批人捧他、支持他，所以他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如果仅仅靠人类学的知识和学术上的成绩是不够的，还得有一个政治力量的支持。

然而，时过境迁，“过去靠评论吃过饭，养成了对会发生什么的猜测，猜对了沾沾自喜。现在觉得大可不必，猜对了又怎样，猜错了又怎样……这样一来，很多事也就不去推敲了……事情发生了，跟大家表表态就行了”。

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依然时时关注国家大事，思考身边发生着的种种问题。比如在阅读《国家与革命》时，他想到我们庞大的国家机器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想一想是很惊人的。每年学校里毕业的人都要分配工作，都成为“干部”，如果干部都是吃白饭的寄生虫，这个国家机器就会不断庞大，庞大到不能生存下去。有饭大家分来吃的办法，也就是冻结工资和维持低工资的办法决不是长久之计。这个问题不解决，领导人实在难于安睡的。

“文革”时期，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产品奇缺，那时候能吃到一个鸡蛋就是件奢侈的事了。可是，每逢鸡蛋生产旺季，在沙洋干校居然有鸡蛋吃，这个现象引起叔叔的一番议论：

这里鸡蛋进入旺季，开始向一般群众供应。我从上星期起每天吃到了鸡蛋，开始供应鸡蛋的地点离这里有一小时的自行车距离。我去了一次，买了七斤，五块钱……在鸡蛋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也很激烈，收购是个问题，农民要跑到市场上出售，时间上很困难，而这里附近有几万工人、家属有空闲，分别到农村里去买，于是自由市场就发生了。结果是收购少了……于是采取了一个措施，收购的价钱是0.71元，而出售只是0.715元，此外每斤给3寸布票。一个农民养10只鸡，每天在旺季产8个蛋，一个月有200多个蛋，约15斤，可以收入十多元钱和5尺布票，这样希望能减少自由市场的歪风。能否收效，我不清楚。

叔叔对政府采取的收购措施“能否收效”表示怀疑，然而字里行间却流露出这样一个信念——发展副业生产，就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其实，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叔叔在干校，甚至在牛棚里，也没有停止过对社会、对人的观察、研究，谁也无法阻止他的脑筋在思考、琢磨。1987年他同巴博德谈话时说：

这段经历的确使我逐渐更好地了解人，逐渐了解真正的人。当我和你谈话的时候我不能了解你真正在想什么，因为人们之间有个社会帷幕。你是我的朋友，但我不能看出你心里对我怎样看法。在那个时期我在社会上是个打入另册的人，人们不必再对我装腔作势，他们不必对我弄虚作假，他们不必把我放在眼里，所以我可以容易看到他们的真相……我们都是戏剧中的演员，我们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是更好的演员，但是我们都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这样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不一定和真正的人相一致。真人可以和角色不同……有的人虽则在会上斗我，但是我明白他们继续对我同情和理解。有的人就不然，幸灾乐祸，甚至还要投井下石。他们对我

表现了真正的面目。我变成了个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

在干校的时候，有一次连里的宣传队到他的房间里排演节目，让叔叔想起早年当文工团团长，带队上民族地区演出时的切身体会，他认为“如果没有必要，不宜去后台……演员脸谱不能迫视，一近就惊人，上了半身装到处乱跑，‘洋相’成了正常。可是没有这一套也就上不了台。作为观众以避免此种印象为好。”

的确，人生就是一出戏，每个人都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有些角色是不能迫近了看的。叔叔在以后的日子里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他自己也吃不准。

把外孙的相片“钉在床边” 当叔叔上干校的时候，婶妈已经从苏州老家回到北京，但是没有一起去干校，那么婶妈随后要不要去呢？这成了叔叔要下“决断”的事情。他最担心是老伴来这里“徒增跋涉”，“弄得不好，身体吃不消”，“所以能不来就不必来”，他要老伴放心，“自己是什么都行，不致有大变化，小的麻烦我是能受得住的”。他还挂念即将分娩的女儿，为小生命“出生后怎么安排”担忧。后来女儿生了个男孩，暂时留在北京。他就惦记着要回去看外孙。

1970年，他早早安排好探亲假，“原因是想看看小外孙……见一见留个印象”。回到北京，见到刚刚满月的外孙，叔叔显得很快活，假期间居然兴致勃勃地和婶妈带了2岁的外孙女，约了我们一家到北海公园玩了一天。他还要我去给小外孙拍照。回干校以后，他催促大哥把相片寄去，接到相片后，就把相片“钉在床边”，望着外孙的模样，感慨地对大哥说：“60年前我大概就是这副样子，看见过我这副模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除了你和达姐之外，大概只有姑母和辛舅……来日苦短，就这样顺着过去吧！”

叔叔的家书，是在一个特殊时间、特定环境里，把自己多年来矛盾、失落、茫然、沮丧与苦闷的心境集中地、比较直率地袒露在大哥面前。从这些信里，我感受到了叔叔流露出的那股从此默默无闻、无所作为的忧伤和不甘，期盼着有机会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在信里说，在清华读书时，床头常置《石头记》



和《战争与和平》两书，他对后一本书中那个老年统帅的印象很深：

这个老年统帅在面对节节败退中，许多他心爱的军官们一个个倒下去时，别人看他像是根木头，就是退、退、退。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却流出了这根木头内心的凄凉和奋激，他正在“待机”。这个机固然是必然会到的，但是什么时候到，却还有个“缘”。如果不能主动地守住被动，那就有可能在机至之时，已经无从行事了……事物大体上可能都是如此的，所谓走运也者，也不是偶然的。有机有缘，有缘而抓不住，就是失机，无缘而强抓，就是投机。而抓不抓是主观能动性之所在。

我想，叔叔就像这个老师，正在“待机”。“机缘”终于降临，他抓住了！

1971年9月，林彪死去，局势发生了变化。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
1970年叔叔早早安排好探亲假。他和婶妈兴致勃勃地带了小外孙女，约了我们一家到北海公园游玩。

老树新枝

“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

“查三代容易做，但一个人的本领没法从三代上查出来”

“为今后参与发展东北亚国际竞争准备实力”

“上书紫光阁”

叔叔的“本领”

“石碑埋又立”

到六巷

“哪儿穷就去哪儿”

广宗扶贫

希望一生中能够亲自去拜访中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

关于“百分之百”的对话

家乡的凤尾菇和卡拉汉访苏北

真秘书，假秘书

遭遇“非典”

最后冲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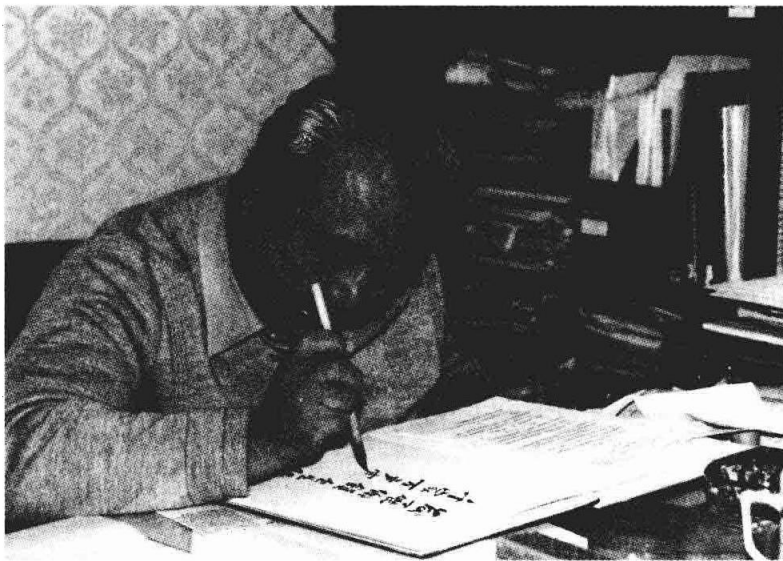
谢幕

十二、“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拨乱反正，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全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这一刻，人们真像又回到开国初年那种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日子，但是时光一去不回头，当叔叔抓住机缘的时候，已经是年近耄耋的老人了。

1977年2月，叔叔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可以说是他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开始忙碌起来的标志。他拿起搁下了20年的笔，开始写作，“费孝通”这个久违的名字又出现在报刊上了；接着他又拾起断了20年的实地调查的线头，迈开脚步“行行重行行”，奔走在全国各地的乡间田野，村镇街头，一篇篇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又呈现在人们面前。

除工作外，叔叔家里也恢复正常，不再冷清。在吉林省公主岭工作了十多年的女儿费宗惠、女婿张荣华一家四口，获准调回北京，全家人团聚了。这时叔叔家已经从西四排搬进了“和平楼”，住房虽然比原来大了一些，但是老老小小六口人挤在一起还是显得局促，为了给“第三代”腾出空间，叔叔写东西的时候就被挤到卧室床边的小桌上。有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来找他，见他伏在床边的小桌上写稿，床上堆满了杂乱的书籍纸张，想起了几十年前



▲ 住进“高知楼”以后，叔叔的书房仍然十分拥挤。

他们在中学时宿舍的情景，禁不住笑着说：“你怎么还在闹住宅问题？”是啊，自从女儿一家回来以后，人多了，空间就少了，两个外孙上学要做作业，只能把地方让给他们。

1983年，叔叔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家从“和平楼”搬到“高知楼”（顾

名思义，这是提供给高级知识分子住的宿舍楼），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总算有了一间属于他自己的书房。我在整理《费孝通文集》书稿时粗略地算过，如果从1977年2月，叔叔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写的《民族研究向前看》算起，到1982年底写《我看人看我》止，收录进《文集》的文章有六七十万言，也就是说，这些文字都是他迁入高知楼前，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之余，“伏在床边的小桌上”写出来的！

当上政协副主席应该算是“国家领导人”了，按规定可以分配到条件更好的住房，有关单位几次要给叔叔调整住房，但是他都以“老马恋槽”为由，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在民族学院住惯了，环境熟悉，邻里和睦，闲时在院子里散步，大家见面打个招呼，聊上几句，十分惬意。再说老伴身体不好，校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认得，打针、吃药很方便，人熟是个宝嘛。1988年，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由于职务上的变化，“高知楼”的住房显然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公务活动了，有关单位再次请他搬家，但是老人家仍然依恋着周围的一切，不

肯离开。又拖了五年，直到1993年，在管理部门多次动员下，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已经居住了40年的民族学院宿舍，搬到新街口四号院的新居。

宗惠和荣华回来后，帮着婶妈把家里安排得妥妥帖帖，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不用我再去“安装炉子”和“打扫卫生”，所以“文革”后我反倒去得少了。不过我知道叔叔很忙，他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也知道他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是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他的名字不时在报纸上出现，还看到了他批判江青的文章。

打倒“四人帮”，中国有了希望，叔叔迫不及待地想要干点什么事情。1977年，他致信当时负责筹建社会科学院的胡乔木、于光远，说自己这匹“三四十年代初生之犊，看来已甘为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矣；牛也罢，马也罢，驰驱未息，殊可告慰”。希望自己还能像“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那样，供人民驱策。

1978年冬，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的叔叔，赴日本出席联合国京都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这是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第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露面。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了20年的费孝通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让不少同行吃惊。这以后，他又访问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印度等国。他利用每次出国的机会，尽量多了解

▼
1979年叔叔（左五）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出国考察。图为代表团成员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合影。





▲
1981年叔叔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在颁奖会上见到了当年留学时的老师雷蒙德·弗思爵士。

这三十年来国外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的情况，设法与老朋友接头，并结识新朋友。1979年四五月间，他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从他写的《赴美访学观感点滴》里，可以了解到他出国访问的一些情况：

赴美访学一月，历经十城。飞机旅行似蜻蜓点水，短期中接触面颇广……思想交流少于礼仪交欢。即在专业座谈会上，话题方启，思路方通，散场之刻已到，如谓访学则难入堂奥，因此，这次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个重建联系的作用。

我个人的条件更使上述情况较为突出。一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美国是两门学科，一般是各自设系，井水河水各有其道。我却是个两栖类，两门学者都以同道相视，不宜轩轻，因而需兼顾双方，任务加倍，未免顾此失彼。二是少壮好写作，狂言拙作流传海外已有40多年，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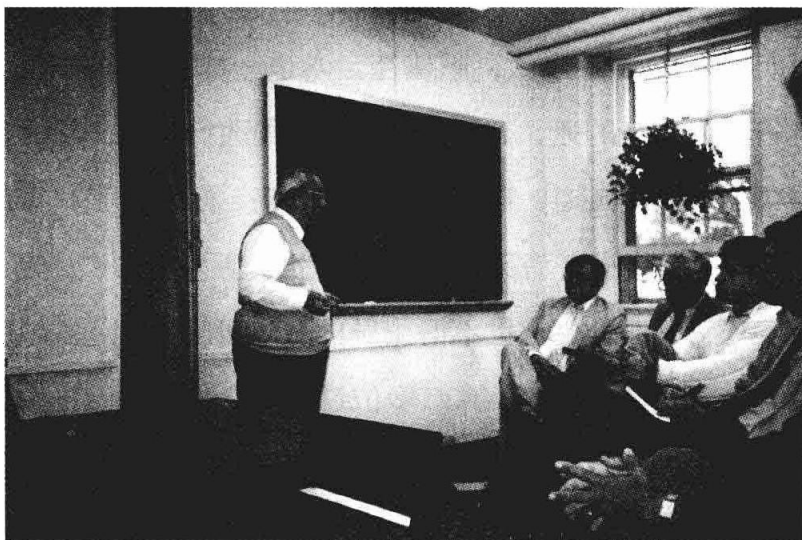
后起者大多读过这些书，加上20年来有关我个人的谣传颇多，此次出访，多少有一点新闻人物的味道，要求一见之人为数较众，难免应接不暇。三是我30多年来和国外学术界实已隔绝，最近几年虽然接触一些外文书刊，也没有时间精心阅读，接到访美任务后，佛脚都抱不及，仓促启行，心中无数。新名词、新概念时时令人抓瞎。四是旧时相识多入鬼录；幸存者众多退休。现在这两门学科的主力几乎全是我同辈的学生，后辈之歌，曲调舛异，领会费神。五是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在讲文化、讲社会的学科里要找一套能互相达意的语词原已匪易，而我又得借用本来没有学好，又是荒疏已久的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当然难上加难。

在与外国学者进行沟通的同时，他还和香港、台湾的同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叔叔的出访结束了我国社会学人类学

◀ 1988年，叔叔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波士顿山间别墅合影。

▶ 叔叔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在学术上取得累累硕果，1989年香港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





▲
叔叔与美国、苏联、印度的
同行进行学术交流。

界与国外学界隔绝了差不多 30 年的历史，为后来请境外学者“进来”讲学和国内学生“走出去”求学创造了条件。

1979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胡乔木，要叔叔出面主持恢复中国社会学的工作。在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早在 1952 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时候，被当成资产阶级学科从全国高校中砍掉了。当时叔叔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当面向毛泽东请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在中国“断子绝孙，多少留个种”。如今要想复活一门已经死去近 30 年的学科，谈何容易。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毁于一旦，要重建时却不能呼之即来。重建就得造砖造瓦从头做起。

任何事情都要人来做，重建社会学也一样，首先要有“人”。然而 30 年前干这行的人，死的死，老的老，要不已经改行。更严重的是，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疑虑重重。要知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他们的心始终没有踏实过。“文革”时，更沦落为“臭老九”，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时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甚嚣尘上。1978 年，胡乔木曾给 30 多位过去社会学界的老先生发出邀请，请他们参加一个商量恢复社会学学科的座谈会，开会时只来了 20 多人。缺席的人中间，有一位叔叔的老同学，因为曾经为社会学说好话，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弄到北大荒去劳动了好几年，吃了不少苦。他接到开会的通知后，他的夫人说，你好不容易爬出来，现在不能再陷进去了。结果他没有出席这次座谈会。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如今，党和政府虽然提出了这样那样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然而以后会怎样？莫不是又一个“阳谋”，大家心里没有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怎样消除当时知识分子中的思想疑虑，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共产党当然深知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所以“文革”一结束，党内就开展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并且制定了相关政策。1980 年 6 月 11 日，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

的通知》里宣布“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并同意统战部对“拟予改正”的22人予以改正，这22人中费孝通是其中的一个。6月23日，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正式宣布了上述决定。在这个座谈会上叔叔表态说：

1957年的反右斗争给我一次不寻常的教育。我多少懂得了，每个人的思想，包括自己的在内，都有其社会的根源，而且都会在社会上发生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曾按我自己对这方面的体会，写出过不少文章，流传在国内和国外，这些是我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的脚印，串联起来，多少可以看到一些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旧社会转入新社会的那个思想历程。

这个历程曲曲折折地为我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生存下去和昌盛起来，只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而当务之急是搞四化建设。这是大局，这是百年大计。为此，个人的得失、沉浮、悲欢、荣辱还能算得了什么呢？

……现在经过复查又对我作出改正的决定。以我个人来说，毕竟是已经年过70的人了，余生有限。请容许我说一说今后的打算。我除了保证完成党所交给我的任务外，还想提到两笔老账，想写两本书：一本是我20年前许下的愿，想到我调查过的江苏本乡的一个农村里去调查一次……第二笔账是欠我前妻的，我们两人在30年代一起在广西大瑶山调查，她当时想写的调查报告因为她的不幸逝世没有完成。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她的夙愿……

说这段话的时候，他估计自己还能工作十年，希望用这十年“余生”，偿还几十年来欠下的账，他打了个比喻说：“我口袋里只有十块钱了，不该随意零星地买些花生米吃，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话虽然说得轻松，

其实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他要把一天当两天来用，下定决心，用最后的十年追回失去的20年！余生有限，要抓紧每一分钟，“不能再辜负生命的最后一段”。

那次座谈会以后，他所说的“我口袋里只有十块钱”的话，就在圈内流传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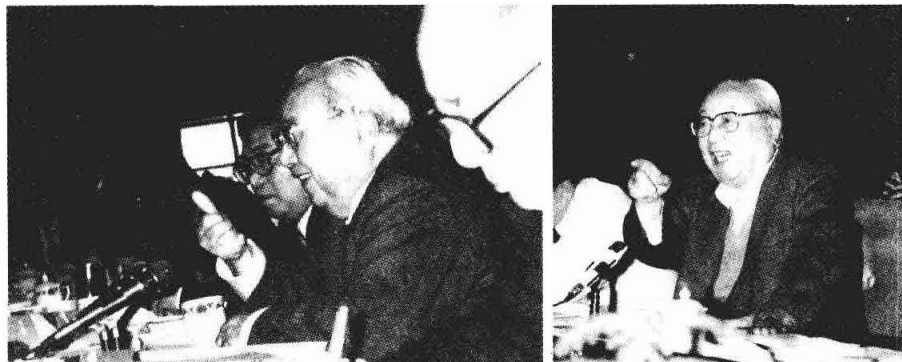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提出“对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已经恢复活动的民盟中央，为了深入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决定由费孝通牵头，在民盟内部做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状况的调查。不久结果出来了，调查报告里说：“有一部分同志余悸尚存，担心1957年的悲剧重演，怕把提的意见转给本单位领导，白纸黑字，轻则影响关系，重则给‘穿小鞋’……有的担心‘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一阵风后烟消云散……特别是1957年反右斗争记忆犹新……提意见是否又会被说成‘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

这个调查是1982年进行的，也就是说，“文革”结束六年以后，上述顾虑依然像一块大石头那样压在知识分子心头。其实叔叔心里多少也有过这种顾虑，但他还是“豁出去”，挑起了恢复一个曾经被钦定为“资产阶级学科”的担子。他说：“我这余生可以说是得之意外。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用它来在事实上证明‘社会学是一门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为了给前人昭雪，为了实现我早年的夙愿，也为了使后人不背上包袱，一种责任感，成了一种内在的力量，使我毅然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同时，从继续认识中国社会的愿望出发，我要在我的晚年为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尽点力。”

十三、“查三代容易做，但一个人的本领没法从三代上查出来”

扪心自问，在工厂打了五六年铁，开了十多年机床，近20年里我一直努力学习技术，兢兢业业干活，希望能在工人阶级队伍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然而事与愿违，因为凭出身，我就低了一等，加上脑子不灵活，参不透身边的一些“潜规则”，所以一直是被排斥的人。有这样一件事让我明白了很多：一次，班长要我加工一批活，说是某兵工厂校验枪械用的塞规，精度要求非常高（这时我已调工具车间开磨床）。他交给我6件半成品，说只要加工出一件合格的就完成任务。几天后，我交给班长3件合格品。事情过去了一两个月，一次和班长聊天，他无意中说：上次你干的塞规，人家很满意，特意来表示感谢，本来要叫你去见面，可是（车间）书记不同意，说对费皖这样的人，利用他一技之长就行了。言者无意，我听了却很伤心。“文革”时，我打定主意做“逍遥派”，但是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还是找到头上，躲都躲不开。多年的遭遇让我心里感到很压抑和沮丧，想起了“树挪死，人挪活”的话。1976年，我终于离开工厂，转到西城区一家小电影院里画广告谋生。

在电影院一晃七年，没想到碰到了陪叔叔去哈尔滨讲学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一起出门，也是第一次听他演讲。可以说他的讲话，是我从来



没有听到过的，虽然演讲的内容广博、道理深刻，但是我都听懂了，并且留下了极其新鲜和难忘的印象。

▲
叔叔讲课时神采飞扬。

记得去哈尔滨的时候，我私下里有个想法：要测验一下自己的能力，看能不能把叔叔的讲话记下来，整理成篇。听讲那天，我准备了纸笔，全神贯注，恨不得把他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可是回来以后，面对记下的一堆丰富、庞杂的内容，却不知如何下手，结果没能整理出来。但是这毕竟是我的一次尝试。这趟哈尔滨之行，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在哈尔滨叔叔就“医学社会学”、“智力资源开发”、“社会学研究”三个题目，分别讲了三次，每次差不多三个小时，一气讲完中间不休息。

“社会学”这个词，我很早就听说过，可是后来听不到了，因为这门学科在中国被铲除掉，没有人再提它了。经过20年的折腾，人们发现即便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而且“社会现象这么广大，对这么大的领域，人们要把这些客观的现象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边来，成为我们可以用的知识，用它来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可不是件简单事，是一门学问。这时人们想到了社会学。当大家明白社

会学对自己的工作大有帮助的时候，都想对这门陌生的学科多一些了解，于是不少单位邀请叔叔去讲课。去哈尔滨之前，他已经在江苏省公安厅、国家体委、石油部、一机部等单位讲过，还在一个心理卫生讲习班上，给医生们讲了一课。

叔叔的演讲可以用“大开大阖”、“丰富多彩”来形容，凭着他渊博的学识，把高深、复杂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在演讲的开场白里他说：中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没有发展起来，现在我们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有条件重新发展新的中华民族文化了。但是要看到，和世界上发达国家比，我们落后了，大家都感觉到要急起直追，赶快培养人才，用现代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事情总得有人开头来做，你们就是在做这个工作，我也愿意充当这个角色，来这里表示支持你们做的这件很重要的事。接着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医生看病是“治病还是治病人”的问题。他说“人”不仅仅是动物，而且还在动物的基础上创造了社会，规定了一套做人的“规矩”，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一个病人看病的结果，会受到诸如他从事的职业、经济状况以及周围亲戚朋友的影响。所以医生眼里的病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然后从人的角度来医治他的病。

谈智力资源开发时，他讲了人类知识的发生、创造、传递、积累；说明什么是知识、智力、知识分子、人才；谈了当前知识分子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说，知识有个特点，它藏在人的脑筋里，这个人要是不说出来、不写出来，别人就不知道，他要是死了，知识就没有了。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比如玛雅文化就灭绝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四人帮”的“破四旧”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都严重地摧残了中华文明。

谈到传递知识的重要手段教育时，他说目前传递知识的人——教师出了问题。据了解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也有近1/3的中小学教员不合格，他们不会教书，什么都要学生背，听说考试的答案与标准答案差一个字都要扣分，这样会伤了孩子们的小脑筋，搞僵了！出现这样的现象，不能怪老师，是因为教育部只把眼睛盯在大学教育上，而忽视培养中小学教员。要赶紧把师范教育

完善起来，培养出合格的教师，同时要提高中小学老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他说前些日子在贵阳了解到一个情况：大量技术人员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里面固然有经济关系，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政策没有真正落实。要解决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疑虑和不信任感”，还有一个“学非所用”的问题。他严肃地指出，过去我们的人事档案里，一个人的祖宗三代是什么出身都写得清清楚楚，但是这个人有什么本领，能解决什么问题却不知道。“查三代容易做，但一个人的本领没法从三代上查出来。”他以袁家骝、吴健雄夫妇为例，强调说：“如果因为袁家骝的祖父（袁世凯）是卖国贼，而不信任他们，倒霉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不能用，给人家用去了。”他说，解放初期他担任专家局副局长的时候，曾经建议建立一套各学科专家的档案，把他们有什么本领，能解决什么问题，调查清楚，记录在案，以备需要的时候，一查档案就可以找到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但是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在第三讲里，他用调查小城镇的具体例子，说明中国社会学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进行研究。社会科学工作者，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反映客观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为执政者出谋划策。理论要结合实际，脱离实际就要犯错误。毛主席是最好的榜样，要学习他成功的地方，“反右扩大化”就脱离实际了，因为他不知道当时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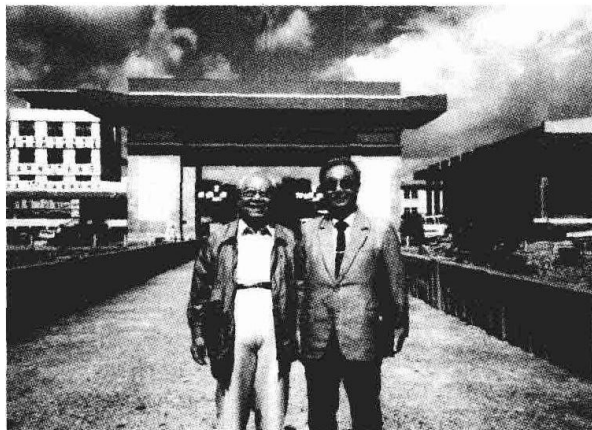
出于好奇，每次讲课，我都特意观察一下现场，发现大厅里总是坐满了人，甚至还有站着的，听讲时每个人都显得那么聚精会神，生怕漏掉什么似的。但是由于叔叔的吴侬乡音，有些话大家似乎没全听懂，但是，看得出大家还是明白了他讲的内容。比如讲到“查三代”和袁家骝夫妇时，引得一些听众交头接耳小声议论。我想他们一定是被叔叔的说法“震动”了一下。要知道，这样的话放到今天讲，当然是太平常了，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初，猖獗一时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那样的论调还在耳边回响，言必“阶级斗争”的习惯还没改变，人们“余悸”未除的时候，叔叔在几百人的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的确不同一般。

十四、“为今后参与发展东北亚国际竞争准备实力”

这次来哈尔滨,叔叔原本还想和省里的同志讨论“盲流”问题。改革开放后,允许农民外出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得到解放,涌入城市找活干,从而引发了上世纪80年代初人口的大流动。由于人们对人口大量流动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缺少因势利导、妥善安置的办法,所以这股无序的人口“盲流”给一些省、市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些地方的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采取硬挡的办法,对“盲流”加以清理、收容、遣送,但是往往送走一批,又来一批,费了很大力气效果并不好。这一现象引起叔叔的关注。他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需要综合治理,像下围棋那样要做活两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二是向边区发展,“应当搞一个正确的有计划的劳力、智力支边办法,制定一项行之有效的人口流动战略方针”加以引导,硬挡是挡不住的。

从历史上看,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又是“闯关东”的地方。在这次人口流动的大潮中,东北成了“热点”,黑龙江更是首当其冲。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30年里,黑龙江省人口虽然增加了两倍多,但是这里大片的土地资源并未充分开发,如今大量人口涌来,政府有关部门是不是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引导,吸收内地移民来开发这里的处女地。这

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盲流”带来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加快黑龙江的开发，增强全省的综合经济实力。叔叔预计到下个世纪，黑龙江省所处的东北亚地区，必将成为中、日、俄、韩、美等国经济竞争的热点，在这场竞争中，黑龙江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 访问长岭子口岸。

未雨绸缪，要提前做好准备，应对这样一个局面的到来，这不是件小事。叔叔打算和省里的同志好好讨论讨论。但是，正在全力应付盲流的省领导，担心叔叔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候提出移民问题，会增加他们工作上的压力，因此委婉地请他不要谈，事情就这样搁下了。

一晃 12 年过去了。1995 年 8 月，叔叔又去黑龙江访问，省里的同志向他介绍说，他们要把黑龙江这个农业大省建设成农业强省、富省。在战略上要打破过去的封闭模式，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来开发荒地；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工矿企业，省外乃至国外的资金共同开发宜农荒地。叔叔认为，现在黑龙江省提出这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思路虽然晚了十多年，但是只要抓紧，还来得及。

这年访问黑龙江后，叔叔应主人之邀到镜泊湖休息。镜泊湖安谧、悠然的湖光山色，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给叔叔留下美好的印象，于是赋诗一首：

熔岩喷射直上天，尘埃回落割山川，
大地形棋局，与人同寿百万年。

天后挥镜竞成泊，众女俯照竞争妍，
画眉无需人间笔，两岸柞黛柔如毡。
何处莽汉来天外，使尽霸道不见怜，
猛劈三岗称砬子，白壁空留恨绵绵。
小姑独立九龙前，九龙起舞似风旋，
鹿奔鳄走吞成岛，碧海青天水涟涟。
红罗女红罗女，赤尾悠游未成仙，
深锁山中人未识，水帘重重声呜咽。
一旦云开雾收世道变，往事俱成烟，
仙境还人间，遍地舞翩跹。
瞰视人间万民乐，重振江山我争先。

返程途中，他参观了一千多年前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临别时留言：

渤海先人贡楛矢，
碣石投鞭闻马嘶。
中华边区黄金地，
耄年来访未忍辞。

东北地区在叔叔“全国一盘棋”的构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年来，除了哈尔滨，还访问了长春、吉林、鞍山、抚顺、铁岭……他还特意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同江、丹东等地拜访那里的少数民族同胞，他的足迹几乎踏遍整个东北。

1990年，民盟中央在辽宁省阜新市举办“现代管理和区域规划研讨班”，叔叔亲自到场讲课。这期间他听说阜新这个生产了几十年的煤炭基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地下资源又即将枯竭，而接替的产业尚未形成，致使社会矛盾凸显，出现了不稳定因素。但是对于这类资源型城市接替产业的培育

和下一步发展，还没有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充分注意。回京后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对资源枯竭中的煤炭城市阜新应采取必要的抢救措施》的建议。这个建议促使有关部门加强了对阜新调整产业结构的实施力度。

1991年，叔叔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和长岭子口岸考察，他特意到中苏边界界碑“土字牌”设立处和距图们江出海口仅15公里的防川哨所参观。据说，天气晴朗的时候，从哨所岗楼上向前方眺望，不用望远镜，就能清楚地看到湛蓝的日本海。历史上图们江口到黑龙江口的日本海沿岸地区一直是我国领土，珲春市有着通过图们江出海航行的悠久历史。

19世纪40年代，腐败的清朝政府和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璦琿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给了沙俄，我国日本海沿岸地区也被“中俄共管”了。1860年，沙俄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强行占领了我国从黑龙江口到图们江口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我国丧失了日本海沿岸的领土。

1886年清政府与沙俄交涉，争回了图们江口的出海权。当时签订的《中俄珲春东界约》中载明：“由土字牌至图们江口30里与朝鲜连界之江面海口，中国船只出入，应与俄国商议，不得阻拦。”在俄国确认这个界约的来照中，没有了“与俄国商议”这一句话，就是说，即使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里，沙俄也承认我国拥有不必“与俄国商议”，就可

▼
“土字牌”前留影。



以经图们江口出海的权利。事实上，在清末民初，我国当地居民一直经由图们江航道出海捕鱼和通商，而且清政府还在珲春设立了海关，珲春成为我国出入日本海的一个重要商埠。

1938年，日本与苏联爆发了“张鼓峰事件”，日本人趁机强行封锁了图们江口，日苏交战殃及中国。从那时起，我国人民再不能通过图们江出海航行了，这种状况延续了52年，一直到1990年我国才派科考人员，对防川至图们江口的15公里河段进行江海通航的科学考察，1991年又对图们江江口段和入海口附近海域进行了第二次考察。

图们江口位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心位置，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如果在图们江口建设开放城市，并引导大连向“北方深圳”的样式发展，加上和山东半岛的烟台、威海这些据点连成一体，就可以形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又一个大的接轨站。这个接轨站依托东北广大腹地，将使我们取得面向参与东北亚发展的广大空间。如果我国不尽早利用进入日本海的口岸，将会在日本海经济区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必须尽快恢复行使图们江的出海航行权，打通进入日本海的通道，以维护我国主权的尊严和在日本海的正当利益。

事关重大，回京后叔叔即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及国务院领导，就行使图们江出海权，开发开放图们江口地区的问题，提出了四项建议：

1. 为正式行使条约规定的我国通过图们江口出日本海的权利，应加快并有步骤地与苏、朝两国进行外交商谈，分别就河道疏浚、安全通航、航运管理、出海捕捞等具体涉外事项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确保通航工作得到法律保证。

2. 建议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东北临近日本海的珲春市列为沿海开放城市……珲春与苏、朝只有一江之隔或阡陌相通，已有对苏、对朝两个口岸（长岭子、沙坨子）进行边境贸易，拟议中还将增辟口岸。尽管该市目前经济实力有待增强，如列入沿海开放城市，吸引外资、开展外贸，国家给以适当的政策扶持，相信该市将能适应形势需要迅速发展。

3. 在琿春防川建立初级码头和必要的配套措施……开展到苏、朝邻近港口的短距离运输，扩大对苏、对朝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并做好出海捕鱼、开展跨国旅游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使琿春尽快成为吉林省和东北地区的外贸基地。

4. 及时组织国内专家进行图们江出海航行和建港的技术、经济论证，制定进入日本海和开发开放延边地区具体规划，并纳入国家计划。

鉴于图们江口出海口岸建设和开发开放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既有内政又有外交的复杂系统工作，不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所能承担，因此建议国务院设立高级专门机构，统一研究规划，统一部署指挥，确保这一项事关全局的大事顺利进行。

叔叔希望通过他的努力，能为促进图们江出海口岸的建设出一把力。他说过，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一直关注东北，因为在清华研究院念书的时候，他的导师史禄国（俄国人，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曾经在俄国后贝加尔湖和我国东北地区多次进行民族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调查，对俄国远东地区和我国东北地区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曾多次对叔叔说：“将来开发西伯利亚，还得靠你们中国人。”叔叔认为，史老师说得有道理，因为俄国远东地区土地辽阔，资源富集，但是人口稀少，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要开发远东地区，除了要“钱”之外，更重要的是得有“人”。作为邻居，又具有吃苦耐劳、勤劳勇敢传统的中国人，一定会成为开发俄国远东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最近商务部有一则消息称：“2005年中国向俄输出劳工1.8万人。他们多数集中在劳动力紧缺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俄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官员称，他们需要来自中国北方的农业劳动力耕种10万公顷废弃的肥沃土地。”这条消息，不正是“开发西伯利亚，还得靠你们中国人”的注脚吗。

十五、“上书紫光阁”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里，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民主党派参政的途径，一是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民主协商或座谈会，交流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发挥作用；三是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各级人民政府领导职务；四是在人民政协中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其实除上述四条途径外，民主党派还有一条更快捷、更有效的反映意见建议的通道，就是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可以通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领导或中央政府各部门领导直接进行沟通。叔叔把这个做法戏称作“上书紫光阁”，说这是民主党派的一个“优势”。上面提到的关于琿春口岸的建设及图们江地区开发开放的建议，就是通过这一渠道直接送达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黄菊那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盟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这样一个“转移”，可以说是“正中”叔叔“下怀”，因为他从来就反对做学问是“为学术而学术”，认为“学术就是有用的知识，有用就是对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推动社会进步有益”，所以他一向是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与强国、富民的目的紧紧联系在一起。

1982年春节前夕，刚刚从吴江县回到北京的叔叔，风尘仆仆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在向大家拜年的时候，他讲述了在家乡调查看到的情况，他说：

我这次去村子里再调查时，刚逢年终结账，粮食虽然减产，农民收入不仅没有下降而大有增加……为什么农业收成不算

好，而农民收入依然不断上升呢？原因是这个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在这三年里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地区……社队工业在农村经济中已确立了优势。

当前社队企业很快地发展，表明它是适应这个地区的特点的。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单靠种粮食，农民收入增加不了多少……但是一旦发展了社队工业，那就好像开了闸门，水平猛涨。

我们应当针对现在社队工业所感到的困难，在原料和能源的供应上，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在制造市场所需要的产品上，给予指导，打进国家计划，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在这样一个隆重的、万人瞩目的团拜会上，叔叔又一次提出了他一贯的主张——发展“乡村工业”。要知道，当他在人民大会堂作这番发言，为稚弱的“社队工业”大声疾呼的时候，社队工业正遭到“社队企业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是不



▲ 1981年叔叔重新拾起中断多年的实地调查，在相隔24年后，第三次访问江村，从此对它进行了长达20年的跟踪调查。图为当年陪同叔叔在江村调查的吴江县县长于孟达（左一）和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朱通华（左三）。



▲
在实地调查中，年逾七旬的叔叔，经常要克服年老所带来体力和行动上的困难。图为叔叔在吴江县庙岗乡同志的陪同下，乘小船到太湖里察看养蟹情况。

正之风的风源”这样的种种非议。

那时，这个从农村里生长出来的“社队工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大多数人还不清楚，就连中央决策者对这个新出现的事物，看法也有分歧，于是他们派人下去调查了。应该庆幸的是，经过调查，中共中央作出了具有历史性的决策，肯定了社队企业的积极作用。此后，经历了20多年，当年稚弱的“草根”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后来，叔叔谈起那年团拜会的感受时说：我刚从乡下回来就去参加团拜，不知道上面什么态度，也来不及和别人商量就放出去了，实际上挺“危险”的，后来我看到一些文件里边，有批判我那次发言的文章。

从那时起叔叔几乎每年到江村去一次，有时一年去两三次，通过对家乡的跟踪调查，他相继提出了“苏南模式”“小城镇，大问题”等著名论断。随着研究的深入，调查范围跳出了家乡和江苏省，向沿海和西北边区扩展。

1988年，在一次全国人大会上，甘肃省委书记贾志杰热情地邀请叔叔到他们那里考察，为该省发展出些主意。叔叔高兴地答应了，并动员盟内外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组成课题组，由他和钱伟长、冯之浚分别带队赴甘肃考察。后来青海、宁夏、内蒙古的同志也提出了邀请，使这次考察的范围扩大到西北四省（区），成了对我国西部发展战略问题的一次研究。通过深入调研以及和专家学者们的探讨，叔叔心里渐渐形成了一套加快黄河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设想：从青海的龙羊峡到内蒙古的托克托，近2000公里的黄河河段，及其两岸纵深100公里的范围内，建立一个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开发区，中央政府给予开发区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充分发挥这一地区的水利和矿藏资源优势，加快其经济发展，从而带动整个黄河上游地区的崛起。考察结束后，在兰州召开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设研讨会”。

1988年7月13日，一份由费孝通和钱伟长签署的《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送进了“紫光阁”。这一建议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快有了批复。9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民盟中央就开发大西北提出重要建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予以肯定将研究实施》消息称：“民盟中央的建议总的设想是好的。何时实施，建议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研究……民盟中央的建议，对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作出了宝贵贡献，值得认真研究。”消息还说：“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的负责人李子奇、贾志杰、沈达人、白立忱、尹克升、宋瑞祥专程到民盟中央机关向民盟中央负责人钱伟长、高天、罗涵先、冯之浚等表示感谢，同时和他们研究了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具体途径。”

叔叔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以后，公务繁忙，但是每年还要用1/3以上的时间“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索”，“凡有所得……写成文章，随时发表”；遇到某些重大问题，就及时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或直接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和意见。据我所知，从1988年至2003年，叔叔向“紫光阁”递交的“奏章”有：《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关于正式批准昆山开发



▲
在河北省沧州市门店乡
后董景村农民家。

▼
参观广东省广州市丰花
织带厂。

►
在山东省潍坊农村调研。

区的建议》、《关于加快黄河三角洲开发的建议》、《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就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问题与江苏、浙江、上海党政领导座谈的情况汇报》、《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建设黄骅港的建议》、《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关于振兴上海经济的设想和建议》、《关于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及建立我国北方经济中心的建议》、《关于将牡丹江市列入开放城市和在哈尔滨市建立内陆港的建议》等 30 多项。这些建议和意见都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重视，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落实或纳入了国家的各项计划和规划之中。

叔叔认为，当前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像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它的框架已经构建起来了，现在需要大家，特别是民主党派创造一些具体的做法来充实它，给这个框架添砖加瓦。民盟搞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就是充实了这个框架内容。

十六、叔叔的“本领”

1988年12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叔叔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前往南宁祝贺和慰问，他要我一起去。庆典结束后，代表团分五路到广西各地进行慰问，叔叔率队走桂东南一路，行程2000余公里，历时半个月。如果说五年前在哈尔滨，我领略了叔叔演讲的魅力，那么这次旅行则是“近距离”看到他是怎样工作和作实地调查的，所以觉得特别新鲜，在旅行中我还发现了他特有的一些“本领”。

庆典活动一结束，我们就出发了。叔叔率队走的这一路，包括玉林地区、梧州地区、桂林地区及涔溪县、贺县、钟山县、金秀瑶族自治县、荔浦、恭城等地。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对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作一番考察。这条路线相当长，时间又短，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只能停留一两天。在这一两天里，叔叔要和当地的同志座谈，要参观工厂，要搞市场调查，要下农村访问农户，时间不够，赶路的时候也要顺道拜访一两个村庄，路上常常就在途经的县或乡里的招待所吃饭、休息。

说到“吃饭”，叔叔是个十分“马虎”的人。在家里的時候，每天早餐吃一个鸡蛋——最好是煎的，要嫩一点；一片抹果酱的面包；再加牛奶（加咖



▲ 参观民族文化苑时，和壮族青年一起抛绣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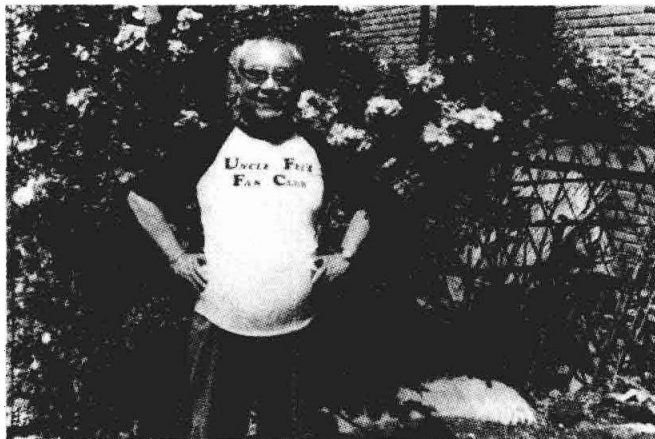
啡或豆浆。牛奶通常要喝两三杯，喝足，喝够。他虽然在北方生活了几十年，但口味不改，仍然喜爱家乡的油炸臭豆腐、酒酿圆子；爱吃黏、甜、香脆的食品，像粽子、八宝饭、花生米之类，特别喜欢口味偏甜的红烧肉。他夸口说，年轻时和吴晗每人一顿可以吃掉一只红烧蹄膀。现在上了年纪，血

糖偏高（但没有戴上糖尿病的“帽子”），家人限制他吃甜食和油腻的菜肴，可是红烧肉还是要吃的，如果几天餐桌上没有红烧肉，他就会“威胁”说：“再不给我红烧肉吃，就写不出文章了。”

叔叔虽然偏好家乡口味，但不挑食，除了辣椒、香菜（说香菜有股“臭虫味”）等少数几种蔬菜不喜欢吃之外，没有什么忌口的东西。他一辈子走南闯北，不论到什么地方，有什么吃什么，“入乡随俗”从不挑剔。

这次在广西，一路上经常在县里或乡里吃饭，有的地方卫生条件不太好，可是他毫不在意，进餐厅就吃，没有一点犹豫的样子。下乡到农民家里作客，主人会热情地请他抽烟、喝茶，甚至端出自家的炒玉米、红薯干、煮糖片请他吃。农户家里免不了有苍蝇，我看着落在桌上的苍蝇，心里想，老先生可别吃这些东西，不卫生啊。然而在我心里正嘀咕的时候，只见他和大家一样，用手捏起这些吃的往嘴里送，一边喝着茶（香烟是不抽的），一边和老乡聊上了。一天回到招待所，我忍不住向他提出，希望他以后在老乡家不要随便吃东西，

他听了以后笑笑说：“习惯了。我从前下乡调查，不仅和老乡一起吃饭，还一起喝酒、抽烟。我们作调查的人，要跟别人沟通，一定要尊重对方、平等待人。人家请你吃饭、喝一杯酒、敬一支烟，是尊重你，怎么可以拒绝呢。喝杯酒、抽支烟，也可以拉近双方的感情，这是很要紧的。我现在年



纪大了，戒了烟，酒也不能喝了。”停了一下又说：“再说人的身体是有抵抗力的，用不着那么大惊小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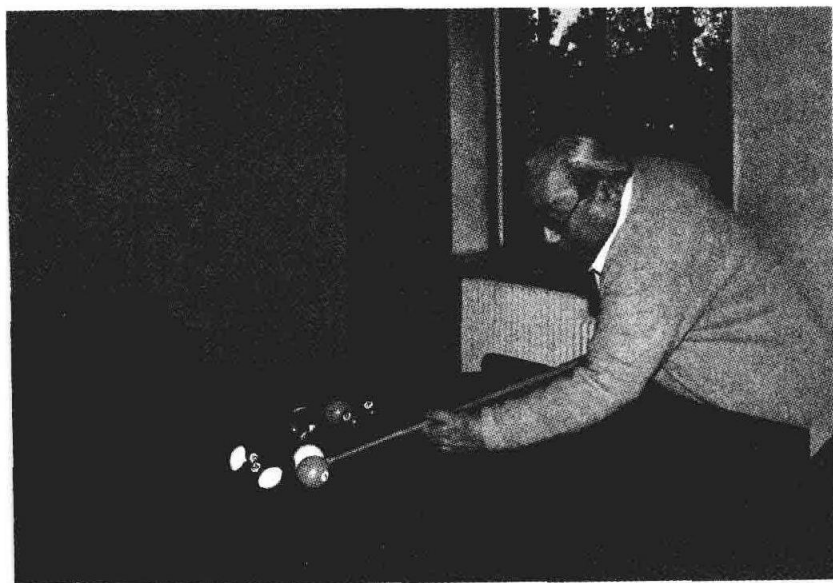
▲
老当益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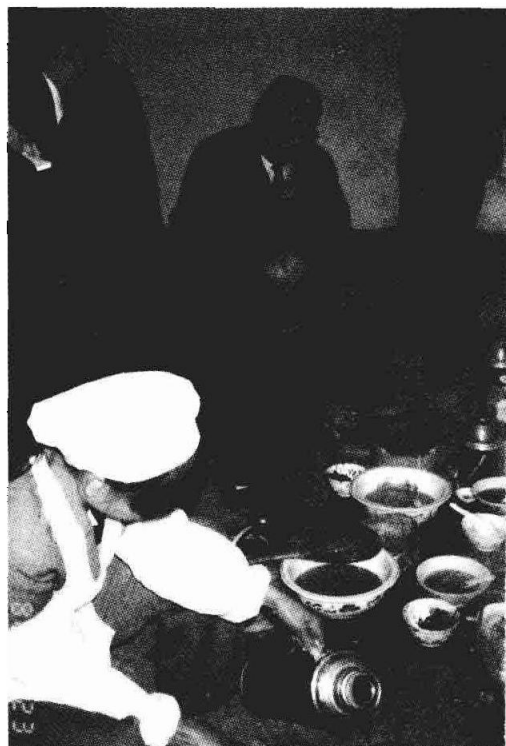
其实，叔叔是十分注意身体健康的。他非常珍惜现在的工作机会，“下定决心，要用最后的10年追回失去的20年”，可谓惜时如金。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好身体。为此，他每天坚持锻炼。早晨起床后，要做一套自编的体操——活动活动腰、脖子，甩甩胳膊、踏踏步，最后扶着床边深蹲几次。除了锻炼，平时还十分注意劳逸结合。他说要天天锻炼，力保健康，争取多活些日子，为国家、社会多做些有益的事情，不要成为社会的包袱。

这半个月里，每天奔波在旅途中，除了赶路还要考察工厂、访问农村，开座谈会、阅读资料。但是叔叔总是精力充沛、有条不紊地投入工作，依我看这与他良好的体质和善于休息有很大关系。在长时间的旅行中，他尽量按照自己的习惯起床、进餐、休息。比如午饭后要保证两个小时的休息。晚餐后，放下手头工作，看看电视，彻底放松。电视的《新闻联播》是要看的，除了新闻，还喜欢看体育节目。他说，小时候身体不好，但是上大学时体育运动成绩不错，尤其是体操，能在

单杠上做一些高难度动作。他尤其喜欢看中国女排和女乒（乒乓球）比赛，说起那些运动员来如数家珍。他称赞郎平不仅为国争了光，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还对促进人民体质的提高作出贡献，在社会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夸邓亚萍“一上场，双目圆睁，那股逼人的眼神，在气势上已经把对手打垮了，这种精神令人钦佩”，他认为中国男子足球队缺的正是这种精神。关于足球，他也很内行，什么红牌黄牌，越位、点球说起来头头是道，他特别爱看外国球队踢球，说看他们踢球是“欣赏”，是“享受”。对一些球星也很熟悉，他给罗纳尔多起了个“大耳朵”的外号。他甚至从足球比赛联想到今后的国际社会，应该和足球赛那样，不论哪国球队，都承认大家认可的统一规则，服从裁判员的裁决，世界才能有秩序。除了体育节目，他还看一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但是，不喜欢那种凄惨、悲苦结局的故事。他说也许是年纪大了，脑筋反应慢，耳朵和眼睛跟不上戏里的节奏，对现代的外国电影没什么兴趣。看看电视放松一下，10点就上床睡觉了。当然啰，出差在外，这个“时间表”

▼
注意锻炼身体。只要条件允许，叔叔就会去跑跑步，打打台球，活动活动筋骨。





有时会被打乱，晚饭后还要阅读白天收集到的各种材料，考虑第二天要做的事情。

说到“睡觉”，这又是叔叔的一项“本领”。旅途中，为了便于照顾，我和他同住一个房间。招待所住宿条件各异，床垫有软有硬、枕头有高有低、被子有薄有厚。每换一个地方，我常常因为不习惯而迟迟不能入睡，然而当我还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他老人家早已呼呼睡着了。由于休息得好，工作起来自然有精神了。

我想，“能吃”、“能睡”的本领，也是成就费孝通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的条件吧。

这次是我第一次跟随叔叔下乡，所以对他去什么地方，参观访问、开座谈会时说了哪些话，都很感兴趣。我发现一路上他没有参观什么国营大厂，最大的工厂大概就是那家有

◀ 参观玉林自行车厂。

▶ 在广西恭城县访问时，兴致勃勃地观看当地群众打油茶的过程。

800名员工的玉林自行车厂了。他去这家工厂，不是因为它有多大规模，而是看中这家工厂的领导能主动“走出去”和上海自行车厂联营，从而提高了自己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打开了销路，也带动起一批当地的相关产业。这种开阔的眼界，勇于打破“封闭”的思想，在当时经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干部里是不多见的。所以他写了“上下联营，带动地方工业，为壮族自治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题词来鼓励他们。

一路上他更关心的是那些小企业以及做生意的个体户。在玉林市他专门去了一家街道工厂，这家当年由20几位妇女办起来的纸袋厂，如今已经有职工220人，1988年1月至9月完成产值2001万元，成了广西第一家年产2000万元以上的乡镇企业。叔叔到这个小厂参观，是要鼓励他们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带动这个地区的乡镇企业快一些发展起来。当然去得最多的还是农村。他访问了玉林市郊的镇忠村，村干部介绍说：这个村198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预计比前一年增长43.7%，人均收入可以达到2400元。农民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村里已经有能力筹集资金支持农业和商品市场的发展，也有更多的钱用在修建学校、道路等公益事业上。叔叔听了很高兴，写了“发展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是脱贫致富的必经之路”的题词送给村委会。他听说村里有一家黎氏三兄弟开办的群健白铁厂，效益不错，就特意去厂里看看，鼓励他们把厂子办得更好。

在参观玉林市中药材市场时，我特别注意听叔叔和老板们的对话，想弄明白他搞调查有什么“高招”。那天来到市场后，他随意走到一个摊位前，抓起一把药材问女老板：“这是什么药？”接着又问：“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药材市场？”老板说：“是从报纸上知道的，甘肃那儿有药材，于是和两个姐妹合计，就一起来了。”当他知道这位中年妇女是从甘肃来的以后，显得很高兴，对她说：“我去过甘肃，那儿的药材很多。”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问题：

“有几个孩子？你出来做生意，孩子在家里谁照顾？”

“有两个孩子，由奶奶看着。”

“生意好做吗？”

“我们刚来这里，情况还不熟悉，今年可能赚不着钱。”

“不赚钱怎么行，赔本生意怎么做下去啊？”

“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我们觉得这里的条件不错，以后还是会有钱赚的。”

叔叔笑着对周围的同志说：“这位从甘肃来的女老板，有这样的商品意识和经营作风，不容易。只要药材质量有保证，加上市场管理、治安做得好，就能吸引八方来客。”

我听了半天，叔叔和这位女老板聊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听不出有什么“高招”。后来跟随他下乡调查的次数多了，更感到他的调查是那么普通、平常。他告诉学生搞调查的时候，要注意观察人们穿的、吃的、住的，从这些人们平常的生活中发现问题，得出结论。一次，在河南农村考察，村干部领我们到一户装修得很高级的农民家参观，见冰箱里存有塑料袋包装的饺子，村领导说，这户人家的主人下地干活，中午回不来，只好包了饺子冻在冰箱里，让孩子中午吃。

▼
叔叔和跑运输的个体户聊天。



孩子叫刘丽娜，在中学读书。回宾馆后，叔叔对我们说，这户人家大概是“门面户”，是做样子给人看的。如果是普通农民家，自己包的饺子是不会用塑料袋包装的；再说孩子叫丽娜这样一个“洋气”的名字，她父亲应该有点文化，而且是见过世面的人。后来一打听，果然，小孩的父亲是村办企业的一位经常跑外的销售员，并不“下地干活”。叔叔告诉我们，做调查要“抓得住，理得清，讲得出，看得懂，能操作”。看来叔叔的调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说有“高招”，就是他能从“人人可以看到的事”和“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里，得出普通人看不见的“道理”。这也是叔叔最大的“本领”。

此前，叔叔曾四次来广西，最后一次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这次一路上看到广西发生了很大变化，心里十分高兴，情绪很高，感触颇多。这天，我们从贵县出发到玉林，途中参观了一大片香蕉林，叔叔触景生情得诗一首：

贪看景色忘午倦，
 蔗蕉并茂胜中原。
 玉林冬日客心暖，
 此行胜读书千卷。

到了梧州，他又吟道：

一别五十载，
 白发又再来。
 西江水长流，
 年老志不衰。

我知道，叔叔大学毕业时，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广西瑶山作实地调查，中途出了事故，一死一伤，王同惠的遗体运出瑶山后，安葬在了梧州。这段

特殊的经历，让他和广西瑶族同胞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几十年，他一直非常关注瑶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这次来广西慰问，他选择桂东南一路，就是因为这一路是瑶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年他和王同惠就是从金秀瑶族自治县进入大瑶山的。

12月15日我们抵达梧州，第二天早上到市郊鸳鸯江畔白鹤山上拜谒了王同惠墓。19日，乘车沿崎岖山道，来到金秀县的六巷乡看望老朋友。离开六巷后，直接去了荔浦，在荔浦过一夜，20日到桂林。22日，抵达这次庆祝慰问活动的最后一站恭城县。

24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江永县，刚刚进入江永（那里瑶族人数约占40%）境内，汽车就驶入一个叫槐木塘的瑶族村庄。这个村原来很穷，人均收入只有70元。从1979年开始种植夏橙，因为这种橙子成熟期早，能够卖上好价钱，仅种夏橙一项，就大大增加了全村老百姓的收入，几年下来就脱贫了，估计今年这个村人均年收入能达到1200元。接待我们的村干部，边说边把我们带到一片夏橙果园里，叔叔问他，这个优良品种是哪里来的？果子销往什么地方？价格是多少？当听说夏橙是本县一位技术员，经过多年不断试验才培育出来，并在全县推广开来的时候，叔叔对当地同志说：“应该好好表扬奖励这位技术员，他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实事。”

走出果园，忽然听见不远处一户人家里传出一片笑声和掌声，过去看，只见屋里挤满了人，一打听，原来是在办喜事，叔叔饶有兴趣地提议大家进去看看。挤进屋里，主人看见进来那么多客人，一时不知所措，连忙让出一个座位。叔叔坐下后，先向主人道喜，接着就聊了起来。原来是这家女儿出嫁，主人说，他的女婿是广西恭城人，今天来接新娘。他为女儿准备了大约2000元的嫁妆——一台黑白电视机，花了600多元；一辆自行车，200多元；一块手表，100多元；加上几套新衣服、几床新被子，一共花费2000元，加上今天的十几桌酒席，3000元足够了，这点费用我们还负担得起……临别时，叔叔笑着对新郎新娘说，希望新娘把这里夏橙的种植技术带到恭城，新郎把那边

的好经验带过来，让大家都发财。在一片掌声中，我们离开了这户农家。

在江永县，叔叔用了三天工夫，详细了解了江华瑶族自治县、富川瑶族自治县这一瑶族聚居区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生活状况。之后，来到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在连南，他和桂、湘、粤三省区民委的同志一起开了座谈会，大家对南岭瑶族地区的经济开发交换了意见。叔叔说，多年来他一直在想，瑶族怎样利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加快发展。希望这个地区的瑶族同胞，在经济开发的过程中，能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彼此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在引进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及商品流通等方面进行协作，早日改变这一地区贫困面貌，实现他心里一个愿望。会议形成了《关于开发南岭瑶族山区的座谈纪要》。《纪要》经三省区党委、政府领导同意后，由叔叔转报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他希望这次南岭之行，能为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点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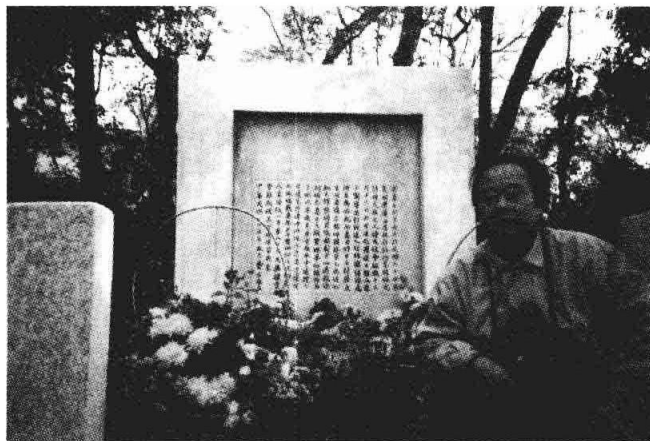
十七、“石碑埋又立”

出发去广西之前，宗惠对我说：“这次爸爸打算去梧州和六巷看望同惠妈妈，到时候请你特别注意一下爸爸的情绪。”我知道，梧州和六巷这两个地方与叔叔有着特殊的关系。宗惠怕老人家重返故地，情绪会过于激动而出什么意外。

15日抵达梧州的时候，我想起宗惠交代的任务，就特别提高了“警惕”。但是我看叔叔仍然和往常一样平静、安详，只是在休息的时候显得神情肃穆，若有所思。

第二天下午，天高云淡，12月的广西还很暖和。我和张勤（费宗惠女儿）陪着叔叔来到梧州市郊白鹤山拜谒王同惠墓。白鹤山上满目青翠，郁郁葱葱，在向阳的一片坡地上，青松翠柏间，矗立着一座两米多高的墓碑，四周石柱环绕，铁链相接，墓碑上面镌刻着叔叔手书的碑文，墓地虽不大，

▼
谒王同惠墓。





1935年8月孝通叔叔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在赴广西大瑶山作“特种民族研究课题”前夕，与王同惠结为伉俪。

图为王同惠在燕京大学校园内，其时，她正师从吴文藻老师，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读书。

却显得庄严、肃穆。叔叔缓缓地沿石阶拾级而上，来到墓前，默默地献上鲜花，鞠躬，伫立了几分钟。

我跟随在叔叔后面，怀着崇敬的心情，向这位英年早逝的婶妈深深地鞠了躬，然后走近墓碑，只见碑上刻着：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同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瑶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误入竹林，通误踏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从墓地回到宾馆，叔叔要我拿出宣纸和毛笔，我知道他要写些什么东西了。我把墨汁倒在砚台里，铺好纸，见他握起毛笔饱蘸墨汁，略一思索，挥笔写下一首五言律诗：

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
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风雨。
坎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沮；
九州将历遍，肺腑赤心驱。
彼岸自绰约，尘世如蚁聚；
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
白鹤展翼处，落日隈远墟。

写完以后，他抬头对我说：这幅字送给你吧。说罢，就在末尾空白处写上“书赠皖侄”。记得有人说过，当一个人的所思所感在叙述的文字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的时候，便化作了诗的语言而宣涌出来。我想，这诗就是叔叔这几天来所思所感的宣涌吧。这幅字是叔叔送给我的唯一的一幅，弥足珍贵。

经过一天的劳累，晚上叔叔早早就上床休息。我毫无睡意，随手翻看放在桌上的一叠材料，其中有关于早年叔叔和王同惠到瑶山搞调查的报道，还有惨剧发生以后的一些“故事”。虽然我早就听说过叔叔在瑶山受伤获救的事，但是具体的情节却没有听人讲过，眼前的这些材料正可弥补这段空白。于是我一篇一篇仔细阅读起来。读了这些材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今天正是同惠婶婶遇难 53 周年忌日。材料里记述的一桩桩事实，使我把原先听说的叔叔和同惠婶婶的片段事迹，连缀成了一篇感人的故事。

1935 年 6 月，叔叔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史禄国老师要他在国内作一年实地调查后，再出国留学。恰好此时广西省政府有一项研究苗、瑶、侗、壮等特种（少数）民族的课题，经吴文藻老师的斡旋，广西省政府同意叔叔到大

瑶山调查瑶族的社会情况。当叔叔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恋人王同惠的时候，她当即表示要一起到瑶山去，她的愿望得到了两位老师的支持。为了路上方便，两人决定结了婚再走。

8月18日，叔叔和王同惠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临湖轩是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因为王同惠是基督教徒，所以特地请司徒雷登作证婚人，亲朋好友都到场祝福这对小夫妻，达叔叔也从苏州赶来，代表家人参加婚礼。

婚礼过后，他们回家乡看望父母，并在无锡太湖鼋头渚住了几天，然后经上海、香港，再折回广东，进入广西，抵达南宁，这一天，离他们举行婚礼的日子刚好一个月。从南宁再向前，道路越来越难走，先是可以乘车，后来只能骑马、坐轿，最后只得徒步爬山。10月21日，叔叔和王同惠从离瑶区25里的百丈村出发，走了一整天，终于进入大瑶山里的瑶民村落。

进山后，他们按计划先在花蓝瑶聚居的地区进行调查，然后来到古陈一带的坳瑶村落。11月16日，完成了在古陈的工作后，他们向下一个茶山瑶的调查地点罗运转移。当走到五指山冲口一块大石坂时，两人停下休息，等起身再赶路时，发现向导已先行走远。两人急忙追赶，山道崎岖曲折，哪里追得上。崇山峻岭中夜幕很快降临，在一处岔路口，两人慌不择路走错了方向，摸索着来到一片竹林里，见前方有一似门的建筑，以为离村子已经不远，想去查看一下，没想到当叔叔推开“门”，脚刚迈进去的时候，只听轰隆一声，木石齐下，把他的腰砸伤，一条腿被压住。原来这是瑶民设下的捕虎陷阱。在危急中，王同惠奋力把木石搬开，将叔叔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出林求援。没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熬过寒冷的漫漫长夜，拂晓，叔叔奋力爬到一处开阔地，见到一头牛，知道一定会有人来找，于是就在旁边等候，果然被出来找牛的村民盘妹暖发现。她见地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戴着眼镜的人，以为是前天从这里飞过的飞机上掉下来的，由于语言不通，不管叔叔怎样打手势，盘妹暖还是被吓得跑回村里，

约了放牛的伙伴盘公全、盘公货三人重又回来。几经周折，叔叔才被背回下古陈村，可是大家还是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幸好此时有一个做生意的汉人在村里，叔叔连说带写，经这个生意人翻译，大家才知道了叔叔的身份，并且得知王同惠失踪了。于是古陈头人立即下令，全村 16 岁以上男子全部上山寻找。但是六天的搜寻，仍不见踪迹。叔叔思念亲人，“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第七天，人们终于在一处山涧急流中，找到了王同惠的遗体。王同惠牺牲的那天，同叔叔结婚才 108 天……

王同惠牺牲令叔叔悲恸欲绝，甚至要同她一起“走”。他把进山时带的药，全都吞了下去，还喝了一瓶用作消毒的酒，“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然而上苍没有接纳他。

王同惠的遗体抬回下古陈村后，村民盘公西、盘妹暖拿出 15 丈土白布包裹遗体，各户还捐了东毫两毫钱，并按照瑶族风俗，为王同惠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第二天，村里派四人抬了王同惠遗体（各发东毫 100 毫），四人抬着叔叔（各发东毫 50 毫），自下古陈翻越对面山，经平南县，到达桂平县江口圩，然后将遗体装棺下船。轮船到达梧州，王同惠遗体由友人华毕等人起岸，因为王同惠信奉基督教，就把她安葬在梧州市一处基督教墓地。当时，叔叔伤势很重，在医院治疗，安葬王同惠的一干事务，皆由友人代理，他写的悼文，亦托友人刻碑，立于墓前。

叔叔在梧州治伤，稳定后转到广州柔济医院。伤情日渐恢复，他开始着手整理和王同惠一起在瑶山收集的资料，撰写《花蓝瑶社会组织》。他要用这本书来纪念妻子，他说：“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职，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不果，当系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时间流逝，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换了人间。叔叔在这漫长、动荡莫测的年代里，始终“勉力视息人间”，坚持自己做学问的准则。

叔叔在上世纪50年代反右时，横遭打击，没想到这一击竟然也打中躺在梧州地下的王同惠。当时梧州当局认为王同惠是右派分子的老婆，这个墓地是万万不能存在的，必须铲除，于是作出了“扒坟”的决定。此时叔叔已是众矢之的，不可能跑到梧州来处理王同惠的遗骨，正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位叫张文芬的年轻妇女，自告奋勇代为收殓王同惠的骨殖。

张文芬是谁？一个与费孝通并不相识，和费家既不沾亲又不带故的女子，为什么会为王同惠墓这么关心？甚至不惜冒着政治上受牵连的危险，主动来收殓她的遗骨？

原来抗战时期，张文芬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在离她上学的学校不远，有一座教堂，是一处绿树成荫、幽静美丽的地方，放学后张文芬和同学经常到那里玩，王同惠就葬在这教堂的墓地里。张文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教堂里的两位外国传教士很熟悉，从两个传教士那里张文芬知道了这个墓地的来历和王同惠的一些事迹，心里充满敬仰。

这时抗日战火已经蔓延到梧州，日寇飞机不时会飞来扔

▼
1995年叔叔和张文芬在广州见面时的情景。



几个炸弹，两位传教士不得不离开梧州回国，临走时要张文芬替他们照看王同惠的墓地。一天，张文芬和两个同学又来墓地玩耍，正玩得高兴，突然遭遇日本飞机的空袭，四周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日本飞机来了，快跑！”张文芬喊了一句，撒腿就跑，没想到刚跑了几步就被什么东西绊倒，重重地摔在地上，就在这一刻，一颗炸弹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两位跑在后面的同学不幸被弹片击中，丢了性命，而她却因这一跤，趴在地上而毫发未损。事后，她看到绊倒她的，正是围在王同惠墓地上的铁链。信奉基督教的张文芬一家认为，是因为得到了王同惠的护佑，小姑娘才逃过这一劫。从此，张文芬更加认真地担负起照看王同惠墓地的责任，十多年不间断。这期间，她一直关注费孝通的信息，终于与费孝通取得了联系，时有书信往来，但是一直未能谋面。

当张文芬知道有人要扒掉王同惠墓的时候，就顾不得什么政治压力，自告奋勇出来收殓王同惠的遗骨。她说，那天她从墓顶凿开的一个小洞口下到墓穴里，看到王同惠的遗骨很完整，就小心翼翼地把骨殖收拢来包了一包，经费先生同意火化了，后来托人将骨灰带到了北京，交给费先生。后来叔叔将同惠婶婶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的老山脚下。

张文芬说，那时候她对王同惠的了解不多，只是碑文上所提到的那一些，也不清楚费孝通是什么人，后来虽然知道费孝通被打成右派分子，但是觉得他和王同惠都是好人，照看王同惠的墓、收殓她的遗骨，都是按照“主”的旨意去做的。

王同惠墓被拆毁后，那块墓碑也不见了踪影。

反右以后，一转眼八九年过去了，灾难再次降临，中华大地卷起一股“文革”恶浪，一时间，年轻学生纷纷“停课闹革命”，斗争矛头指向老师。梧州市第五中学的邱艾军老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强迫“劳动改造”。1970年的一天，他和几位“劳改”同伴到学校附近的山边挖土，无意间挖出了一块白玉石碑，仔细一看，碑上刻有费孝通悼念王同惠的文字。邱老师上大学时，曾经读过费孝通的文章，对费孝通有所了解，他被石碑上的文字所感动，心想一定要把这

块碑保存下来。但是当时打砸抢盛行，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费孝通又是有名的大右派，虽然听不到他的什么消息，估计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肯定无暇顾及这块碑石。如果搬回住地，让“红卫兵”知道了，结果不难想象。邱老师犯了愁，后来转念一想，这些红卫兵小将文化程度不高，知识浅薄，不一定会知道费孝通是什么人物，即使看到这块碑，也不懂得它的价值。于是邱老师就把墓碑抬回自家院子，“随意”放在一个角落里。正如邱老师判断的那样，这块石碑的确引起了一些红卫兵的注意，但是，因为悼文是三十多年前写的文字，又没有标点，这些年轻人不会断句，读不懂碑文的意思，对费孝通也懵然不知，看了以后就不再理睬。这样，墓碑在邱老师家的院子里静静地躺到“文革”结束。

1979年，邱老师的夫人刘志鹏在英文版的《中国建设》上，看到费孝通写的《重访大瑶山》，文中记述了王同惠在瑶山牺牲的情节。于是邱老师夫妇致信费孝通，并附上用铅笔拓出的碑文。不久邱老师收到回信，信中说：“我早应给你复信道谢，你给我寄来用铅笔拓出的墓碑，所费的时间和劳力是相当多的，使我很过意不去……拜托你照顾此碑，也是我的一桩心事。”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确有此碑，并承梧州五中邱艾军同志及博物馆何虚中同志寄来拓片。碑中梦告一事，系当时幻境，是一种心理状态，不可迷信。”后来刘志鹏出任梧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经她提议，梧州市政府在白鹤山上重新树立起王同惠墓碑。

另外值得宽慰的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叔叔和张文芬两人终于有机会在广州见面了。这时张文芬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如今她移居美国，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十八、到六巷

12月19日一早，我们从梧州出发，汽车在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行驶了三四个钟头，快中午了才到达六巷中学操场。一路上汽车盘旋转弯、颠簸摇晃，搞得我头晕目眩，幸好还忍住了，没有出洋相。到达目的地后，我晕晕乎乎下了车，心想好几个钟头的颠簸盘旋，老人家吃得消吗？然而，当我循着鞭炮声、锣鼓声看去，只见叔叔正被人们簇拥着，精神饱满地向一位瑶族老太太走去，然后紧紧握住她的手，两位老人神情都有点激动。听旁边的一位同志念叨说：“那是蓝妹国，93岁了。”哦，我知道蓝妹国，当年叔叔在六巷搞调查时，住在瑶头蓝公霄家，蓝妹国是他的儿媳妇。

当初吴文藻老师同意王同惠一起到瑶山，是考虑到在做社会调查时，有些场合女性出面会比男性方便。况且吴老师还发现王同惠是个“肯用思想，是对于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的青年”，后来“更发现她不但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天才”。如果她和费孝通一起去做调查，取长补短，必然会有很好的效果。结果正如吴老师所料，王同惠凭借出色的语言天才和公关能力，得到蓝妹国及村里瑶族妇女的信任，从而取得不少瑶族风俗习惯的第一手资料。

王同惠是河北省肥乡县赵寨村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笃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老师。孝通叔叔比她高两年，即是同门师兄妹，接触的机会自然多一些，甚至会在一起讨论问题。1933年临近圣诞节的时候，叔叔和她在关于人口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当时燕京大学里，过节时同学之间有互送礼物的习惯，于是叔叔就趁过圣诞的机会把一本讲人口问题的书，作为礼物送给王同惠，希望用书里的观点来增加自己的说服力。没想到，这个礼物让王同惠觉得费孝通“这个人平常”，产生了好感，从此两人来往更加密切了。

从1934年到1935年的一年里，他们两人从各不相让、争论不休的同学，逐步发展到相认、相知、相恋。虽说他们之间没什么罗曼蒂克，但是正在清华读书的叔叔“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姊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是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得寒冷地等候她”。王同惠则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到清华园和叔叔做伴。这段时光给叔叔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他说：

这时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附近的圆明园废墟和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追念中不时感到这段生活似乎和我的一生中的基调很不调和，甚至有时觉得，是我此生似乎不应当有的一段这样无忧无虑、心无创伤的日子。这些日子已成了一去不能复返，和我一生经历不协调的插曲。

吴文藻老师说王同惠在语言上有绝对的天赋，是因为她在“法文还不过有三年程度”的时候就翻译了法国人许让神父著的《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成绩真是可以使人惊异”。当这本书翻译完成时，恰巧叔叔手里也有一本翻译完

的英文书稿《社会变迁》，王同惠知道后，就要去阅读。叔叔建议她到图书馆借英文原本，边阅边校，作为他们两人合译本出版。王同惠听了这个建议以后，也提出要叔叔同她一样，到图书馆借法文原本，边阅边校《甘肃土人的婚姻》，作为两人合译的著作。这就是她一向主张的两人必须坚持的“对等原则”。后来叔叔提到这个原则时说：

我和同惠后来虽则已经生死相别，但精神上我们之间还是坚持了这个对等原则。她为我们共同的理想而去世，我就应对等地为我们的共同理想而生。这种信念也成了支持我一生事业的动力。

当叔叔和王同惠决定一起去瑶山后，他们提前结了婚，在蜜月里踏上了奔赴大瑶山那充满期待又长满荆棘的崎岖山路。如今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得出，70年前进入瑶山这样边远山区的艰险程度了。幸好他们留下了记录这次旅行的《桂林通讯》，从那些通讯里，多少能让我们看到当年他们进山时的片段情景。

他们从家乡出发，经香港、广州，绕了一大圈才抵达南宁，然后从南宁出发去柳州，这段路已经通了长途汽车，还算好走。但是“柳州的市内交通比南宁更不便，除了私家汽车，和酒精厂特设的轻便有轨推车外，完全是步行和肩挑，行李运输之不方便，更甚于南宁”。第二站本打算经融县到三江再进山。但是到柳州后，听说融县那里正闹土匪，只得改道，沿柳江坐小火轮去象县（即现在的金秀瑶族自治县）。从柳州“到象县的水道极老，曲折甚烈，近弯处，山壁峭立，竟疑无路。水流颇急，且河床不平，水花打旋，小船不易航行”。

两人坐了十二三个钟头的小火轮到达象县，在县城停留了三四天，完成了132个人的“人体测量”后，再向瑶山进发。象县县城距离瑶山还有百余里，既没有水路，又没有公路，都是崎岖的山道，只能挑担坐轿步行。从象县出发那天下了小雨，他们“在全巷注目出了县城，向西进发……广西人口极稀，行路上很少经过村落……天雨旷野，绝无人迹，四顾只是荒山”，一路上“真



◀ 叔叔和欢迎他的瑶族同胞亲切握手。

▶ 叔叔和蓝妹国（前排左五）在瑶族同胞中间。

使人提心吊胆，想不到还有回到人群里的一天了”。经过一天跋涉，他们到了百丈村。这里是进入瑶区的最后一站。在百丈耽搁了一天，又做了 16 个人的“人体测量”。

百丈村东南 25 里，过枫木界顶，就是瑶区了。这里虽然离瑶山不很远，可是那时候的瑶山，还是个不服“王化”的“化外”之地，大多数人对瑶山十分陌生，人们提到瑶区，都说“瑶山的路怎样怎样的难走，怎样的没东西吃”，好像“去瑶山简直是难似登青天，而瑶人简直是‘野人’”。

10 月 21 日早上，叔叔他们预备下四张烙饼、一锅鸡蛋，雇了挑夫和两顶轿，从百丈村出发了。所谓“轿”，就是两根竹竿绑住一个坐椅，人坐在上面，会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恐怖”。路上“所经俱系峻恶难行之路，忽而缘峭壁，忽而过独木，下轿不止十余次，一路只觉得造物的着意真是无美不备，无奇不有了”。在挑夫和轿夫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在黄昏时分到达瑶区的第一个村落——王桑。

来到瑶区，他们进一步体验到了在瑶山行路的艰难。这里一出门就是“仰望看不出山顶，山势斜度极大”的大山，险恶的山路陡得站不住人，到处是十几丈深的山谷，四下里听

不到半点人声。有一次完成任务转移时，带路的瑶人挑着行李在前面走得不见影子，两人走到一处，前面陡峭的山路被一股从山顶泻下来的山水挡住，没了去路，下面是看不见底的深渊，这时王同惠简直累晕了，只好坐在山石上停一停再说，约莫有十分钟光景，“才气吁吁地把两手抓住了块怪石，像狗一般地爬了过去”，这样的旅行真让人心惊。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不正是因为有了这险恶的山岭，几千年来在汉人欺压下辗转南迁的瑶人，才得以维持独立，没有这天险，哪里还有瑶区呢。

来到瑶区，他们除了体验到行路难之外，还真切地感受到瑶族同胞的智慧、热情和善良。在那里他们看到一片片一层层依山势种植的稻田。要知道，在山上种水稻，最大的问题是灌溉。聪明的瑶人用祖宗传下的办法，把半片竹管连起来，接上泉源，通到田里。叔叔认为当地的汉人，如果能把“这种简单轻便又经济的灌溉方法学得了，一定能使很多广西的荒山，成为有出产的熟地”。除了灌溉，“瑶山中可以使汉人学的地方还多着呢。”

一到王桑，村里人知道有客人来了，纷纷带了米来问候，原来按照瑶民的规矩，客人吃的米是由全村人供给的，他们被瑶胞亲切、热情的欢迎感动了。瑶人都很有礼貌，彼此间也很和气。天黑了，屋里点燃松木条取光，“松木燃着时，放出一种让人想到年景的香气，融融一室，主客欢笑”，让多年没有回过乡的叔叔，“在这种香气中，更觉得人情的深厚了”。

晚饭时王同惠煮了带来的香肠、腊肉，村长温了自酿的白酒，大家“围坐一桌，主客倾杯，真是一见如故”。酒至半酣，村长端着酒杯介绍说，我们这里不用怕丢东西，晚上睡觉开着门，不用担心。村里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打架相骂的事。接着开始猜拳……这顿饭叔叔“喝得有些醉意了”，在醉意中，他把来意向主人说明白，并且得到允许测量他们人体的承诺。

饭后，他们被安排在一间房间里住宿。其实瑶人是很忌客人夫妇同居的，这是他们的一种禁忌，但是因为找不到地方，叔叔又一再说明，不破坏他们的规矩，这才迁就过去。

他们在王桑工作了3天，然后转移到门头村，又从门头来到了六巷。因为六巷乡是花蓝瑶聚居的地区，所以他们除了对村里的情况作了比较细致的调查，还以这里为基地，白天出发到周围的大橙、古浦等村寨做调查，晚上回来。他们在六巷住了25天。

由于叔叔和王同惠十分尊重瑶民，态度诚恳、和蔼，又处处遵从瑶民的风俗习惯。比如与年长的人谈话时会客气地问对方：“老爷，你多大啦？”对瑶民来说，只有对亲近和受尊重的人才称“老爷”；一有空，叔叔就和他们坐在一起抽烟、喝酒、拉家常，很快就取得了瑶族同胞的信任。尤其是和房东一家更建立起了亲切、友好的关系，王同惠还和蓝妹国结成“老同”，老同就是亲密朋友的意思，相当于我们汉族的“干姐妹”吧。在《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里，有一张叔叔给她们两人拍的照片，照片里王同惠和蓝妹国手拉着手，王同惠亲切地搂着蓝妹国的肩膀，流露出浓浓的姐妹深情。

王同惠说，“蓝夫人是一个很和蔼，很好说话的人，只可惜她不会讲官话，我又不会讲瑶话，所以她见了我，总是拉拉我，拍拍我，笑嘻嘻地不说话……每次在孝通离去的晚上，临睡时都要来看看我……站在我面前，向我笑笑，摸摸我，过一会便走了，去时还要把门给我关好。我明白她是来看看我平安不平安，闷不闷。”

有一次，“孝通到大橙去了两夜，第三天回来，连衣服带被褥都湿得一塌糊涂。这条路连瑶民都说难走，回来的第二天便病了。”蓝妹国和她的丈夫蓝济君得知后，便来为病人“捉鬼”治病。蓝济君“到正屋里端了一碗饭，拿着三支香，他的夫人后面跟了他，拿着几张火纸。他先到孝通床前，把饭放在地上，把香点着，告诉我，等他一出去，立刻要把门关上。他又把饭端起，拿了香便出去了。我照他说的急急把门关上，跟了他出去，他到外面把火纸点着，口里念叨着把饭泼在地上，将三根香插在纸灰后面，站起来很肯定地对我说：‘不要怕，明早就好了。’”说来也巧，第二天，病人的症状果然有所减轻，蓝济君夫妇知道后很是高兴，“自觉做了件慈善事业，救了一个人。”



叔叔带领我和张勤肃立在王同惠纪念亭的石碑前。

他们在六巷对花蓝瑶调查告一段落后，去了古陈，就在离开古陈向罗运转移时，发生了一死一伤的惨剧！调查工作被迫中断。

转眼间 53 年过去了，今天重访六巷，叔叔又踏上这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见到当年的老房东，我想，两位老人的心情一定非常激动。然而，我看到的只是他们那历尽沧桑的脸庞上平静的笑容。由于语言不通，两人没有说什么，只是目不转睛地瞧着对方，紧紧地握着手，通过眼神，他们都懂得对方要说的话。

除了蓝老太太，当年的老朋友多已作古，但是叔叔见到了帮他挑过行李，带过路的阿荣的儿子和捐过白布的盘公西的孙儿。叔叔把从北京带去的毛毯和糖果分送给蓝妹国和其他朋友。

下午两点，当地同志陪同我们来到离乡政府不远的一座小山岗前，叔叔整理了一下衣服，神情肃穆地一步步登上耸立在山冈上那座完全是汉族形式的亭子——尖顶、飞檐、绿瓦、红柱。亭子正面檐下的牌匾上，端端正正地写着“王同惠纪

①“王同惠纪念亭”由六巷乡群众自愿筹建（得到了县政府、部分干部职工、罗运转村群众、有关知名人士捐款支持），于1985年11月27日建成。当孝通叔叔得悉后，致信当地政府表示感谢，信中说：感谢你们建成“王同惠纪念亭”。这是瑶族同胞对我前妻和我本人最大的荣誉和亲切的鼓励……研究少数民族同胞的历史和社会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在研究过程中由于我的粗心大意，延祸我妻，是我的过失。瑶族同胞当时救了我的生命，又出力运送我们出瑶山，此情此意，我一刻难忘。值得纪念的正是你们对我们科学工作者的爱护，瑶汉两族人民的同心同德。请你们把我这番意思转告当地的瑶族同胞。我一定继续努力，为少数民族的进步和繁荣作出我的贡献，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深情厚谊。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第85页，《王同惠女士考察大瑶山始末》温永坚著。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8年。

念亭”^①六个大字，纪念亭正中树立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纪念碑文：

王同惠女士，系河北省肥乡县赵寨村人，生于191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

1935年10月，王同惠女士同其夫费孝通先生，应广西省政府特约，从北平来到广西象县东南乡（1952年后属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进行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工作中勇敢警奇，深入群众，夜卧土屋，日食淡饭，为瑶族人民所称道，12月16日，在由古陈村转移罗运乡途中，因迷路误入阴森竹林之中，费孝通先生误踏虎阱，被石头压伤。王同惠女士奋不顾身把石头移开之后，即出林呼援，不幸失足坠崖，为国捐躯。时年二十三岁。有遗著《花蓝瑶社会组织》存世。

王同惠女士为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把芳年华献给了瑶族人民。兰摧玉折，淑德常昭。我乡瑶族人民，为纪念其高尚精神，特建亭树碑铭志，以流芳千古。

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人民敬立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当地同志介绍说：站在纪念亭前向左看，可以望见当年费先生和王同惠进山的道路；右前方远处，是巍峨的五指山和莽莽林海，那里是王同惠遇难的地方；正前方就是六巷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费先生疗伤的那户人家……在主人的讲解声中，我似乎看到了叔叔和同惠婶婶足蹬长统皮靴，身背简单行囊，浑身焕发着青春活力，相互搀扶，正行进在瑶山崎岖陡峭的羊肠小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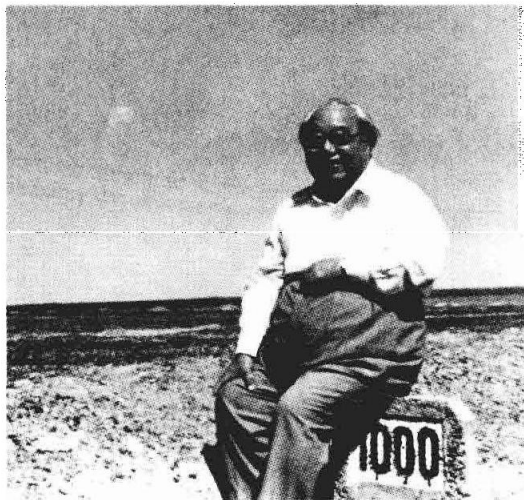
叔叔在亭前献了花篮，肃立默哀，然后和当地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十九、“哪儿穷就去哪儿”

记得这是叔叔在兰州召开的“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研讨会”上说的一句话。20世纪80年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迅速崛起，各行各业都感到专业人才不够用。然而这个时候的西部地区，由于种种原因“醒得早，起得晚”，还处在相对保守、封闭的状态里，经济发展缓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出现了西部人才大量流向东部的现象。叔叔一直在思考怎样缩小、消除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差距，扭转“孔雀东南飞”的局面，简单地说就是要把西部的经济发展起来，让老百姓尽快富裕。

从1984年开始，叔叔接连到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地考察，希望找到一条使西部崛起的途径。他在内蒙古赤峰，看到由于滥砍、滥牧、滥垦、滥采，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破坏，造成“自然生态失调”，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农牧业之间的矛盾。所以要把赤峰的经济搞上去，除了大力治沙、防风、种草、种树，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之外，还必须注意改善农牧之间关系，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路子。

叔叔又考察了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他认为包钢虽然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个大型国营企业并没有与当地经济联系起来，没有带



▲ 这是在甘肃省距离兰州市1000公里的戈壁滩拍摄的。

动起内蒙古地区的发展，形成贴不拢的“两张皮”。更糟糕的是，由于企业自身封闭的体制，迫使它不仅“包钢”，还要“包人”，也就是不得不安置几十年来不断增加的人员，企业除了生产，还要负责员工的生老病死，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导致企业设备老化、工艺落后，又无力更新，生产效率不断下降，患上“人文生态失调”的毛病。

怎样调理？叔叔开出的药方是包钢必须转型，走改革开放的路子，以开放代替封闭，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让企业和地方这两张皮贴在一起。其实叔叔说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失调的毛病，似乎是整个西部地区的通病。

叔叔在赤峰考察的时候，听说有个“西海固”，是西北最贫困的地区，其中甘肃的定西，历史上被人称作“陇中苦甲天下”。他想，要了解西北干旱地区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状况，就去一个最苦的地方看看，于是选择了定西作为研究的一个点。1984年9月，他第一次踏上定西干旱的土地，开始了在甘肃省长达20年的跟踪观察。

这些年来，叔叔跑遍了甘肃14个地、州（市）中的12个，拜访了居住在那里的藏、回、东乡、保安、撒拉、裕固等少数民族同胞。叔叔说，他一辈子的梦想就是中国老百姓能富裕起来，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哪儿穷就去哪儿，为的是为那里的老百姓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他还用“少壮东南走，老马西北行”这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要经常来西部地区调研的决心。

来定西之前叔叔只是听说那是个“苦甲天下”的地方，来了之后，这里干旱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确实给生长在江南水乡的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家乡河湖密布，出门要坐船，小时候从同里到苏州要摇半天的船才能到，对我来说，水是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到了定西，我才第一次看到一家人全年的用水，要靠积存在水窖里的雨水来供应；家里富不富，竟以拥有多少个水窖来作标准。在这里还第一次看到为了减少水分蒸发，耕地里压上一层卵石，庄稼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奇特现象。”

定西这个地方十年九旱，有很大一部分土地并不适宜种粮食作物。但是长期以来，政府实行“以粮为纲”的政策，所有能种东西的土地，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都得种粮食。定西老百姓不得不把原来适合长草的地方，开垦出来种粮，结果粮食收不了多少，却破坏了植被，最后造成这一地区 2/3 的农民温饱无法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摒弃了过去的错误观念，懂得了要按自然规律办事的道理，但是怎样才能根据当地条件，找到一个突破口和有效的办法来改变当前以种植业为主的封闭自给性经济呢？叔叔建议定西的干部，要学敦煌壁画里那个“飞天”，思想观念来个“‘反弹琵琶’，来一次意识领域的革新。要确认自然条件和商品经济规律是决定利用土地的原则”。

在村里访问时，看到有的人家开始养猪、养羊、养鸡、养兔搞起家庭牧业，收入都有了明显增加。他认为“这或许反映了定西发展商品化畜牧业生

▼
1985年叔叔第二次赴定西考察时，与当地同志座谈时的情景。



产的必经之路，即由农本牧业到半农半牧再转向牧本农业”。

他还走访了定西城里的敬东机器厂，以及电焊专业户、榨油专业户、磨面专业户，对那里的乡镇工业进行调查。后来和当地领导同志座谈时他说：“定西的贫困已很久了，现在还没有达到自给，今后不要只从粮食上死作打算。要打破定西经济结构的现状。种草种树是对的，是第一位的任务，但同时还要求转移，要转到工业方面去，转到服务方面去……围绕一个大的企业形成中心，如服务中心，草粉加工中心。”按照叔叔的经验来看，定西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扶植、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如果乡镇企业壮大了，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事情就好办了。他听说这里胡麻的种植面积很大，老百姓把胡麻籽拿去榨油以后，秸秆都当柴火烧了。其实这种胡麻是一种亚麻，胡麻秸秆还可以加工成亚麻，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他想按照家乡的办法帮助定西办一个亚麻厂，于是就请哈尔滨亚麻研究所的专家来帮忙（因为种种原因，办亚麻厂的想法未推广开来）。他还鼓励和帮助定西的干部到无锡、苏州这些发达地区去考察、学习，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自此，叔叔多次到定西访问，和那里的同志建立起联系，结

▼
叔叔对定西县石家岔小流域治理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下了深厚情谊。

2003年，93岁高龄的叔叔提出要去定西看望老朋友，看看他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变化。8月底，他再次踏上甘肃的黄土地。抵达兰州的第二天就安排去定西。上车出发的时候，下起了大雨，在干旱的西北遇到雨水，大家的心情都很高兴。在车上，一位同行的同志说：“费老，今天是您第七次去定西了，

也是您第十一次来甘肃。”“是吗。我第一次来是20年前的事了，比起来，现在去定西方便多了，你看这路又宽又平。”叔叔回答说，全车的人听了都会心地笑了。

这次访问定西，时间不长，叔叔除了和定西的干部座谈之外，还在回兰州途中，冒着大雨拜访了岷口镇岷口村农民王明的新家。岷口村紧靠高速公路旁边，由于交通方便，一到马铃薯收获的季节，这里就变成一个马铃薯交易的大市场，于是有人在这里开起了淀粉加工厂。这个村的农民靠着交通和地理位置的优势，搞运输、做生意，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王明说，他家四口人，有五亩耕地，其中三亩退耕还林种了树，两亩种马铃薯，退耕还林的三亩地，每亩一年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200斤粮食和20元的补助，另外他还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他家去年人均纯收入2100元。现在富裕了，盖了这幢243平方米的二层楼，家里彩电、电话、家具样样都有。说话间，女主人端出一大盘刚出锅的土豆和老玉米，热情地请大家尝尝鲜。

临别时，王明取出纸笔，请叔叔为他们家留个“墨宝”，老人家痛快地答应了，来到桌前，提笔写下“全家福 费孝通九十三岁”十个大字。据我所知，这几个字应该是叔叔为一家普通农户写的最后一幅题词了。写完字，王明请叔叔到厨房“参观”，进屋后，他径直走到一个水池旁，打开上面的水龙头，一股清水哗哗地流出来。原来他在水窖里安装了一个电动抽水机，用水的时候，插上电源，水就抽上来了，王明笑着说：“费老，我们也

▼
在王明家“尝鲜”。



用上自来水了。”水窖就在院子的地底下，有50立方米。王明打着伞站在院子的雨地里，拉着叔叔的手说：“你老人家从北京大老远跑来看我们，老天爷都高兴啊，你看”，他指着大门边的地上一个打开了盖子的洞口“这是水窖的进水口，瞧，这雨水流得多欢！”大家听着都乐了。

这次访问定西，连来带去也就七八个小时，不过时间虽短，却在叔叔心里有着一定的分量。在回京的路上（途中又访问了西安和杨陵农业高科技示范区），他几次对我说起这次“定西行”给他留下的印象，并要我把他一路讲的话整理出来。他告诉我，定西的变化真的很大，20年前，那里有2/3的农民饿肚子，现在贫困面下降到了4.2%，地方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提高，定西地区也要升格为定西市了。这些年来，他们不再死守着种粮食一条路，而是遵循自然规律、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发展起适合这里生长的马铃薯、畜草、中草药、食用菌四大支柱产业，畜草的种植把养殖业也带活了，定西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调整。但从整体看，定西在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回京后，我把他的讲话整理好，并且琢磨了个题目：《大变则大效 任重而道远》，交他审阅。没过两天，稿子还给了我，上面批了几个字——交《群言》杂志发表，再往下看，原来的题目被圈掉，改成《又一次访问定西》，此外有几处用词不当或说得不清楚的地方都用铅笔改过。像往常那样，我一边看，一边细细体会他删改的道理。在文章结尾，叔叔加了这么一段：“我第四次去定西的时候说过……这次来和我第一次来，感到定西的变化太大了，要是定西以后的变化还是这样大，我也就可以不再来了。如今定西的乡亲们已经把定西建设得越来越好……它的变化令我这老人目不暇接。所以我可以‘不再来’了。”

不想这话竟成谶语。老人家回京后不过三个月，竟一病不起，真的再也不能去定西了。然而，可以让老人家感到欣慰的是，他提出的“反弹琵琶”的主张已经结出果实，让定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他所去过的那些穷地方，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提高。

二十、广宗扶贫

为什么叔叔如此钟情定西？我想，是因为他有一颗“志在富民”的心，要用自己的知识，为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找一条尽快富裕起来的路子，这样一个心愿激励着他，所以哪里穷他就到哪里去。当然他关心的不仅仅是定西一个地方，而是全国的贫困地区。比如四川大小凉山、贵州毕节、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山东沂蒙山区……都留下他的足迹。他不仅自己关注贫困的农村和农民，同时还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参与扶贫工作。在担任民盟中央主



▶
与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天（左）、秘书长吴修平（右）一起研究工作。



▲叔叔坐在一处空地的长条凳上，听村长介绍情况。

席期间，他把扶贫作为民盟的重要工作来做，动员、鼓励全体盟员为消除贫困贡献自己的力量。

1991年，叔叔听一位住在民族学院宿舍的邻居说，改革开放十多年了，他的老家，离北京不很远的河北省广宗县，一直还没有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这位朋友无意中说的话引起了叔叔的注

意，他想，能不能发动民盟的智力优势，联合社会各界力量，把广宗县作为试验点，找出一个帮助地方脱贫的具体办法来。于是他决定亲自到广宗走一趟。去之前，他要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收集一些资料。临走时我问他：“听说县里接待条件比较差，你有什么要求？”他笑着说：“只有一条，看看马桶是蹲式的还是坐式的。”到广宗县以后，除了和当地同志商量老先生考察的行程，要了一些资料之外，我特别注意了招待所卫生间里的马桶，发现那里的马桶都是蹲式的。临走时，县里同志问我对接待方面有什么要求？我说，费老年事已高，身体沉重，蹲下站起，比较困难，请他们把老先生用的马桶改成坐式的。县里同志说：“这个问题好解决。其他方面呢？比如饮食上有什么要求？”我说：“老先生不吃辣，一吃辣就咳嗽。除此没有什么别的要求。”那位同志又说：“我们县食宿条件比较差，没有高级领导同志在这里住宿过。据我所知，只有一位局级领导来过，当天就回地区了，没在这里过夜。费老是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不但要到我们这里来考察，还要在这里住宿，对广宗来说可是件大事！我们一定会把接待工作做好。”

广宗县位于河北省南部，相传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到山东海滨视察，回京途中死在广宗县沙丘平台。由于古河道变迁，留下了一条纵贯南北的百里沙带，历史上这里就是一个地薄、民穷、灾多的地方。严重的干旱、资源的匮乏，一直困扰着当地的经济的发展，1986 年被确定为全国扶贫重点县。1990 年全县的人均收入仅 300 多元；213 个行政村中有 52 个村人均收入在 201—300 元，12 个村在 200 元以下。1991 年 5 月，叔叔赴广宗考察。经过石家庄的时候，河北省领导同志考虑到县里接待条件差，老先生年纪大，怕出问题，就极力劝阻他不要在县里过夜。叔叔认为条件差一点没关系，自己经常下乡，比广宗条件更差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去过，再说已经答应地方同志的事，仅仅因为“条件差”就改变计划，这样做是不尊重他们，计划还是不变的好。可是省领导同志仍然不放心，最后几经协商，双方“妥协”各让一步，把原定在县里住四晚的计划，减少到只住两晚。这天一早，从石家庄出发，汽车行驶两个来小时后抵达广宗县政府。稍作休息，叔叔就到会议室听县领导同志介绍情况。下午，去西关村参

观龙飞印染厂和东马鲁村裕东淀粉厂等几家企业。第二天访问大东村。这个村 1990 年的人均收入仅 150 元，是县里数得着的贫困村。由于村子里没有能够容得下十几二十人的大房间，叔叔就坐在一处空地的长条凳上，听村长介绍情况。村长说完以后，叔叔起身走进一家农户，一进院子，看见一个小女孩正在打

▼
“你的手真巧，能教教我吗？”小姑娘仍不作声，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竹帘子。小姑娘看到这么多人进来，抬头瞥了一眼，木然地低下头继续干她的活。叔叔走到她身边轻声地问：“小朋友几岁啦？上学没有？”小姑娘双手熟练地拨弄着线锤，一声不吭。叔叔又说：“你的手真巧，能教教我吗？”小姑娘仍不做声，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村长连忙过来回答：“孩子十岁了，没有上学。”接着又补充一句：“她要不打帘子，她妈就会打她。村里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在家打帘子。”说完，接过小姑娘手里的线锤，边操作边讲解编织竹帘的方法。叔叔爱惜地抚摩着小姑娘的头，默默地听村长介绍，过了一会儿才向村长打听，村里有多少户人家打竹帘？销往哪里？竹子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人一天能打多少张？一张能赚多少钱……

告别小姑娘，叔叔走进另一家农户。这家狭窄的屋子里，摆着一架老式的织布机，主人说这架织布机织的布，是供自家用的。叔叔感慨地说：“这是一种我祖母曾经使用过，在我母亲一代已被淘汰的织布机，没想到今天在离石家庄这样一个大城市只有两个小时路程的地方又见到了。”出了村，叔叔又察看了大东村的小学校和庄稼地。

在返回招待所的路上，叔叔特意让车停下来，下车走到公路边的沙地里，抓了一把沙子放在掌心，用手指捻着这又白又细的沙子，细细地看，若有所思……

由于考察时间缩短了一半，两天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但是还有不少原定要去的地方来不及去了。临别，在与县领导同志座谈时，叔叔说：“通过这几天的考察，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广宗县给我的印象是当前还比较贫困。这里自然条件比较差，气候干旱，土地瘠薄，农业基础薄弱，社会经济还处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中，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对广宗县来说，如何发展农业，解决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其次是如何发动广大群众，大搞副业生产，让家家户户增加收入，老百姓手里有了钱，才有集资办乡镇企业的条件。作为干部，我们一定要争气，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共同治贫。这里遍地是沙，要想办法‘沙里淘金’，在沙子里做文章。我相信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

一定会想方设法利用这些沙子的，办法就在群众中间。”接着他从打竹帘子和老织布机说起，分析了广宗县发展跟不上形势的原因，希望干部们改变旧思想，树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观念。他说：“大东村有打竹帘子的传统，不要看不起这样的小事，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打帘子的农户改进技术，比如组织技术人员，发明一种简单的机器，把现在一天打一二张提高到十几张、几十张，那么，一天赚一二元钱就变成赚十几元、几十元了。我听说，村里的帘子是由两家个体户帮着销售，又由他们买来南方的竹子作原料；我又听说，眼下四川质优价廉的帘子已经威胁着这里产品的销路。作为‘父母官’，我们要为老百姓着想，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由政府出面，把他们组织起来，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原料来源和销售渠道，帮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说不定打竹帘就能成为这个村子脱贫致富的一条路子。一个贫困地区，只要上了路，用不了几年就会大变样。作为贫困地区的干部，眼睛不能只向上看，一味指望国家给钱。国家帮助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是要向下看，组织农民从他们熟悉的副业生产入手，使全县的劳动力转变成生产力，让千家万户真正增加收入。”最后，叔叔建议把广宗县作为民盟扶贫工作的联系点，发动全盟力量为广宗县脱贫致富做些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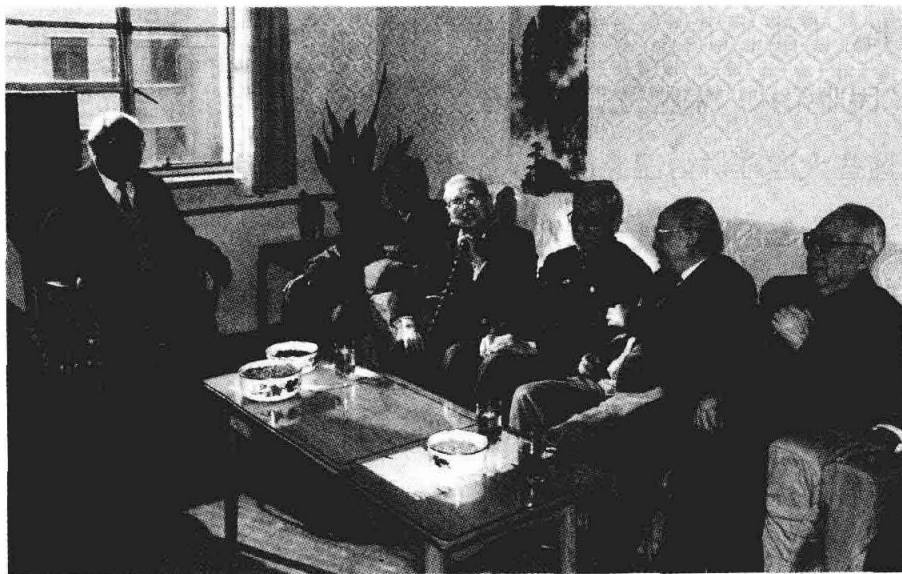
回京后，他向国土开发建设基金反映在广宗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广宗县前两年打的81眼机井，因为缺乏资金，不能配套，至今无法使用，如果再拖下去，这些机井就可能报废了。国土开发建设基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派人到河北与省农行、民政厅等部门协调解决了这个问题。

民盟把广宗县作为扶贫联系点之后，民盟河北省委会雷厉风行，立即成立了以名誉主委、农业专家王健为首的广宗科技脱贫工作组。工作组遵照民盟中央提出的“讲求实效，从小到大，立足务实”的精神，以大东村为试验点，组织专家对该村的土壤、气候、作物种植等情况进行调查，然后“对症下药”提出了更换小麦品种、改变种植方式、发展节水栽培和旱作农业的一整套改进方案。专家们的一系列措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二年，大东村的小麦、

玉米产量有了显著提高，这套措施很快在全县推广开来。

叔叔提出“沙里淘金”的想法，得到了县里同志的认可。他们与一位叫张建勋的人联系上了，这个人多年来一直用本地沙子作原料，烧制一些小工艺品，利用沙子有一套经验。县政府积极促成张建勋和山东济南黄河建筑陶瓷厂合作，于1993年在广宗建起了一家用沙子和黏土为主要原料，年生产22万平方米釉面砖的冀鲁建筑陶瓷有限公司。叔叔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1994年，他二下广宗，亲临工厂视察，当了解到工厂在经营、管理、技术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的时候，就指示民盟河北省委，请唐山的陶瓷专家来广宗指导。

叔叔虽然工作忙、头绪多，但是一直惦记着广宗县的釉面砖。1994年底，他要我专门去广宗了解一下，吩咐我一定要到陶瓷厂看看。一到县里，我就赶到陶瓷厂。听厂长说，唐山的专家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釉面砖的质量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目前年产量达到30万平方米，销路也很好，年产值300多万元。但是目前生产的是大路货，档次不高，不论是技术、



与民盟中央的老同志在一起
(左起依次为费孝通、叶笃义、李文宜、马大猷、钱伟长、闻家驷)。

经营还是管理上，仍须不断提高。

离开陶瓷厂，我又去了大东村。村长见到我很高兴，把我拉到村公所，指着挂在墙上的相片说：这都是那年费老来时照的，他老人家可好？费老来了以后，河北省民盟把我们村作为扶贫联系点，派来专家、教授，送来优质种子，帮助我们改进耕作技术；县里又派人来打了一眼深水井，全村的水浇地扩大到350亩，实现了人均一亩水浇地的目标。去年虽然旱得厉害，粮食亩产还达到800斤，被评为“粮食生产示范村”。费老特别关心的打竹帘，也用上了机器，效率比原来提高了十倍，因为帘子生产得多，用线量大了，村里一个小伙子腾出一间屋，自己出钱办起了一家“合线厂”，专门供应编帘子用的线绳。1993年全村生产帘子8万张，产值60万元，赚了15万，仅这一项，全村人均收入就有200元。眼下，民盟又派来技术员帮助我们种蘑菇，十来个塑料大棚已经搭起来了……

回京后，我向叔叔作了汇报，他拿起我带回来的釉面砖，像一件艺术品那样，翻过来掉过去地“欣赏”，显得十分高兴。后来，在一次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通气会上，他把“广宗釉面砖”带到会上，用实物作例子，向党中央汇报了广宗县的状况和民盟的扶贫工作。

1995年，为了总结、推广扶贫工作经验，民盟中央在石家庄召开了有河北、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吉林、甘肃、韶关八省一市同志参加的“民盟帮扶广宗脱贫工作现场会”。叔叔在会上说：“扶贫工作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些大道理讲得已经很多了，大家心里也都已经清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做，怎样落实。我们就把广宗作为一个例子，看一看民盟这几年在广宗做的工作里面，有什么是好的，值得其他地方盟组织学习，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还有什么应该注意的问题。”会议期间，他要大家到广宗去看看，了解情况，想一想还能做些什么事。来自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同志表示，他们将根据各自的优势，在信息、技术、商品流通等方面给广宗以支援。

四年来，广宗的确起了不小的变化，据统计，与开展扶贫前的1990年相

比，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农村人均收入增长60%以上，达到624元。叔叔说，他第一次去广宗县的时候，看到马路坑坑洼洼，招待所的条件也很差。可是1994年第二次去，那里已经有了一座漂亮的宾馆和平坦的马路。这反映出广宗县的经济有了提高。

民盟在广宗县开展扶贫工作的举动还引起日本、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朋友的关注。日本饭山市日中友协理事长高主精一认为这是“振兴农业的富民良策”，新加坡凌美公司董事长庄智升表示愿意在生产信息方面对广宗县提供帮助……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叔叔毕其一生，潜心研究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同。有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使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新尝试。乡镇工业的成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1994年，菲律宾政府因为叔叔提出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建设，“为中国空前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向他颁发该年度的拉蒙·麦克赛赛“社会领袖奖”。该奖项提供了一笔经费，要求获奖者用这笔钱做一次学术调查，并将调查报告提交该奖基金会。调查报告除文字叙述外，还要提供有关的音像资料。叔叔就用在广宗县调查的资料撰写了一份报告，同时派我和一位搞摄像的同志，到广宗拍了一些电视镜头，编辑后，一并交了上去。没想到默默无闻的广宗县，竟然走进了国际学术殿堂。

1996年，叔叔第三次赴广宗视察，对民盟的扶贫工作作了进一步安排。事后我问他：“广宗的扶贫工作已经搞了四五年，怎样才算完成了？”他说：“民盟做的这些事，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对广宗的工作会有些帮助和推动。但是，一个地方能不能搞好，还得靠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靠他们自己实实在在地做起来，外边的人只能帮忙推一把。”

的确如此，广宗县20多万人民要彻底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要靠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工作做好。但是一个包括党政有关部门、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帮扶脱贫的局面正在形成。



◀ 拉蒙·麦克赛赛颁奖现场。



◆ 由于叔叔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1980年美国国际人类学学会授予他该年度马林诺斯基荣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1988年获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奖（中图）；1993年获日本福岡年度亚洲文化大奖（下图）；1998年获年度“霍英东杰出奖”等国内外多个奖项。

二十一、希望一生中能够亲自去拜访中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

▼
叔叔自幼喜爱写作，14岁时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学生时代他一直是编辑出版校刊的积极参与者。在东吴大学时，他是东吴大学学生会秘书、校刊通讯秘书。图为叔叔（左四）与校刊同事们合影。



叔叔从小喜好写作，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屡经战乱，早年习作多已散失，所以《费孝通文集》里只有10多篇他少年时写的文章，里边有一篇14岁时写的《读陈龄君通讯感》，其内容是希望通过讲述吴君在困苦中艰难地坚持上学读书的事，来鼓励同样遇到困难的陈龄“把你健全的身体在阻力中猛斗！猛斗！切不可退步！”其实他与陈龄并不相识，只是读了陈龄在《少年》上自述式的通讯以后生出了同情心，写了这篇文章。

1928年，刚刚年满17岁的叔叔，在《新年的礼物》里讲述了一对小姐妹，在置办新年礼物的途中，遇到一个被冻得发抖，说不出话的老人，当他们把老人

送回家时，看见在一座草屋前，一个老太婆倚在门前哭丧着脸，在那里候着，原来他们的儿子已经给官兵们拉去充夫役，听说已经死了。姐妹俩觉得他们苦极了，只剩两个老人，怎样能够快快活活地过新年呢？于是把准备买新年礼物的两块钱留给她们，作为赠送她们的礼物。在学校迎新年的联欢会上，小姐妹报告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她们的行为受到了校长的赞扬。校长说：“新年的快乐，本来不是少数人的，应该使得全人类都快乐，尤其是穷人和老人……”

接着在回味过去一年情形的《年终》里他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关帝庙的时候，一阵狂笑声引起他注意，原来有四五个小土棍正在“作弄一个挑剃头担的小工”，剃头担已经半翻在地上。面对这伙小土棍，孤立的小工成了毫无抵抗力的屈服者，只好流着泪，在小土棍和一群瞧热闹的人的哄笑声中，默默地走了。他看着这一幕，气得“全身发着愤怒的战栗”，心也“沸突”起来，紧捏拳头，真想冲过去帮小工一把。但是他和那个小工一样柔弱，他只能用手中的笔来表达自己的同情。

从这些文章里，我看到了一个疾恶如仇、同情弱者、乐施好善的少年费孝通，这就让我懂得了为什么现在的叔叔能关爱身边的亲人、周围的朋友，进而爱故乡，爱祖国，爱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乃至爱全人类！他希望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服务，为老百姓谋幸福，在人类社会学这个领域里孜孜矻矻探索了一辈子。

在叔叔初入学术殿堂的时候，正是人类学这门学科，让他与瑶族同胞有了亲密接触，瑶族同胞受到的苦难叫他感到“心中很难过”，从而对历史上汉族统治者迫害少数民族的行径深恶痛绝，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历史一直有反感”。他常说，从历史上看，汉族依仗自己的强大，把少数民族赶到了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深山老林里，限制了他们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汉族对他们欠下了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宪法上作出明确规定，消灭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主张各民族间坚持平等、互相合作以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实现了各民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1950年，叔叔作为中央访问团贵州分团和广西分团的团长，参加了以宣传新中国民族政策和对各地少数民族进行初步调查的工作。代表团翻山越岭，穿林涉水，深入黔桂两省少数民族的村寨，每到一地就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文工团表演节目，把带去的粮食、药品、衣物分发给穷苦的村民，访问团的活动，让他再一次目睹少数民族同胞的贫困和艰难。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制定出来了，但是在贯彻执行时，碰到许多具体的困难问题，比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要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这就得知道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少数民族？他们的人数有多少？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些问题，由于解放前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对大多数少数民族缺乏正确的了解，所以没有留下什么资料可供参考。于是新政府组织了工作组，开展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叔叔是被邀请的专家之一。

工作组主要是遵循毛主席关于民族工作的精神和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来进行民族界定。当时全国自报上来的民族有400多个，这明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们就按照斯大林的理论来处理，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一个民族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意识，但是实际情况是纷繁复杂的。比如要有共同的语言这一条，事实上就不那么简单，有时会出现历史和现状纠缠在一起的情况。有这样一件事：在川甘边境，居住着被称作“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的少数民族，1951年被暂定名为藏族。国庆15周年时，该族的一位女同志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问她是哪个民族，她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旁边的人代她回答“是四川白马藏族”。后来毛主席接见她的纪录影片在她的故乡放映，大家看了以后，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对这个族名却产生了异议，认为自己不是藏族。为了搞清楚这个“白马藏族”，工作组派人下去调查。正好这时候，叔叔看到一位朋友写的书，书里有一段谈到这一地区的历史，作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发现这里曾经被藏族征服过，这一地区的土人逐渐融合到藏族里去了，所以语言上受到藏语

的影响。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不论从历史还是现状上看，“白马藏族”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确有差别，这种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同时也看到他们在宗教信仰等方面与藏族也有不同。这些事实可以表明，“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还比如，贵州西北部有20多万被当地汉人称为“穿青”的人，他们过去讲一种与当地汉人不同的“老辈子话”；有自己的聚居区和不同于当地汉人的信仰、风俗习惯。如果按照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要素”乍一看，穿青人在这几个方面，似乎都符合构成“民族”的标准，可以算是单独的一族。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叔叔他们先从分析“老辈子话”入手，发现这种话和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方言有渊源；然后又从地方志书、穿青人的家谱、墓地的碑记、文物的记录、民间的传说等方面加以研究，终于搞清楚了穿青人的来龙去脉，从而证实他们是早期从贵州以东诸邻省进入的移民，原是汉人中的一部分，自从进入贵州之后并没有和汉族隔离，没有独立发展为一个民族。

同甄别穿青人没有发展成一个民族一样，识别工作也要用事实证明，某一人群具备了构成单一民族的条件。虽然民族识别工作意义重大又很复杂，但是经过我国民族工作者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确认了我们现在熟知的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这项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但是我国少数民族的状况十分复杂，而且和民族心理、政治，有的甚至和国际斗争因素联系在一起，所以遗留下来的问题还不少，据说至今还有要求确认其少数民族地位的人。叔叔曾经因为民族甄别工作，引起过个别人对他的不满。

从民族识别工作中，叔叔深切地感到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知识实在太少了，必须赶紧补上，于是向有关部门提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够抽调力量，对每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整理记录下来。这个建议得到了领导的认同。如今，经过民族工作者几十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有了一部简史，这项工作已经搞出个模样了。

正当叔叔准备对民族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时候，1957年的反右运动

把他打入了另册，所有学术活动戛然而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终于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综合国力有了提升，大部分老百姓开始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的日子。但是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同胞，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再加上自然条件严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至今仍处于封闭、经济相对落后的状态中，生活十分贫困。

叔叔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各民族“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的原则，不允许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的状况继续下去。他常说：过去汉族统治者欺压少数民族，欠下了债，现在到“还债”的时候了。中国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大鱼帮小鱼”，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怎么帮？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不仅要给政策，而且还要给以切实的帮助。当然少数民族同胞也要站起来，自立，走自己发展的路。汉族有责任从各个方面帮助少数民族改变现状，让他们跟上我们国家前进的步伐，因为“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能说已经完成”。

因为和少数民族有着一份特别的情怀，所以当叔叔恢复正常工作以后，民族问题又成了他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他说，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一直是他“下功夫下得最多的学术领域”，“算得上是一名老民族工作者”了。他曾经许下心愿，希望一生中能够亲自去拜访中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所以多年来，除了西藏和台湾外，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文革”结束后，叔叔原本想把主要精力放在民族研究上，但是一项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让他不得不先放下民族问题。1981年6月，叔叔接到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决定授予他该年度赫胥黎纪念奖章的通知，同时还接到当年在英国求学时的老师弗斯的来信，建议他在领奖时讲一讲自1938年以来江村的变化。为了准备这篇演讲，叔叔回家乡搞了一次调查，正是这次调查让他感受到了中国广大农村中涌动着的巨大力量，于是他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农村社区，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从农村上升到小城镇，再从城镇进入到对区域经济和中心城市的研究，但即使把研究重点放到了农村，叔叔仍然对“民族研究旧情未忘，



恋恋不舍”。

当叔叔的研究扩大范围，跳出江苏以后，把注意力一路沿海南下，一路进入边区，边区这一路正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当他来到边区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要去看望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

1988年，叔叔在兰州出席“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研讨会”之后，就到内蒙古有名的“骆驼之乡”阿拉善左旗看望蒙古族同胞。我也一起去了。在阿拉善，我们参观了一处用电力抽水灌溉而造出来的绿洲——腰坝，还去了著名的吉兰泰盐池。

吉兰泰离住地很远，这天我们分乘几辆“巡洋舰”（一种吉普车）上了路。其实，所谓的“路”，只不过是戈壁滩上两道被压出来的车辙。我和叔叔坐一辆车，他坐在副驾驶座上，这是他的习惯，说是坐在前面，视野宽，能看清楚外面的景物。我们顺着这样的路，在不见人迹的茫茫戈壁上行驶。突然，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昏暗下来，一团团乌云在头顶翻滚，紧接着，像是什么人猛地打开闸门，哗的一声，一场大暴雨从天而降，顷刻间，车窗外茫茫一片，就像老天爷用一道厚厚的灰色幔帐，

◀
参观腰坝

▶
从兰州去阿拉善途中，叔叔顺路考察了腾格里沙漠飞播造林的情况。

把我们紧紧地裹了起来，除了能看见车窗玻璃上的水流，咫尺之外，什么都分辨不清了。车队不得不停下来。当地同志说：“不要紧，这雨一会儿就过去。”果然，前后大约不过几分钟，大雨来得突兀，又忽地戛然而止，天空放晴。那位同志又说：“咱们快走，得赶在山洪下来之前通过这里。”

车队急忙赶路，速度明显加快了。刚驶出不远，不知是着急还是大意，前面开道车突然来了个侧翻，原来那辆车右边轱辘驶上了一个沙包，掀了起来，翻到一边。所幸无大碍，大家七手八脚把车扳过来，继续上路。快速行驶的车子颠簸得厉害，有几次，我被颠起老高，头都碰到了车顶，只得用力抓住车厢里的把手。一路上果然遇到几处湍急的水流，司机说：“再过一阵，这些水流就会形成从上边冲下来的山洪。”

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在招待所迎接的同志，纷纷过来向叔叔问候，生怕老先生有什么闪失。他却乐呵呵地说：“路上碰到了这里多年没有下过的大雨，很高兴。我是一路跳着‘迪斯科’来的。”大家听了不禁笑起来，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

蒙古族同胞豪爽、热情人人皆知，晚宴上，当款待贵客的烤全羊端上来后，主人割下一条嫩豆腐似的羊尾，用手掌托着献给叔叔，只见叔叔把羊尾送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当地同志介绍说：优质的羊尾又大又厚，像个盆子，是用来贮存营养的地方，割开来，里面是胶质脂肪，看上去就像人们说的“羊脂玉”；羊尾虽然是“油”，但吃起来有嚼劲，是整只羊身上最肥美的部位。按蒙古族同胞的习俗，宴席上第一块羊尾是要献给座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叔叔吃了第一块，作为客人，我也分得一份，可惜因不喜欢吃肥油，又不好推托，只得囫囵吞下，无缘品尝个中美味。蒙古人善饮也是出名的，可能客人年长又不喝酒，所以席间虽有人唱酒歌劝酒，但都很“文明”。我听说，等客人走了以后，当地的同志会接着喝，直到尽兴。

访问结束时，叔叔与阿拉善盟的同志进行座谈。他说，通过几天的参观学习，看到阿拉善盟并不是个很荒凉的地方，它资源丰富，已经开始现代化建设

了。吉兰泰盐场是个现代化的化工企业，是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工业区，而且发展势头很好。阿盟在开发利用盐、煤等资源的同时，也要抓紧实现牧业现代化。这里的蒙古族牧民可以把养骆驼、山羊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优势。把骆驼的品种改良好，在骆驼身上多做文章，形成有阿盟地区特点的民族经济。他建议当地政府尽快建立起小规模的一系列加工工业，比如“把驼毛在多层次、多种类的企业里进行深加工，创造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我们不能满足于卖驼绒、羊绒这样的土特产，这种买卖，说得不好听一点，是一种“殖民地经济”。

说到经营，叔叔认为，一般地说蒙古族同胞商品经济的观念比较淡薄。比如说在内蒙古辽阔的草原上旅行，旅客途经任何一个蒙古包都可以进去休息，有吃有喝，而且不用掏钱。这是因为历史上内蒙古地域辽阔，荒无人烟，人们在外旅行，会碰到很多困难，今天你帮助了别人，明天当你出门遇到同样情况的时候，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接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的风俗习惯。一下子让蒙古族牧民去经商摆摊，还不适应，要慢慢来。所以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蒙古族同胞“不能安于穿袍子、吃羊肉”的现状。要对得起祖先，跟上时代，努力把这里建设成现代化牧业的基地，“实现蒙古族的现代化”。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天来阿拉善路上发生的一件事：我们乘坐的中巴车正快速行驶在空旷、平坦的公路上，路两旁无边无际的戈壁，单调乏味，搞得我昏昏欲睡。车队平稳地向前行驶，突然车速慢了下来，最后还停住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紧朝前看，原来车前面拥挤着一大群羊，咩咩叫着正慢慢悠悠地过马路，不远处一位老乡站在路中央不慌不忙地吆喝着。几分钟后，羊群过去了，我们才重新上路。

晚上，看完电视新闻以后，叔叔一边用遥控器换台，一边问我：“今天过马路的那群羊你看到了吧。”我说：“看到了。”“你注意那个放羊的老乡了吗？”“没有。他怎么啦？”“很有意思。看他的样子，慢慢悠悠，自由自在，我想这个老乡放牧这么大一群羊，生活过得一定满惬意的。可是我们来

到这里，却讲什么工业化、现代化，商品经济，这样一来会打乱他的生活，你说他心里会高兴吗？”停了一会儿又自问自答地说：“不这样不行啊。”这天晚上，他的这番话，让我琢磨了好久。

叔叔希望拜访中国所有少数民族的美好愿望，其实是不好实现的，比如说，全国各地他到过的地方不少，但是台湾和西藏却没去过。没去台湾，是因为台湾当局不让他去。记得1988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个“立法委员”，为增进两岸学术交流，建议当局邀请费孝通和刘海粟访台。但是这个人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台湾当局始终不许叔叔访台。虽然叔叔没去成台湾，但是他希望和台湾同行聚会，拜访那里少数民族同胞的愿望，一天都没有放弃。1985年清明节，从台湾归来的袁晓园，在一次会上朗诵了一首诗，表达她复籍归国后的感受：

▼
在1998年“霍英东杰出奖”颁奖典礼上，叔叔与台湾著名科学家吴大猷亲切握手。



年华虚掷恨难追，
浪迹他邦今得归。
万里长空清似水，
檐前晓燕效鹏飞。

叔叔听了以后，步韵和诗一首：

蹉跎岁月尚能追，
骨肉离家早盼归。
祖国清明扫墓节，
寄书犹愿雁东飞。

他盼望台湾早日回归，也盼望着能去探望那里的少数民族同胞。

至于没能上西藏，那是因为他从小患有哮喘病而得不到医生的批准，这件事让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觉得“见不到藏族的实际社会生活，怎配得上说是个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人”。所以上高原，访藏族是他长久未了的一桩心事。

来到甘肃以后，听说从兰州坐一天汽车就可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这个消息让他又动了上高原访藏族的心思。在他努力说服、

▼
平生实地调查途中在最高海拔处留影。



并保证“有反应，即回头”的条件下，医生终于开了绿灯。为保险起见，医生建议把兰州到甘南首府合作，原本一天的路程分两天走，中途在海拔近 2000 米的临夏打尖，第二天再到合作。合作的地势比临夏又上升了 1000 多米。一路上，叔叔居然“除了每过几分钟，自然地深呼吸一次外，没有发生什么高原的特殊反应”。

因为身体状态出乎意料的好，叔叔在甘南的六天访问中，几次越过 3000 米上线，到高原草场藏族牧民家作客，又去了白龙江林区，最后到夏河拜谒喇嘛教圣地拉卜楞寺。这一趟甘南行，不仅了却了叔叔多年来“访藏族”的心愿，也打通了他对促进藏族现代化的一条思路——用现代化和商品化来打开藏族地区封闭的大门。因为早在唐宋时期，甘南地区和毗邻的青海海东地区，就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是汉藏茶马交易的中心，被称作河州。“商品”这个东西，早就成为汉藏接触、交流的媒介，时至今日由甘南入藏的商路一直是畅通的。据了解，1987 年的时候，经常往来于甘南和拉萨搞运输的私人汽车有 300 多辆，主要运送酥油、啤酒、塑料底布鞋之类的日用商品。甘南的藏族有 25 万人，约为西藏藏族人口的 1/10，其中竟有一半的人到过拉萨。看来，甘南藏族已经在起着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叔叔认为，如果说商品化能够打开藏区封闭大门的话，那么甘南“大有条件可以作为藏族现代化的一个起点”。

在拜访拉卜楞寺这一喇嘛教圣地时，叔叔目睹无数善男信女绕着寺院打转，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有的甚至一步一叩，四肢舒直，五体投地；他们进香朝拜，做功德，祈求来世的幸福，信徒的忠厚虔诚令叔叔尊敬。当叔叔与拉卜楞寺的嘉木样大师同行的时候，看到“所遇到的藏民无一不毕恭毕敬地低着头，鞠着躬，摊开双手，站在路旁。车子一停，他们就一拥而上，把头伸过来，意思是要求我们摩顶，有人甚至用头冲撞我们的汽车”。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崇拜敬仰之情，让叔叔动情。然而，这些虔诚的信徒们现世所得到的报答，却是如此艰苦和悲惨，这使叔叔心里很不舒服。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对我说，看到信徒们对活佛那份真心诚意的信赖，使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如果有这

样一个活佛，能够用他们宗教的语言，向老百姓解释、宣传“现代化”、“商品化”的意义和做法，藏民一定乐于接受，那么西藏的事情就可能好办得多。

经过了甘南的“考验”，叔叔更加快了在甘肃探访少数民族同胞的脚步。1986年，他再次访问临夏回族自治州，这期间，他特意去传统的皮毛中心三家集赶了一次场；去广河县城关镇拱北村参观杨麻尼家的皮袍作坊；在窰家巷乡王家村，拜访了靠跑西藏做买卖而发迹的马达吾家。他了解到，那年临夏50万个农村劳动力中，外出打工和做生意的大约有16万多人，占33%。改革开放以来，临夏回族同胞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经商的特点，跑到西藏经商的有2000多人，在拉萨有一条由600多家临夏商人开的“临夏一条街”。

临夏跑运输的私人卡车有1000多辆，据说4吨的卡车往返拉萨一趟，可以赚3000~4000元。他认为，这些跑买卖的生意人，说不定就是打破西藏高原长期封闭的尖兵，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对回藏两族同胞自发组成的这支民间商队，应当加以扶助和培养。当他得知这些搞运输的汽车，大多是用废旧卡车改装而成，不仅常



叔叔访问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时着藏袍留影。

出毛病，还不安全，车主们希望能够尽快更新车辆。回京后，他向中央物资部门反映情况，请他们帮助解决这支商队眼前的困难。不久，物资部门调拨了几百辆卡车，支援甘南和临夏两地的运输专业户。

叔叔还邀请边区地方上的同志到自己家乡作客，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同志交流。1987年夏天，临夏回族自治区访问团抵达吴江，恰巧那天叔叔刚完成了一项调查后，离开吴江去了苏州。虽然他在离开吴江时已经向家乡的同志再三交代，要好好接待这些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客人，但是他觉得临夏的同志到了家门口，是一次难得的交流经验的好机会，于是不顾天气炎热从苏州重又返回吴江，同他们见面并叙谈了两个半天。叔叔就是这样处处表现出对少数民族兄弟的“偏心”。

叔叔利用在大西北考察的机会还拜访了积石山的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看望聚居在祁连山麓的裕固族；还翻山越岭看望青海省的土族同胞。在访问保安族同胞后，他高兴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黄河天上来，冲折积石轴。
过峡入河州，起伏多滩谷。
坡田如棋局，麦黄牧草绿。
车绕山村过，儿童竞相逐。
遥指三庄落，保安自成族。
首镇名吹麻，宰羊留客宿。
插刀嵌彩玉，蒙藏畅销速。
富民仗特技，户户有余谷。
挥手依依别，情留我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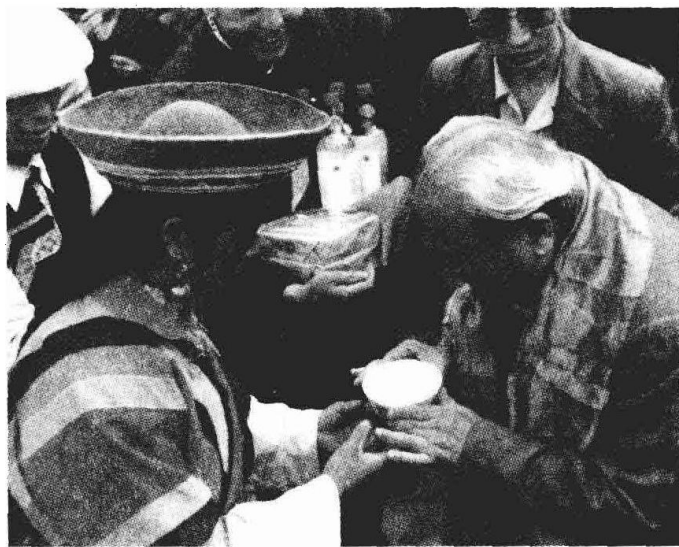
在和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叔叔结识了不少少数民族朋友。1990年，他在兰州与王渝·吉嘎不期而遇。吉嘎是位藏族女企业家，她的父亲早年在甘肃办



过葡萄酒厂、红蓝墨水厂、肥皂厂，是藏族中少有的实业家，也是较早与汉族文化接触的藏族人。吉嘎参加工作以后，一直在甘肃省供销系统上班。上世纪80年代初，一次出差到深圳，这座正在蓬勃兴起的城市震撼了她的心，同时东西部巨大的差距也刺痛了她的心。1985年，她只身来到深圳，筹建了甘肃省在深圳的第一个“交通站”——甘肃省农副产品进出口公司驻深圳办事处，开始了在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中打拼。她通过开座谈会、组织展销等各种办法，将甘肃的土特产品介绍给了港澳台地区的同胞和外国客商，生意越做越大……

经过几年的锻炼，吉嘎的头脑越来越灵活，她以一个藏族人特有的眼光，看准了雪域高原上牦牛的开发价值。这种半野生，生长在无污染又极其严酷环境里的牦牛，不仅肉、奶可供食用，而且营养极高，据说牦牛奶简直可与人奶相媲美；牦牛血以及它的各个脏器还有很高的药用和保健价值，可以说牦牛浑身都是宝。

▲
在深圳，叔叔和吉嘎聊得正欢。



孝通叔叔说，他“一生有两篇文章都是(20世纪)30年代写起的，至今没有写完”。一篇是“到广西大瑶山调查，进行到一半出了事，这第一篇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文章没有做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再作调查了。时隔半个多世纪，他重获机会，在开展“边区”调查时，就千方百计地去拜访少数民族兄弟。图为叔叔访问黑龙江同江市郊区赫哲族和贵州、四川少数民族同胞时的情景。

然而，目前藏民仅仅将牦牛肉当作食品，其他部分都浪费掉了。吉嘎想，如果能将牦牛充分开发利用起来，不就能提高藏族牧民的收入了吗？对于藏区经济发展将有重大意义。2001年，她组织多位专家赴甘肃、青海、四川对牦牛的利用开发进行调研，接着在北京召开了“牦牛产品综合开发利用论证会”，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利用开发牦牛的立项申请。

论证会结束后，吉嘎把开会的结果和今后的设想向叔叔详细作了介绍。叔叔听了很高兴，十分赞赏吉嘎的胆识和魄力，希望她的想法能够实现，造福藏区百姓，也希望她能在少数民族中成为一个榜样。为了支持吉嘎开创的事业，叔叔致函国务院温家宝副总理，将情况“上达中央，深盼关注和指导，促其实现”。很快，温总理就作了批示。叔叔的信函和温总理的批示如下：

家宝同志：

最近我又一次去甘肃考察，很想寻找一条能使大西

北少数民族群众早日致富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次来深圳访问遇到老朋友藏族女企业家王渝·吉嘎女士，她是深圳华龙土特产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很有实力和远见，向我提供了藏区牦牛产业化事业的计划并叙述了对这项计划的调研和推动的实际状况。我深予赞赏并相信她的实干精神，想加以支持。因此写此信上达中央，深盼关注和指导，促其实现，现特转上有关此事的汇报提纲，盼转致农业部及农行予以审核。此致
敬礼

费孝通 10月15日

温总理批示：

牦牛产业开发很有前景，但要注意运用科学技术，遵循市场规律。这件事办好了有利藏区经济发展。费老的信及调研报告请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研究。

温家宝 11月7日

2003年，叔叔最后一次赴南方访问，在参观吉嘎他们兴建的华龙土特产批发市场时，吉嘎告诉他，他所关心的牦牛产业化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目前，在四川搞的牦牛肉、牦牛奶生产线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牦牛血SOD胶囊的生产，正在审批当中……一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进行。叔叔听了对吉嘎说，他虽然已经93岁，但是还要为建设一个繁荣的西部出力，希望华龙土特产市场快快成长起来，获得成功。

令人遗憾的是，他对吉嘎说这番话以后不久就病倒了，再也不能为他日夜牵挂的少数民族同胞出力了。

通过实地考察和史书、文献、文物的长期研究，叔叔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它的主流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由若干个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而成的。它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来，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

大，这个“雪球”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

中华大地上许许多多原本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逐渐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汉族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区，起到了凝聚和联系各民族的作用。形成了在这一疆界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

1988年夏，叔叔利用暑休，把几十年来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写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并在这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泰纳讲座宣读了这篇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问世以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影响日渐扩大，并且在学术研究中逐渐得到应用。

叔叔一生关注少数民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的少数民族兄弟早日脱贫致富，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他希望他的理论研究“能为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

二十二、关于“百分之百”的对话

叔叔的文章里有不少统计数字，在他早年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和《重访江村》，以及后来写的很多文章里都能看到。我发现，这些数字里，直接引用资料上现成的数据，要比他自己调查得到的数据少得多。拿《禄村农田》来说，文中列举的大量数据，多是通过他和助手自己调查得出来的。当年调查的时候，关于云南农村状况的参考书很少，最常见的资料是一本五年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云南农村调查》。叔叔原本希望用这本《调查》作对照，“看这一段时间中，内地农村中有什么重要的变化”。然而，到村里和实际情况一对照，发现这个《调查》里的数字“是不可能正确的”，这些数字“是为了政府有减租计划而特地编出来做宣传的”，根本不可信也不能用，一切都得重新做起。

那么，叔叔他们是怎样获得数据的呢？举个

▼
田间地头做实地调查。



例子：在《禄村农田》第九章《生计》中有一张“养生送死关节上的费用”的表格，里面详细地列出村民在办婚事、丧事、祝米（小孩满月）、做斋（祈求家宅安宁）、做寿的花销。这些数字都是他们从办理上述种种仪式的村里人那里了解到的。比如办丧事的费用，是“正逢当地小学教员为父亲出丧，一连请了六天客”后，由这个教员提供的；后来从“那家熟识的佃户，为他儿子筹备婚事”的过程中，了解到办婚事的费用；做寿的费用则是“张之毅君在禄村时刚逢隔壁刘老奶做寿……由张君直接在他们特为做寿所记的账上抄下来的”。在这篇文章里，类似这样从老乡那里问来的数字，比比皆是。

记得在整理、编辑《费孝通文集》时，发现《禄村农田》和《〈云南三村〉英文版的“导言”与“结论”》这两篇文章里，有一些数字前后不相符。我们推断这是因为当时流行于民间的计量单位，与公制、英制的计量单位相互换算时，很难准确地一一对应，而且叔叔编写这些文章时正在美国，手头资料有限，不可能仔细核对这些数字。加上时间久远，文章翻译出来，几经登载，难免出现差错。对此我们特意去请教叔叔，问他怎么办？他回忆说：“当年我和张之毅是拿了皮尺到田里去量田亩，拿了秤去称谷子，得出的数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老百姓量米是用石、斗、升作计量工具，而且各地量具的容积都不一样，容量要折合成斤、两，再换算成公斤，一个数字来回换算几次，就会有误差。那年代还有用“蒲式耳”^①作计量单位的，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你们说的情况确实存在。”我问他对那几个不相符的数字怎么处理？他想了想说：“几十年过去了，已经成为历史，还是保持原样，不去动它为好，但是要说明一下。”后来在《费孝通文集》的这两篇

① 英美计量干散颗粒的计量单位，与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关系是1英蒲式耳=36.37升；1美蒲式耳=35.24升。

文章后面，我们按照他的意思加了按语，予以说明。

叔叔做学问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对数目字决不含糊。几天前，我在整理录音带时听到叔叔与一位记者的一段对话，这段话很能说明问题。那是1995年在吴江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叔叔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成员，赴武汉、南平等地，对教育法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后回到吴江，在吴江宾馆接受当地记者采访。一位年轻的女记者说，吴江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百。叔叔对她说的百分之百提出质疑，批评她对统计数字的马虎态度，并告诫她，一个新闻工作者“作报道会用到数目字，这时候一定要慎重，不要说过头，不要为了面子说过头话。其实说过头话不是争面子，而是失面子。”这位记者不以为然，坚持自己的意见，由此发生了一场小小的“辩论”。事隔十多年，现在听来，仍然很受教育。其中有一段对话如下：

记者：当前吴江人民正满怀信心向现代化目标努力，借此机会想聆听费老对吴江人民的教诲。

费孝通：教诲二字可不敢说。我是吴江人民的一分子。吴江当前在各项工作中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从历史上看，这不是偶然的。吴江有比较好的自然条件，我们利用这个资源，比较快地提高了生产力，当然，这里边要加上党的政策和群众的力量。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依我看，我们这些在“天堂”里的人，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起来……毕竟这里不是神话里的天堂。所以总的说，在文化层面上，吴江还达不到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水平……九年义务教育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吴江执行得怎样？

记者：我们1992年就达标了，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全部普及了。

费孝通：不可能，我不相信。完成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

记者：百分之百了！

费孝通：我不相信。你说的百分之百只是个数目字。我没有自己去看，

不能说这个话。

记者：实际上是这样的。

费孝通：我希望你这个话的确符合实际，但对我来说，我认为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事情，天下是少有的。

记者：做到百分之百是有难度，但是我们确实做到了。

费孝通：我们不进行辩论……你给我出了一个很好的题目。我在全国人大负责联系文教工作，有责任查实你所说的话对不对。一般地讲，事情能做到百分之百是很少的，我们可以把百分之百作为努力的目标，争取把事情做得更好。但是一切事情都要实事求是，特别是新闻工作者，作报道会用到数目字，这时候一定要慎重，不要说过头，不要为了面子说过头话。其实说过头话不是争面子，而是失面子……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做工作的时候，可以向百分之百这个目标努力，但是实现了没有，还应当看一看。不能光靠一个统计数字，认为那就是事实了。科学调查不是听说就能算数的，非得要去证实、证明才行……现在义务教育到底实行到什么程度？假定说真的有一个地方，一个县，像你说的达到了百分之百，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

记者：我们这里的确是这样的。

费孝通：我希望你说的是对的，也希望你科学化一点，特别是新闻工作者，你的责任是把真正的信息报道出去，传达给群众。不是向上级报告，向上报是另外一件事，我想你们在写这个报道的时候，是根据政府的意思写的，那由他们负责。我们是向人民群众传达信息，就必须根据事实。假定你认为这百分之百的事做得到，我怀疑你的思想有一定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

记者：费老说得对，我们还要作调查研究。

费孝通：所以，我们要说科学的语言，不是一般的语言，要做到这一点还是很难啊！你们是负责传达信息的记者，要讲究科学化，且不要说

做到完全科学化，能够做到比较科学化就很不容易了。你刚才相信天下有做到百分之百的事情，我就很怀疑你的脑筋是不是“科学化”了，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呀。你这样的态度如果再发展下去，就会发生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报道不科学，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然，这不仅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从总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没有做到完全实事求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我们国民的文化程度提高起来才行，要靠教育。

说到教育，实际上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牵涉的问题很多……我想，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吴江人已经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都认识到教育的关键是要提高人的素质。更不能说每一个做父母的吴江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得到程度比较高的教育，而不是要求他们赚多一些钱。假定是这样的话，又表明你刚才讲的话不一定合适了。

教育的效果，一定会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它可以在当前我们最关注的经济发展上起作用，而且说到底，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要靠具有高素质的全体国民的努力，而提高国民的素质，最终必须发展教育。

可以说，叔叔对待数目字的态度始终如一，在他晚年写的文章里，我们仍然很少看见有什么“权威机构”或“学术权威”所发布的数据，他关注的是自己实地调查中获得的事实。如果扩大来看，他不仅对数字要求真实，对所有的实地调查都要求扎实可靠。

二十三、家乡的凤尾菇和卡拉汉访苏北

叔叔早年求学时就认定，“学术就是有用的知识，有用就是对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推动社会进步有益”，他一生的活动都没有离开这个基本点。所以当他恢复工作以后，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心里一直惦记着为“改善人民生活”出力，只要是对“改善人民生活”有利的事，无论巨细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大到为重建中国社会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考虑“全国一盘棋”的经济发展格局；小到帮助家乡服装厂与新疆纺织品公司联系业务、吁请物资部门为临夏个体运输户更新车辆……总之，时时刻刻忘不了“富民”。

1981年叔叔去澳大利亚讲学，在一次华人的招待宴会上，尝到一道味道特别美的炒鲜菇。在座的一位教授听他连声称好，就很高兴地对他说：这是我试验培育成功的一种高产平菇，原种出自中国喜马拉雅山南麓，后来传到澳大利亚，经我试验培育，它的产量比普通平菇提高10倍，口味还好。叔叔听了接口说：这既然是中国的种，就应该让它回乡去。当叔叔离澳前，这位教授真的送来几支平菇原种和有关试验经过的论文，作为他送给祖国的礼物。

回国后，叔叔把这几支原种送到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保存，但是北京大学没有把它推广到农村种植的条件，于是叔叔将一部分原种拿到家乡吴江县，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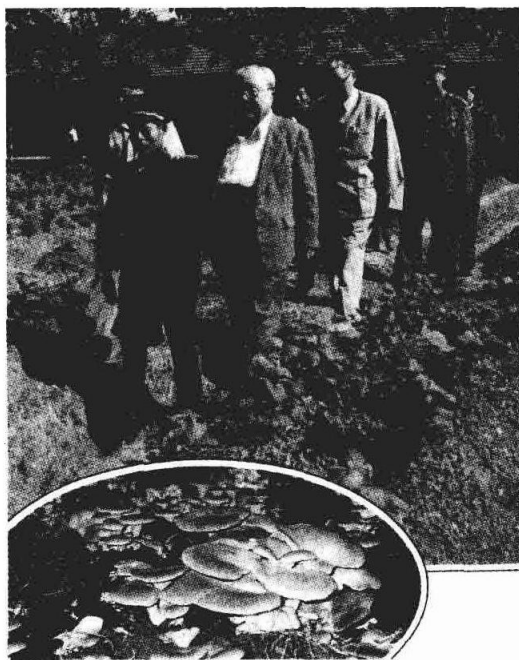
县农水局技术人员的努力，利用稻草、麦秸、棉籽壳等配制辅料，试验栽培成功。当在湖滨乡生产队试验栽培的平菇出菇时，现场的乡亲们看到满床乳白色肥大的平菇时十分兴奋，纷纷讨要菌种，要求学习种植技术。

由于栽种这种平菇的原料便宜，技术简单易学，劳动强度又小，然而产量很高、能赚钱，因此受到农民欢迎，很快在吴江全县推广开来，老百姓还为它取了个好名字叫“凤尾菇”。

凤尾菇在吴江栽培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江苏省电视台、苏州市电视台都到吴江拍摄宣传片。同时《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军报》、《农民日报》等十多家媒体，报道了民盟苏州市委与驻苏部队联合举办食用菌培训班，讲授栽培凤尾菇技术，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事迹，这一下凤尾菇的名字迅速传开。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有关单位纷纷来函或派人到吴江索要凤尾菇菌种和栽培技术资料。

还有不少地方邀请吴江技术人员去帮助他们开发凤尾菇生产。叔叔知道后十分高兴，鼓励家乡的技术人员要“深入调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种菇的原料上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变废为宝，降低成本，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据说在以后的十多



叔叔到苏州一个部队农场察看凤尾菇栽培。

年里，“凤尾菇热”一直不退。民盟苏州市委担负起了培训的任务，举办了60多期食用菌栽培技术讲习班，培训了3600多名学员，这些人把种植凤尾菇的技术带到了全国四面八方；此外，还为各地提供优质、适龄的凤尾菇母种数千支……可以说，叔叔从遥远的澳洲带回来的凤尾菇，如今已是香飘万里，让农民得到了实惠。

为了老百姓富裕，叔叔可谓无处不用心。从历史上看，江苏省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比苏南地区落后。上世纪80年代初，叔叔在苏北考察时注意到，是因为乡镇工业还不发达，拖了苏北整个地区发展的后腿，要想扭转这个局面就必须加快发展一些中等城市的工业，以带动周围腹地的乡镇企业。

1986年6月，叔叔陪同胡耀邦同志出访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四国。访问英国时，在英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宴会上，叔叔刚好坐在前首相卡拉汉的旁边。卡拉汉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身，说起来和叔叔是“校友”，当时又同为该校的荣誉院士，所以撒切尔夫人指着他俩笑着对胡耀邦说：“他们是一伙。”不料这句话让叔叔灵机一动，想到了上个月访问苏北时，淮阴市长告诉他，市里计划把淮阴的电站和盐矿发展起来，在技术上并无多大困难，关键是钱。于是叔叔向卡拉汉讲了发展乡镇企业的道理，卡拉汉听了很感兴趣，叔叔又说目前的困难是缺资金，卡拉汉马上接过话茬说“我可以打电话”，意思是向英国银行界作小额贷款，并说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带几个银行家访问中国。

回国后，叔叔向中央作了汇报，经批准，正式向卡拉汉发出邀请。12月，卡拉汉如约访华，叔叔陪他到了南京，因为当时公路状况很差，中央有关部门特意从北京调了两架直升飞机，把卡拉汉一行从南京直接送到淮安。英国客人考察了淮阴电厂、清江化工厂，听了淮阴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情况介绍，还欣赏了中国的国粹——京剧《红娘》。

改革开放之初，各地接待外宾的条件还不够完善，但是卡拉汉对于这次苏北行还是很满意的，访问结束时他对叔叔说：“我在江苏访问，像天鹅一样飞行。你作了让世界了解苏北的贡献。”这次访华的客人，虽然有好的愿望，



▲
与卡拉汉在北京见面。

愿意以商业贷款的形式在淮阴投资，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我国的开放程度不够大，在接受外资方面还缺乏经验等原因，以致实际操作时出现不少障碍，结果淮阴未能和他们达成有效协议。但是正如时任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朱通华说的那样：“两架直升飞机带来的两位老人，毕竟给人们留下了开发苏北的睿智之见，并开启了对外引进资金的风气之先。”

后来我还听说，有一次叔叔和卡拉汉坐直升飞机去无锡访问，天下着雨，很冷。飞机升空后，在云层里能见度很低，而且驾驶室前面的玻璃窗上又结上了薄冰，飞行员看不清楚外面的情况，有可能会影响降落时的准确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机长不得不悄悄向陪同访问的江苏省副省长陈焕友报告，陈焕友镇定地说：沉住气，别紧张，慢慢找准方位再降落。大概首长的镇定增加了飞行员的勇气和信心，飞机终于安全降落。当时叔叔并不知道自已遇到了险情，这段插曲直到八年后，

在一次谈话时，陈焕友才说出来，叔叔听了“哦”了一声，哈哈一笑。

叔叔一生“志在富民”，他的学术研究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学者指出：费老与他那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点是“行知合一”，这正是“费老与那些‘国学大师’们的最大不同点，而这种不同，也恰使他赢得了‘庙堂上下的广泛敬仰与尊重’”。

二十四、真秘书，假秘书

很多人都知道，费孝通是个写文章的快手，听说抗战时期为了挣稿费养家，在云南大学大门外的茶馆里摆摊，“立等可取”“卖文章”的故事。战后回到北平，来约稿的人仍络绎不绝，一些性急的记者，为了早一点拿到稿子，干脆就在客厅里坐等，文章一写好，马上拿到报馆去发表。叔叔自己也说过，那时候写文章“从不过夜”。他的“快手”的名声在文化人的圈子里流传很广。当然，也有人对他这种“高速度”不以为然，比如学法律、事事要求严谨的青叔叔就批评他把“老婆孩子、家长里短都写进去，太随便了……”，说他“才胜于学，华多于实”，写的文章“花哨”。

写作已经成为叔叔的习惯，但是当上右派以后，不能写了，然而命运像是画了个圆圈，经过20年后又把他带回到丢失那支笔的地方，重新开始了写作生涯。这时候叔叔虽已是古稀老人，然而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仍让他激动不已，他把自己到全国各地考察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大量署名费孝通，风格清新、具有远见卓识的文章，又出现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快手”费孝通复活了。

叔叔恢复工作以后，担任多个职务，公事繁杂，既要应付公务，又要下

基层考察，十分忙碌。人们看到这一篇篇文字优美的文章时，不禁要问，这些文章都出自这位老人之手吗？他哪来的精力和时间写作？这里有什么“秘密”？难怪有不少朋友问我：费老这么忙，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是不是他身边有个“写作班子”，或者有专门的秘书替他写？

其实没有，既没有“写作班子”也没有“写作秘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费孝通的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文章表达的是他的思想，里边的遣词造句是“费孝通式”的。当然这不是说他写文章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恰恰相反，叔叔在写作当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比如说，叔叔的文章有很多是讲话的“记录”。他常说，他讲课不喜欢照课本宣讲，而是喜欢把自己对问题思考的过程和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拿到课堂上和学生们一起讨论，然后把讨论的内容整理成文，积多了就成一本书。《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这两本叔叔最得意的著作，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这两本书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据说《乡土中国》刚出版的时候，大受欢迎，1948年4月第一版发行的3000册，不到一个月即告售罄。以后在6月、7月、8月、11月以及1949年1月，平均每月发行2000册（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再版）。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经历了漫长岁月，时至今日仍然是了解中国农村乃至理解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特性必读的一本书。

叔叔的这个习惯延续至今，在各种会议上，他从不念现成的稿子（必须念稿子的场合除外），而是根据会议的主题讲述自己对问题的思考。凭着广博的学识，有条理的论述，他的讲话总是那么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讲话的时候，会场里总是座无虚席。把讲话内容记录下来，整理好交给他，由他审定、修改、润色，一篇文章就出来了。比如那篇脍炙人口的《小城镇 大问题》，就是他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由他的学生沈关宝整理，经他审阅订正后的著作。

再比如，叔叔参观了濮阳老城西水坡的仰韶文化遗址后，写了《从蚌龙想起》。在写这篇文章时，为了搞清楚编号M45墓主人的情况，他要我把文稿

送给考古所的潘其凤，请潘先生阅后提供一些有关资料。后来潘先生回信，把他掌握的关于 M45 墓主人的资料提供给叔叔，解决了叔叔写作时的一些疑问。

当然有的文章是要叔叔自己一字一句写出来，像《人不知而不愠》、《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补课札记》这样的文章，那是旁人无法代劳的。据我所知，叔叔从 1998 年 6 月就开始酝酿、思考撰写《补课札记》，到 2000 年 3 月完成，历时一年零 9 个月（其间还做了许多别的工作）。叔叔心里清楚，当重新能够写作的时候，自己已经是个年近 70 的老人，能够支配的时间所剩不多，要做的事却堆积如山，只有抓紧时间才能做更多的事，一天要当作两天用，所以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写作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在我的印象里，见到叔叔的时候，他不是伏案写作，就是在专心读书，似乎没有闲在那里不干事的时候。

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去他家，一进门宗惠就跟我说：“这两天老先生眼睛有点炎症，今天看了一上午书，下午又接着看，叫他休息一会儿都不肯。你去跟他聊聊天，帮他换换‘频道’。”

来到书房，只见叔叔坐在书桌前正捧着一本书看。我走到他对面说了一声：“五叔我来了。”他这才抬起头，放下书，望着我，哦了一声，指着我身后的沙发说：“请坐。”叔叔有这样一个本领，在他看书或写文章的时候，不管身边有什么人走动、说话，甚至吵闹，都不会影响他照样做事，所以在我打招呼后，他的眼睛才离开书本，然后摘下眼镜，同时又拿起另一副眼镜戴上，对我说：“现在真麻烦，看东西用一副眼镜，平时又要戴另一副。最近眼睛有点红，还要点眼药，而且精神也差了，一天只能看四五个钟头，这样一本书要看好几天。”“你在看什么书？”我问，“钱穆的《国史新论》。”近几年，叔叔在不少文章和讲话中，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在“主张新学，不要旧的一套”的家庭里长大的，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所以国学底子不深，现在要努力补上这一课。

他指了指大约有三四百页的《国史新论》说：“里面写的好多东西过去我

都不知道啊。现在年轻人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大概更少了。”

“是的”，我说：“我的历史知识就少得可怜。我想，像我这样年龄段的人，可能有不少跟我差不多。”

“历史给我们留下很多好东西啊，丢掉了可惜。年轻人要多懂得一些。”

“现在的学生忙得很，要学的知识太多，课余时间又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吸引他们，什么上网聊天、网络游戏、VCD等，怕是没有时间去学历史。新东西出来得那么快，对我来说，现在流行的数码相机、数字电视，为什么叫‘数字’？这些最基本的知识我都没有。”

“我也不懂。现在科技发展太快了。你看，人类不仅从地球上获得资源，现在都要开发太空了。”

顺着“学生负担重”的话题，又说到“学英文过热”。我说：“现在中国人学英文成风，不仅在小学、中学花很多时间学，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前几天有报纸说，有一家人把孩子送到一所双语教育的幼儿园，结果孩子是学会了不少英语，可是中国话却说得不利落了，搞的大人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对于学外语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算过，中国学生从一上学到参加工作，总共花了多少时间来学外语，这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又有多少人的外文派上了用场？我想工作上需要高水平外文的人，一定是少数，大多数人把过去学的外文又‘还’给了老师。这样算下来，我们用那么多时间来学外文是很不合算的，不如减少一些学外文的时间，用来提高中文水平。据我了解，目前学生的作文写得好的不多，甚至一些研究生、博士生的文章写得都疙里疙瘩。当然外文不是不要学，而是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具备一般的外文知识就够了，当一个人用得上外文时，他会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去学，这时候他学习外文的效率，比在学校里绞尽脑汁背单词的时候不知道要高多少倍，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就能举出很多……”叔叔饶有兴趣地听我发了一通“谬论”后说：“你讲的这些，实际上就是当今时代，我们的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学校又该教些什么的问题。你不妨写下来，在《群言》上登出来看有什么反应。《群

言》也可以开辟一个让人们提意见出主意的栏目。”

为了完成“换频道”的任务，我挖空心思找话题。又扯到什么“恐怖活动难制止”啦、“人类最终会消亡”啦、“中国将来会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的一些话题上。我发现叔叔还蛮有兴趣地听我胡侃。天色渐渐暗下来，这时宗惠端了一碗粥、一碟菜、一小块蛋糕进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告辞下楼，算是完成了“换频道”的任务。

可以说，叔叔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一天到晚不是趴在桌上写，就是捧着书看。如果要问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文章”的话，也许这就是“秘密”。

虽然说在叔叔身边没有专门的写作班子或“写作秘书”，但是秘书还是有的，那就是潘乃谷教授和张荣华先生。

潘乃谷，1957年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重建社会学”的时候人手紧缺，可是“重建”需要人啊，叔叔把潘光旦老师的女儿潘乃谷调回北京，并于1982年送她到美国纽约亨特学院人类学系进修深造，1983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

198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994年更名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这是一个以研究工作为主，同时担任教学任务的机构。1987年被列为国家教委文科重点研究所之一，同时设立了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以及国际赞助与协作的研究项目。研究所成立之初，叔叔出任所长，潘乃谷任副所长，叔叔退下来以后，潘乃谷接班担当所长，负责所内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成了叔叔的得力助手。

叔叔身边除了业务方面的这位助手之外，还有一位专门处理日常事务、文件书信的生活秘书张荣华。张荣华是我的妹夫，他和费宗惠是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上学时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吉林公主岭，在东北成了家。“文革”结束，全家才回到北京。宗惠到北京建工学院教书，荣华在昌平的一所农校任校长。

叔叔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虽然已经70岁了，但是还“不知老之将至”，

不服老。就拿出差来说，那时候出门之前，只要宗惠他们把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准备好；把每天要吃的药装在瓶里，交代清楚就行了，一路上同行的学生或工作人员帮帮忙，问题就解决了。年纪不饶人，他终于感觉到老了，体力明显下降，各处关节活动不灵，做事情力不从心，需要别人帮忙了。下乡调研要联络，参加会议要安排，加上事务繁杂，文件信函成堆，处理起来颇费精神……这些事务需要专人来负责办理了。经过考虑，叔叔请全国人大秘书局将张荣华调到身边当了秘书。

做实地调查是社会学、人类学的一项基本功，圈内人称之为“田野调查”。叔叔每年都要用 1/3 以上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去跑。起初，为了节省时间，出差时他喜欢乘飞机，后来老了，飞机升空后耳朵痛，不舒服，就改成尽量坐火车出行。叔叔乘坐的是所谓“公务车”，一般都挂在列车的最后。车厢一头是一个面积比较大的“客厅”，里面摆着一个可以坐三个人的长沙发，两个单人沙发，一张桌子和几把靠背椅。接下来有五间包厢，共 10 个铺位，后面还有供列车员休息的包间和厨房、卫生间。

叔叔在火车上也不闲着。车一开动，张荣华就从一个随身带的小箱子里，把出发前准备好的书拿出来，摆在桌上，以备叔叔随时阅读。在车上除了看书，有时他会在厅里和随行人员讨论问题，如果有学生同行，甚至会在火车上讲一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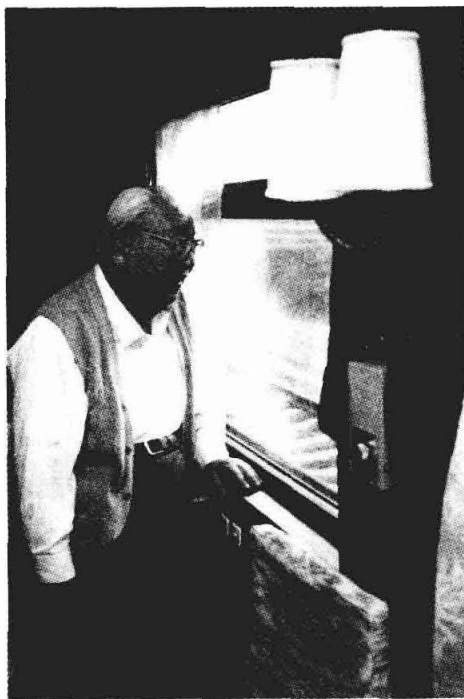
叔叔还喜欢搬把椅子坐在车窗前向外眺望，窗外的景色让他着迷，但他更留意的是地里的庄稼、沿途的村庄、大田里干活的农民……凭着敏锐细致的观察力，他能在这匆匆一瞥里，看出普通人看不到的问题。1999 年 5 月，叔叔乘火车去赣州参加一个经济发展研讨会，一路上他又习惯地临窗眺望，窗外的大田里，三五成群的老乡正在忙碌着，5 月，正是农忙时节嘛。

第二天的研讨会上，大家出了很多主意，提请赣州抓紧时机发展高科技产业。轮到叔叔发言，他建议当地同志，要用“传统+科技”的办法找到本地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他说：像赣州这样经济还不很发达的地区，在关注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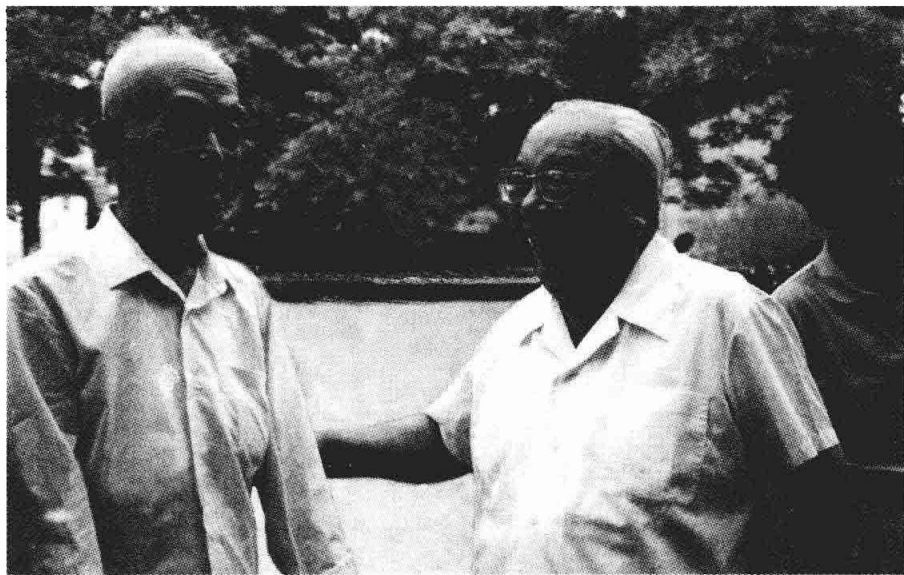
技术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传统产业。比如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只要抓住其中的一个“字”，就可以成气候。在来赣州的一路上，看见铁路边有不少农民在干活，总共有两三百人吧，我注意了一下他们穿的衣服，发现只有两个人没有穿衬衣。想想看，光是农民穿的衬衣就是一个多么大的市场！如果我们能在这个“衣”字上做好文章，就可能取得突破。叔叔把在火车上看到的最普通的现象，在一个发展地方经济的研讨会上提出来。这就是他能从“人人可以看到的事”和“普通人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里看出大道理的过人之处。

叔叔年逾90还能奔走于祖国各地，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身边的两位秘书。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出“真秘书”和“假秘书”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曾经听说过，外地有人跑到某县，自称是“费孝通的张秘书”，能够为县里招商引资，以此行骗。幸好该县有关人员警惕性高，报了案，将骗子抓住判了刑。我还听说就在北京某郊区县，也发生过假冒张秘书到学校行骗的事。社会上的确有“假秘书”这样的骗子。

近来季羨林先生书画流失一案，闹得沸沸扬扬，报上还登出一幅用篆体写的“鹤寿”两字的书法作品，说是费孝通写的。这明摆着是个假货，叔叔是不会用书法作品来给季先生祝寿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没下功夫练习过书法，不是书法家，字



◀ 在火车上叔叔喜欢这样凭窗远眺。



▲
叔叔和季羨林。

写得不好。退一步讲，即使写了，也决不会写篆字。张荣华说，自从他当秘书以来，老先生每次写字，准备宣纸、笔墨，盖章、分送都是他张罗的，这么多年来，就没见先生写过篆体字，更没见过这幅“鹤寿”。

现在赝品到处都有，就是叔叔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也有喜欢别人称他为“秘书”的，觉得当领导的秘书身价高，甚至以“费孝通的学术秘书”自诩。开始我还不信，真有如此拉大旗作虎皮之人？他目的何在？想想这样的人，可谓工于心计。然而，这里讲的绝非无中生有。人们应该对所有的“赝品”提高警惕。

二十五、遭遇“非典”

2003年注定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今年上半年我国遭遇“SARS（非典型肺炎）”的袭击，叔叔因此在上海被困了两个月；下半年临近年底，他又发烧住进医院，从此没能离开病榻。

这年4月，我随叔叔到上海。按原来的安排，在上海参加了“世博会与上海城市文化精神座谈会”后，就转道杭州，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没想到，一到上海，“非典”突然在中国一些地区传播开来，其势凶猛，一时间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政府要求人们尽量减少流动、聚会以避免交叉传染，杭州的研讨会被迫延期。这时，北京传来的消息也令人不安：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不断增加，外地人纷纷离京返乡，从电视里看到街上行人都捂上了口罩，原本熙熙攘攘的商店里变得冷冷清清，公交车上乘客寥寥，人们简直到了谈“非典”色变的地步。这样的状况下回北京似乎也不适宜。因此决定在上海避几天，看看情况。这样一来，我们回京不成，离沪亦不行，被困在了上海。而且这一待，竟是两个来月。

住在宾馆里，叔叔虽然可以读书看报，偶尔也可以把在上海的学生找来谈谈话，了解一些外边的情况，甚至还写了《“非典”的社会学反思》。但是住

宾馆毕竟不像在家里，书报、资料有限，而且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里，憋在宾馆里不仅出不了门，外来的客人也往往被“拒之门外”。再说，赶上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是阴雨天多，晴朗天少，一连几十天被“闷”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真让人提不起精神，乏味透了，显然这样的日子也让叔叔感到郁闷。

为了活动身体，每天下午，张荣华他们就会催促老人家起身在住地的走廊里来回走一走，有时他会到我住的房间里转一圈，也会坐下来跟我随便聊聊，我想到什么就会问他，东拉西扯。可以说，这些日子里，我们爷儿俩聊天聊得很畅快。现在想起来，真后悔当时没请他多讲一些，失去了宝贵的机会，也后悔当时没认真记下他的话，现在记忆变得模糊，只能根据零星的记录来回忆那时的情景了。因为聊天的话题“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所以我的回忆也就变得“跳来跳去”的。

“非典”的社会学反思 一天傍晚，我正在叔叔房间里看电视，上海大学的李友梅和顾骏来了，他们讲述了当前上海抗击“非典”的一些情况。听了以后，叔叔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非典型肺炎”在医学上属于传染病，它的传染必须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和接触来实现，因此“非典”背后必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社会工作者从这个角度入手来研究，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在人类历史上，传染病的暴发与都市化有很大的关系，都市化的显著特点是人们在地理空间上的距离不断拉近，而人与人挤成一团时总会出些毛病。现在全球化了，人与人的交往更频繁，这类毛病也必定会增加。当前“非典”这个突发的传染病，首先危及的是大城市里的人。

他回忆起念小学的时候，妈妈得了天花，他不能回家，只好在学校一位老师的宿舍里搭个铺，住了好多天，这就是隔离。他还说起解放初期去贵州访问的时候，在毕节的一个地方，汽车突然抛锚，他们想到附近的一个村里过夜，但是村里人不让他们进村，说是村里发生了瘟疫。他们只好挤在公路边上的一间道班房里过夜。这也是隔离。现在我们对付“非典”主要还是搞隔离，但是

把病人隔离开来以后,还要进行救治。这反映了社会进步,是现代化带来的办法。

他还将“非典”与“9·11”恐怖袭击联系起来,认为这两个突发事件,都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都在考验社会的应对能力,两者有相似之处。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这类突发事件还会发生。所以对付突发事件将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能力,这需要依靠科学技术。“9·11”事件是利用科学知识来杀人,而抗击“非典”,防止疾病传播是利用科学知识来救人。但是由于科学一时跟不上,对“非典”的医治还不十分理想。

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一下,人类的科学进步究竟应该落实在哪里?这一点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前途!全球化意味着人类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何去何从,搞社会科学的人要好好研究,作出判断。要把造福人类的科学技术搞上去,为子孙后代服务,努力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这才是科学发展的正道。

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的,全球化背景下生活的个人,其中暗含着许多复杂性。人与人的关系看似变得简单了,交往的大多是陌生人,见面可以不打招呼,人与人好像都不相干,但是陌生人碰到一起,对方得了病传染给你,你都不知道。这次“非典”,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下子都发生了,说明人与人的关系确实已经变得更密切了。在这样一个局面里,一个人再不能只看到自己,要多想想别人,想想社会。有了病赶紧治疗,有疑问就主动隔离;大家不恐慌,不说空话、谎话,多干实事,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

“非典”使我们意识到社会是一个守望相助的整体,每个人都离不开社会。这次为了抗击“非典”全社会花费了大本钱,治了病,也教育了人,使大家体会到什么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还有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非典”疫情面前,大家更清楚了什么叫做责任和责任感;为什么发展经济不能忘记社会事业;鼓励竞争不能忘记互相合作。其实,这些不仅是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也是日常生活的需要。

这次中国抗击“非典”,得到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声援和支持,这是人类在共同克服突发的危机,共同对付面临的威胁。得到国际支持是好事,但从根

本上说还要靠我们自己把事情做好。比如某些方面我们原来就有好的传统，这次也发挥了作用，上海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上海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好的标本，在社区建设上也一直在探索，我们要趁这次全民抗击“非典”的机会，推进社区建设，在上海建立起一套守望相助的社区体制。

叔叔还说，这次“非典”暴发，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它不仅仅表明卫生系统有问题，也表明其他方面同样存在毛病。比如城市建设应该有新的思路，特别要注意城建与各方面的协调。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还存在不少弊病，要抓住这次抗击“非典”的机会，拿出一些能说服人的事实，提出一些有科学根据的改进办法，使“非典”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对社会有益的资源。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应对突发事件，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是多么需要社会学、需要社会工作者作出的努力。而我们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要站得高、看得早、看得远，预先看出问题，看准方向，抓住机会，深入研究，坚持下去，发挥社会学的实践功能，在社会动态中建设社会学、发展社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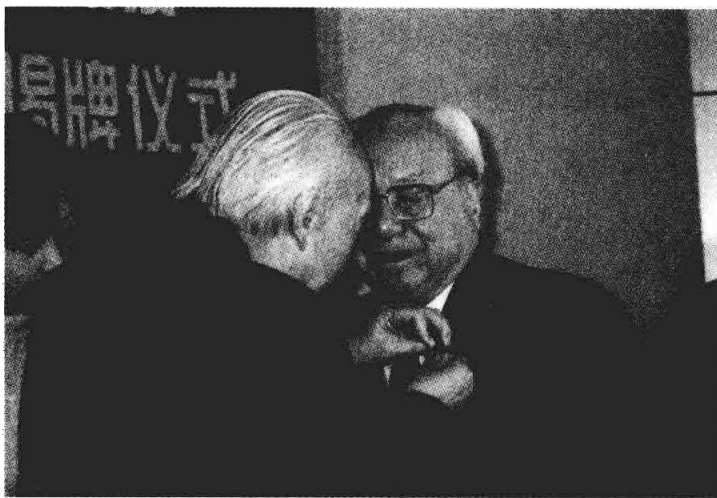
这次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老百姓身边发生许多生动的东西，我们搞社会学的人要善于观察、总结，并且用通俗的话讲出里边的道理，这就是社会学。他对李友梅和顾骏说，钱伟长在上海大学为社会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了一个阵地，现在要看你们年轻人怎么把它搞好了。

几天以后，李友梅他们把这番讲话整理好，叔叔亲自修改后，发表在2003年5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

这期间，除了讨论“非典”之外，李友梅还会来向叔叔汇报他们对上海“社区”以及浦东新区研究的进展情况。“社区”是这些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加快，在我国一些城市里出现的新事物，上海的社区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面。1999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聘请叔叔担任中心主任，就是想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作为社会学家，叔叔自然会十分关注社区建设这个在社会转型时出现的

新生事物。所以晚年时，社区建设成了他关注的重点之一。他认为，广大的城市居民通过社区，可以学习并参与对自己生活的自理、自治，也是一个“培养和提高社区居民既服务于自己，又服务于他们社区的意识和能力”的课堂，大家在一齐“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



高尚精神文明的过程，也将是他们共同来营造一个和睦成风、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美好生活环境的过程”。记得他还说过，社区里推行的“自治”、“自理”、“自立”这些理念，正是推行“草根民主”，培养人们“民主”意识的途径。我想叔叔把社区建设摆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想必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吧。

有意思的是，社区这个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竟是叔叔1933年在燕京大学上学时，为了翻译派克老师讲稿中英文community这个词而创造出来的。没想到60多年以后，这个词会这么普遍地被运用。

姐弟深情 一天，叔叔到我房间来，我问他：“昨天香港凤凰电视台播的一段新闻里说，不久前在一个很古老的村子里，发现了一部连续记载了几百年的家谱，很少见。家谱的主人表示，他要继续记录并修订这部家谱，一代一代传下去。另外有消息说，福建最近搞了一次宗族家谱展览会，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在福建搞这样的展览，当然有他的目的，可是即便抛开政治因素，现在许多地方修家谱的风气也很盛行；



1999年11月在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为担任该中心主任的费孝通佩戴上海大学校徽。

具体到我们费家，也有人很热心搞这一套。解放以来宗族、家谱这套东西，好像都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糟粕，为什么现在又时兴起来了？”

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历来很看重血缘，中国的社会就像是一个用人的关系搭成的网络，‘家里人’和‘亲戚’是组成这个网络很重要的部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看看我写的《乡土中国》，里面讲了一些。解放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阶级’上，干什么都用阶级观点来衡量，强调‘家庭出身’，其实本质上还是没逃出‘血缘’这套东西。‘文化大革命’中搞的什么‘出身论’，更是走到了极端。‘文革’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不那么强调‘阶级观点’了。加上工业化进程加快，人口大量流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广泛、更复杂了。在外边干事，需要别人帮忙，过去那种出门靠亲戚、老乡、朋友的做法又时兴起来。亲戚、朋友这个圈子，可以用‘血缘’和‘地缘’关系来加强凝聚力，所以像‘同乡会’、‘同学会’那套东西又冒出来了，修家谱这种传统的方法也就热起来了。这个社会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一定是坏事。当然啰，什么事情搞过头了都会出问题……”

大概是我认识的亲戚不多，一直对这方面的意识比较淡薄。听了叔叔这番话，让我想到他们11个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在这当中，孝通叔叔和姐姐之间显得更为亲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头讲起。

我有两个祖母，第一位祖母，也就是叔叔的生母杨纫兰，48岁就去世了，去世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孝通”，担心这个身体羸弱、生性顽皮的小儿子，一旦没了母亲的照顾，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少了母亲的管束，会走上正路吗？

母亲去世以后，比小弟弟大7岁的姐姐便接过母亲的担子，负责起照看弟弟的任务。后来，每当叔叔提到童年往事时便会说：那时达姐管我管得好厉害啊，我真怕她。当叔叔和王同惠结婚时，也是姐姐代表家长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叔叔在瑶山受伤，被送到广州治疗，姐姐得到消息后，立即放下正在南洋考察蚕丝销路的工作，赶回来看护、抚慰弟弟。从医院出来，又是姐姐邀他到开弦弓疗养。姐姐在家乡从事的工作，引起弟弟的兴趣，由此写出了《江村

经济》，成就了社会学一代顶尖人物。

按照我祖母定下的“大学和专科间隔交叉”培养子女的办法，排行老二的达叔叔 14 岁时，上了专科学校——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来被选派到日本东京蚕丝高等学校深造。1923 年毕业，回母校工作，追随蚕校校长、蚕丝教育家郑辟疆先生，为我国的蚕丝教育和科技推广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回到蚕校以后，郑先生安排达叔叔担任蚕校“推广部主任”。为了向蚕农推广新蚕种和新技术，她经常要带领蚕校师生，摇着宣传船，到养蚕制丝最集中的吴江县各地办展览、开讲堂。有一年，开弦弓村的 20 多户蚕农，听了他们的宣传以后，决定改用蚕校的新蚕种。达叔叔深知这次试养新蚕种成败的重要性，就亲自领着几名学生，坐着手摇船来到村里。她们把参加改养新蚕种的农户组成“共育组”，手把手教他们怎样按照科学方法进行操作和管理。在达叔叔他们悉心指导下，试养的新种蚕宝宝顺利长大结茧。这一年，试养新蚕种的农户，家家获得了丰收。在事实面前，新蚕种在开弦弓顺利推广开来，不久就传遍四邻八乡。改养新蚕种，让农民得

▲ 吴江市松陵镇磨坊弄是叔叔出生的地方，经历了七八十年的风风雨雨，姐弟俩又回到了这里。

▶ 和弟妹、子侄在一起。





▲
在女蚕校推广部工作时的达叔叔。

到了实惠，蚕农们给学校送来一面绣着“富国利民”四个大字的锦旗。据说，在蚕校不懈的努力下，到1936年，蚕校和其他各蚕种场生产的良种，完全取代了苏南原来的土种，并且传播到了浙江、安徽等地。

有了新蚕种，结出好茧子，还得配上先进的缫丝技术才能提高丝的质量和产

量。达叔叔他们又在开弦弓进行了新式木制脚踏缫丝车的演示。这种新机器引起了蚕农的兴趣，这年秋天十多个姑娘来到浒墅关女蚕校，接受新式缫丝车的短期培训。郑先生亲自为她们安排食宿，审定教学计划，达叔叔负责讲课。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姑娘们不但学会操作新式缫丝车，学到了许多养蚕的科学知识，还提高了文化。这批姑娘后来大都成了蚕业改革的骨干。

虽然木制脚踏缫丝车缫出的丝质量优于土丝，但还是无法与日本的机器制丝相抗衡。到1926年，中国丝的出口已不及日本出口的1/3。在美国这个最大的生丝市场中，日本丝占了80%以上，中国丝仅占6%。为什么中国丝会落得如此下场？一个美国人说出了原委：中国丝“竟至屈服日本欧洲之下”，是因为“人民保守旧法，未知科学之研究，机械之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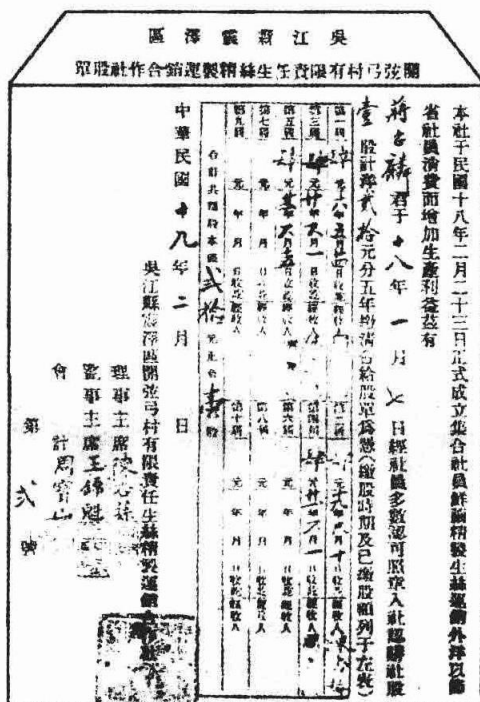
事实的确像这个美国人说，在上世纪20年代，我国丝厂使用的缫丝车，大多数是几十年前从意大利进口的“老爷

车”，生产出来的丝，质量低劣。要提高制丝质量，当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旧的坐纡改为立纡，但是改“坐”为“立”，得有立纡车。那时，日本的立纡车是禁止出口的，国内个别厂家有这种机器，也会严加防范，怕别家工厂学了去，因此研制新的立纡车成了提高制丝质量的关键。

1930年，蚕校克服了重重困难，办起了一家实习丝厂，达叔叔兼任制丝科主任，她提出要赶快研制立纡车，她的建议得到郑先生的支持。研制需要经费，郑先生自掏腰包拿出500元钱；缺资料，他们就凭着日本杂志上登的几张立纡车照片，多方求教、反复琢磨，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研制出了第一台“女蚕式立纡车”。随后，由无锡铁工厂制作了30多台，在实习丝厂装备起了一个立纡车间。立纡车间开工那天，蚕校请了一些制丝厂的老板来参观，并与瑞纶丝厂老板签订合同，“承包”该厂的技术改造。承包期间，达叔叔他们不仅为该厂引进了立纡车，还对煮茧机、剥茧机、复摇车等进行改良，同时帮助工厂改进工艺，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改革获得成功，在江浙一带的制丝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柳亚子、何香凝二位也慕名前来参观。亚子先生即席写了“本有蚕桑利田野，行看衣被遍寰瀛”的对联；何香凝女士留下了“农业救国”的墨宝。

由于达叔叔对我国近代蚕丝业发展的贡献，人们说她是“当代黄道婆”。达叔叔他们不仅在生产环节上进行革新，还在经营、销售环节上为蚕农着想。比如鲜茧出来14天后就会出蛾，苍蝇叮了又会长蛆，所以蚕农的鲜茧必须尽快出手。茧行商人便利用蚕农急于出售茧子的心理，压价收购，使蚕农遭受损失。达叔叔她们就想出了一套由合作社把社员的茧子集中起来，再由蚕校推广部按质论价，出售给茧行的“鲜茧共售”来对付茧行（后来又进一步帮助蚕农自己烘茧，延长茧子的保存时间）。起初，茧商拒绝与推广部合作，经过一番斗争，茧商终于屈服，同意购买合作社的茧子，蚕农的利益进一步得到保护。

达叔叔还帮助开弦弓村村民，筹办了一个股份制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



▲
开弦弓生丝精制合作社股
单。

建起一家拥有员工67人、32台缫丝车、16台复摇车的开弦弓合作丝厂。1929年8月5日，这家中国第一个农民自己兴办的工厂，正式投入了生产。据说，这家丝厂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乡镇企业”，所以也有人称达叔叔是“中国乡镇企业之母”。

抗战时期，达叔叔和郑先生撤退到大后方，在四川乐山蚕丝实验区继续他们的蚕丝教学和新技术推广。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家乡，在废墟上开始重建被日本人毁坏殆尽的蚕校和试验厂……

达叔叔为“蚕宝宝”呕心沥血，而自己一直到1950年48岁时才成家。我的姑夫就是蚕校校长郑辟疆，那年他71岁。郑先生是一位蚕丝教育家，一生从未脱离过学校。费达生在蚕校读书的时候，郑先生是蚕校的校长，他们是师生关系。费达生从日本留学回国，在郑先生领导的蚕校工作，他们成了同事。他们俩志同道合，正如孝通叔叔说的：“他们同甘共苦，风雨同舟。郑先生的主意，费达生的行动，紧扣密配，把他们的理想，逐步地化成事实。”但是长期以来，这样志同道合的两个人并没有结为伉俪。因为郑先生看到女蚕校的学生，毕业后几乎都做了“贤妻良母”，认为“妇女要做事业，就不能结婚”，为了不影响费达生的事业，他不能流露出自己的真

情；而达叔叔因为“怕人家会说我们是为了私情，对工作不利，就压下来了”。两人都把感情埋在心底里，直到解放后才结为夫妇。孝通叔叔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不会不明白，如果不等到这个时刻而发生了这样的事，旧社会的舆论必然会对他们两人为之奉献一生的蚕丝改革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郑先生对此完全是清醒的，他当时的选择是宁可独身终生也要保卫住这番事业……他们在结婚之前在精神境界里早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开了。”

我的祖父也为这一“迟到”的婚事表示衷心的祝贺，亲笔写了贺词：

联以道义 系于事业
结为夫妇 永昌厥德

费家的老朋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亦作诗祝贺：

真是白头偕老，
同宫茧是同宫。
早三十年结合，
今朝已是金婚。

孝通叔叔从小受到姐姐特别多的关爱，长大后，当他投身于自己的事业时，姐姐的献身精神和从事的工作，又对他的学术研究起了重要的影响。叔叔对姐姐始终怀着敬佩之心，他经常说：“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

1996年9月，民盟中央、北京大学和吴江市政府及亲友旧好为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60周年，在吴江市开了一个欢聚会，在欢聚会上叔叔深情地说：

我要借今天大家欢聚的机会，特别是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表示我的感

激之情，说一声感谢了！

回顾60年前，我的姐姐费达生带了我到开弦弓，那时我才26岁，她也只有32岁。我的姐姐16岁时到日本留学，回国以后就到乡下，特别是在开弦弓村推广科学养蚕和新的缫丝技术，这样做了10年以后，我才来到这个村子。这时，她已经帮这个村里的农民办了一个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我在开弦弓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把姐姐开始推动的事业写了下来，这个事业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我姐姐一生努力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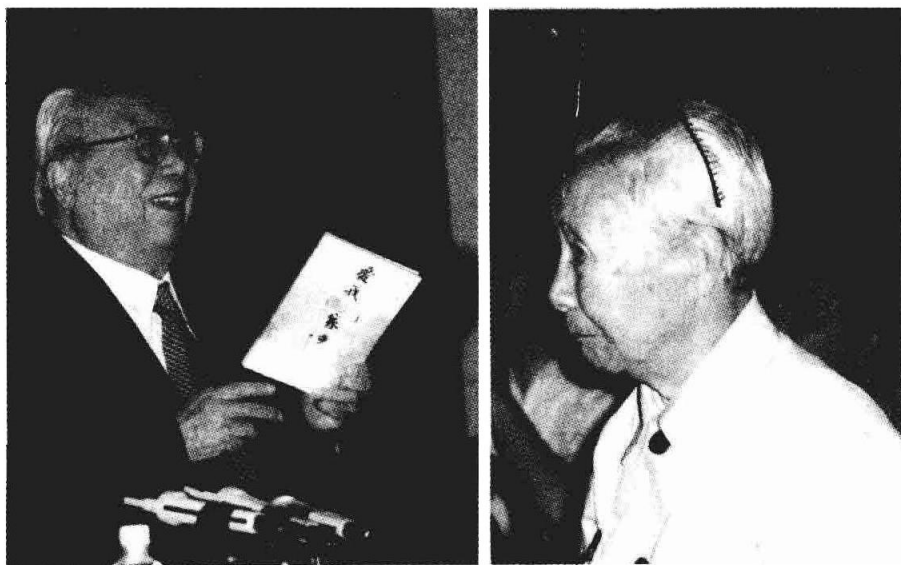
现在我姐姐已经93岁了，她今天也来到这里参加这次欢聚会，虽则她的耳朵不行了，眼睛看不清大家的面貌了，但是，她的心还和我们连在一起。

此刻，达叔叔正坐在台下侧耳倾听，但是她已经听不到弟弟讲话了。

依我看，郑先生和达叔叔他们，一辈子的心思都放在了

◀
向家乡的父老乡亲说一声感谢了！

▶
达叔叔正在倾听弟弟的发言。





蚕丝业上，眼里只有“蚕宝宝”，可以说对“政治”是不热心的。但是他们两人却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打击。“三反”时，达叔叔被当作“老虎”打，又关禁闭，又挨斗争，最后查实加在她头上的罪名都是捏造的。反右以后，受右派大哥和弟弟的株连，被免去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职务。郑先生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6月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江苏代表团开会批判“大右派费孝通”，发言的人个个慷慨激昂、声色俱厉，痛斥费孝通的种种“罪行”，然而郑先生相信，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妻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面对巨大的压力，他保持了“沉默”，在会上一言不发。“文革”当中，87岁高龄的郑先生被戴上“反动堡垒”、“改良主义祖师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一摞帽子，多次被揪到学校批斗。达叔叔除了是“牛鬼蛇神”挨斗外，还被逼着交代“如何与大右派费孝通相勾结向党进攻”。她被“革命小将”剪了“阴阳头”，扭住胳膊游街；请罪、挨打、住牛棚、上干校……一样没落下。1969年11月，郑先生挺不住中风了，当达叔叔从昆山农村赶回家时，郑先生已经昏迷不醒，没几天就离开了人世。

▲
叔叔向百岁姐姐献上“贺家姊诞生百岁大庆”的祝词（2002年）。

▶
姐弟俩，拍拍手。

春天终于来临，枯木逢春。“文革”后，年近80岁的达叔叔，被任命为苏州丝绸工学院顾问，并担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苏州市妇联副主任，还被推举为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名誉理事、江苏蚕桑学会名誉理事；她不顾年迈，下乡考察，对恢复家乡遭到严重破坏的蚕桑业提出建议；1985年，在孝通叔叔的帮助下，又写了《建立桑蚕丝绸系统观点》的长篇文章，对我国蚕丝业的改革和发展，发表见解。

达叔叔和郑先生都是高级技术人员，工资待遇优厚，但是他们的心思全在事业上，生活十分简朴，然而对周围的同事却十分关心，常常接济有困难的职工。蚕校桑园工人老黄因病去世，留下五个子女，生活十分困难，十多岁的儿子黄扬，只得辍学上街卖烧饼油条。郑先生知道后，就每月从工资中拿出钱来资助黄家，让黄扬继续上学。黄扬染上了血吸虫病，郑先生又把他送进医院治疗。中学毕业后，黄扬进工厂当工人，后来参了军。

达叔叔和郑先生没有子女，两人又忙于工作，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于是请了蚕种场年轻女工张凤珍来帮忙，凤珍是个勤快人，把这个家操持得井井有条。达叔叔他们也把凤珍当作自己的女儿，还在墙上挂块小黑板，每天教她学文化，后来索性认作了养女。经常来这里的黄扬，与凤珍相处融洽，日久生情，黄扬退伍后，他俩结了婚。郑先生、达叔叔和黄扬、凤珍成了一家人。

达叔叔的心里只有“蚕宝宝”，直到晚年，她还和几位退休的同事试养蓖麻蚕，希望能够提高在我国广泛种植的蓖麻的经济价值。达叔叔用试养蓖麻蚕结的茧，缫出蓖麻蚕丝，亲手编制了三件背心，分送给苏州丝绸博物馆和一直支持她做试验的弟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蓖麻蚕丝还达不到推广应用的要求。

“蓖麻蚕”一直是达叔叔放不下的心事。在她去世前一个月，一个学生物工程的侄子到医院探望，躺在病床上的她，还动员侄子用生物工程技术来研究改良蓖麻蚕种，她认为新的蓖麻蚕种是一定能够培育出来的。在场的人无不为她这种百折不挠，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所感动。

姐姐给予弟弟无限的温暖，弟弟对姐姐满怀敬爱，到了晚年，绵绵的亲情

来得更浓烈。“文革”后叔叔重回吴江做调查，几乎每次下乡，他都要请姐姐一起去，并倾听她的意见。后来，达叔叔的视神经萎缩、玻璃体病变的眼疾日趋严重，以致近乎失明，耳朵也渐渐听不见了，姐弟俩不能再一起下乡了。这时，孝通叔叔再回吴江，就把住在浒墅关的姐姐接到住地，大家见见面、聊聊天。每次见面达叔叔都显得那么高兴、兴奋，常常是一边手里摸索着把一团乱丝捻成丝线，一边告诉弟弟近来自己试养蓖麻蚕的情况，弟弟则侧着头微笑地听着……叔叔常说，看到达姐 90 多岁了还这么健康，给我增加了（长寿的）信心。

2002 年，达叔叔度过了百岁生日。

2003 年 4 月，叔叔又回吴江，和以往一样把姐姐接到吴江宾馆。和弟弟见面，达叔叔依然显得很兴奋，坐下来以后，不断地抚摸着弟弟的手，还用手指从弟弟的额头沿脸颊轻轻摸下来，直到下颌，嘴里还念叨：孝弟是来开会的吗？来几天了？什么时候走？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一次叔叔对姐姐的问话一直没有作声，达叔叔终于忍不住地问：“伊怎么不响呢？”身旁的人赶忙大声代为回答。谁也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永诀！

这年年底，孝通叔叔住进医院，从此卧床不起。虽然达叔叔的家人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但是老人似乎已经感受到了什么，变得沉默起来。2005 年 4 月 24 日，孝通叔叔去世，又过了 111 天，达叔叔也在浒墅关家里安详地离开了我们。享年 103 岁。

2005 年 8 月 18 日，在苏州，当我向达叔叔深深鞠躬告别的一刻，个子矮小，身体消瘦，睡卧在鲜花丛中的达叔叔，似乎显得那样高大起来，在她的上方，分明悬挂着孝通叔叔庆贺姐姐百岁寿辰时送的那幅寿幛，上面写着：

忠诚待人，

勤俭自持。

无私忘我，

乐在其中。

这四句话，是孝通叔叔对姐姐一生的评价。

“灵魂出壳” 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张荣华对我说：“下午医生来，再给你压一次，这次先拔罐，再压就不会那么疼了。”接着指着自己胳膊上的紫印说：“不知道你拔罐子会不会这么紫，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张荣华说的“压一次”，指的是让陈医生为我做一次穴位“指压”。陈医生是上海人，大约五十多岁。据说她上学时成绩不错，好像是因为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进工厂当了工人。后来患上某种严重疾病，在医院一直没看好，于是自学中医理论、经络学说，自我按摩，终于琢磨出了一套手指按压穴位的方法，治好了自己的病，真是久病成医。同事见她把自己的病治好了，便有人找上门来请她看病，没想到治疗的效果还不错，于是名声逐渐传开。

前些年，我被诊断患有隐匿性肾炎，后经中医治疗已无大碍，但是小腿一直有些浮肿。张荣华惦记着我的病情，所以一有机会就介绍医生给我看病，这次在上海待的时间长，正好可以让陈医生医治一下。

除了陈医生之外，还有一位与我同姓的费医生经常来宾馆。费医生是上海某医院的外科大夫，他的绝招是打“水针”——往穴位上注射（生理盐）水。这次来到上海，费医生听说我的腿肿，依他看，是因为静脉回流不畅，打几针就能解决问题。于是我决定接受费医生的治疗。每隔三天忍疼挨一针。也许是不适合两位医生的治疗方法吧，当我接受最后一次治疗，即将回北京的时候，我的腿“依然如故”。

其实，两位医生是应张荣华之请，来为叔叔作保健的，所以叔叔也接受陈医生的按摩，偶尔也打打加了些麻药的“水针”。

有一次我刚打了水针，叔叔“散步”到我房间，看见我正在揉腿上打过针的地方，就问我：“很痛？”“挺疼的。”“有用吗？”“到现在为止，还没见效。”他坐了下来，说：“你有没有叫陈医生按摩？”“有，但是也没效果。”这里要说明一下，我这样讲，没有评判两位医生医术的意思，几年来我在北京几家正规

医院里求治，也一直“没见效”，有位医生还开玩笑地说我太“皮实”，对药物“反应”迟钝呢。叔叔听了我的话沉思了一下又说：“不过，费伦（费伦是与非同辈的一个亲戚，70岁左右，退休前是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和陈医生搞的那个研究还是很有意思的。费伦告诉我，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找不到中医说的经络和穴位存在的具体证据。后来有人发现针灸的时候，穴位周围会聚集大量的钙离子，针对这种现象，费伦他们运用物理学的道理和解剖学的办法，在实验室里用科学仪器进行试验、分析，找到了可以表明穴位和经络存在的证据。这一发现“可能会对中医的研究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中医经历几千年能流传下来是有道理的，它为老百姓解除病痛，特别在农村，起了很大作用。我在大瑶山受伤的时候，当地一个土郎中给我治疗，他对我作了一番检查之后，给我吃了一粒红色的药丸，说吃了这粒药以后就不要紧了，不会有危险了，一定能活下来。我的左脚趾骨被挤压得重叠在一起，他要把骨头拔出来，他事先说明，拔得出来就能医好，拔不出来，就不好办了，别人也不会有什么好办法。可是拔的时候，得忍得住痛。这个郎中是有武功的，很有劲道，他用力拉我的脚趾，真是痛得要命，叫我尝到了什么叫‘痛’的滋味。他搞了半天，没拔出来。后来我住进广州柔济医院，医生用外国办法，开刀，结果也没彻底治好，这只脚到今天还是这样。”

“还有一次是解放初期搞民族调查的时候，我从马上摔下来跌坏了腿，当地的一位医生给我治疗后贴上膏药，第二天基本上就好了，照样能够走动，简直有点神奇。我想老百姓中间一定有很多高明的医生和‘神奇’的药方。回北京以后，就给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写了封信，建议卫生部要多多保护民间优秀的医生和发掘那些有奇效的药方。”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特异功能”。在所谓的“特异功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一些“气功大师”到处表演他们的神功，听说不少高级人物都去看过，褒贬不一。可是我没有听说叔叔去看过这类表演，也没听见他对这些东西说过什么话。就脱口问他是怎么看待“特异功能”的？

他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其实对自己，也就是‘人’自身的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我的老师史禄国认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和大自然非常亲近，所以那时候的人会有一种自然的、特别的内在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现在不行了，因为人类离开自然越来越远，这种能力越来越弱了，但是这里边还会有一些现在虽然不再表现出来，而实际上还在发生作用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很多被归到宗教里去了。记得史禄国说过：‘心理学之外还应该有个东西’，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没去多想。现在年纪大了，慢慢领会到了其中的含意。”

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还记得跟你讲过的‘灵魂出壳’的故事吧。那年端午节我正在嘉兴，嘉兴的粽子是有名的，我又喜欢吃。这天吃饭的时候，我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粽子，突然觉得夹筷子的右手抬不起来了，想要夹盘子里的粽子，可是手不听话，就想转身告诉坐在旁边的宗惠，告诉她我大概出什么问题了，但是身子转不了，也张不开口。这个时候我脑筋是很清楚的，却指挥不动自己的四肢，好像‘我’跳出了自己的身体，站到了一边，站在一边的‘我’已经不能指挥我的身体了。正常情况下，大脑指挥人的一举一动，而现在大脑很清楚，但是指挥不动了，就好像它已经离开了这个‘人’。大概这就是所谓灵与肉分离的感觉吧。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猜古人‘灵魂出壳’这个词，就是这样造出来的。还有，所谓人类特有的‘心态’、‘精神世界’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摸不着、看不见，虚无缥缈，也许将来会有什么仪器能够‘捉住’它。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史禄国把生物现象放到社会和文化里面去看，把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精神境界都放到自然现象里去研究……我到现在也还不能完全懂得他的意思。我对‘特异功能’没有研究过，不好说什么话。不懂不要装懂，说话是要负责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老实说，我听了好像明白，又好像没明白。

“实际上我在民盟没做什么工作” 有一次，叔叔说起当年在燕京上学时，

学校里学术辩论的气氛很浓，他说：“在社会科学圈子里就有好几个学术团体，一些学历史学的人成立了一个‘神州国光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讲中国社会史，那时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两种思想斗得厉害，双方论战激烈。他们的争论引起我很大兴趣，从某个角度讲，这些争论加强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决心。在论战的人里边，我最佩服的是顾颉刚，他写的《古史辨》我都认真读过，他用民俗资料来印证历史和他的历史地理学都影响过我，后来我写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就是以地方志为根据，观察结婚时新郎要不要去迎接新娘这样一种民间风俗的地理分布，来看文化的变迁。

记得我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看到他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只有中华民族一个民族，其他民族都是汉族的分支。顾先生是我敬佩的老师，彼此也熟悉。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于是就写文章反驳。没想到文章一登出来，顾先生一连写了几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从而引起一场争论。后来还因为我的看法与当时政府的政策相悖，险些酿成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想想，顾先生这样说是与当时抗日的局势有关，提出一个民族的说法，是另有深意的。那时我还年轻，没跟别人商量，也没多考虑就写文章反驳他。

说起来很有趣，我出生的第二年清王朝就被推翻了，按理说刚刚摆脱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社会上应该到处充满了民族矛盾，但事实上没有。我小时候对自己是汉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识，懂事以后，知道有回民、有满族，不过也只注意到回民不吃猪肉，要做礼拜的规矩，把它当作一种风俗，一种宗教，重其教而不重其族；对满族则知道旗人可以做大官，有特权，重旗而不重满，并没有把族当作政治概念来对待。

如果再往前看，虽然清朝初期曾经发生过留发留头的问题，但是后来这种矛盾减少了，甚至民间还流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找外婆的故事，证明满族和汉族有血缘关系，用来冲淡民族矛盾。明末清初有反清复明的口号，清朝末年有太平天国起义，但是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得并不很强烈。

孙中山的同盟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里面也有驱逐异族的意思，

但是他始终强调革命最要紧的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他说过就是汉人为君，也不能不革命。孙中山也提出过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概念，但是他强调民族意识，是受到西方思想和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影响，主要还是用来对付西方帝国主义的。这些人认为中国就是中华民族一族，其他的都是汉族的宗支。

那么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民族问题的呢？可以说是从进大瑶山与瑶族接触以后，少数民族这个概念才在我的脑子里比较清晰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了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应该说，那时搞的民族工作，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东西，而是学苏联的那一套。苏联是很讲民族平等的，搞成联邦制，苏联最多时有190多个民族，到20世纪70年代减少到一百零几个。其实他们的民族问题远未解决，民族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说过，不能样样学苏联，这样学苏联就不要革命了！所以我们在民族问题上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而坚持了统一国家……

不说这个了，话再说回来。那时候学术界的头头是胡适，第二号人物是傅胖子，傅斯年。学术界里还分派，讲究谁是谁的学生，看重师承。像我就是吴文藻的学生，吴文藻和冰心在燕京有一定的势力，所以我在燕京也吃得开。吴文藻看上我，冰心欣赏林耀华，林耀华和我一直在暗斗，看谁好。后来他入了党，反右时批得我很厉害。

抗战时期，我、吴晗、闻一多、冯友兰这些人同其他年轻人一样，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我的这种思想，可以说小时候就受到大哥的影响，大哥那时是很进步的。后来我加入了民盟。民盟历史上有三党三派^①的说法，我哪一派都不是。反右时，他们说我和罗隆基一派，真是瞎搞。罗是想做官的人，对政治有很浓厚的兴趣。当时入盟的人里面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想执政，有的想做官。我们几个人反对做官，当时大家都讲好，不当官，要教书，我们要的

^①民盟成立时……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至此，民盟有“三党三派”之称——《党政干部统一战线知识读本》第55页。华文出版社，1999年。

是民主,要议政,想让当局听到我们的声音,希望用我们的想法来影响政治,所谓为王者师嘛,并不要执政。当时吴晗在清华很活跃,他老婆是共产党员,所以跟共产党的关系很深,我跟吴晗来往密切。刚解放的时候可以说我们还有些政治野心,觉得民主党派在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中可以起作用,吴晗也觉得自己在党里的地位比较稳了。有一次我们谈起民盟工作,按吴晗的意思,北京市民盟由我负责,所以在北京市的盟务方面我出过不少主意。

北京解放前夕,共产党通过张东荪安排我、雷洁琼和她的丈夫严景耀到西柏坡参加政协筹备会。张东荪这个人热衷于政治,跟共产党和国民党上层都有联系。我在燕京的时候听过他的哲学课,觉得他讲得不好,考试的时候只给了我70分,这是我从来没有得过的低分,所以对他不满意,但是他一直对我不错,彼此很熟悉。

在西柏坡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时候毛泽东很有魅力,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佩服他,他的诗也写得好,很有才气。可以说,西柏坡之行使我的一生起了变化。解放初期我在清华教书,待遇、条件都不错,朋友也多。共产党方面的彭真和李维汉拉我拉得很紧,彭真想要安排我去北京市政策研究室。李维汉是国务院秘书长,说话算数,在党内抓民族、统战工作,我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起作用,结果李维汉把我要去了,从此走入仕途,在这件事上,不是我的选择,是共产党决定的。关于这样的安排,周恩来没有跟我单独谈过话。



▲
叔叔同尚铖(左)、吴晗(前)在一起。

1957年的反右运动给了我很大打击，所有的想法都没有条件实现了。“文革”后，民主党派的地位同从前不一样了。有一段时期，我彻底放弃了民盟。胡愈之死前要和我谈话，但没来得及谈，他留下了话要我干，我实在不想干，于是推出楚图南当民盟主席。

当时我还是想在学术上站得稳一些，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一直拖到1987年才到民盟。实际上我到民盟以后没做什么工作，只不过出点主意，具体事情都由高天他们去做了。不过我还是把盟内的一些老人请出来做事，在这件事上面，大家意见不一致，所以至今云南民盟的一些同志对我有意见。有些老人在盟内拉关系，这样做不好……今天讲到这里，明天再讲。”

叔叔走了以后，我把他当选民盟中央主席前后的事，串起来想了想，理出这么一条线索：“文革”结束，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这个时候叔叔回到家乡搞调查，看到家乡的“乡村工业”正在迅速崛起，衰败的小城镇渐渐复苏……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是他早年所憧憬的，这些社会变化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就把自己研究的重点放到了家乡的农村。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思路不断开拓和提升，研究范围跳出了江苏，向沿海和边区推进，他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1989年在回顾几年来的收获时，他不无激动地说：“这四年对我个人来说，应当肯定说是一生中兴奋点最高的四年。我之所以兴奋，是在于看到了个人的思想不仅可以反映社会现实，也能对社会改革发生推动作用。”

我想，正在叔叔从学术研究中感到无比“兴奋”，下决心搞出点“名堂”来的时候，要他分神去担任“实在不想干”的民盟主席，应当说他的推托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最后他还是挑起了民盟主席这副担子。

叔叔说在民盟“实际上没做什么工作”，其实并非如此。担任民盟领导人以后，他紧密联系盟员，记得有一次在东北某地，叔叔与当地盟员同志见面——这是他给张秘书定下的“规矩”，到外地出差，只要时间允许，一定安排他和当地民盟同志见面。见面时有位盟员抱怨他们单位党委不重视民盟，在作决策

时不听取民盟同志的意见。叔叔听了以后对他说，你要人家重视你，首先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第二，看你提的意见有没有道理，不能每次开会就发牢骚、挑毛病，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而是要提出事情应该怎样办才能做好的意见。你提的意见有道理，办法好，对人家有帮助，人家自然会重视，会主动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谁喜欢老听你发牢骚、挑毛病？

当了主席以后，他审时度势，提出民盟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为政府“出主意，想办法”，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并巧妙地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民盟工作结合在一起，引导全盟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把民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虽然他的主张和做法开始的时候，遭到不少盟员的质疑，说这样做像个群众组织，不是政党了。经过几年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参政、议政的好路子，终于取得大家的共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民盟在新形势下的工作。

我觉得，这12个字可不简单，它是叔叔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里边包含了很深的意思。

“我老了，什么都干不动了”第二天叔叔到我房间坐下后说：“接着跟你讲昨天的话题。1986年，胡耀邦要我陪同他访问欧洲四国，这次出访很顺利。出访期间，我们天天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他身上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①，觉得他还是比较了解我的。当时上面有意思要我出任国家副主席，也跟我谈了，可是回来以后，时局发生了变化，胡下了台。”

“你什么时候认识胡耀邦的？”趁讲话停顿的一刻，我插了一句。“要说认识可能很早就认识了，但只是见面时点点头、握握手。后来他做的几件事给我

^①当时叔叔并未讲什么具体事例。后来读《思念依然无尽》，其中的一段话似可作为叔叔这话的注脚：1986年，父亲出访西欧，特意安排著名学者、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教授参加代表团，并请他自始至终参加研究出访计划。费孝通准备了一篇在英国的讲演稿，送给父亲审阅，父亲摆着手说：你是教授，你自己要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就不看了。访问中，父亲还请费孝通出席每一场记者招待会，当记者提到有关计划生育等问题时，父亲就请他回答。特别是在参观时，父亲走得比较快，但他常常问道：“费老跟上了没有？”若没跟上，他总要停下来等一会儿。费孝通感触颇深，之后对人说：什么叫民主党派参与国家大事？我看这就叫参与。这绝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摆样子，而是真正的参与。——满妹著《思念依然无尽》第423页，北京出版社，2005年

做出
主意想办法
好事做实事

费孝通
二〇〇五年五月

▲
叔叔手迹

①胡耀邦1983年11月5日所作的批语：发展小城镇这件事，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接触过，我也是蜻蜓点水，因此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更不可能拿出一套正确的措施，既然拿不出，就不必急忙作决策，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推行，凡属不成熟的事硬着头皮去干，事情必然成不了功。我在这方面吃苦头是很多的。但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有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吴修平著《信念与探索》第340页，群言出版社，2001年。

印象很深。第一件就是他主持‘改正’。现在大家觉得右派改正好像是很容易的事，其实并不是这样，这里边‘斗’得很厉害，直到现在还留个尾巴嘛。第二件是‘文革’后不久，有一天他突然来民盟机关，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次见面时他说民盟是共产党之外的一个知识分子政党，肯定了民盟盟员是爱国的，是学有专长的、正派的。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共产

党高级领导人之口，还是第一次。有一次，我和他谈话，听出来他脑筋里很重视‘家庭’，把家庭看成是社会的细胞，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个看法我是很赞同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里把人民公社改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下子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就是这个道理。再有就是没想到他对小城镇早有研究，对《小城镇 大问题》这篇文章会感兴趣，并且写了一段批语^①，他的批语推动了大家对小城镇问题的重视和研究。

胡耀邦之后，党内民主更进一步，邓小平提出废除最高领导人终身制，领导人到一定时候要退下来，他自己这样做了，江泽民任期满了以后，也不再连任，看来以后胡锦涛也会这样做。”

“你什么时候认识邓小平的？”

“最早应该是在西柏坡，但是留下的印象不深。后来我和中央访问团去贵州的时候，他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我们去了以后，他请我们参加西南局的政务会议，要我们‘多参谋参谋’，还请吃饭。我觉得邓小平一直很‘厉害’，当时大家在民族问题上，一般是强调民族差别，承认少数民族同汉人不同。但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邓小平认为‘不要强调得太厉害，要摆稳’。他的意思是说，汉族还是主体，要摆稳民族关系。我记得他是在吃饭的时候同我讲了这个话。他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他当时想把我留在西南，对我讲，你不要走了，你要去哪个大学，就去哪个大学。当时有个华西大学，他想让我去做校长，但是李维汉不同意，要我回北京。

话再说回来。党内民主有了变化之后，党外，也就是民主党派的情况会怎样？看来目前还没有什么变化。我看民盟盟员教教书还可以，治国平天下，不行。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还形不成什么政治力量。新的力量还没有形成，‘上边’讲话，‘下面’举手，这是中国的老办法呀，在这个时代里怎么行得通！

总的说，这20多年来我们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从全世界

◀ 与胡耀邦同志亲切交谈。

▶ 谒胡耀邦墓

上看，地球上美国这样的国家，它要限制中国的发展，这个国家又有一个‘牛仔’总统，但愿这个总统明白，千万不能用对付伊拉克那样的办法来对待中国啊，这可是件大事。

我老了，什么都干不动了，不过还好，这20年里我还是做了一些事——在允许的范围内做了一些事——这是我一生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些事够我做的，做都做不完，而且都是对国家、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我知道有人不同意我现在的做法，但是不去管他，毁誉在人口嘛，不能再浪费时间了。现在回过头看，我早年的一些提法有点‘超前’，路子是对的，可是一时还行不通。”

我说：“依我的理解，你早年主张用赎买政策对农村进行改革，就是政府花钱把土地从地主手里买过来，分给农民，再想办法迫使地主把拿到的钱投资到生产上，用这个办法来缓和社会矛盾。一句话是不要使用暴力。可是共产党主张武装革命，把地主的地夺过来，跟你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为什么解放后他们会用你？”“也许是他们看中我反对蒋介石，而没看到我早年写的那些文章吧。那时候我反蒋还是很厉害的。1942年我们十个教授去美国访问，出国前要我们去培训班，我不去，后来他们讲好话，答应我不作一般团员对待，不听课、不出操，去一个星期，到一到就可以，这样我才去了。在团里给他们介绍过关于英美社会礼节的常识。训练班结束时，蒋介石请我们吃饭，他问我读什么书？我说读我这一行的书。他说，你得学点中国东西呀。我说，我对中国东西不懂。其实我是有意这么说的，根本不买他的账，不要他抬举我。这个人像上海滩上的大流氓，手段下作。”

说到“反蒋”，忽然想起我的岳父讲的一件事，我说：“晓燕的爸爸解放前是‘城工部’的人，一直在北京出版界搞地下工作，听他讲，他就收集过你的文章，并且把这些文章送到解放区去。看来，他们对你的言论是很注意的。”

这天叔叔的精神很好，谈兴甚浓。我又问他：“听说有人问梁漱溟，民主党派人士中，对谁的印象最好？他说是费孝通，还说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都通，近年深入农村工矿调查，使他更通。他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你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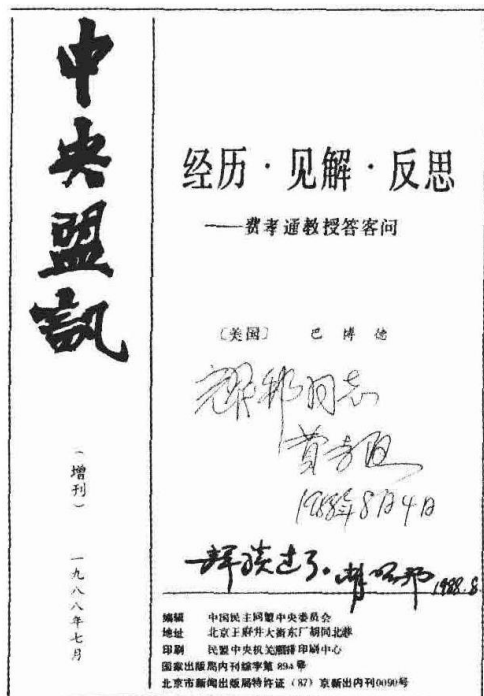
道这个事吗？”叔叔说：“我也听人说过。我跟梁漱溟很早就认识，记得我大学毕业后，曾参加过他在邹平搞的乡村建设，但是没引起我的兴趣，他的东西对我早年影响不大。后来我参加了民盟，他是民盟的秘书长，但是我们接触不多，没有什么私交，解放后接触才比较多一点。特别是出事后（指人大会上梁顶撞毛泽东），觉得他能这样做很不简单，也很同情他，可是觉得他‘傻’了一点，不必和毛正面发生冲突嘛。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这人很‘厉害’，是个有思想的人。他的不唯上、不唯书、不唯经、不唯典的精神令人钦佩。

记得有一年（1988年），我们在香港召开一个‘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研讨会，本来打算请梁先生参加，研究中国文化是他的本行，但是考虑到他年龄大，身体又不太好，长途跋涉太累了。我就出个主意，要他在家讲，民盟派人去把它录下来，带到会上放给大家听。没想到，等我开完会回到北京，梁先生就去世了。

现在看出来，我们还是一条线上的‘东西’。总的讲都不是‘革命’这条道路上的，而是承认传统、主张逐步的，不是激烈的变革，可以说是改良主义吧，但这个词不好听；我们还都认为，中国文化要适应新的世界、新的局面，同样，西方文化也要适应这个变化，大家相互适应。这叫‘磨合主义’，东西方文化要相互磨合，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文化。总之我是很佩服梁先生的。”

话音刚落，荣华推门进来，说是该去按摩了，搀着叔叔回客厅去了。我望着叔叔老态龙钟的背影，突然生出这样的想法，他不主张“激

▼
1987年7月孝通叔叔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人类学教授巴博德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巴博德将这次谈话整理成《经历·见解·反思》一文。民盟中央认为，这篇文章“是费老敞开心扉畅谈他50年来的坎坷历程，以及他对个人和整个民族这段历史的反思……”因此在1988年7月将这篇文章以《中央盟讯》特刊的形式刊出。1988年8月4日，孝通叔叔将一本签有自己名字的《中央盟讯》特刊送到了胡耀邦手里。第二天——8月5日，胡耀邦在这本《盟讯》上，写了“拜读过了，胡耀邦”。





▲ 叔叔十分敬重梁漱溟先生，1991年到山东考察，特意将梁先生最后一次讲话的录音带，送给邹平县梁漱溟纪念馆。考察间隙，叔叔去凭吊梁漱溟先生。从下车到墓地，要上二百多级台阶。他让张荣华搀着，硬是一步一步走上去来到墓前，向梁先生敬献花圈、鞠躬，然后缓缓绕墓一周，肃立墓前。

烈的变革”，是不是与他温和的“性格”相一致？他是个“软心肠”的人啊，看电视都不喜欢看“悲剧”，当然更不愿看到打打杀杀的暴力了。又说自己的“一些提法有点超前，路子是对的，可是一时还行不通”，我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业下

乡”、发展“乡村工业”这个主张了，它“超前”了30年；还有，1983年打算和黑龙江省的同志探讨的“移民”和开发北大荒那个问题被婉拒后，过了12年才成为黑龙江省“发展战略”上的思路；他提出的黄河上游、黄河下游、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方略；建设一个“深圳式的上海”还是“香港式的上海”等问题上，都有很强的前瞻性。

在他那个学术圈子里，我知道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李亦园教授说过，费孝通先生“提出一个命题，做出一个暗示，可能会引导后人跟上来，接着往前走”。他说，看了费先生最近写的文章，感到“很有意义，忽然就提出一个人家想不到的事情，启发了人家的兴趣和思考”。李教授的话让我想到叔叔躺倒在病榻前完成的那篇《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这是一篇作为“设计师”的孝通叔叔，为社会学、人类学这门学科今后还应该研究些什么而写的。起初我想，这篇论述一门学科今后如何扩展学术研究的文章，读起来一定会佶屈聱牙、莫测高深，看都看不懂。但是当我读了这篇文章后，发现老先生用了“只能意会”、“讲不清楚的我”、“将心比心”这样风趣而通俗的语言，把那些高深的道理说得

浅显易懂，让我这个对社会学一窍不通的人读了以后也觉得，中国社会学的确应该按照他所指出的方向去做，这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掘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

真希望老先生提出的“命题”和“暗示”，“会引导后人跟上来，接着往前走”。

“主早就告诉我你会来这里” 有一次我问叔叔对当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满意不满意？他说，现在中国的社会学还没有形成一个统领得起来的、比较“完整的思想”，吴文藻提出来的“社会学中国化”还没有真正实现。北大100年校庆的时候，我们请了几个一流的外国学者来讲课，如果拿他们的水平来比，说老实话，我们的水平还很低，我们的基础知识还不够，而且取得知识的手段也很差。年轻的一代里还没有领头的。现在国外有人说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级大国，好像我们各方面都很好了，其实是在给我们戴高帽子，切不可上当！学术上也一样，不要以为国内哪本杂志登了你的文章就了不起。不稀奇，要到国际上去比一比，你的文章抵用不抵用，那才是硬碰硬的。

这时叔叔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如果我现在30岁的话……”突然停了一下，话锋一转，接着说：“算起来30岁的时候，我正在昆明。当时吴文藻搞了一个‘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吴老师去重庆以后我接了班，负责这个站的工作。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工作站从昆明搬到了呈贡县古城村，在村外找了个没人用的破庙办公，这个庙叫魁星阁，是过去人们供奉‘魁星’的地方，这是个保佑‘知识分子的神’，所以工作站得到了‘魁阁’这样一个绰号。

这是座三层楼的古庙，周围风景很美，里面却十分破旧，地板踩上去嘎吱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子，叮得人浑身发痒。我们把一层作了厨房，自己开火做饭；二层摆上桌椅办公；三层当宿舍，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他们就在这里安顿下来。我没有住在魁阁，那时小惠快要出生了，只好在县城里租了一间下面是猪圈的房间住。”

“这样简陋的条件你怎么讲课呀？”我问。

“我不正式开课。那些学生都不是在读学生，他们是联大或清华的毕业生，是助教待遇，但是都不满意老的一套讲课方法——先生讲学生听，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做学问的新路子。我就把马林诺斯基那套“席明纳”搬来，用讨论的方法，由学生依照自己的兴趣提出问题，想出研究的路子，然后下去观察、调查，各人做各人的题目。过一段时间再集中起来，一起谈感受，念论文。我谈我的看法，他们讲他们的道理，互相争论，共同研究，无拘无束，有时还会因为观点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跟我到禄村蹲点调查的张之毅，就是因为对这套方法感到有意思，才参加进来的。另一个谷苞，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在国情普查研究所任助教，因为不喜欢人口学与统计学的工作，就来了。这里边有几个人和我的年龄相差不很大，谷苞只比我小6岁，属于同一代人，我们都希望干出点名堂来。

我们研究的范围很广，张之毅跟了我搞农村调查，谷苞研究地方社区的行政系统，田汝康到一家国营工厂调查女工情况……”

“那时候你们是怎么搞调查的？”我突然想知道叔叔五六十年前搞调查，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选定题目以后，就想各种办法去联系。有时候我们打着云南大学的旗号，通过县乡政府跟有关单位接头，向他们讲清楚调查的内容、目的，有什么意义，最后还要商量吃饭、住宿一些细节，安排妥当；我们也利用私人关系来打开局面。像田汝康就是因为跟工厂管事的人相熟，能方便地住到工厂里接触到女工。后来写了《内地女工》的调查报告。

我从英国回来以后，急着想找个地方做调查，但是初到那里，人地生疏，去哪里做调查？一时没着落。说来也巧，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燕京大学的一位老同学王武科，他的老家在离昆明大约100公里的禄丰县，而且是个‘大户人家’，当他知道我正为找不到调查地点发愁时，便把我带到禄丰他亲戚家里，没想到一到那里，见到了我的一个姨母，一见面她就说，主早就告诉我你会来这里，所以在这里等你。以前就听说这位姨妈会‘算命’，这次让她算对了。她是基督徒，一年以前就到这里传教，村里人都认识她。我在禄村住下后，凭着

王家和姨母的这层关系，可以很方便地和村里人打交道，他们也愿意跟我说真话。

可是后来去的易村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是硬闯进去的。易村离昆明大约150公里，不通车，很少有外地人进去。我和张之毅先是乘了一段汽车，然后骑马，跟着马帮进山，短短的150公里路，竟走了六天。一天马帮在滇池边的一个寨子里过夜，没地方住，我们就在一座破庙的菩萨脚下搭个铺。月亮慢慢爬上屋顶，月光透过残破的墙壁照在菩萨身上，四周一片寂静，这种感觉真是很特别。还有一夜，我们在一个村里的小学借宿，清早告别的时候，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教师硬要塞给我们十几个鸡蛋，说是带在路上吃……这些事我一直记得。

到了易村，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两个陌生人突然闯进村子，引起了村民的疑惑、反感，甚至不安。到了新地方，先要找个住处，村里人领我们到一处挺宽敞，但显然已经很久没人进去过的屋子里住下。我觉得有些蹊跷，对张之毅说，这里面一定有‘道理’。后来与村民混熟了才知道，原来这是一间经常闹鬼的‘鬼屋’，村里没人敢住，他们想让鬼把我们吓跑。我们住下后就找村长说明来这里的目的，并保证不会扰乱他们的生活，消除了村民的疑虑，才得到他们的信任。

那时我在云大和西南联大有课，不能在易村久留，十多天后就回昆明了，留下张之毅一人，最终由他完成了调查，写出《易村手工业》。之后，又去了玉村，写了《玉村土地与商业》。”

“这样跑来跑去要花不少钱啊，经费从哪儿来？”

“吴文藻从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和农民银行那里搞到一些资助，很少，又在打仗，物价涨得厉害，不要说大规模的调查没办法搞，买胶卷、参考资料的钱也没有，就连日常办公用品都买不起。写了报告，没有钱出铅印本，只得自己刻蜡版，用油印机印。我从英国回来时节余的大约100英镑，也都花在了这上面。这里可以讲一段插曲：马林诺斯基为了通过我的毕业论文，在家里安排了一场考试，考官是当时英国最有名的‘东方学者’丹尼森·罗斯爵士。罗斯来了以后，两人东拉西扯，根本不提论文的事，直到最后，马林诺斯基才

提到考试,罗斯好像“恍然大悟”那样,说他老婆已经看了我的文章,觉得很好。看样子他连我的论文看都没看,就这样一句话,算是通过了。罗斯走后,马林诺斯基请我吃饭,他告诉我,罗斯是英国研究东方学的头头,中国虽然不是他研究的重点地区,但也属于他的‘地盘’,现在我们人类学要‘入侵他的领地’,不经过他点头是不行的。他答应来主持并通过你的考试,表示他认可人类学进入‘东方’这块领域了。马老师又说,《江村经济》只是我研究中国农村的开头,用这个方法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宗教、意识形态、语言等。说完他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和伦敦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商定出版我的论文,出版商提出要他写序言,他答应了。放下电话后就考虑起这本书的书名,先说这本书可以叫Earthbound(土地所限制的)……但随即又改变主意说,你的第二本书叫这个名字吧。后来马老师写的序言得到了50英镑的稿费,我走的时候,他把这笔稿费作为礼物送给了我。

考试一结束,我就准备回国。那时候规定公派的留学生回国,可以买二等舱的船票,票价70多英镑。为了省钱我买的是四等舱,只花了16磅,这样加上马老师送的50磅,回到昆明的时候我口袋里大约还剩下100英镑。有这100英镑打底,我就到禄村去了,后来张之毅参加进来,我带着他走家串户,同农民打交道,告诉他怎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可以说,在魁阁像这样手把手带的学生,只有张之毅一个人。

那时候条件虽差,几年下来,居然搞出了一批东西,除了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之外,还有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的《话城镇的基层政权》;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庆汉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

我们的工作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许烺光来了,太平洋学会的人也来了;还来了一些外国人,我记得有李约瑟,他对我们的评价还挺好,还有费正清夫妇,他们参观时看得很仔细,回国后为魁阁做了不少宣传,所以魁阁在国外的名声比在国内响,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味道;后来太平洋学

会出版了我们的一本书。这些事情促使 1943 年我能够作为云南大学教授，被派到美国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

在美国期间，我花了不少时间把《禄村农田》和《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翻译成英文出版，书名就用了马老师起的第二本书的书名 Earthbound China（《被土地束缚的中国》）。我还把另一篇魁阁论文，史国衡的《中国进入机器年代》编译成英文出版。顺便说一句，这 20 世纪 40 年代问世的英文版 Earthbound China，直到 1990 年才以《云南三村》为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了中文版。

抗战胜利以后，时局更加动荡了，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人民反对，昆明的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爆发了‘李闻事件’。我也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费正清的老婆费慰梅的建议和安排下，于 1946 年底跑到英国暂避。本来是要到美国的，但是杜鲁门上了台，不好去了，才改去英国。

这时候，魁阁的那些人，也由于各种原因都先后离开了。延续了六年的魁阁在这样的局面里收场了，这个收场好像是个没有‘结果’的结束。”

叔叔讲完，回他的房间去了，我却还在想他讲的“魁阁”。听得出叔叔对“魁阁”十分留恋。记得 2000 年他到昆明参加一个“高级研讨班”，会后不顾旅途劳顿，特意回魁星阁探访。这天上午，我随叔叔来到这座四角飞檐的古庙前，虽然这座古建筑已被当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屋顶上黄色的琉璃瓦已经斑斑驳驳，长满蒿草，外墙壁风化剥落，一副破败的样子。然而叔叔一到，就让荣华扶着，迈过高高的门槛进到庙里，这边看看那边摸摸，还指着楼梯说，“那时天天爬上爬下，现在爬不动了”，显得很兴奋，似乎年轻了几岁。离开时他要我为他和宗惠在魁阁门前照了相。

我很理解叔叔为什么如此留恋魁阁，因为在那里他获得了学术上的第一个丰收。他一边教书一边调查，他所推崇的“亲身实地观察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在魁阁得到运用。在叔叔身体力行的带动下，这支小小的科研队伍已经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工作风格和学风，有人评价说，这个集体“大体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

这个时期也是叔叔学术上的丰产期。他在《今日评论》、《星期评论》、《当代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同时开始动手写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著作。

“魁阁”是叔叔心血的结晶，他希望上世纪40年代末收场的魁阁没有“结束”，魁阁的学风能够延续下去！然而中国的社会学停顿了20多年，“断档”了，青黄不接。他认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学生多了，然而有的年轻人从国外学了一些新名词，回来后生搬硬套，写出的文章让人看不懂，反倒说人家“水平低”，这不是好现象。当前需要的不是一心想自己成名成家的人，而需要“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叔叔虽然心急如焚，希望用前辈“开风气，育人才”和“身教重于言传”的精神，用自己的行动来重振“魁阁精神”。



孝通叔叔与他的学生。左三即“魁阁”时期学生谷芭。

可是现实并不如人意，叔叔没有能看到自己心里所期待的学生出现。他认为这些年来，自己培养成功的学生还没有出来，“物色已久，都是半路不对了”，他曾无奈地说：“凡是我真心希望学生做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做出来。我落空了。”

但是叔叔相信，他一生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章，就像种子一样播撒在了中国大地上，这些种子如果“落入一些乐于培植的心田，说不定在今后的日子里会长出美丽的花朵”。

我们期待着。

活着脑筋就停不下来 一天，乘电梯上14楼吃早饭，叔叔突然冒出一句：“我想回家。”宗惠听了说：“现在还不行，北京每天收治的疑似病人还有好几十人，等降到‘个位数’时再说吧。”

我非常理解老人家被困在这里的心情，这种抑郁的情绪不仅仅是因为单调的生活，其中还有因为年老而引起身体和精神上的种种变化。在跟我聊天时，叔叔好几次提到感觉自己已经衰老，体力下降，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兴趣。甚至他还想过，如果摔一跤，突然“过去”了也好，从此丢开一切，不闻不问，但是又做不到。话虽然这么说，其实老先生对世界上的“风吹草动”都极为关注，头脑一刻也没停过，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活着脑筋就停不下来，就想看，而且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又看不懂。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了，知道它一定会变，可是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很快，人类下可到海底，上可达太空去寻找资源，人类会走到哪儿？

他还说，看这世界多有意思，“两霸”的时代已经过去，其中一霸，美国“衰”了，它欠债太多，“空”了。两只“脚”，一只陷在中东，一只陷在苏联，都拔不出来；另一霸苏联，已经“散”了，到现在还没起来。两霸都无暇顾及我们，我们要趁人家不来干扰的时候，赶快把实力加强起来。如邓小平所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这样一个大国，总统简直像个牛仔，胆子大，什么都敢

干。“9·11”事件发生时，我从电视里看到那两个大厦的倒塌，心里想，这是给人类文明的一个警告，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应该深刻地想一想这件事发生的根源，是不是西方文化出了问题？没想到布什把它当作一件刑事案，要抓凶手，凶手抓不到，就出兵伊拉克，他也不想以后怎么办？人心不服啊，结果恐怖活动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厉害；美国与法、德不和，各打各的算盘，影响很大，欧洲却联合成了欧盟，结果会怎样？看不出来……世界上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可是我已经没有精神去搞清楚了。

记得1999年春节，我给叔叔拜年时，他对我说：“按旧历的算法，过了节我就90岁了。70岁的时候我不服老，能到处跑，真的是‘不知老之将至’。可是岁月不饶人，进入80岁以后，我感觉到老了，做事力不从心，许多事要靠别人帮忙了。进入90岁，老实说，我心里有点‘害怕’，毕竟年纪大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是想做的事情还不少，怕来不及啊。年过90，应当承认我一生已进入衰老阶段，躯体和四肢都已不能自如地活动，但头脑还觉得能够思考一些问题。有朋友建议我写自传，其实，我一生所写下的文章就是自传，不必再另外写了，倒是可以写点‘杂俎’一类有意思的小东西，不过怕没时间。我还是要用剩下的时间写一些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分量的东西。”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叔叔满了80岁以后，精神大不如前，我开始听到他抱怨自己的眼力退步，看书吃力了、听力下降，和别人说话，要大声讲才听得见，身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抱怨得最多的是感觉腿力不济，走不动路，不好下乡了……虽然年龄的增长给老人带来了种种苦痛和困难，但是他仍然没有停下“行行重行行”的脚步，没有搁下手中的笔，“脑筋”始终没有停下来。这些年，叔叔对我国经济发展、民族格局，对华夏文化、世界文明等课题，进行了深刻的观察和思考，留下了大量的著述。

当年陪同叔叔在江苏搞调查的老朋友朱通华先生说：费老70岁到90岁的20年间，一直在下面跑，在问，在写。他从学部委员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又回到一介书生。他虽然拥有显赫的高位和荣誉，

但没有成为贵族，没有到殿堂去享受荣华富贵，没有养尊处优，一直在下面跑，在想，在写，在关心国家大事。他一生志在富民，重在农村，矢志不渝。这是特别值得尊敬的。

日前，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称：“2000年达90岁高龄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后五年中发表了11篇论文……‘更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奇迹’。”^①

2004年叔叔病倒了，不能写、不能说了。有一次我去医院看望他，见他精神还好，就问他“这次生病，是不是又想了很多新问题？”他歪歪斜斜地写了“多得很”三个字，但是已经没有力气把这些想法写下来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叔叔的脑筋仍然没有停下来。

“说起反右、‘文革’，你总是几句话一带而过，为什么不多讲几句？”“你的孩子在干什么？”这天一落座，叔叔冷不丁问了这么一句，我一愣，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问过孩子的事情，今天突然问起，真有点出乎意料。我据实作了汇报，并解释说，两个孩子具体在做什么我不太清楚，他们不跟我说，不要我管他们的事，我也乐得不管。不过我知道他们对念书都不感兴趣。叔叔点点头说：“第三代的事情我是不管了。看看现在的社会，变化实在太大了，和我们念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对年轻人来说，要能安下心来读书，很难，外边的诱惑太厉害了。我们费家下一代‘读书’的人不多了，不过，不必非读书不可，干别的也一样，做生意、办工业，会赚钱也不容易。”接着他问我近来工作得怎么样？我告诉他我已经退休了，他吃惊道：“怎么，你都退休了！”“我退休

^① 2007年9月27日北京《新京报》C10版。

五六年了。这些年有机会在你身边干活，自己觉得有点长进，但长进不大。年轻的时候没有受到系统的专业训练，后来又没有抓紧学习，知识水平很低，所以现在干起事来很吃力，不能多帮你点忙……”他打断我的话说：“你是不是对没能上大学心里一直不舒服，其实不必，这就是历史，已经过去了，多想也没用。现在你的文章写得还可以嘛。”我明白叔叔是在开导我，鼓励我。这些年来，在他的教导下，我从整理不了他的讲话，到勉强写出来，再到写得比较顺手；送给他审定的稿子，也从每一篇都被改成“大花脸”，到渐渐地“干净”一些了。记得有一次他看了我整理的讲话稿后说：把在台上的讲话写成文章，不是原封不动把讲的记录下来就算了，一定要“加工、整理”。我讲话的时候可能“跳来跳去”，想到什么说什么，写成文章就不能这样了，要有“取舍”，不然人家会看不懂。还说，写东西要“调皮”一点，不要什么都讲出来，那样就没意思了，要“留有余地”……

这些年已经成了习惯，当稿子从叔叔那里退回来时，我最先看的是被改动的地方，然后读几遍，仔细揣摩为什么要这样改？为什么用这个词？我觉得能从这里边学到很多东西。在叔叔的指点下，我有了一点长进，今天听到他这样一句表扬和鼓励的话，我很开心，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顺着这个话题我问他：“说起反右、‘文革’这些问题，除了你跟巴博德的谈话里讲得比较多一点之外，在其他场合或文章里，你总是几句话一带而过，为什么不多讲一些？”略一沉思后他说：“这些事情太复杂了，弄不清楚。它关系到国内外、党内的斗争，牵扯历史和现实，还有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党内的斗争，局外人是容易知道的。为什么会出来一个‘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定是看到了什么‘危险’，而且用一般的办法已经解决不了了，所以才发动这个运动，但是后来他控制不住局面了，以致酿成一场灾难。这样繁杂的大事情，真相搞不清楚，不好讲。”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过，总会有人研究这段历史的，比如巴金、季羨林都写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生产力搞上去，这20多年虽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但是和发达

国家比，我们差得还很远。再说，我想做的事情这么多，留下的时间却很少，哪里有时间算旧账……”话没有再往下说，叔叔就回房间去了。

我知道，叔叔是想用最通俗的、简单的话给我讲解一桩很难说清楚的事情。我也知道，现在能够和叔叔讨论问题的“对手”越来越少了，他常常为没有人和他争论，使他对问题的思考不能更加深入而感到无奈。我和他的差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大概正是这个差距加大了他和我讲话的困难。

自那天起，我一直试图弄明白叔叔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最近似乎想出了一些“道理”，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事实。

新中国成立之初，叔叔被共产党人身上那股压倒一切的气势所折服，相信这个新政权会更好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积极热情地投身到这个新政权的建设当中。他还认为，像他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意识改造之后，才能跟上时代，不掉队。他积极、主动地进行这样的改造，并且自认为找到了改造的路子，希望自己能在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一个“样本”的作用。在经历一段痛苦的过程之后，总算过了思想改造这关，并受到重用，当上了官，一下子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

但是没过多久即遭致命打击，一夜之间所有人的“脸都突然转过去”了，人们肆无忌惮地用歪曲、篡改了的材料对他进行批判，甚至搞“人身攻击”。这就如同当头挨了一棒，他被打蒙了，思想乱了，想不通其中的道理，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1987年他和巴博德谈起这段历史时说：“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现自己落入陷阱。甚至现在我也不真正了解那个突然变化的背后是什么。”这种思想上的混乱，使他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产生怀疑，“不相信自己还能做什么事”了，以致“放弃希望”，失去了“奋斗目标”。在这样既无目标，又无希望的状态里，他觉得自己“不能忍受回顾，也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又不想回顾”。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还有什么比思想、智力被扼杀，比失去了奋斗目标、没了希望更痛苦！

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国家拖向了崩溃的边缘，中华文明遭到

践踏。叔叔受到了心灵和肉体上的摧残，以致万念俱灰，甚至“考虑过自杀”。

叔叔是坚强的，终于活着闯了过来，这时虽然他已经是个耄耋老人，但是像大多数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那样，一旦获得了工作的机会，便立即无怨无悔地回到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效力的行列里。他说：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意外地得到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要抓住它不浪费掉。现在看，我过去的路子和讲的道理有不少是对的，但是有点超前，今后得走“安全路线”，要知道我已经没有时间再“折腾”了。我理解叔叔，他不想花费时间去回忆、去追究，而是要把精力全部放在眼前亟须做的工作上，所以在谈到过去的问题时，就一带而过，不多说什么了。

不过孝通叔叔是个脑筋停不下来的人，我想他一定会对过去的经历进行“盘点”。比如说，当年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知识分子改造的路子”，并且写了很多文章，希望别人也能这样。如今，对这个“路子”有什么看法？会怎样重新评说……很遗憾，这些问题已经不能向他老人家当面求教了。虽说这个想法是我私下里的揣测，但是我确实听叔叔说过，他那个时期的一些做法是“对不起知识分子”的，是一个“很大的过失”，甚至是“罪过”。

我又想到1989年五六月间的那场“风波”。在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下达戒严令之前，学生们集会游行已经有好多天了，后来索性在天安门广场上搭帐篷驻扎下来。

从那个星期日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再见到叔叔，我知道他正在为排解这样一件严重的事件而忙碌。我也相信叔叔对待学生上街的态度，和1987年那次一样，一定“不认为这种风潮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学生上街不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应该允许学生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相信形势最后会平静，因为这几年国民经济在很快地增长”。

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叔叔对这场“风波”说过什么，只是在时隔几年以后，才听他说，当时盟中央领导，在应对这场风波时十分小心，因为这不仅仅是盟中央几个领导人的事，搞不好就可能殃及全国几十万盟员，甚至会影响到整个

民主党派，事关重大……他还觉得那些“学生领袖”还不“成熟”。此外，我想叔叔一定认为，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眼下迫切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生活上的“保障”，全国上下要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这才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十六、最后冲刺

回家的感觉真好。北京的“非典”终于得到控制，我们可以回家了。张荣华告诉我，回家后，老先生要给学生讲课，要我也去听听。

6月30日开课了，叔叔在开场白里说：“我每次讲一个上午，大约两个钟点，讲课中间，你们有什么地方没听清楚，或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这天他从9点半开始，一口气讲到11点半。后来在7月7日、11日、14日、18日、21日，又连续讲了五次。课后，我把这几堂课讲的部分内容整理成《暮年漫谈》一文。按惯例，文章写好之后要交给叔叔修改、审定，可是他在26日就去了大庆，一路上很辛苦，我不忍心去打扰，想等稍有空闲时再把文章交给他。

大庆是叔叔心仪已久的地方，但是却一直没有机会去拜访。这次访问，他参观了铁人



▲ 2003年6月30日开始讲课。

王进喜纪念馆,聆听了铁人讲话的录音,还到铁人40多年前打的第一口油井旁,倾听石油在“采油树”里汨汨流淌的响声。访问中他了解到,这个地区的石油资源正在逐年减少,在长期的采油过程中,当地的地质结构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后果日益显现,大庆市正承受着整治生态环境和发展替代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的巨大压力。叔叔认为,大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未来的兴与衰,其影响和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大庆和黑龙江省的“经济问题”了,它是具有全国,甚至超越国界,包含了经济和政治特殊内涵的大事情。解决好大庆发展后劲,其中包含了对大庆生态环境治理的好坏,关系重大!大庆目前遇到的问题,应当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并给予一定的帮助。返京后,叔叔就向中央有关领导提出了关于加强大庆市地质灾害治理和加快替代产业发展的具体建议。

8月,叔叔赴太原参加“晋阳文化与民族精神”座谈会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暑期论坛工作座谈会;8月底访问甘肃定西,参观陕西杨陵农业高科技示范区;9月,为了解“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CEPA)签署后,广东省推动泛珠江三角洲“9+2”计划的实施情况,南下深圳、东莞、广州考察,直到10月1日才回到北京。我想休息几天以后,就可以请他审阅《暮年漫谈》了。没想到假期刚过,他就病倒了,从此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拖到年底,终于住进了医院,这篇文章一直没有交到他手里。

叔叔病倒了,让我心里存下一个挥之不去的“痛”——作为晚辈,在他最后的几年里,我虽然经常听到他抱怨自己的精力大不如前,也看到他劳累的样子,但是却没有劝叔叔注意休息,也没提醒宗惠他们多加留心,应该适当放慢脚步,减少外出。中国有句老话:“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就是告诫老人,生活不宜有大的波动,要放松些,不能把弦绷得太紧。但叔叔在“非典”之后,连续讲了六节课,接着外出考察,一路上要开会、要讲话,要应付宴请、要接待朋友……叔叔病倒,我想跟频繁出行和过快的工作节奏不无关系吧。叔叔去世虽然已经好几年,但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无比内疚。

2003年对于叔叔来说，原本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年，因为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刚好20年，有关方面打算在年末举办一系列活动来庆贺。叔叔也认为自己对“小城镇，大问题”的调查，已经到画句号的时候了，应该说几句“结束语”。他对我说：“问题”是从家乡开始的，句号也画在那里吧。

为了画这个句号，2002年的清明节刚过，叔叔就回吴江老家，后来又走访了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和苏北的盐城、阜宁；浙江的宁波、台州、临安等地。每到一处，叔叔除了深入村镇自己观察外，还邀请下面一些搞实际工作的同志和过去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老同志、老朋友一起讨论。他要我把他一路上看到的变化和说的话整理出来。记得一次谈话时，有位同志问叔叔对当前一些人说“小城镇建设已经过时，现在应该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说法怎么看？听到这个提问，我不由得神情一振，心想叔叔会不会即兴讲出一套道理来。只见叔叔缓缓地回答：我也听到了这种意见，说明大家都在关心小城镇建设的问题，他提出自己的想法，见仁见智，很好。我们搞小城镇研究，是要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真实地记录下来，这是中国农民为了找到一条“活路”闯出来的，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我们研究小城镇，只是把里边的道理加以总结，把好的经验宣传出去，希望能够更快地让更多的农民生活富裕起来。但是应该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会出现许多新事物、新问题，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实在是赶不上形势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努力。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我们的研究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要对老百姓有利……

叔叔的这番话让我一下子想起五六十年前，他提出“乡土重建”的主张以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在答复各家的批评时他说：自己写的文章是忠实地记录自己思考的结果，这结果是从自己的经验和许多别人的经验和思想中所思索出来的，写出来不过是供给别人思索时作参考，希望大家共有的知识能更完全一些，更丰富一些。讨论的时候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目的是用别人不同的意见来修正自己的看法。他从各家踊跃发表的意见中得到了许多启发，为此要向大

家诚恳地表示感谢。他甚至计划在出版《乡土重建》这本书时，把大家的批评一起编进去，成一本讨论集。后来因为印刷和出版方面的原因没能实现。

我觉得叔叔对待人们在小城镇建设上的不同意见，和几十年前一样，他没有就事论事地去评论孰是孰非，而是把它看做是学术讨论中不同的观点，是值得欢迎的。我想这就是一个学者的大度和宽广胸怀！

从南方回来，我把记录下的材料整理出《家乡大发展的20年》一文，叔叔看了以后，觉得这篇文章还没有把意思说完，就请北京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的几位同志来讨论。讨论以后他认为其中的一些内容可以补充上一篇文章“意犹未尽”之处，就请参加讨论的邱泽奇，以问答的形式整理出来，经修改后定稿成《发展如蜕变，说城镇与区域经济》。

2003年除了为“小城镇，大问题”研究画上句号外，叔叔还写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美美与共”和人类发展》等好几篇“有分量的，总结性的学术论文”。

这些年叔叔一直说自己在进行“学术反思”，其实这是“温故”而“知新”，通过“反思”遥望“未来”——他想到“小康之后我们的路子应该怎样走下去”，为“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和开路的工作”，他提出“文化自觉”的主张，呼吁地球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大小群体共同创造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他认为，今天中国人民正迈开大步走向世界，中西文化不可避免地又碰了头，在西方文化面前中华民族“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中华民族要通过“文化自觉”搞清楚自己的文化，确立自己的位置，同时理解接触到的外来文化，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大家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中华民族有责任先从认识自己的文化开始，在认真了解、理解、研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现代的新文化，为将来创建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准备条件。

然而要做到“文化转型”谈何容易！叔叔常用1997年访问江南古镇甬直

时碰到的一件小事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天中午，他参观了镇上新建设的工厂小区、住宅小区和大型游乐场“惊险大世界”后，来到甬直老镇的街上游览。路边一家店铺的主人正在准备午饭，桌上摆的都是他熟悉的家乡菜，就信步走了进去和主人攀谈起来。不大的店堂一下子挤满了人。就在进屋的那一刻，他看见一位穿长裙、扎头巾的老太太迅速地躲进了里间，然后掀开门帘一角偷偷向外看。老太太典型的江南服饰，让他想起自己的祖母和三好婆，感到很亲切，很想请老太太出来一起聊聊。但是出乎意料，任凭大家怎么动员，老太太就是不肯露面，见此情景叔叔只好说：人家不想出来，就别勉强了。

回宾馆后，有记者问他对刚才发生的一幕有何想法？于是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记者：那个老太太不愿出来，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答：我看到了一个文化的变化。我们诚心诚意地请她，老太太却不肯出面，很有意思，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到了一个题目，叫“文化的自卑感”。中国现在最怕的，就是文化的自卑。不肯出来的意思，是她要走了。文化要走了。自己觉得不能出来见人了。不是大家不要她，大家欢迎她出来，可是她自己觉得她那一套不行了。这样一来，她真的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淘汰你，是你自己要走了。你这文化要退出舞台了。老了，老到自己没有信心了。这不是她个人的自卑，她对她的文化没有信心了。

记者：我很想知道您觉得“文化要走了”时的内心感受。

答：很惨呐！我是联系中国文化想这件事。这是个很惨的局面，我们不能走到这一步。真的弄到这一步，那就难了，就非得整个换一套了。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想换。现在时兴港式的东西，很多年轻人的头发要披起来，这叫老太太怎么接受啊？她不可能接受这一套，可是又觉得自己这一套拿不出来了。你看多苦啊。

你看过我写的讲“文化自觉”的文章。我讲文化自觉，一个意思是敢

于拿出来。我们有好东西啊。可是老太太做不到了。不是她个人做不到，而是这套文化虚弱了几百年了。现在有个大问题，中国人不敢真正拿出自己的面貌来，对不对？好的东西，自己认为不好了。有时候，觉得自己还有好东西，可是只能自己看，不能拿给人家，不敢亮相。我们要敢于在世界上亮相。我就是这句话。文化自觉就是敢于在世界上亮相！

记者：还要敢于坚持自己。

答：首先是要有自信。你自己都没有信心了，怎么坚持啊？我们很友好，去访问老人家，希望她出来。她有这个机会出来，她家里的人也希望她出来。可是她觉得那一套装束不能出来。这个厉害啊！我知道，现在我们中国也有人觉得自己不行了，这个很苦的。

记者：从前读您的《访美掠影》，您在一个美国教授家里，从东西方不同的饮食习惯中谈出了走什么样的现代化路子的问题。今天这一幕，您又从老太太不肯出来的心理，看出了文化的自卑感问题。

答：所以我后来说，不要叫她出来了。不要叫人家痛苦啊！假定她勉强坐到我们这些人面前，就更痛苦了。她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梳妆一番，还是有快乐的，还有人欣赏她。可是叫她到我们面前，她不肯，因为她知道，我们不是她那个文化里的人。

问：平时没有外人来欣赏她，突然有一群人来到面前，有人欣赏她，她害怕了。如果经常有人来欣赏她……

答：不是这样。她还没有理解到我们欣赏她。她的理解，有点像我对你的理解一样，你找我，我知道你有一个目的，是要拍电视。老太太觉得我是好奇，看看她，是要表示我对群众很好，而不是真正欣赏她。我们这批人里边，真正欣赏她的人没几个。只是觉得今天这个场面里有这么一个老太太很好。

问：费老，我感觉出来，您和这样的小镇有一种很深的感情。

答：我就是从小镇出来的嘛！我的心情很复杂。从小熟悉的小桥流

水这种文化存在不下去了。旁边这个力量多强！那是个“惊险大世界”。中国文化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讲人和自然的协调，讲人与人的和睦。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我们要敢于拿出来，有文化的自觉，有文化的自信。

第二天清晨，昨日的情景依然萦绕在叔叔的脑海里，兴之所至，提笔赋诗一首：

为觅童时境，
弃车入旧镇。
小桥流水石驳岸，
实物犹存未失真。
老妪腰缠裙、头扎巾，
小我二十春。
叩问何不移家入新村？
答云“鸡犬尤恋窝，
此处多旧邻”。
街狭弄深楼相接，
推窗攀谈笑语频。
沿街堂前摆餐席，
谈笑不避过路人。
满桌多香味，
鱼鲜菜蔬新。
此地无惊险，
欢乐属天伦。
揖别老乡亲，
低头自思量：



推陈乃出新。

文化转型何其如此费精神？

▲
在家乡的油菜花里。

难道叔叔已经感觉自己快跑到终点，在做最后的冲刺！所以 2003 这一年仍然东西穿梭，南北奔走，不肯停下脚步，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笔。

10 月 5 日早晨起床的时候，叔叔发觉自己的左手不能动，舌头发僵，话说不利落了，不过意识还清楚。听宗惠讲，当时老先生示意不去医院，于是他们请了几位医生朋友来诊治。经过调理，症状有了一些缓解。11 日我去看望的时候，叔叔正坐在藤椅里，宗惠在旁边陪他说话。我问候之后坐下，他告诉我：“这次病得厉害，好不了了，现在还不能看书，可是脑筋停不下来，还要想这想那。”宗惠赶紧说：“谁说的，你今天比昨天要好，说话清楚多了。”其实在我听来，他说话不仅比平时慢了而且显得吃力，但是还能听得清楚。这次去广

东我没一起去，为了转移话题，我问他：“这次去广东累了，休息一下会好的。在广东看了不少东西吧？”他指了指桌上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张图片说：“香港开了这么个会，很有意思。”我一看，是一幅从报上剪下来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关系”）签约仪式的一张新闻照片。接着他就断断续续地讲起来。

叔叔讲得很有条理，说到关键处，怕我听不懂，还要写出来。但是写字的时候只是凭感觉，眼睛并没有看，字越写越小，有的挤到了一起。我听着虽然吃力，但还是明白了他说的意思。他说：这个“关系”用签约的形式确定了内地、香港，加上澳门之间的相互合作，也可以说是合伙，像老百姓中间的结义，就是《三国演义》里边的“桃园三结义”。“关系”允许外商通过许多变通的办法将产品运到内地来卖，换句话说就是欢迎、鼓励外国到香港投资。这样做有好处，但是坏处也很大，好处是能够繁荣香港经济，内地也得利，老百姓可以更富一些，同时因为经济利益的关系，我们不会成为“伊拉克”，可以得到一段时间的和平；坏处是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世界加工厂，自主权减弱。从政治上看，这是一国两制的具体体现，这样做，必然会推进内地的民主进程。民主党派领导人要看到这里面的“奥妙”，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党派应该可以有所作为。

另外，这个“关系”对构建“大珠江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内地的政治体制改革都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个“关系”出台，基本上奠定了我国东南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局。从学术角度讲，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课题，可惜我已经没有力量再去研究了……时间过得很快，已经一个多小时了，我看叔叔有点累，就告辞退了出来，一边默默祈祷他早日康复。

然而事与愿违，叔叔的健康状况一直没有大的起色。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亲自去参加各种活动了，于是向潘乃谷口授了《老来还要向前看》、《给南京纪念〈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的信》、《给“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信》和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四篇信件和讲稿。还要潘乃谷将这一段时间里

他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且希望将这些“想法”转告各位同仁，要大家“讨论讨论”。

后来，潘乃谷在一篇文章中说：费先生虽然老了，“但总是努力地‘冲’在前面，把自己看到的、发现的新问题及时告诉大家。然后提出希望，说自己力量不够了，希望年轻一代跟上时代，抓住机遇，从实求知，打好基础，放开思路，把研究工作深入下去。”文章中还披露了叔叔交给她的，在病中写下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虽然很多字不易辨认，但意思是很清楚的……这些就是他最后要对我们说的话”：

病时所思，作为留言可也。

成人以来立志以脑力劳动为人民大众谋些福利，即所谓志在富民。回顾此生这个志愿基本上做到了的，至于有什么效果就让别人在身后去评论了。自凭（觉）在我这一代人中是尽力为这目的去努力的一个。但所学不够，更不深入。学习得不够认真，不够高要求。这是真话。成绩不如条件好，多得于人而出的不够，也可说是负此生的机遇。这是真心话。受于人者远过于援于人，这个天平上我不是个成功者。我是想做得更好更多些的，但到自觉时，存信者不坚是件大苦事。作为一个教训，不要失去时间和机会，要有自觉。这是为什么我说要补课的真实原因。其实我是想自责耳。有心理条件时不主动充分争取，多留着一些尾巴，失之极易，追以难及，这是我自己最后的一点心理，也是忏悔，是一点自己的悔恨，一点自知之明。

当此初，作力追取要及时，莫悔恨失之错臂。举个例子说，我所师从的几位老师是很难得的，但我并没有好好地学，把他们的成就继承下来。比如史禄国的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 其含义很深，我没有搞清楚。又如潘光旦的新儒学的见解，我也没有好好学会。其他如 Park 和 Malinowski 我只是掠了个皮毛，没有深入。学习不认真是我的大毛病。

二十七、谢幕

2003年12月7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费孝通学术基金主办的“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钓鱼台宾馆召开。叔叔抱病出席了会议，讲话时，他只讲了几句，就由助手潘乃谷代为念讲稿——他已经没有气力讲话了。这是叔叔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之后，他的身体更加虚弱，晚上经常发低烧。我知道叔叔是最不乐意住医院的，他说医院里的氛围使他觉得不舒服，医生、护士的白大褂，床边挂着的输液瓶子，一切都在提醒自己是个“病人”，搞得人精神紧张。但是我也知道，老年人抵抗力低，最怕感冒发烧引起并发症。我想宗惠他们，应该尽力说服老人家到医院去才是。

12月28日，叔叔终于不得不住进医院。那天晚上，他高烧40.3℃，白血球高达11000，心跳每分钟100多次，情况十分凶险。叔叔得了对老年人威胁最厉害的肺炎。医生立即采取各项紧急措施，29日凌晨用上了呼吸机，身下铺了“冰毯”降温，提取痰液进行“培养”，希望能够查出炎症的元凶，好对症下药。但是一直没有查出来，只能给叔叔使用“广谱”的抗生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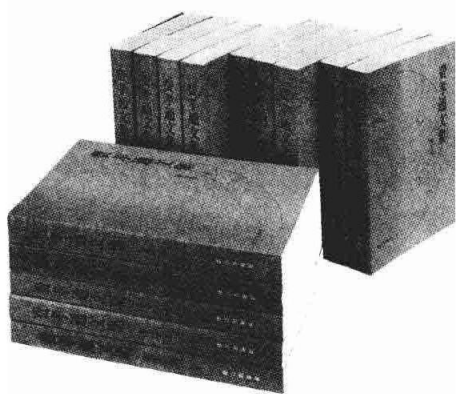
29日上午我赶到医院，只见叔叔闭着眼睛，平躺在病床上，最扎眼的是

旁边那台一人来高，正在运行着的机器。从机器上引出的一根软管插在他嘴里，通过这根拇指粗细的管子，氧气正呼哧呼哧地输入他肺里。这就是所谓的“呼吸机”。

叔叔在病榻上度过 2003 年除夕。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叔叔的体温降了下来，各项指标也都接近正常，病情得到缓解。1月8日撤掉了呼吸机。可以说，这十来天他闯过了一关，连医生都说：费老创造了一个“奇迹”。叔叔精神好多了，可以说话了，虽然还没有力气说出连贯的句子。他的头脑依然清醒，从简短的话语和所写的字迹中，大家都能懂得他要表达的意思。他问张荣华这次发病的原因，又问他住院以后，家里会有什么困难。他要宗惠读报给他听，有时还坐起来看看电视新闻，让服务员用轮椅推着，到楼道里转转……

看到叔叔恢复得快，我心里非常高兴，盼望他尽早出院回家。一次去医院探视，到床边和他握手以后，他示意我坐下，然后问有什么新闻？我说这几天大家都关心台湾的选举，陈水扁挨了枪，不知道他会不会连任？他微微点头说：要看美国的态度。这家伙用上青红帮的手段。这次他赢了。我看他精神挺好，就问他：“这次生病，是不是又想了很多新问题？”他回答：“多得很。”说完又做了个写字的手势，我把一沓纸和笔递到他手里，他躺在床上写了“多得很”三个字；我又问：“现在你一定很苦恼，因为有很多想法不能表达出来。”他写了“是”；我凑到他耳边大声说：“不要紧，等你养好了身体，把想法讲给我听，我再帮你整理出来。”他摇摇头，摸



▲ 作为一名教师，一位学者，95岁的孝通叔叔写有大量的文章。称他“著作等身”，一点也不为过。

索着写下“不可能了”。我默默地看着这四个字，无话可说。

叔叔的病情虽然有了缓解，但是恢复的好势头没有延续下去，体温一直稳定不下来，医生说他体内还有炎症，用了多种抗菌素，却没有彻底消炎，时好时坏地拖着。在与疾病抗争中，叔叔耗尽了精力。时间悄悄地溜走，我们在病房里送走了2004年。

元旦刚过，护士在量体温的时候，发现叔叔左右两边腋下的温度不一样，右边要比左边高1℃左右。医生说大概是因为右边有栓塞和右肺上有肿瘤的缘故吧——叔叔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肺部发现肿瘤，出现胸积水、左手颤抖、腿肿、心跳加快；血压降低到40、30；血色素7点几，输了800多cc血后，指标仍没有上来……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叔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叔叔终于撂下手头的工作，躺下休息了，就像一个老农，在地里耕作，累了，想歇一歇，当他坐下来，抬起头放眼向四处望去时，发现自己的耕耘有了收获——他的学术思想留下来，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表明，“在2000—2004年社会学论文被引用最多的作者统计中，费孝通高居第一。”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先生说：“（费孝通）的一些重要著作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话语词汇被人们所使用，从很久以前一直到今天，具有常青的生命力，特别是今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正在使用……如果我们用中文网络搜索引擎‘百度’作一个快速统计……初步调查的结果：与‘乡土中国’和‘费孝通’这两个关键词放在一起搜索的结果是22000篇，‘乡土中国’单独搜索的结果是89800条……费老没有离开我们，他的伟大名字和伟大的学术思想已经在年轻人中传播开来。”

中国老百姓不会忘记他。据报载，举行费孝通遗体告别仪式那天，超过6000人来到八宝山为他送行，还有更多的人，通过网络表达对费孝通的哀悼：



乡亲们为孝通叔叔树立的墓碑。

——惊闻噩耗，难受万分！《江村经济》，辟国际社会研究中国之窗口；《乡土中国》，成专家学者探讨中国之必备。斯人虽逝，功绩长存！

——费老真正推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并且把社会学的抽象理论应用于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实践。不朽于民，永铭于史。

——作为一个温州人，感谢费老为温州正名。

——费老曾关心过山东东营的发展，他是最最敬仰的人。

——吴江人民怀念您，您是吴江的青松，永远耸立在人民心中。

.....

2007年清明时节，叔叔的骨灰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到了家乡吴江，安葬在离他出生地磨坊弄不过百米之遥的松陵公园。他的身旁矗立着一块浑圆、庄重的青石，上面镌刻着他说过的一句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后记

叔叔去世后，我常翻看他的文章，边看边回想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一天，忽然想到他写的一篇短文，说他写那样的文章是在做“脑力体操”，可以防止脑力衰退。看来他的话是有道理的。叔叔90多岁的时候，思维仍十分敏捷，讲话逻辑性很强，一点没有老年人啰啰唆唆说车轱辘话的毛病，即使躺在病榻上，身体很衰弱了，脑子依然清晰。我想这肯定是他长期动“脑筋”的结果，其中做“脑力体操”一定也起了作用。

如今我也排到了老年人的队列里，跟大多数老年人一样，每天要吃些维生素之类的东西，希望自己的脑筋衰退得不要太快，同时也想照叔叔说的，做做“脑力体操”。这个体操怎么做？我想，把这些年和叔叔在一起时看到、听到、想到的一些事情写下来，就把它当作“脑力体操”吧。我管它叫“自言自语”，意思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只说给自己听。

有一次，和几个朋友聊天，大家不知不觉谈到和费老相处时的许多往事，我说自己正在做“脑力体操”，零零星星地记了一些和老先生在一起时的见闻。“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没想到我不经意说的话，引起坐在旁边的吴志实的兴趣。志实是作家，又搞了多年编辑和出版工作。听了我的话接茬说：“你写的东西

可能挺有意思。费老是你叔叔，你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些外人不知道的故事。不妨下点功夫，把它写成一本书。”我说：“你是赶鸭子上架，难为人。我可写不了。”没想到志实的建议得到了其他朋友的响应，大家七嘴八舌地怂恿我试试，志实还答应：“先写起来，有问题我帮你。”

我被说动了，心想反正要做“体操”，如果按志实的要求去写，就好比把体操动作难度提高罢了，做不了，再降下来就是了，而且又不“限时限量”，没有压力，试试何妨。

事情开始后才知，这套“体操”还挺难，就像要我这个老头，再来练踢腿劈叉一样。写作不仅进展缓慢，有时干脆写不下去，卡住了。每当这时，我就约朋友们来侃一通，大家的讨论往往会让我的思路豁然开朗……再接着写。这些文字就是在大家的帮助和鼓励下“码”出来的。

当我在电脑上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时，我真想立即跑去找董云志，向这位老同学表示感谢，是他不断鼓励我，同我一起回忆陈年旧事，不断给我提供写作的素材；还有马宝琛——我退休前的老搭档，始终支持我，帮我搜集了不少资料；特别要感谢志实，他不仅给我出了写作的题目，而且在每次“卡壳”的时候，都给了我具体的帮助，使我能够接着写下去……

我要说明的是，这里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想到的有关孝通叔叔的一些往事片段，如果这些回忆里边，有因为时间久远、理解有误、表达不清而偏离了事实或背离了叔叔意愿的地方，都应该由我负责。

叔叔去世快要满五年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只不过是出远门做调查去了，只是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一些。待他回来，我会把这本《我的叔叔费孝通》交给他，请他审阅、修改……

我等着。

费 皖

2009年1月30日